

辩证法与 社会学

[苏] 米·尼·鲁特凯维奇 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辩证法与社会学

〔苏〕米·尼·鲁特凯维奇 著

朱有钰 金宗美 顾晓鸣 译

毛信仁 王志伟

朱有钰 金宗美 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年·福州

М. Н. Руткович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СОЦИ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0

本书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辩证法与社会学

〔苏〕米·尼·鲁特凯维奇 著

朱有钰 金宗美 顾晓鸣 译

毛信仁 王志伟

朱有钰 金宗美 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0.5印张 249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490

ISBN 7-211-00206-9

B·6

书号：2173·64

定价：2.30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译者的话

《辩证法与社会学》一书系苏联著名社会学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鲁特凯维奇所著，1980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作者在书中阐述了作为认识方法的辩证法的重要性，分析了社会学各个层次间的相互作用。他在社会学结构层次方面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苏联社会学家的看法。书中对苏联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辩证法进行了分析，总结和归纳了社会过程的规划和管理实际工作，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最新学派的方法论基础也有一定的分析和批判。

米·尼·鲁特凯维奇生于1917年，基辅大学物理系毕业，曾任乌拉尔大学教授。1961年得哲学博士学位，1970年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3年起任苏联社会学学会理事会主席、《社会学研究》杂志编委。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朱有钰（第一章），金宗美（第二章），顾晓鸣（序言和第三章），毛信仁（第四章），王志伟（第五、六章）。由朱有钰、金宗美校译。

目 录

前 言	(1)
-----	-------

第 一 编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社会学科学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对象和方法	(13)
第一节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对象	(13)
第二节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与结构	(33)
第三节 社会学认识层次的辩证相互联系	(46)
第二章 唯物辩证法对于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	(65)
第一节 辩证法是社会发展的理论	(66)
第二节 辩证法是社会认识论	(93)
第三节 社会学中的概念辩证法	(105)
第三章 辩证法、社会学与当代的全球性问题	(131)
第一节 全球发展的预测：哲学与社会学方面	(131)
第二节 战争与和平问题：哲学与社会学方面	(155)

第 二 编

苏联社会的社会发展辩证法与社会学科学

第四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 相互关系辩证法	(170)
第一节 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	

社会政策·····	(170)
第二节 社会学与社会规划·····	(184)
第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辩证法·····	(206)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概念·····	(206)
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	(230)
第三节 向社会单一性发展的辩证法·····	(250)
第六章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及其发展的辩证法·····	(273)
第一节 生活方式是一个社会学范畴·····	(273)
第二节 生活方式与个性形成·····	(287)
第三节 生活方式的质量与数量特征。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与 生活水平·····	(301)
第四节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辩证法·····	(317)

前 言

20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非常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学科提高到了首要的地位。这个现象发生在属于不同社会体系、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中，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也还具有若干基于当代特点的共同的原因。社会思想发展的源泉，归根到底，是新的社会条件和需求。在这一社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世纪中，社会发展的过程，更为复杂，速度更快，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参加到积极的历史性的创造活动中去，大众信息工具的蓬勃发展，从而具备了影响人们思想的可能性——这就是产生开展各种规模的社会学研究，诸如应用研究、具体研究和经验研究（关于这些概念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见后）的必要性的基本因素。具体社会学研究直接从科技进步中获得强大的推动力，是由于大众信息工具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为进行具体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组织技术的条件。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各国人民和整个人类迫切需要预见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前景，而如果对历史进步道路没有深刻的理解，没有既用作概括其他社会科学的资料，又概括具体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理论社会学，这种预见是不可能的。

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表现为科学信息流的增长，几十个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出版了众多的社会学杂志。研究领域的扩大使科学知识日益分化。人们提到的许多杂志并非关于总体社会学的，而是涉及其一定的分支，例如农村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等。在更大程度上，上述杂志属于专题学术著作。全世界每年出版成千上

万册社会学书籍，社会学分部或社会学系为其他专业学生开设的社会学课程也一样，都已成为大学教育必要的组成部分。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社会学者在工业、管理机构、大众信息机构和各种类型的学校中大显身手。但是，近十年间，在西方国家中，在培养社会学家方面，在培养人文专业的许多年轻专家方面也同样如此，明显地暴露出“过剩”现象。相反，在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却感到社会学家的不足，并且提出了关于扩大社会学教育的有充分根据的建议。

科学知识的基础部分与应用部分，总体和整体上的理论与经验，是平行地、相互联系地发展着的，虽然其中之一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落后于另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建立了真正科学的总体社会学理论，这正好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问世发生在同一时候，而这本书又可以看作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样板，这不是巧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理论上总结了大量的事实材料，首先是经济材料，还有在现在被称为具体社会学的材料，例如涉及工人阶级日常生活条件的材料。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础的这一传统，已为列宁在他的早期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加以继承。

在当代社会研究的方法、组织和技术（由于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已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条件下，在作为方法论基础的社会学理论中，就更加迫切地需要经验的、具体的和应用的社会学研究了。

经验主义的倾向表现为不仅对经验资料，而且对研究的方法和组织技术方面加以绝对化，这有损于原来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法，这种倾向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恩格斯在1885年指出过，理论自然科学的革命（这个革命开始于19世纪中叶，但是达到最高点要晚一些，在物理学中是在20世纪第

一个二十五年)“必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①。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看清了,恩格斯当时是何等的正确,而且,它的正确性不仅仅只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时代社会生活的蓬勃发展,甚至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认识到社会过程的辩证性质和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作用。

然而,在西方社会学中,对数量方法的热衷,以及明显地出现于本世纪20至30年代的,与之相联系的经验主义的浪潮,远远没有得到克服。在社会学中,谈不上缺乏科学的社会理论,因为,社会科学的革命已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19世纪完成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对于许许多多忙于进行应用研究的西方社会学家来说,仍然是不知晓的。他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所讲授的大学课程来判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同他们所坚持的意识形态观念,同他们对习以为常的固定的生活方式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经验主义渐渐不时髦了。关于“宏观社会学”,即总体理论,同照旧纠缠于琐碎问题甚至有时是假问题的“微观社会学”相脱节的论断,现今充斥着西方国家的书籍和杂志。严肃的资产阶级学者,其中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公正地把社会学首先看成是理论的科学。因而,全部问题在于他们能否提出可作为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的东西。

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最主要的理论家所提供的概念图式,是来自Γ. 斯宾塞、Э. 涂尔干、M. 韦伯和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的其他古典社会学家。首先,这些理论没有为理解人类总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为我们急剧多变的时代提供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5页。

匙。第二，这些理论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同经验研究的实践相联系。例如，被认为在几十年中对美国社会学最有影响的T.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由于其理论体系的思辨性质，对经验研究的发展未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而那些站在与其气味相投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立场上批判经验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的流派，对经验社会学的影响那就更小了。例如，从Э. 胡塞尔哲学中汲取观点的“现象学社会学”，与法国存在主义有联系的R. 古尔维奇的“辩证社会学”，冒充“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等等。在西方，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社会学的脱节正在加深，这迫使许多理论家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学日益迫切的危机”。在一本以这句话为标题的书中，A. 古德纳尔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学”具有“辩证法的性质”^①，也就是说，他承认社会学同他所理解的辩证法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只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哲学原理——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能作为经验研究的真正的理论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毫无疑问，社会学同一切科学一样，是理论和经验的统一，而且经验研究只有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才可能顺利地进行，而科学理论也应该在总结经验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起来。由此就产生理论和方法论在对于研究的方法、组织和技术方面所起的首要作用问题：选择方法方式和组织技术手段应该取决于研究的理论目标和方法论。而如果说，60年代苏联社会学曾出现热衷于经验主义那样的“幼稚病”症状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这是部分科学工作者无批判地借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经验，没有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缘故。同时也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的应用社会学的研究，在20年代获得较大的

① A. 古德纳尔著：《西方社会学日益迫切的危机》，纽约—伦敦，1970年，第12页。

发展，以后实际上中止了，而从50年代下半期起又迅猛地发展起来，还吸引了许多不具备应有的理论知识修养的人。

任何科学的方法论都必须采用其为了从事研究并得到新结论而制定的总的理论概念。但是，与此同时，不能不注意到，科学的每一个分支的方法论基础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于其本身。知识的任何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然而，它不是同其他部分相隔绝的，而且，归根到底，它是科学知识这一整棵树上的一根枝条。作为一切科学的共同研究客体的世界的统一，在由抽象思维于实践的基础上创造的、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关于世界的知识的统一中得到继续和反映。方法论集中了获得新知识的方法，在方法论的范畴中，由于科学知识的统一性，所以对于科学知识的每一个分支要求，第一，研究边缘科学思想和方法，这对于研究边缘现象尤为重要；第二，研究性质上更为一般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象物理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科学，对于自己的领域（物理学对于物质的基本性质，社会学对于社会）来说，是非常一般的科学，这种科学把在具体经验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同对这些知识的理论概括并且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概括结合起来。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些科学可以比作多级火箭。在物理学中，“第一级”是理论物理学，它分为最一般的几个部分，诸如，经典力学，热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社会学中，“第一级”是总体社会学理论，它提供有关人类社会发挥功能和发展的总的规律的知识。基础物理学理论对于下面几“级”以及对于物理科学的为数众多的部门的方法论意义，学者中谁也没有异议。同样，总体社会学理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在五花八门的社会学分支中则是作为局部社会学理论以及具体研究、应用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然而，除了上面提到的一般特点外，社会学在实质上是与物

理学不同的。在社会学中（如同在其他社会科学中一样），不存在通用的、在观点上统一的总体理论。在理论社会学中，流派和学派斗争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同与其对立的资产阶级理论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并不排除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流派和学派之间的竞争。尽管有这种区别，但社会学象物理学一样，如果不依靠更一般性质的科学，就不能顺利地获得发展。

确实，如果说，社会学具有自己的对象——人类社会，而社会是我们地球这一宇宙之一小部分上的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那么，社会学不能不有赖于提供总的知识的科学。这种科学就是数学和哲学。这两门科学，无论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对于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说，各自都充当了方法论的基础。但是，我们深信，数学和哲学绝对不是处于竞争者的位置，也绝对不应该相互对立。无论数学或哲学，对社会学都是必要的，并相得益彰，但是，在求助于它们以寻找认识方法时，应该追求不同的、虽则是一致的目的。换句话说，来源于哲学原理的社会学认识方法，应当为数学方法所补充。

新时代的知识数学化趋势，是从伽利略与牛顿的古典力学开始的，到了19世纪，这一趋势更为强烈地表现在物理学中，后来又扩大到化学和生物学，甚至扩大到社会科学。在社会学中，数学方法在20世纪主要是从经济科学、人口学和社会统计发展而来的。20世纪数学之渗入社会学，不仅表现在研究的准备工作（例如，取样）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学方法以及在对所获得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时使用电子计算机。数学渗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社会学的“灵魂”之中。数学方法被用于确定社会学研究的目标，用于表述要求用经验加以检验的假设，用于社会体系发展的模式化和预测。最近一个时期，已从预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以及使其模式化（人口的增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等）

向建立社会学性质的模式和预测过渡，同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人们综合地并且在国家、地区和世界范围的总体上加以处理。

在社会学中，应用数学方法意味着，一般理论的职能——解释和预见不仅具有质量的，而且具有数量的规定性。但是，数学在社会学思维中获得成功的过程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时候简单的公认的见解，有时候甚至陈腐的东西，也借助于复杂的数学符号来叙述。在社会学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数学式子用于反映那种很难、或者完全不能以数学定义加以表述的社会过程，例如艺术创作过程的内容。

可是，更为严重得多的是另一种危险性，就是在社会学知识领域内运用数学方法的进步过程被用来作为否定、或者至少是低估哲学在社会学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越出某一科学的界限向更一般的理论的突破，都是有利于证实哲学的必要性，而数学方法应用的日益扩大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作为测量的出发点的那些质量特征的正确性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数学方法同哲学方法论的对立，乃至试图把数学方法与哲学分隔开来，并把方法论归结为采用数学方法，这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它被用作替经验主义辩白，而这种经验主义在用一整套数学工具装备起来时也就获得了“尊严”。

西方理论社会学的代表在许多场合，向实证主义者借用这样的口实，说是哲学不可能为获得真理而提供好处，因而，他们同哲学是“隔绝”的。确实，20世纪哲学中，非理性主义和神学主义的潮流是敌视科学认识的。社会学从它们那里不可能得到好处。实证主义顽固坚持“科学本身就是哲学”的论点，那么求助于实证主义哲学也就无助于在社会科学中获得真理。

由于社会学家们对实证主义的这个论点信以为真，结果往往

处于“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的境地，在自然科学家中这样的人是不少的。他们惯于将日常意识以及默默承认社会过程的客观现实性的“健全的思想”来偷换哲学。“健全的思想”也能自发地承认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及其不间断的运动和变化，但是，正如恩格斯谈到自然科学家时所指出的，“健全的思想”由于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不坏的“谋士”，因此可能随着进到对现象更深刻的本质的认识时，把人引向迷途。他写道：“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①

这个警告对于研究社会生活特别需要，因为，在现象的表面，研究者看到的是人类活动的精神上的动机和理想的目标，这些东西只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对它们本身就需要进行解释。

西方社会学界人士在寻求理论指导时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求助于它的社会哲学和辩证法。这种趋向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当前的情况。这一趋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中已经出现了。该学派是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这个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在希特勒独裁时期，被迫离开德国而移居美国，并大大地影响了所有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想，特别是促进了“左翼激进”思想的发展。但是，除了M. 霍克海默尔、Γ. 阿多尔诺、Γ. 马尔库塞、Θ. 弗洛姆之外，形式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法，却日益流行起来了（如法国的JK. 古尔维奇，英国的T. 鲍陀摩等等）。开始研究总的哲学，特别是社会哲学，承认后者与理论社会学的联系，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学思想的现状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特点。

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作用。在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4页。

界社会学学会（MCA）召开的社会学大会上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世界社会学学会前主席 T. 鲍陀摩于1978年在乌普萨拉召开的第九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说了以下一段话：

“在学会存在的开头几年，在学会中还谈不上有各种流派；社会学科学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50年代，在社会学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一词，根本就没有提及，虽说马克思是研究社会的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可是现在，社会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占了应有的地位。”

本书的重点将是哲学和社会学科学的联系问题。但是，对于这个复杂而又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不想在所有范围都加以说明，而只是探讨它的若干方面。

首先，我们在下面要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它们作为科学认识的两个领域的相互联系。从当代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所取的材料，只有在有必要更充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近年来，在苏联出现了一系列西方作者的书，出版了不少著作，是专从整体上批判性地分析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其主要流派的。作者引导专门对有关课题感兴趣的读者去读这些著作。^①

第二，我们只限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社会学的相互联系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乃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问题，也就是它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意识地从阐明作为一个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结构，以及辩证法和总体社会学理论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的问题开始讲起。

但是，社会学并非就是总体的理论社会学，它超出总的理论

^① 例如参见《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莫斯科，1977年；《二十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社会学史》，莫斯科，1979年。

社会学的范围，从而同时也超出哲学的界限。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具有十分复杂的内部结构。因此，辩证法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问题，而且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学在其中占中心地位的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的更广泛的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和内部的统一问题之后，我们必须继而探索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结构和统一的问题，以便彻底研究认识的各层次以及社会学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阐明总体社会学在“中间层次”理论和具体研究及经验研究的发展中所起的方法论作用。

社会学作为理论学科具有自己的对象——社会发挥功能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辩证法是关于在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起作用的联系和发展的总的规律的科学。我们将首先从阐明辩证法作为较一般的科学的方法论作用方面，研究这些科学的相互联系。辩证法在三个方面发挥这种作用：作为发展的总体理论、作为认识论和作为关于思维的科学。辩证法对于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将根据这几点加以研究。而且，我们将对于在我们文献中研究得较少的问题——社会学中的概念辩证法给予特别的注意。以上简略介绍了本书第一编的任务。

与社会学不同的是，辩证法不仅仅是科学，它还是自然界和社会一切运动和发展过程内部所固有的。这个客观的辩证法反映在主观的辩证法中，即既表现为自发的，又表现为更高级的层次上的思维的辩证法中，反映在作为科学的辩证法中，反映在有意识地将它应用于认识和人们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及其实践的过程中。

客观辩证法说明发生于现实世界上的过程的更深刻的本质。物质在本质范围内从最低级形式向最高级形式的自我发展，说明运动的普遍规律和辩证法规律具有自身行动的特征。物质运动的

形式越是复杂，这个特征当然就越明显，自然过程中的客观辩证法也就具有更完整的面貌。人类社会的出现是这个地球上物质运动最复杂的形式，它象征着在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发展方面，其中包括辩证法规律的发展方面，向前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人们的行动具有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性质，因此，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包括人类活动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

但是，人类的历史并不是在原地踏步，相反，社会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如果说，恩格斯在一百年前把这个发展过程比作抛物线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现代这个过程可用指数曲线来加以表明。社会内部结构从原始部落向现代民族的进步，就象社会之间的联系从邻近部落偶然的交换和定期集市向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的复杂系统的进步一样，意味着社会进步的客观辩证法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给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其中包括给社会生活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增加了重要的特点。

因此，“辩证法与社会学”这一题目不能局限于研究科学知识的不同领域的相互作用。它还包括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对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辩证法的关系。社会学科学越是充分而自觉地采用作为认识方法的辩证法，它越是能较正确地反映总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当代历史过程的辩证法，也越能更充分地被用于驾驭社会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由于它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依据，在这方面比之所有别的社会学思想流派，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然而，这些优越性不会自动地起作用，它们必须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加以实现。

以上简略叙述了促使我们研究关于历史过程辩证法与社会学认识的发展相联系问题的原因。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得不在于相当大的程度上，对自己有所限制，远不可能研究全部问题。

有关当代全球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在本书第一编有所涉及。本书第二编完全用于论述现阶段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以及社会学在认识这一辩证法中的作用。

苏联的社会学科学如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必须给予现实社会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和对立性以及在新旧的斗争中的辩证发展过程以深刻的、全面的和客观的描述。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要求在提供正确方法论方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勇敢地干预生活。这恰恰是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对苏联思想战线上全体工作人员的号召。这个决议还强调指出了特别重视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①

^① <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1979年4月6日通过），莫斯科，1979年，第11页。

第 一 编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社会学科学

第 一 章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 主义社会学：对象和方法

第 一 节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对象

辩证法产生于古代并具有不少历史形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是它的最高形式。因此，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实质问题，需要用历史的态度进行研究，这对下面的讨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地中海地区（以及中国、印度、中东）的古文明哲学是一门统一的、混而未分的科学，现在已发展成为十分复杂的、多分支的科学知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哲学科学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最终受社会实践发展水平的制约，受人们在地球上以及最近数十年在靠近地球的宇宙空间对大自然的征服程度的制约，这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它正在我们的时代继续蓬勃发展。

科学是在科学知识的分化和整体化这两个对立趋向的互相制约中进步的。第一个趋向表现在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继从原始的混合科学——哲学——中分裂出来，表现在由这些科学

又构成一些专门的、其数量正在不可抑制地增加的科学。这一分化的结果，使研究整个世界并揭示认识中和行动中的人在其中所占的位置的哲学的对象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科学研究的客体与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完全是一回事，同一个客体，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它时，就可能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尤其对于象世界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客体来说，更是如此了。所以，为什么具体科学同哲学分离及其继续分化，既不象大石块的机械分裂那样，碎裂到最后互相之间永久地失去了联系，也不能比作园丁所做的工作，从“认识”树上剪下枝条，插到附近土里任其独立生长。

科学知识体系发展的辩证法应被看作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哲学分离出来的各门科学，在其独立性不断增长的同时又和哲学以及彼此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一门科学脱离哲学而独立，意味着与哲学建立了两方面的联系，一方面，使哲学成为具体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另一方面，使具体科学以新的、发展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所必须的资料充实哲学。分化的加剧必然促进整体化趋向的发展。这一趋向的表现形式很多，其中如作为科学知识体系中心的哲学发生了变化（指出这一点对我们的讨论特别重要）。哲学研究范围缩小到认识世界和人类思维的普遍特性、特点和普遍规律，从而哲学知识随着哲学科学结构的复杂化而深化了，哲学变为多分支的科学体系。在这一本身就已很矛盾的过程中还加上哲学流派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因而具有阶级性。

由于生产、商业，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发展，专门科学的形成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哲学对象的缩小过程，从15世纪末开始进展得更迅速。然而，对于哲学的新作用人们并没有立即意识到。新时代哲学最有名望的代表人物仍按传统习惯视哲学为“科学的科学”，似乎它不必经过对经验资料的分析就能使专门科学

中存在的问题迎刃而解，并使这些科学接受他们提出的抽象公式。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一些伟大思想家建立了哲学体系，这些体系将他们所处时代的科学知识系统化。在这些科学知识中包含了不少属于专门科学的天才思想。例如，笛卡尔的反应原理，康德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假说。为很多思想家所共有的，又为黑格尔发展到顶峰的把哲学视为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科学的企图，是有史可溯的。

但是，这一企图遭到具体科学代表人物的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在从事专题研究的科学家中，经验主义是大有市场的。他们力求摆脱深奥的理论，特别是哲学的世界观。自然科学家们对唯心主义产生不信任是因为它与宗教的联系，这对于经验主义能长久地保持其生命力起了不少的作用。哲学（尤其是唯心主义哲学）同倾向于经验主义的具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形成的。关于这一矛盾赫尔岑于19世纪40年代初在《关于研究自然的信件》中已经指出，到了70年代，恩格斯则作了更清楚的阐述。

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人们沿着三个方向寻求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第一，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传统把科学看作从属于宗教的一个意识领域，企图使哲学脱离科学，这些传统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的资产阶级哲学中继续有所发展。使哲学脱离科学的企图，就是在我们现时代也是各种宗教哲学流派的特点。将哲学归属于神学，不管是哪一门神学，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神道教，或是其他任何一种宗教，都会使哲学成为反科学的。当然，现在要求科学直接听命于宗教是很难的。甚至新托马斯主义也“只”主张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哲学在职能上作出分工，“只”主张真理的两面性。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广泛流传的主观唯心主

义的各种形式都具有哲学脱离科学的特点。实用主义或则存在主义把哲学用于对主体感受的分析，使科学脱离哲学。

第二，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出现的实证主义则独树一帜并发扬老经验主义的传统。实证主义打着有用（实用）知识的旗帜，宣布必须同“形而上学”，即实质上同基本哲学问题的提法作斗争。不过，即使这样，它也仍然不失其为一门哲学，因而在实际上它非但不能推翻哲学，反而迫不得已地为哲学在科学行列中谋求一席之地。不管在孔德和斯宾塞的“古典”实证主义，“这一实证主义的第二次浪潮”马赫主义，“第三次浪潮”即20世纪中叶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现代的后置主义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差别，这一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流派的追随者们企图把实证主义说成是“科学的哲学”，并宣布它“已不再”属于世界观的范畴了。事实上，因为实证主义哲学通过各种方法或者将感觉和感受，或者将思维所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与现实等同起来，所以按其思想基础来说，它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实证主义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或是对感觉的分析（马赫主义），或是对科学语言的分析（逻辑实证主义），至多不过赋予它辅助性学科的作用。实证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很大的影响。然而，它提出要“消除”具体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矛盾，这种建议实际上乃是一种幻想。

企图将科学从世界观问题上，从而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趋向至今还存在。但是，没有一门科学能够摆脱哲学的影响，任何一个知识领域，只要它的理论性越强，它就更需要作为科学世界观的哲学以及一般的认识方法。问题在于对学者的智慧产生影响的是什么样的哲学。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

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①这些话完全适用于研究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在先进哲学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通过理论思维形式积累而形成的，这一思维形式为解决上述矛盾指出了道路。

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坚决反对哲学脱离科学，另一方面又反对把哲学融合于专门科学之中，这样它既没有必要追求成为“科学的科学”这一业已过时的地位，同时还继续发扬老哲学的优良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是由科学世界观存在的必要性决定的，而科学的世界观在所有科学的资料基础上建立起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统一的知识体系，将这些科学的成就加以归纳，同时又作为世界观和一般认识方法为进一步发展科学所必不可少。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中，知识的整体化趋向得到较充分的体现。但是，正由于哲学的整体化作用在不断增长的科学分化的条件下不仅没有消失，而相反地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分化也渗透到哲学知识的体系之中了。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中，与共同组成哲学知识核心的本体论（关于存在的学说）、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学说）、逻辑学（关于思维的学说）同时，还形成了一些其他领域，诸如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对于反对宗教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与宗教哲学相似的是无神论）以及哲学史。哲学知识的分化过程同样没有完成，直至现在还有专门科学相继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可以认为，心理学已完全脱离了哲学。数学（符号）逻辑学也是一门专门科学。关于社会学问题需要作专门的探讨，以后将对它作详细阐述。

与日俱增的科学分化促进哲学内部的整体化趋向。这一趋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552页。

过去曾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中得到体现。然而，在黑格尔之前，哲学还没有能力用统一的思想包括哲学知识的所有领域，使其从属于自己。黑格尔体系在思辨基础上不仅将专门科学，同时还将哲学的所有领域加以综合，这是最后一次尝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个唯心主义的、充满了“强制结构”的、导致真理绝对化等的体系的总的评价，并没有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体系对它所处的时代来说是哲学知识所有领域的综合体。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黑格尔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①。

马克思主义否定了黑格尔的思辨结构，同时在对哲学对象的理解上又是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进步传统的继承者，也就是为20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所丧失的传统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的、具有内部统一性并在这一意义上与其他哲学学说（在它以前的、现在与它对立的）迥然不同的观点体系。那些哲学学说狭义地理解哲学研究的任务，把哲学看作为哲学的一个部分或一种职能。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者将哲学归并到认识论中去，现代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从属于逻辑学或症状学，而现代的非理性主义者则企图将它同伦理学和心理学合并。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和谐的世界观体系，在这一世界观体系中，自然、社会、人、人的活动和意识都在共同原则基础上获得解释。

历史上形成的哲学知识各个部分的核心是哲学世界观，它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10页。

答世界和人的实质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问题。正是在真正的本义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完成着这一任务。列宁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①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包括整个哲学。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和现在以另一种形式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的哲学知识的各个部分，我们都已提到过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与它的总的理论社会学——这是相近的概念），以及与伦理学、美学、科学无神论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明白起见，要求确定这些哲学科学中每一门的对象，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

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是哲学学说，它给予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精神和自然界、主体和客体等关系问题以完全确切的回答；物质、自然界、存在、客体被认为是第一性的。因此，这些极其丰富的，包括很多方面的关系，就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研究对象。应当指出，唯心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这些关系，不过，区别就在于唯心主义用完全相反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人脑作为具有意识特征的一种物质形式与意识的关系，以及外界客体与意识的关系。意识与物质在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只有将意识看作为存在的反映时，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第一方面可以称为本体论方面，在这一方面意识应被认为是经过一定方式组织的物质的特性，是物质普遍特性的最高表现，即在自我发展的物质不断变得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并受社会存在制约的一种反映特性。第二方面一般称为认识方面，在这一方面意识应被看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反映，是由实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页。

践和社会存在决定的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

在同物质的关系中意识是第二性的，这并不是说意识对于物质没有作用。恰恰相反，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越高，它反过来对社会存在以及对被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改造的自然界的影响也越大。马克思第一个对人们的意识同存在之间的辩证相互关系作了阐释，他的解释将唯物主义上升到最高阶段。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这种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在认识自然时，是唯物主义“在下面”，在认识社会生活时，是唯心主义“在上面”。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者不懂人们的物质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是不懂劳动和生产在改变自然界和社会关系中的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唯物主义就带有直观的性质。马克思说过：“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①

在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学建立以后，以前的唯物主义这一主要缺点被马克思主义纠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揭示了人民群众为了改造自然和实现社会革命变革紧迫的任务而进行的劳动和实践活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建立就成为可能了。

正因为劳动、实践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所以对于意识同物质的关系，不能从“人类学”的、即从孤立的单个人的角度去认识。人的意识是受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关系时所从事的物质活动、实践活动制约的社会意识的表现，也是社会意识的一个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页。

部分。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而认识活动的所有形式被认为是人与世界的实际关系、他的生存条件以及为这些条件所决定的社会需要的反映。

因此，在认识作为关于存在和意识相互关系的学说，即唯物主义的对象时，必须运用辩证法，因为它把存在和意识看作为发展的、在人类的历史中运动的。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组成部分的辩证法的对象又是什么呢？

哲学始终面对着一个问题：世界——包括物的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呢？还是静止、不变、稳定在其中占优势呢？这一问题也象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一样，乃是一个深刻的世界观问题，同时对于认识的各个领域来说，又具有头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这一问题截然相反的回答，将各种哲学流派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以外，又按另一特征区分开来。所以，哲学史又包括在运动和发展中研究世界的辩证法同它的对立面——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

辩证法的历史发展使它的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最初认为辩证法是进行交谈的方法，过了很久以后又认为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这些解释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说都是不够的。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过去对于发展的概念深化为对于物质世界与精神普遍发展规律的认识。黑格尔曾为揭示这些规律作过尝试，但是他认为辩证法是关于精神发展和绝对思想的科学，仅此而已。然而，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不仅仅是为思维所具有的发展规律。恩格斯用下列方式简明地描述了辩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页。

证法的对象：“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必须指出，这里说的不是关于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也不是关于思维的特殊规律，而是关于对这两个领域来说都是共同的规律，因而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人同世界的关系。

辩证法的内涵之丰富使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获得了多种定义。每一个定义都刻划了辩证法的一定特点，所以必须把这些定义作为一个系统集中地加以研究，才不致使个别定义掩盖了本质。因这一问题对后面的叙述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较详细地对它进行探讨。

在着手撰写《自然辩证法》一书时，恩格斯是这样阐明他的任务的：发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作为关于联系的科学——辩证法的普遍特性。在同一文中，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②。因此，普遍联系原则是辩证法的根本原则，虽然，不言而喻，这种联系不能被归结为对于各种联系的普遍性的承认，以及从这里引伸出去的对于每一特定客体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承认，即对于客体系统分析的承认。对于联系不仅应该理解为物体及其各个部分在每一特定时间内的相互作用，而且还应理解为存在于各亲缘客体之间的共同特点中的遗传联系，这些亲缘客体也可能不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比如，在亚马孙河的热带丛林、西伯利亚的极地冻土带、古埃及以及千年之前的斯拉夫人和日尔曼人中的原始公社之间就没有直接的相互关系。

有时，人们从不同的意义上理解“联系”和“关系”这两个概念。比如，有些作者认为联系就是直接的“接触”，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把这一术语作了狭义的解释，以资区别于术语“关系”。我们则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同义的概念。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54页。

② 同上书，第357页。

外，我们还把“联系”理解为不仅是相互作用的客体或者相互作用的主体之间的联系，同时还是普遍的联系，是在其总和中建立世界的物质统一的关系。

各种物体之间在每一特定时间内的联系为任何一个过程在时间上的状态联系所补充。所以，辩证法作为关于联系的科学，包括决定原则以及包括承认过程的后面状态受前面状态的制约。我们就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对辩证法这一门关于各种过程，关于产生和消灭，运动和发展的科学所下的定义。恩格斯提出下面一些关于辩证法对象的定义，如“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①。以及我们上面所举的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常用的定义，如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这些定义彼此之间完全一致。诚然，如果运动和发展确实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状态在时间上的联系的话，那末对于任何联系和关系都应在它们不停的变化中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联系原则和发展原则是有机结合的，所以辩证法要求不要把决定原则同对客体的系统分析方法割裂开来。

恩格斯在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时，关于辩证法他是这样说的：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②。这样，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的辩证法，在确定其对象的一般定义时，要求估计到一个情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原则是与普遍联系原则分不开的。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每一门具体科学研究一定范围内各种现象的联系。一门科学所具有的共同性程度越高，越需要承认联系的普遍性。例如，理论物理在守恒定律中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6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5页。

录了自然界中普遍联系的各个方面，并证明了这些定律的通用性。在生物学和控制论中，也就是在那些研究有高度组织的自我控制系统的科学中，特别感到系统方法，结构分析、对各种系统的组织和发挥功能的一般原理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即对普遍联系重要问题研究的必要性。最后，在研究自然发展史的科学中，例如在宇宙学、地质学、生物学中，尤其是在研究关于社会的科学中，早在19世纪，历史主义就已开始为自己开辟道路了，注意的中心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普遍联系和发展不管怎样就成为一切科学的研究对象。

在所讨论的关系中，辩证法与具体科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研究现实中特定领域历史发展的特殊联系和特殊规律。辩证法则研究普遍的东西，即研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一切领域所固有的、表现在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中以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那些特点。在研究联系和发展时，必须把辩证法与具体科学相比较得出的特点反映在对其对象所下的定义中。所以，按照我们的观点，可以对辩证法下这样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客观世界以及反映客观世界的人类意识的最普遍联系形式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定义将它与具体科学区分开来，但是却没有解决辩证法同其他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哲学观点之间的区别问题，这些哲学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继黑格尔之后）一般被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观点。然而必须指出，形而上学，即使在它的古典形式中，都没有否定事物之间联系的存在以及发展的各个阶段。

问题不仅在于对外界的看法，还在于如何理解思维。“老形而上学”哲学贩卖僵化了的、互相割裂的概念。哲学的范畴曾经是彼此对立的。例如，某一种现象被认为或则是必然的，或则是偶然的。两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或者是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等

等。恩格斯是这样表达关于联系和发展的两种对立观点的：“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①

到了19世纪末，由于科学的成就，普遍联系的原则得到公认，但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并没有消失，这种对立不过转为新的形式而已。即使在现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关于联系的科学，仍然在根本上区别于在认识现象之间联系的问题上所存在的“通常的”、“流行的”观点。列宁早就对辩证法的优点作了说明，他说辩证法的主要特点是：“……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②

辩证法的当代敌人企图利用辩证法的某些要素和某些方面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在联系学说中，这一普遍趋向有两种表现：一方面，企图将系统结构方法的名目繁多的变种同作为科学认识的哲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起来。我们在上面已经强调指出，辩证法为系统方法提供了可靠的哲学基础，因而这种对比是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企图用主观辩证法替换客观辩证法，也就是说承认辩证法，但只承认在思维中才有辩证法。这样，在运用概念时取消了客观界限，使这些概念具有“毫无边际的”无所不能证明的灵活性。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涉及到社会学时再讨论。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在解释普遍联系时的对立，又继续表现在对发展的认识中。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估计到敌视辩证法的一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6页。

观点的演变。列宁认为20世纪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对立首先是两种关于发展的观点的对立，他认为两者的对立在于，辩证法对发展过程作了正确的解释，而形而上学对这种过程的解释则是简单化的、错误的。^①

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哲学在建立对世界的辩证观点上已经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发展思想。在这一方面起十分重要历史作用的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其中作用最大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发展观点虽然具有神秘的性质，但是，在自然科学继续发展的时候，它是唯物辩证法这一关于发展的真正科学观点的来源之一。

19世纪末，在科学成就的影响下，特别是由于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中取得的胜利，历史是发展的，这种思想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于是，如何认识发展这一问题就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列宁在其著作《谈谈辩证法问题》一书中的一段话，对新时代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绝对区别作了概括的评述：“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飞跃’、‘渐变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②。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08页。

② 同上书，第408页。

这里列宁把“进化”理解为普遍的发展过程，因为继达尔文之后，进化概念被广泛应用（现在也仍常用）在这一意义上。关于社会生活的进化在20世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中已成为老生常谈了，甚至那些与进化思想格格不入的社会学思想流派（如结构功能主义），现在也不得不接受它了。

这样，发展的根源和原因问题，是辩证地认识发展的关键，以此为基础就获得对于将发展推向新水平的飞跃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对于辩证法这一门关于发展学说的解释引导到对矛盾，即发展的动力的研究上去，同时将发展的辩证观点扩大到思维范畴，并且将概念看作是变化的、活动的和矛盾的。

现在我们试将上述依次讨论过的、涉及到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对象的两点结合起来。如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而他的辩证法是唯物的，则在哲学基本问题的一切方面都必须把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置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和历史发展中加以研究。同时在研究物质世界和思维所共有的发展规律，即辩证法的规律时，必须在物质中，即在自然与社会存在中看到这些规律的基础。

照我们看来，在苏联哲学中有时对辩证唯物主义对象的认识是狭隘的，即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仅仅属于辩证法范畴，而辩证法只属于关于辩证思维规律的科学，属于辩证逻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辩证法所下的全部定义中，占首要位置的始终是现实世界的——自然的和社会存在的——辩证法。恩格斯写道：“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①由此可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553页。

辩证法作为主观辩证法的最高表现的一门科学，不仅应该研究辩证思维，而且首先还应该研究客观世界，研究客观世界（自然与社会）所遵循的最普遍的规律，因而也研究反映这一世界的思维的规律。

因此，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归结为辩证法的对象，而将辩证法的对象归结为辩证逻辑学的对象，都是不正确的。用逻辑学和认识论来划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界限的企图，已不止一次地遭到苏联哲学界，包括本书作者的公正的批判。^①然而，这种企图甚至到目前为止仍在不时地出现，在强调辩证法作为思维方法的作用，以及强调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时，某些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为众人所接受的、来源于恩格斯的辩证法定义，似乎不能合法地算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象的定义。例如，按照Э.В.伊利延科夫的说法，这种公式似乎对马克思之前的辩证法形式是适用的，例如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而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点，则完全不合适。但是，恩格斯在将自然置于第一位，然后是社会，仅仅在最后是思维时，很清楚，他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不是黑格尔辩证法。^②

Э.В.伊利延科夫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论题的呢？他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点在于这一辩证法是唯物的。这就是说，它认为思维的普遍规律是通过科学认识得到反映的自然与历史的普遍规律。”

反映是以被反映的物体及其不受意识决定的存在为前提的。Э.В.伊利延科夫则从那些不正确的论据中得出自己的“最简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殊对象的定义”，“在思维中反

① 例如参见М.Н.鲁特凯维奇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与统一》，载《哲学科学》，1965年，第1期；《列宁反映论的迫切问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0年，及其他。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54页。

映存在的普遍规律”^①。这里第一位是反映，所以辩证法被狭义地理解了，被归到认识论范畴。^②

将辩证唯物主义解释为关于人类活动普遍规律的科学也是错误的。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前的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于承认体现人与世界实际联系的实践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讨论思维仅仅与社会存在发生关系的问题，而自然似乎融化在实践中而消失了。这同样不能说，辩证法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活动的规律，而忽视了自然运动的规律。不能主观地解释实践，忘却自然又忘却社会生活的客观方面，而把重点放在“实践”上。^③上面已经指出，人们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因而为什么对“人类活动共同规律”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对思维共同规律的探索，而辩证法正如前面所说的情况那样，被归结为主观辩证法。

辩证法作为一门科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它的那些互相联系的原则、规律、范畴就是它的要素。揭示辩证法的内部结构是复杂的任务，这一任务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辩证法这门科学概念系统的结构中有两种结构“交接”在一起，一方面是物质世界（其最一般规律反映在辩证法的范畴中）的结构，另一方面是认识过程和人类思维的结构。

按照我们的观点，能够作为辩证法的要素而被提出来的，首先是辩证法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也可叫作辩证法的原则。关于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同唯物主义原则相结合的普遍联系原则和

① Д. В. 伊利延科夫著：《辩证法与世界观，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认识的逻辑学与方法论》，阿拉木图，1977年，第169—170页。

② 对于这一观点的批评，参见B. Г. 英尔德科维奇和B. M. 费奥多罗夫所写的有关阿拉木图讨论会的概述，载《哲学科学》，1978年，第6期，第150—152页。

③ 对于这一观点的批判性分析，参见《列宁反映论的迫切问题》，Л. 霍夫曼著：《马克思主义与理论》，莫斯科，1978年。

发展原则，上面已经提到过了。决定原则，即各种现象在时间上的普遍制约原则，也可列入辩证法原则。在这一原则中，从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的唯物世界观与辩证地对待世界的、主张普遍联系和发展的态度相结合。决定论作为方法论原则在因果关系上以及其他许多范畴中得到具体化。我们还可以把系统原则列入辩证法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估计到客体特有的内部联系时，把客体看作为按不同复杂程度而区分的各种系统。

上述原则具有普遍性，所以产生了对它们的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在企图将这些原则具体化为概念工具时。分别接受每一个原则，甚至同时接受所有的原则，还不能说明学者已经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了，特别在今天，当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科学事实的压力下对这些原则表示同意的时候。因此，关于发展思想，列宁曾这样写道：“对于‘发展原则’，在20世纪（以及十九世纪末叶）大家都已经同意。——是的，不过这种表面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①

辩证法原则只有通过它的基本概念，即范畴来表达并得到具体化，诸如数量和质量、偶然性和必然性、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等等。这些是反映普遍联系和发展过程特点的具有最大共同性的概念。

辩证法规律不是什么在本质上区别于范畴的东西。正如人们所知，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②，它说明现象的本质联系。辩证法的规律（正象物理学和任何一门科学的定理一样）是现实世界各种关系的反映。不过这是最普遍的关系，思维同样也具有这样的关系。如果范畴是基本的科学概念，那么科学定理按其逻辑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8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61页。

形式来说就是判断，而在判断中记录了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以为什么辩证法同时被认为是一个体系，这一体系联结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范畴和规律，不过组成这一体系要素的首先是范畴。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理论社会学中的情况原则上也是如此。此外，对于社会学来说，辩证法的意义还在于辩证法指引社会学正确理解其本身的基本概念、范畴及范畴之间的联系，即社会学的规律。后面，我们将在社会学概念辩证法一章中较详细地回答这一问题（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承认一切过程互相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列宁赋予这一规律十分巨大的意义，以至把它引用到辩证法这门科学的定义中去。他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①各种物体本质中的矛盾，是最深刻、最基本的矛盾。我们认识的客观世界中，这些矛盾决定这一世界各个过程的联系与发展。但是，如果客观过程中本质的矛盾是辩证法所研究的最主要的东西，那么关于矛盾的学说不言而喻也就是辩证法最深刻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着这个本质。”^②

列宁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在辩证法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作了如下说明：“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③

如果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解释为对立面的调和或则忽视下面这一点，即“斗争”是要求对立面的统一和互相渗透的，则承认一切存在的东西的矛盾性还不能防止异己思想渗入辩证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78页。

② 同上书，第285页。

③ 同上书，第240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法。现在，将社会过程辩证地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种认识是和贬低矛盾在社会机体发挥功能和发展中的作用的“平衡论”（力的均衡）相对峙的，或则是和“冲突论”相对峙，这种理论则否认社会机体的统一与制约其发挥功能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表现了前一种特点，“冲突社会学”则表现了后一种。这两种理论以后还将提到。只有承认作为辩证法实质的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规律，才能在科学辩证法与社会学中的与之对立的理论的哲学基础之间划清界线，才能正确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决定论和系统论。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它当代敌人之间的斗争，总的说来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方面，特别是在理论社会学中。归根结底这一斗争反映了当代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唯物辩证法的敌人在解释社会发展的途径时，或者毫不隐晦地捍卫过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或者偏向于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科学、文化的成就。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一门总的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以及部分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因而特别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与阶级立场的联系是公开的。作为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在唯物辩证法中找到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必然被推翻，新的、更进步的社会制度必然建立的直接依据。马克思写道：“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括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①然而，辩证法不作赤裸裸的否定。片面地突出否定这一因素会阻碍对历史进步的认识，对为未来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页。

斗争的进程的认识。唯物辩证法否定旧事物是为了使新事物取得胜利。所以它与“否定辩证法”及其类似观点的斗争是对反对主要敌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体系以及它的追随者改良主义和右派修正主义——所作斗争的必不可少的补充，而否定辩证法及其类似观念是由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急进阶层的假革命理论家以及“右派”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提出的。

第 二 节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与结构

正如在引言中指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社会学理论。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又扼要提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重要成分。现在必须将这两个论题合并起来，一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另一方面对它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地位作比较详细的分析。后一方面要求将社会学结构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

在上面的叙述中，不是偶然将“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两个相同意义的术语来使用的，因为哲学在其直接意义上说是回答有关世界、人、认识等的本质问题。列宁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方面反对20世纪初期的修正主义者时说过：“报告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不承认，那么他为什么一次也不去分析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无数言论？”^① 1920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二版的前言中，列宁把自己的著作评为“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参考书……”^②。在一些国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文件中也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①

同时也完全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科学体系。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总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它的核心和枢纽。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思想渗透到所有其他哲学科学。哲学知识的各个领域或者可以看作为统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和部分，或者看作为各门哲学科学。这里没有什么矛盾，在这点上可以同物理学相类比。例如电动力学、控制论、热动力学也都可以称为科学，这样做不会对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完整性产生怀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上述各门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在一切相对发展的客体中，统一——这是表现在多样性中和通过多样性表现出来的统一。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个体系研究时特别需要辩证认识科学的统一性。这一体系的内部统一是由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一般原则所决定的。斯大林于1938年提出的对辩证唯物主义对象的认识，长期在苏联的科学著作中起着统治作用。在说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基本特点时，斯大林引用了自然科学的例子。这样使读者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就是对自然的看法。更有甚者，历史唯物主义在斯大林的笔下被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向社会的推广和运用。^②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是唯物主义向社会现象领域的推广这一论点，已在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得到反映。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功绩时，与其前人作了比较，他写道，“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一切历

① 参见《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69年，第331页。

② 参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53年，第11版，第594页。

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①完全清楚，列宁的意思是，与前辈思想家包括唯物主义者相比，马克思已前进了一步。确实，马克思首先将唯物主义推广到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唯物地认识历史这一发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在哲学中所作的革命变革的实质就在这一发现之中。但是，斯大林没有把这一公式用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而用于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基本部分的相互关系中。而将关于“推广”、“运用”、用历史唯物主义“补充”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点，包括到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定义中去，这是不正确的。而且，斯大林著作中的提法在后来一些科学、教学、宣传文献中被当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定义，并常常被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定义中。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同义词。但是，甚至在这一狭隘词义上也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推广或者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上。唯物地同时又是辩证地认识历史的原则有机地构成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解释不推广到解释社会，辩证唯物主义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法规律是作为适用于自然的原则与规律而出现的，然后再推广和运用到社会。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直是把它们看作同样地为自然与社会所固有的规律和特性。

但是“唯物地认识历史”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是不一样的。当斯大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转到叙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时候，如转到叙述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被认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生产特点”等问题的时候，他在自己的那篇著作中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确实是（虽然不全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页。

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然而不仅是在狭义上的,作为解释社会历史根本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广义上的,作为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后来,在40—50年代出版的一些历史唯物主义专家的著作中(以及在这一门学科的教科书中),在上述问题上又补充了关于国家的实质、社会意识的形式、阶级以及关于民族等方面的问题。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的科学,即关于一切民族和历史进步各阶段的共同发展规律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简单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把它归结为唯物史观和辩证历史观的基本思想。

这样,斯大林从狭义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即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原则开始,然后把读者引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理论社会学这一认识上。这两种认识都是容许的,但不能混为一谈。同时,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这一概念的两种意义之间的界限没有划清。

在这个刻板公式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献中长期延用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向认识社会的推广和运用这一定义。然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哲学知识的特殊领域,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的观点逐渐站住了脚。其中,大学历史唯物主义课程逐渐成为总体社会学课程。

直到70年代中期,在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专著中,还能感觉到斯大林公式的影响。比如,在一本著作中强调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运用于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已。”^①甚至在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中,尽

① A. B. 沃斯特里科夫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对象》,莫斯科,1963年,第34—35页。

管对学科领域在实质上作了正确的说明，仍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定义这样的内容，也把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乃是辩证唯物主义向社会推广的观点，看作是“不足为奇”的。^①

长期抱住这种“不足为奇”的观点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有些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企图走得更远，想将历史唯物主义所有问题和全部内容都纳入辩证唯物主义，包括阶级、民族、社会意识形式等的学说。^②我们认为这种企图是不足取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只对社会而言，不适用于自然，因而是社会学理论。把关于阶级（以及关于民族等）的学说归并到辩证唯物主义中去是想入非非，使人不由自主地认为，似乎阶级斗争不过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发生作用的“实例”。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挥功能和发展最普遍规律。因此，它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既不能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归并”，也不能看作是两者的离异或则两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并立”部分，更不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被排挤出”哲学的范围。这一联系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部分一致和辩证的相互渗透。

确实，辩证唯物主义包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它与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区别也就在这里。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涉及到社会存在第一性和社会意识第二性的论题。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的、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是社会哲学，或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总的理论社会学。这是哲学社会学理

① 参见A.E.富尔曼著：《历史唯物主义》，授课讲义，莫斯科，1970年，第8页。

② 例如，参见A.M.米纳相著：《辩证唯物主义》，顿河罗斯托夫，1972年。

论。^①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于形态、阶级和民族等）涉及到社会结构，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发挥功能、它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些内涵不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

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将辩证唯物主义同关于社会的各门科学联结在一起，则在关于自然的一些科学中，一般称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起着类似的作用，这个领域研究宇宙的无止境，物质的无穷尽，物质的统一及其特性，辩证法规律在自然界（非生物界与生物界）基本范畴中的作用特点等方面的哲学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部分与过去的“自然哲学”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过去的“历史哲学”毫无共同之处一样。针对这一点，П. Н. 费多谢耶夫说过：“自然哲学的告终当然不是说明自然界已不再成为哲学思维的客体了。这样提问题的只有实证主义者，而不是唯物辩证法的拥护者。有自然辩证法，有我们现在经常叫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自然科学哲学，这一点我们认为是不容置辩的。但是，我们否定在特定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就是通过哲学推理取代专门科学来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方法的自然哲学。”^②

有些苏联哲学家对哲学的这一部门作为哲学知识的特殊领域而存在的权利表示怀疑。他们坚持说，因为辩证法是一门统一的科学，所以不可能有各种特殊的科学在现实生活的这个或那个领域中**来研究辩证法**。确实，辩证法是统一的，然而它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是通过具体形式，即通过自然中的辩证法、人类历史中的

① 参见Г. 格列泽尔曼、В. 凯勒、Н. 皮利片科著：《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认识与革命行动的理论和方法》，载《共产党人》，1971年，第4期，第69页；Л. Ф. 伊利切夫著：《哲学与科学进步》，莫斯科，1977年，第211页。

② П. Н. 费多谢耶夫著：《共产主义与哲学》，莫斯科，1971年，第121页。

辩证法、认识和思维中的辩证法来实现的。不懈地坚持这一观点，可以促使承认自然中和社会中的辩证法规律作用的特殊形式。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表现在各种物理过程之中，如间断性和不间断性、引力和斥力等，而在社会方面则表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辩证法普遍规律作用的特殊性，则我们同时应该承认对这些规律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性，并不仅应该进而承认辩证法总的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在辩证唯物主义中），而且还应该承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分支和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存在的必要性。因这些部分、分支和领域无论是研究社会，还是研究自然，与辩证唯物主义相比，具有较低程度的同一性。

到此为止所谈的都是辩证法。不过关于唯物主义要说的也是这一些。意识是反映现实的最高形式。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意识和物质的普遍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不仅研究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特殊形式，而且还研究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弄清自然中的反映特殊性、反映与信息的联系、反映与活机体中生理过程的联系，这已经是属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范畴了。至于谈到辩证唯物主义同关于思维和意识的科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的联系，则这一问题已具有专门问题的性质，讨论这一问题将会使我们离开正在讨论的正题。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同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具体科学的联系是通过一些普遍性较小，研究现实中这两个基本领域的哲学科学。这种联系是辩证的。因为，一方面，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自然的哲学问题之间的部分重叠和相互交叉，另一方面，这些哲学科学与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具体科学又有部分“重叠”。

让我们继续往下讨论。哲学是科学，同时又是意识形态，因

此它不仅与其他科学紧密联系，同时还与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如道德、艺术、宗教、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领域与哲学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提供社会生活结构知识的总体社会学理论的交接处也形成了哲学知识的特殊分支，这些分支研究社会意识的每一个形式，与上述领域以及与研究这些领域的专门科学交叉并与它们部分“重叠”。如果“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实际上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分裂出来的话（虽然有分离它们的企图而且常常谈着“政治哲学”），那么美学、伦理学和科学无神论（在科学无神论的名称中已强调指出，这门学科的主要目的就是克服宗教意识）则处于哲学同艺术、道德和宗教的“交叉部位”上。

这些哲学知识中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自己特殊的方法等。领域之间的联系也是辩证的。例如，美学中的基本原则都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现实在人的意识中的各种反映形式，包括艺术反映。按照研究对象，美学与马克思主义总的理论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交叉，总的理论社会学使人认识到艺术是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的特殊领域。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美学扎根于较一般的哲学学科中，则它的基本内涵就远远超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也超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并且部分与艺术学交叉，再通过艺术学与艺术发生联系。其他哲学科学，如伦理学和科学无神论的情况也是如此，都是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和相应科学的哲学概括。

因此，在广义上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总体，一个互相紧密联系着的哲学科学的体系，它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狭义上，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统一。上面已经说过，哲学的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只存在于哲学史的萌芽时

期。现代的科学哲学，在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同时，又通过哲学的各个专门分支与这一科学体系联系着。这些专门分支针对着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科学，并通过这些科学研究现实中的相应领域以及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

故而，必须分析那种反对上面提到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复杂结构的统一科学的论点。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哲学这一互相联系着的各种知识领域的体系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不作任何区别，其理由是，似乎后者是有统一对象和统一方法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统一的方法将在后面进行探讨，至于说到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其他哲学科学的“统一的对象”问题，则这种见解，正如上面已经说明过的那样，不反映现实的情况。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中不包括阶级和民族学说（历史唯物主义）、责任和良心的相互关系问题（伦理学）、悲剧的冲突问题（美学），等等。

上面所援引的概念是以对象和方法的同一为基础的，有关这一问题必须多费一些笔墨加以阐明。上面已经说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科学的总和不是一回事，每一门哲学科学都有自己的对象和概念工具。比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制订了自己的范畴系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又如，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现实的艺术反映和对世界的开拓的规律性，同时美学也有自己的范畴系统（美的，高尚的，喜剧的，悲剧的，等等。）。其他哲学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们中的每一门对于有关自然和社会的具体科学来说都是总的理论，因而是获得新知识的方法和手段。例如，分支社会学理论，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等，如果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则都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范畴系统对于部门哲学科学以及所

有具体科学来说是最一般的理论和最一般的认识方法。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作为一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该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被建立以后，就有自己的方法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及对这一研究客体还采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制定了辩证法的总体理论，而在该书的再版《跋》中则对辩证法作了总的评述。列宁认为，对于认识马克思的方法和认识黑格尔的方法来说，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黑格尔的《逻辑学》有着同样意义的作品。他写道：“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①

因此，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是世界观的基础以及哲学知识一切其他领域的科学认识方法，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着中心位置。这是因为，正确解决有关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联系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等互相之间紧密联系的根本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自然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无神论、哲学史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本书中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联系，因此必须根据上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详细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结构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过，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这门学科的建立意味着关于社会的科学中发生了真正的变革，按照列宁的说法，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②。但是，除了总体社会学理论以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包括分支（专门）社会学理论与具体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的这些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辩证地相互联系着的社会学知识的各个层次。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357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0页。

到现阶段为止，已经形成了数目可观的分支社会学理论（常被称为“中间层次理论”）。这些理论存在的必要性为下面这一点所证明，也就是从总体社会学理论到具体社会学研究目的的提出，只有通过共同性程度较低的概念工具，包括通过“操作主义”概念。对于分支社会学理论的存在和作用持否定的态度，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一个整体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作为依据的。不过我们认为，关于有几十种独立的“社会学”存在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在分支社会学理论中站住脚，尚处在形成过程中。不过，这些理论的出现是20世纪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们看来，这些理论可以归为三组：

属于第一组的是研究具有一定范围的人类活动的最一般领域的分支社会学理论。最初，活动形式被分为劳动活动、生产活动以及自由时间（职业劳动之外的）的活动，因而产生了“劳动社会学”与“闲暇社会学”。后一个术语是不确切的，因为这远不是生产部门或机关的所有工余和业余时间都是闲暇时间，即真正的自由时间。不久，从劳动社会学中又派生出如“工业社会学”这样的领域，而以研究如何支配自由时间为主的闲暇社会学中又分化出一些领域，诸如体育和运动社会学、旅游社会学等。

属于第二组的是出现在社会学与研究社会生活局部范围的社会科学的交接点上的分支社会学理论。这些分支社会学有政治、法律、文化、艺术、科学、宗教、保健等社会学，这些社会学中的每一门都和政治学、法学、艺术学、科学学、科学无神论等有一定的区别。这些区别在于，相应的社会学分支从总体社会学理论的观点出发，综合研究人们的活动，以及人们在该领域所建立的组织。由于社会学首先面向现在和未来，所以结合人们实际的（以及可能的）行为来研究他们的意见、评价、计划和打算，可

以使分支社会学与上面所提到的边缘专门科学相比大大地放宽研究范围。比如，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就包括法律准则的实际作用，公民对待法律准则的态度，发生在违法者和被法律处罚者的意识和行为中的变化，等等。

第三组包括一些研究个人通过多种多样的中介，也就是各种类型的社会集团与社会发生互动的分支社会学理论。属于这一组的有：个性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小群体社会学、劳动集体社会学和研究各种类型“社会分层”（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达）的一些社会学分支，或者说得确切些，研究社会阶级结构以及居民结构（“城市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等的社会学分支。当然，这还远远没有全部列举从一定视角对社会关系结构作研究的分支社会学理论。

这种归组还不能概括社会学的全部领域，不过通过这些组可以了解总的理论社会学如何通过分支社会学理论体系与具体社会学研究相联系的概念。每一个分支社会学理论使总体理论的概念工具具体化，使之为本部门的目的服务，从而为从事经验研究架起“桥梁”。

分支社会学理论同以社会生活的一定领域或一定方面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具体科学之间有着某种相似的特点。因这里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所以两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法学、文艺学也类同）与家庭社会学或则文化社会学一样，都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是这几者之间又有根本区别。分支社会学理论以总体社会学理论的原则为依据，综合地研究人的活动，即在整体上，在各种因素：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相互制约中研究人的活动。例如，象家庭社会学这样的分支社会学理论，是将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最小组织单位

来研究的，在这一组织中，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产生影响，艺术鉴赏力和无神论的（或宗教的）信念得到培养，等等。以此类推，在有关自由时间的社会学研究中是弄清各种范围居民的时间支配结构，揭示在生产以外领域人们行为的精神动机，分析产生这些动机和决定人们选择这种或那种消闲形式的原因，以及这些形式包含哪些社会内容。

经验社会学研究是按照经过详细制订的方法和技术来进行的，这些方法和技术包括有代表性选择的方法（可以在提问人数不多的某一集团代表的基础上准确判断这一集团的行为），吸收社会心理学成就而制订调查表和履历表的方法，整理和分析所获得的资料时采用各种数学方法等，上述方法不仅为社会学家所采用，同时在从事具体社会调查的经济学家、法学家、人种学家、教育家以及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代表人物的著作中也广泛采用这些方法。

然而，不是随便哪一种采用社会学制订的方法的经验社会学研究都是社会学研究。全面地、综合地对待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的态度，乃是使社会学研究成为特殊的，同时又具有最复杂的具体社会研究形式的特点。在这种研究中，按照总的和某一分支的社会学理论，人的活动被认为是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相互影响。客观方面是指决定人们需要的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主观方面是指这些条件和需要在人们精神世界中和他们的行动动机中的反映。具体社会学研究如果具备科学的，而不是原始的性质。则按其意图和方法来说，这种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向人们的生活的特殊的“投射”，这种“投射”可以在他们生活中发现新的、在理论上得到阐释而又能够丰富理论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资本主义社会学的对立是由它们理论观

点上的根本区别所决定的，这种对立不可避免地会在经验研究的目的中表现出来。举例来说，在研究社会意见时，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常常将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意见解释为“群众意识”的特殊现象，不考虑客观因素以及社会中的阶级、社会集团、社会阶层在地位上的差别对各种意见的制约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意见时，把社会意见作为特殊的、包含着对各种事件的评价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来对待。这种反映受阶级、社会集团、社会阶层客观地位的差别，以及他们的利益、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的差别的制约，并对人的活动产生根本性的倒递影响。苏共二十大强调为改进思想工作的形式和方法而研究社会意见的必要性。^①在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必须“特别重视深刻地和全面地研究社会意见和进行社会学研究”^②。

苏联所有社会科学在研究发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规律性时的共同任务是，如何通过对这些规律的作用机制和使用机制的认识，提高科学向实践所提供的建议的效益。这一任务整个地摆在社会学面前，为了解决这一任务，要求在研究过程中正确理解和体现社会学认识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 三 节

社会学认识层次的辩证相互联系

现在，我们根据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则及唯物辩证法，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作为社会学认识各个层次的总的理论社会学、分支理论以及经验研究之间的相互关

① 《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第99页。

② 《真理报》，1979年6月8日。

系。我们列出四个基本方面。

第一，客观现实本身的结构是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它是科学层级性多层阶结构的世界观基础。本质的东西——这是各种现象中的普遍的和必要的东西。只有当本质在现象中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时，现象才是本质的。本质的意义是，现实中普遍的东西不可能以“赤裸裸”的形式存在，而总是通过个别的事物存在于个别的事物之中。按同一性的程度，普遍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次序，所以本质是多级的。

人类认识世界过程的历史发展，包括科学认识在内，是从现象到本质，从现实的表层到纵深，从第一序列的本质到第二序列的本质，这样不断加深下去，以至无穷，因为世界是无限的又是发展的。科学的任务是在自己的规律中反映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列宁指出：“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①这是每一门科学历史发展的道路，社会学在这方面也不例外，社会学从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表面观察向越来越深地把握社会生活规律的方向发展。经验认识首先是对现象的认识，它为渗透到本质提供可能性。经验知识是理论的基础，按历史起源先于理论，而理论发展又要求积累新的经验知识以加深已有的理论推断并得出新的结论。

不过，不能以此得出结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科学都是按归纳的途径发展的。科学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必须以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不间断的互相作用作为前提的。在科学沿着历史发展道路而存在的每一特定时刻，科学总是认识层次构成的多级的体系。科学每前进一步，不仅要求从需要出发的理论和根据理论提炼出来的新的经验资料的积累，还要求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些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59页。

料进行概括，探索理论中的新东西。同时，在组织经验研究的时候，高一层次的理论起着主导作用。

由此可见，从经验到理论这条途径在历史意义上作为科学认识发展的基本途径时，同时又要求经验与所有层次的理论产生辩证的相互作用，因为理论为经验认识指引道路，制定目标，因而将经验认识变为有方向的，有理论依据的对新的科学事实的探求。理论的这一作用以较完备的形式，表现在专门用来为证明任何一个理论假设真实性的科学实验中及带有目的的观察中。

我们认为，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将经验的与具体的这两个概念用于社会学研究时，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确实，抽象是具体的对立面。在科学理论范畴中我们经常遇到各种抽象概念，但共同性的程度不同。具体研究在反映世界时要求较低程度的共同性，同时还要求与具体东西的联系，即与来自经验的经验资料的联系。

第二，为了认识经验知识的实质，必须弄清某些认识论范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一方面弄清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弄清经验认识和理论认识的相互关系。早在真正科学出现之前，产生于实践中的日常意识具有经验的特征。关于用来制造劳动工具的材料性能、各种动物的癖性、植物的可食性能和治疗性能、各地区气候的特点以及部落习俗的经验知识，使原始人得以保障自己的生存。随着科学的出现，经验知识似乎有了“高一层楼”。科学不仅依赖于在社会实践基本形式中，如生产中和人们的实践交往中所获得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创造专门用来增长知识的本门的“科学实践”。经验的科学知识既包括由科学家直接“从生活中”汲取的知识，也包括从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中获得的事实。

实践是物质的、具体的，因而是感性的，同时又有明确目标

的，尤如渗透了意识的人们的活动。在任何认识活动中，都有感觉与理智这两个人们反映现实的基本形式在起作用。直接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包含通过感觉能够把握的部分。理论知识是在抽象化过程中从经验知识中脱胎而来的，但是，如果认为经验认识仅仅局限于感觉器官所提供的“报道”，那是错误的。这些

“报道”在被接收的过程中已经得到概括和掌握。而且在科学的经验认识过程中，总要对得到的结果进行思考，将它们与已有的实据作比较并进行概括。例如在物理学中，研究人员在一连串实验的基础上绘出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被测定参数的经验曲线。社会学中的情况无不如此，譬如研究人员在调查一定总数被询问者的基础上作出判断，他们中哪一部分人对所提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哪一部分是否定的。此外，从个别事实到统计实据的过渡（而在经验社会学中这是准则），要求在经验认识的层次上借助统计方法对各个别的科学事实做出初步的概括。因此，科学领域中的经验认识和理论认识的对立首先说明科学概括的程度，这种对立抽象思维的领域中继续发展。

第三，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不局限于上面分析过的一个方面。实践不仅是科学认识的基础与源泉，同时还是衡量科学认识的真实性与目的的准绳。正是理论的相对独立性产生了“科学的实践”，而随着科学实践的出现和发展，理论同整个社会实践的联系也复杂化了。科学研究可能不带有完善生产或改变阶级斗争、社会集团斗争、民族斗争策略的直接目的。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别首先在于基础科学与社会实践各种基本形式的联系是间接的，而应用科学与它们的联系则是较直接的。但是这不是说，在技术科学、医学、农业科学、兽医学以及应用社会科学中，研究的目的总是为了获得直接的实践结果。在这些科学中，也存在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管理的各种不同的联系程度。但是在基础科学

中，这种联系往往需要通过某些中介，上述一些知识的应用领域就包括在其中。

社会学联合了科学认识的各个层次，不仅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就是应用研究和基础科学也都被联合成“一家人”。

总的理论社会学是揭示社会普遍规律的关于社会的基础科学。然而，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还能够满足社会管理实践中，以及被压迫阶级为变革现有制度所作的斗争实践中所提出的最直接的需要。例如，为了强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垄断组织广泛地使用应用社会学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同样也借助经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为了领导他们为改造社会而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用社会学研究获得了更广泛的发展。在苏联，结合社会规划的发展（参见第四章），为各级党委、地方苏维埃、各种企业和联合公司、大众信息机构所推行的这类方法，现阶段已深入到生活。所以，在这里指出应用研究与具体（经验）研究的异同点，是很有必要的，更何况这些概念经常被等同起来。^①

应用社会学研究直接满足实践的需要，这种研究一般是经验研究，因为人们认为，此类研究的结论“济事”，可以被直接采用。如工厂的社会学工作者经常解决为完善劳动集体的生产活动而产生的问题，例如，如何减少人员流动，通过改变劳动条件提高生产效益，等等。

不过，当经验研究专门用于发展理论的目的时，它可能不带有直接的应用的意义。如物理学的实验是为理论的目的服务的，

^① 例如，参见T. II. 达维久克著：《应用社会学》引言，明斯克，1975年，第6—7页。

而在实验过程中获得的科学结论，只有在技术中具体化以后，才能被应用于生产。

在社会科学中，实验一般不用作检验真理真实性的基本手段。社会变革实践的正确性是由人民群众的活动来证实的。不过在社会科学中，科学实践本身的作用也在增长。例如，考古活动的范围扩大了，现在采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最新成就鉴定出土文物的年代和进行复原工作。现阶段使用多样技术，首先是最新通讯手段和电子计算机发展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实践，大大提高了研究社会意识和人们实际行为的可能性，为建立包含未来变化的数量预测模型创造了条件。

社会实验，也就是在人为创造的条件下对各种集团的人的行为和意识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对这种实验的意义估计过高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专门创造的条件下，或者由于某种情况的影响，人们可能是自发地凑在一起，或者通过某种协议被有意识地拉来的。一般所说的社会实验是指管理实验，即管理机构在某些集体中对业务或日常生活实际条件所进行的改革，这种改革通过行政规章和经济规章的调节作用而得到保证的。比如，苏联化学工业中著名的“谢季诺实验”（有关该实验的社会意义参见第四章）就是旨在扩大组织、劳动报酬和人员调动等方面的行政权力。这一实验表明，在生产管理领域中所作的试验性改革是多么合理。

在农业建设领域进行实验，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求相应的管理机构拨出款项建造按照一定设计规划、考虑到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及经营个人副业等需要的实验性居民点。通过在全国各地区建成的实验性居民点，可以发现某些建筑类型的优点、缺点以及与农村居民的习惯需要是否适应等问题。

社会学中“科学实践”的基本形式是观察，不过对于社会改

革的实践来说，即对于人民群众在改变自己生存条件所作的实践活动来说，观察只起到辅助的作用。我们这里采用的“观察”这一术语是从广义认识论意义上来理解的，而不是仅仅指社会学家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进行简单的或者概括式的观察。调查征询和谈话访问是根据工作设想按一定计划组织起来的观察形式，这种观察很象自然科学中的作为手段的那种观察方法。研究者在社会学中和在自然科学中的任务都在于要使对事件的自然发展过程的破坏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同时预见到存在哪些可能性足以估计出“干扰因素”，也就是我们的干预的作用，以便获得较客观的图景。有关排除这种“干扰”的可能性问题将在以后（在第二章第二节中）讨论。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于社会学中十分广泛使用的文件和统计资料的分析不是什么其他方法，实际上就是对预先观察所得的结果的逻辑加工，也就是以观察为基础的。

社会学中的实验作为检验假设的专门方法，起着从属的作用。专为科学的目的而进行的社会实验，其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过管理实验，在这种实验“储存”着一定数量用于检验的科学假设。一般说来，认识的社会客体的特点乃是，在社会认识中实验应起从属的作用。

我们认为B. A. 亚多夫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指出，管理实验“可以提供重要的知识补充，但是它终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管理实验本身的目的不容许实验人员的积极干预。”^①更何况这完全是用于研究小群体的纯粹的科学实验，而且首先应被看作为社会心理实验。对社会实验作出类似结论的还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例如可以援引在社会科学方法方面写过价值很大的著

① B. A. 亚多夫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计划、假设》，莫斯科，1972年，第214—215页。

作的作者——法国学者P. 彭托和M. 格拉维茨的证明，他们说，人文科学中的研究“要求将已检验过的资料进行对比，这种研究首先与观察、分析、解释有联系，而不是与实验有联系。”^①

夸大社会实验作用的现象直到现在还能见到，包括在苏联的社会学著作中；甚至有人企图宣布社会学是“具体的实验科学”^②。但是，实验在社会学中不得不起着有限的作用，因为要将一部分人置于特殊的生活条件和管理条件中，使他们长期地和完全地与现实的一切社会联系“隔绝”是不可能的。承认社会学研究中实验的从属作用丝毫不贬低它的意义。扩大经过周密思考和巧妙制订的各种规模的社会实验是在一切按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改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管理机制的重要杠杆。

因此，应用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总的和分支的)的区别就象经验(具体)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的区别一样，取决于它们和实践联系的性质。在所讨论的情况下，首要问题是整个社会实践的需要如何决定科学研究的目的。

最后，第四，对唯物辩证法来说，对科学认识经验层次与理论层次的统一，它们之间深刻的内部联系、互动、交叉、互相渗透是不容置疑的。

认识领域中经验与理论的对立是相对的。为了了解这两个认识论范畴的联系，我们再一次提出辩证法范畴中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这些范畴首先体现客观现实中本质的多级性。本质的规定级(我们叫它为 n)对较深($n+1$)一级本质来说，是现象的最邻近的“一层”，而对于本质的深度较低的($n-1$)一级来说，本质的规定级则是较普遍的，因而是本质的。一般说来，在

① P. 彭托、M. 格拉维茨著：《社会科学的方法》，莫斯科，1972年，第354页。

② 《社会过程的模式化》，莫斯科，1970年，第18页。

个别的与普遍的之间存在着无穷数量的特殊的级。所以在科学认识领域中，一旦科学获得充分的发展，“中间层次”就是多层的。

从这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中，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总体社会学理论与专门社会学理论以及经验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家庭社会学对总体社会学理论来说是整个多级经验基础的“上面一层”。同时，对于有关家庭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以及一些必然属于经验社会学的分支理论概括来说，比如，对于弄清家庭的复现职能与妇女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以及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来说，家庭学不言而喻是科学认识的一个理论层次。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解决经验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的相互关系，这是它所经历的危机的一种表现。众所周知，经验社会学于20—30年代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在经验社会学与继承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经典学家O. 孔德、Γ. 斯宾塞、Θ. 涂尔干、M. 韦伯等人的传统的理论社会学之间出现了分裂。

与社会心理学紧密联系的美国资产阶级经验社会学受到行为主义的影响。它的代表人物认为，经验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行为的科学”，它应该借助数学手段从被观察的社会因素转到总的结论。这些经验主义者抛弃了作为“思辨学说”的社会哲学的同时，又否定了理论社会学。其理由是，这些科学都在“实证”知识之外。但是，资产阶级经验社会学要完全摆脱理论是不可能的。不过它的信徒们谈论的却不是负有解释世界和揭示规律使命的理论，而是关于总的研究方法论。例如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J. 马基宁认为，经验社会学中的方法论“基本上回答‘怎样’的问题”，而直接的理论则回答“什么”的问题。^①

① T. 贝克尔、A. 博斯科夫著：《在继承与变化中的当代社会学理论》，莫斯科，1961年，第218页。

尽管在资产阶级的经验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之间存在分歧，有时甚至是敌意，但前者和后者都来源于实证主义。经验社会学来源于20世纪初的实证主义，这种理论坚持认为通过思维概括的感性资料（在这些资料后面没有客观世界）起主要作用。理论社会学更进一步转向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部分受到新康德主义和M. 韦伯的影响），对逻辑实证主义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智慧的结构和为思维所创造的“充满了”经验资料的理论模式。

1947年，P. 默顿曾作过克服总体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社会学分裂的尝试，他宣称必须建立一些“中间层次理论”，这些旨在对社会生活的部分领域作理论上阐释的“中间层次理论”，当时已经以各种社会学分支的形式开始出现了。但是默顿和资产阶级社会学没有全部实现这一任务。总体理论与经验社会学之间的分裂至今没有消除。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结构功能主义（P. 默顿本人来自结构功能主义）、资产阶级社会学各种流派的无能为力及其理论基础的无科学性；第二，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不可能理解社会学中认识的各个层次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说，从分支社会学理论到总体理论之间有一“障碍物”。在建立“中间层次”理论的呼吁发出二十年以后，P. 默顿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他认为中间层次理论对各种总体社会学理论来说应具有“不变性”。换句话说，在工业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等领域的理论结论与各种总的理论观点似乎可以同时并存。默顿写道：“总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T.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P. 索罗金的整体社会学，与物理学中在探索“总体理论”时讨论的严整的“紧密结合的”密集的系统相比，更象总的理论的解释……，很多中层理论作为一种结果，可以与五花八门的

社会思想体系并行不悖。”^①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在“中间层次理论”之间，也就是专门社会学理论与总体社会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从总体理论到经验，反之：从经验到总体理论的途径都要经过中间环节，即专门理论。当然，在测定可以定量的观察数值时，要确立总体理论、专门理论的概念系统与经验研究所必需的“操作主义”概念之间的直接联系远非是简单的任务（参见第二章第二节）。

必须同时考虑到，从总体社会学理论到具体研究之间的途径同样要通过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这样，在我们的条件下，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具体研究，例如对苏联工人时间支配的研究，其中不仅要通过闲暇时间社会学，还要通过研究新形态形成的特殊规律，研究这一形态第一阶段，包括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在内的发展特殊规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在苏联社会学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近二十年来暴露了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还未彻底克服的对经验研究的怀疑，以及又对它过分的入迷，都应该算作社会学科学成长过程中的“病态现象”。调查征询如果没有科学依据，缺乏明确和深思熟虑的计划，有时只能是对社会学科学的损害。在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并提高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具体社会学研究发展得不够；另一方面，这类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仍然是完全经验主义的”^②。

当在苏联发展大规模的具体社会学研究时，资产阶级社会学已在制订此类研究方法工具和组织工作方面，以及在采用电子计

① P. 默顿著：《关于理论社会学，五篇随笔，旧的 和 新的》，纽约，1949年，第68页。

② 《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工作问题》。《苏联共产党最重要决议汇编》（1965—1972年），莫斯科，1972年，第387页。

算机处理所得数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研究这一经验过去是必要的，在目前也是必要的。但是应该考虑到，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著作的重视隐藏着因方法与方法论、经验研究与理论基础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产生的某种危险性。在个别的一些场合，在苏联的社会学著作中曾不加批判地借用概念工具，与此同时还借用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社会学对象和任务的概念以及概念论公式。

到现阶段为止，1967年苏共中央决议中所指出的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缺点大部分已得到纠正，但是还不彻底。目前，社会学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发展。一些缺乏方法论和方法依据的社会学研究还时有出现。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对象的认识方面还有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碰到两种极端的态度。

其中之一是夸大了研究工作中经验层次的作用，因而对理论的作用估计不足。这种观点以最普通的形式在下列议论中表现出来：“既然采用调查表格，这就是社会学了。”此类观点的较委婉的形式则表现在企图将社会学的定义表述为社会学是“纯粹的经验科学”，是“关于如何在社会领域里进行测定的科学”，或者更委婉些，是“关于社会体系的结构、发挥功能和发展的具体实验科学”^①。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再较详细地讨论一下莫斯科大学授课教程中对社会学对象所给的定义，“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发挥功能中和发展中的社会体系的经验社会学科”^②。这里首先就产生一个问题：社会学（其实，其他任何科学都一样）是否应该将对于“发挥功能中和发展中的系统”的研究上升到对于这种发挥功能和发展的规律的研究呢？如果是这样，则社会学不可能只是作为经验科学加以研究，因为缺乏理论的经验不能保证对规律的了的

① 《社会过程的模式化》，莫斯科，1970年，第18页。

② Ю. А. 列瓦达著：《社会学讲义》，莫斯科，1969年，第5页。

解。如果不是这样，则社会学就不能成为独立的科学学科，而变成负有提供规律知识使命的其他社会科学的“附属车间”和“经验资料的供应者”。

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将社会学和物理学进行对比。物理学既是实验科学，即经验科学，同时又是理论科学。但是，物理学家中谁也不认为物理学仅仅是经验科学，或者更有甚者，认为它是实验科学。没有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就不存在，只有加在一起，它们才组成作为科学的物理学。同样，社会学本身也包括经验研究和具体研究，但它的主要任务是对规律进行研究，因此，社会学也如物理学一样，是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的统一体。

对社会学中认识层次之间的辩证联系缺乏理解，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不正确的解释。例如，在上述援引的著作中有这样的呼吁：

“要掌握将现代社会学与19世纪社会哲学区分开的方法论分界线。”^①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得到“社会哲学”的承认，而得不到真正社会学的承认。但是，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为科学社会学开了先河。

要使历史唯物主义与理论社会学“分家”的企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停止。这种企图的根源是对社会学对象错误的理解，把社会学归结为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区别的、有关社会体系的结构和发挥功能的科学，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涵义要广泛得多，它是有关社会的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这样，在上述援引的讲义中便认为“发挥功能也就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②。

这一观点经不起批评。上面我们已经强调，不能把发挥功能和发展对立起来。唯物辩证法要研究的既是目前存在的联系，也

① 《社会过程的模式化》，第18页。

② Ю. А. 列瓦达著：《社会学讲义》，第7页。

研究发展过程。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来讲也是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关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与此同时又是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上层建筑不同“楼层”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自身之间相互联系的科学，也就是说是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发挥功能的科学。

社会体系的发挥功能总的来说是它的历史发展的一个成份，社会进步的速度越快，则这一联系就越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挥功能及其发展，直到资本主义被推翻，社会主义建立这段时间。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挥功能是与它的发展和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分不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发展就是要求质量状态的更迭，包括了发挥功能，也就是在该质量状态范围内的运动。

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分开的企图，给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带来了明显的损害。确实，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社会学理论（而社会学缺乏总体理论就不可能存在），则不得不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再发现或创造某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可是，将探索社会发挥功能抽象规律作为重点的理论社会学，纵然是以 T. 帕森斯的“社会作用理论”这样的形式出现也早就已经存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新的”社会学理论时，都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一理论上。类似的“探索”曾经在苏联党刊和科学报刊上受到了公正的批判。例如，Л. Ф. 伊利切夫把我们前面所引的一系列社会学对象的定义评为“按其本质来说是实证主义的”，并且得出下列结论：“社会学脱离历史唯物主义，为它寻找别的基本原理，都为那些对我们来讲是异己的思想和观点渗透进社会学创造了客观基础”^①。

① Л. Ф. 伊利切夫著：《哲学与科学进步》，第 210 页；再参见《共产党人》，1970 年，第 4 期，第 80—85 页。

最近，被批判的、似乎已经得到克服的观点又重新抬头的。在《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所组织的讨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圆桌会议”上，有些参加者坚持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任务不过是“把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作为统一的社会机体、本质特殊的、完整的社会体系加以研究。根据这一点，建议把社会学规律当作这一体系的联系程度和完整程度的特性加以研究。”^①从这一理论观点出发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发挥功能规律和社会主义发挥功能规律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但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规律（这一规律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很早之前就被叫做一般社会学规律！）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畴，却不是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在一篇论文中还肯定地说：“在上面阐明的思想中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作为社会学知识加以解释。”^②

对类似的推论不能同意，这些论断绕过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它之外为创造某种总的理论社会学“奠定基础”。这种理解使苏联社会学在两个方面迷失方向。首先，只有依靠把成熟社会主义的发挥功能过程看作它的完善过程、历史发展过程、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过程的理论社会学，对现代苏联社会生活的具体社会学研究才能取得成效。社会学研究所负的使命在于发现生活中新事物的萌芽以及必须与之斗争的旧的残余。它需要从哲学中的发展理论，即唯物辩证法及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即作为总体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础。

第二，要考虑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学不仅仅是一门有关作为体系的社会的发挥功能的科学了。认为理论社会学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前景的科学这种观点已

① 《共产党人》，1978年，第17期，第34页。

② 同上。

占优势。第九届世界社会学大会（1978年），以《社会发展道路》为专题进行了讨论，这决不是偶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的敌人认定资本主义向某些“后工业化”等等社会进化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者在会议上与他们的斗争不是环绕社会学是否应该研究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这一问题，而是环绕着下面一些问题：这一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沿着这个方向将产生怎样的社会类型，这一发展的规律又将如何？今天，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对象，在认识上的错误和不确切，削弱了马克思主义者在与资产阶级社会学斗争中的立场。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象认识中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把社会学仅仅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内。这种观点在苏联几乎不从事具体社会学研究时占了统治地位。目前，每当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划等号时，此种观点就表现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对象下了模糊的定义。^①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不恰当地将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则反映在对待具体社会学研究，对待“中间层次”理论的轻率态度上，反映在对它们的不信任方面。

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例子。1966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青年的生活计划》。经过13年，到1979年，本书的作者们被指责为“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及“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②其根据仅仅是“书的一半内容用来介绍经验论”以及该书在当时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类似批评所依据的前提是：不应该从事经验社会学研究；在苏联出版的社会学著作不应该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这两个前提都缺乏根据。

① 例如，参见A.E.富尔曼著：《历史唯物主义》，第6页。

② T.基什尼奥夫著《社会主义所有制两种形式接近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律问题》，第1卷，第67页。

尤其是对具体社会学研究的类似批评常常被共产主义的敌对者加以利用，他们长久以来徒劳地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似乎不能创造在苏联发展社会学的条件。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是支持苏联的学者在生活所有领域进一步发展具体社会学研究的。^①

最后，即使简短些，也应该在认识上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象和结构的基础上，研究一下社会学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大家知道，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在马克思学说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在科学著作和政论文中有时提出下列议题：“社会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组成部分。”这一议题初看起来不会有异议。但是，这一议题是作为“限制”社会学的研究任务而提出来的，它为各种对社会学对象的解释提供了极大的余地。

实际上，这一议题可以这样理解，社会学科学（例如，和马克思主义法学或历史学等一样）不能作为组成部分直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但是，那些将社会学归入“经验科学”之列并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割裂的拥护者们同样可以提出议题：“社会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组成部分”，并且还可补充其主张：社会学的任务只不过是“研究具体社会中的具体现象”，而这一点就已经不对了。与此同时，所讨论的议题还可能用另外的方式来“修补”：“社会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组成部分，因为从整个来讲，它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第9卷，第348页；第11卷，第449页；《真理报》，1979年5月6日。

的，同样不正确，因为这会缩小对社会学对象的解释。

因此，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时，使用同一个前提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所讨论的议题对于两个极端的并具有同样错误观点的拥护者都可以适用，所以，问题提得很拙劣。只有用补充的解释才能修正对这一拙劣问题的回答。这就是为什么要分析社会学的对象、它在马克思列宁理论中所占的地位，以便对上述反面议题予以补充。

按照我们的观点，对上述问题正确的回答应该具有展开的性质。总体社会学理论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也就包括在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一个部分中。但是，在总体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支社会学理论，例如家庭社会学或闲暇社会学，它们从总体理论中获取自己的主要思想，不可能包括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在这方面，它们和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体的、分支的社会科学，如历史学、法学和文艺学等相类似。对于辅助社会学学科，象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技术和组织，上面所述的也是正确的。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的（第四）组成部分，因为总体社会学理论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一个部分之内，即包括在它的哲学中，同时，整个社会学又比总体社会学理论广泛，因此，超出了哲学的界限。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其所有的部分和所有的研究层次上应该来自并依赖马克思主义哲学。

应该指出，这种“不简单的”、不是按照“是或否”，而是按照“既是又否”的原则作出的辩证回答，就是在解决经济学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时也是唯一正确的。作为总体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具体的经济理论，诸如工业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因为不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内。

不但如此，对于一系列哲学科学也应该考虑到它们的复杂结构，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推论。例如，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哲学科学，因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但是，整个美学和它的哲学基础是两码事。美学在其一些具体领域中与艺术学或心理学交接，例如建筑美学和认识美学，这些具体领域就超出了狭义哲学的范畴。

最后还要说几句关于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目前已经变成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经济学说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后者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动力和道路），是以作为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因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社会学理论，也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为基础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需要在具体社会学的研究中发展自己。具体社会学研究可以提供人们活动机制的知识，揭示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因此，政治经济学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也需要从分支社会学理论和总体社会学理论的立场出发所作的这些研究的概括中发展自己。同样，分支社会学理论以及在该社会经济形态条件下进行的具体社会学研究（后面，在本书第二编中正是要对苏联社会中社会学的作用进行论述），也应该依赖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和动力的了解。

第二章

唯物辩证法对于 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

辩证法在科学认识的过程中履行着三个相互联系的职能。作为总的发展的理论，它首先是发展的客观过程的哲学观点，这是它的本体论职能。作为认识论，它是关于认识的过程和认识的历史发展的一门科学，这是由它的理论认识的（认识论）职能所决定的。作为辩证逻辑学，它是一门关于抽象思维的科学，它的逻辑职能就取决于这一点。

只是为了便于分析才分成上述几个职能。在认识的实际过程中，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都必须同时以下面几个哲学概念作为出发点，即关于客观世界及其运动和发展的概念，关于通过实践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概念，关于人的思维的本质和利用抽象思维的规则的概念。必须借助于抽象思维，有意识地（或者即使是无意识地）利用上述的哲学前提，再现具体客体，一般说来，这种前提可以从任何一个哲学体系中借用过来，同时也可从“健全的思想”中汲取，而“健全的思想”的特点是具有自发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能利用逻辑原理和自发地掌握辩证法的某些要素。如果科学能以当代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作为出发点，而在我们的时代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作为出发点的话，那就会在很多方面取得胜利。

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在每一门科学中的使用都具有一定的特点，第一，因为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每一个特定领域中的作用都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二，因为每一门科学同时也会产生自己的方法，具有已经形成的概念工具。下面我们将详细研究唯物辩

证法在社会学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要考虑到社会学这一门科学的对象的特点，来研究它在认识人类社会过程中的作用。

第一节

辩证法是社会发展的理论

为了研究辩证法的世界观的和其他的职能，必须列出它的最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现象的普遍联系；从量变到质变；通过质量状态更迭的向前发展，这种发展伴随着似乎是已有的特点在更高的基础上的重复；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初看起来，上述原理似乎是极为普通的，因而难于在社会学研究中加以考虑，尤其在经验研究中。其实并非如此。无疑的，辩证法的原则首先给理论社会学提出了方向，因为这些原则是研究社会史、社会的现代生活和发展远景的正确依据，同时通过理论社会学又为经验研究指明正确的方向。为了阐明辩证法对社会学在各个认识层次上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来研究一下辩证法的规律，即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是怎样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以及怎样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之中的。

承认现象的普遍联系和依从性，在现时代可能认为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始终如一地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各个社会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发展，则是历史主义在理解以下两点时的必要前提：即一方面要理解在每一个特定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发挥功能的规律和社会规范，另一方面理解各社会、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的性质。

联系（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一方面，在自然界、社会中的同类客体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征，由于共同的起源，这些客体可能直接地相互起作用，也可能相互之间没有起作用。例如，

人类按其自然素质是同一的，因而我们不用对人种志学者和历史学者所断定的原始部落的内部结构、血缘系统、生活方式以及存在于彼此互不相关的各大陆上的古代文明方面的惊人的类同感到奇怪；另一方面，各大陆不同民族之间直接接触的发展会导致人、物、思想日益频繁的交流，从而使人们生活中的共同因素增长。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贸易的发展，由于联络和通信工具、航空和电视的发展，地球上人类的发展也就成为统一的、世界性的一个过程。

全球系统的各要素中共同因素的增长，是随着各民族之间联系的日益多样和巩固同时发生的。克服一些民族、区域、大陆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不平衡的主要先决条件就是这样的。这种不平衡是相当大的，因而那些不太发达的民族至今还可以为那些已经向前发展的民族展示它们自己从前发展的全部阶段。确实，19世纪中叶时英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尚未完全摆脱封建主义，尽管它们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中国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中封建主义的制度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当一些殖民地掩饰得并不巧妙的奴隶制度还处在昌盛时期的时候，而在中非、亚马孙河流域、太平洋诸岛、极北地带和地球上许多其他地区的民族还未脱离原始公社阶段。这样，西欧一些国家和美国就为其他民族展示出它们的近景或未来的远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已实现向新的形态过渡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为地球上一切其他民族指出它们的发展前景。但是，就是在今天，世界上不仅存在着资本主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前的残余，而在一些最闭塞的地区，如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山区，民族志学者至今还发现过着原始时代生活的部落。

过去，由于一些地理区域的被隔绝，一些发展落后的民族才会长时期地停留在落后的状态。欧洲人在地理学上取得伟大发现

的时代里征服了其他国家，使所有的民族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和平的文明感化，而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残酷的剥削，对于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来说，是一种灭绝他们，将他们变成奴隶，并加以奴役的过程。印加人和美洲阿西德克人的高度文明被摧毁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非洲变成了“狩猎黑人的自然保护区”。根据目前的统计，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在殖民地扩张政策时期，被灭绝和被运往美洲的共有6500—7500万人。马克思将按照这种方式获得进步的过程与甚至饮仙酒也只用死人的颅骨的多神教神灵相提并论。

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条普遍规律，它既表现在帝国主义强国为重新瓜分销售市场和殖民地而斗争的相互关系之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又反映在殖民地所属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之中。这种进步的对立性质表现在一些国家和另一些国家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例如，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种差距在18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征服它的时候比起在20世纪印度半岛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要小一些。在帝国主义殖民地体系瓦解后，由于依然保持着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地位，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的差距并未缩小。1950年人均生产前者（平均）超过后者10.2倍，而1977年已超过11.5倍。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以前落后的民族在最短历史时期内，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性质、文化水平方面赶上先进的民族。这一点已为苏联的（中亚一些共和国的、北方的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民族）和已经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正在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所证明，而现在又为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社会主义制度对被压迫民族来说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这

是因为这种制度将社会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并为它们创造了现实的条件，使之能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早已沿着历史进程向前迈进的那些民族。剥削国家的统治阶级旨在加深不平衡的政策，正在让位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旨在拉平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政策。在几十年内这个历史宗旨在苏联已基本实现。而这一点正是革命前遗留在我国境内的中央与边区之间发展水平极大差别的条件下实现的。

这个规律目前也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友好合作之中。在加入经互会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因过去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严重落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1950年相差2.2倍，而1977年仅相差0.3倍。^①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优越性，兄弟国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互相帮助，才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大大缩小了这一差别。

一切社会主义制度之前的社会关系的时代都将退出舞台，全人类的进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是一个均衡发展的过程。这样的时代快到了。

唯物辩证法关于在进步发展中量变和质变的联系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哲学，对于理解人类发展的共同进程的意义都是不无重要的。马克思正是从这些观点出发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形态有规律的更替的过程，是从比较简单的、较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向较复杂的、较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变过程。从原始公社过渡到阶级社会，而在阶级社会的范围之内又从奴隶占有制固有的比较粗野的剥削形式，经过农奴制到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而继续下去的必将是废除一切剥削，通过革命手段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其向共产主义制度的方向发展。

^① 参见《真理报》，1979年3月30日。

俄国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这一历史上最巨大的革命变革奠定了基础。这一变革至今已遍及各个大陆的许多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已产生了，无疑还将产生更多的不同的形式，因为各种不同的民族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上开始这一过渡的。

越过人类总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可能性在过去已经成为现实。居住在罗马帝国的西部和东部边区的日耳曼和斯拉夫种族，在其衰落时期能从氏族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基本上越过了奴隶制的形态。在现代条件下，对于许多民族，在他们根据友好合作国家的经验和依靠他们的帮助而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的情况下，从资本主义前的、有时甚至是从有阶级以前的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已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将平凡的进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从低质状态过渡到高质状态，从社会的一些社会组织类型过渡到另一些社会组织类型的循序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观点对立起来。列宁指出：“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人们的意识”^①。列宁认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的实质是两种发展观点的对立。^②

这个原则性的论点现在依然有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甚至是它的最保守的流派也会接受关于现行制度进化的论题，不但如此，在V.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各阶段》的观点中和在许多其他的理论中，都预言“后工业”社会将代替“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至上社会”、“能人统治”社会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在表面承认质变的背后隐藏着保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思想。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6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08页。

承认历史发展过程各阶段之间质的差别，就是对认识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发展的阶段、时期、分阶段之间的差别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些差别，即使也是质的差别，与各个形态之间的差别相比，那是另一种程度上的、等级上的、序列上的差别，因为前者是在该形态发挥功能作用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阶段与它垄断前的阶段相比，虽具有一定的质的特征的区别，但仍保持着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基础之上的主要的剥削关系。

共产主义形态与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差别，——这是一个序列之内的差别；在共产主义形态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又是另一个序列之内的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各分阶段之间，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社会和成熟（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是第三个序列之内的差别。苏联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和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的理论原理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的。

上面提到的两种观点的对立在解决关于源泉、发展动力^①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般认为发展的源泉存在于矛盾中，而社会生活进步的源泉则相应地存在于社会矛盾中。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它的“核心”，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将术语“斗争”放在引号内，这是一般表达这个规律时所必需的，以便把发生在自然过程中的矛盾（“斗争”也是此意），例如在原子核中的核子力和引力等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在这一概念之内。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08页。

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同样只能合理地理解为统一的整体，即该社会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社会中对立面的斗争，不管怎样都是人与人之间，即具有各种客观利益的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术语已用于它的原义。认清利益就会使人们产生磨擦、冲突，关于这一点将在下面加以论述。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的统一，要求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它的质的状态，从而要求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暂时的、动态的平衡，最终要求人们、各集团、各阶级、各民族能意识到客观利益的共同性。这种平衡（不断遭到破坏，不断地恢复，但是已经要估计到力量对比的变化）要求取得人们一定的协议和协调的行动。

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立的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社会思想方面，其中包括在社会学中有一种保守的趋势，以“平衡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其目的是为了保持现行的、达到一定程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为其辩护。

另一方面，与之对立的是“左的”、“急进的”、“超革命的”思想流派，它们否定现行的一些制度，但同时又看不到能废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和能使新的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力量。

“急进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否定辩证法”，同时还有一些“冲突学”的变种，其特点是强调社会冲突的作用，但是不要以新的原则改造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条件下，在解释社会发展的途径时，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内部所固有的、关于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规律的学说与进步发展的科学概念之间的联系。

辩证法在矛盾中看到各民族的发展、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整个人类发展的根源，但同时必须将决定该形态范围内的关系再

生产的矛盾，与引起这个形态的发展和转换成另一个形态的矛盾区别开来。第一种是社会发挥功能的矛盾的实质，第二种是社会发展的矛盾的实质，两种矛盾相互紧密联系。在发展得非常缓慢的原始社会中，发挥功能的矛盾是居首位的。随着阶级的产生，社会成了阶级斗争的舞台。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农奴与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手工业者与商人之间的矛盾，最后，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成为社会主义形态之前社会关系范畴内的基本矛盾。它们首先是作为特定形态发挥功能的矛盾，因为它们再生产出现行的社会关系。

但是历史前进得越快，决定阶级对抗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发展矛盾就具有更大的意义。这些矛盾同样也存在于社会生产之中，首先作为下列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矛盾而出现：决定社会对自然界的关系，对自然界统治程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之间的矛盾。从整体上说来，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彼此互相适应，处在一个统一体之中。但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这一矛盾将推动生产向前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整个社会也向前发展了。这一矛盾同时又是社会关系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为过时的生产关系的载体是统治阶级，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体现在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之中。

一般说来，决定某一形态存在的阶级矛盾和超出该形态范围以外的矛盾并不相同。众所周知，在封建制度的内部孕育着具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制度。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符合这整个时代中作为进步的、在一定条件下作为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资产阶级将社会的其他阶级——农民、手工业者、正在产生过程中的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这些阶级的利益是与封建主的利益矛盾的，它还以人民利益的名义，

反对保守力量，即企图永远保持已经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力量。这个矛盾的发展会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而在这个革命进程中会发生“对立面的转化”：资产阶级从一个从属阶级变成一个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是在封建主义社会内部成熟的，而这些矛盾的萌芽出现得更早些，是和商品生产一起产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简单的商品生产开始作研究，并不是偶然的，为的是以后转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上去。列宁曾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①

存在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存在于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某种商品的生产与为了达到私人的目的，即为了在出售时获得最大利益而进行该商品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另一种质的形式。这种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的产品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演变成为工人阶级——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占有者——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生产力为一方和陈旧的生产关系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从一个先进的阶级成为一个反动的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又成了新的、革命力量的代表者。这一矛盾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发展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09页。

过程，即从工人阶级起初自发地登上舞台到劳动者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为止。就这样，发生了“对立面的转化”，工人阶级成了矛盾的主导方面，他利用自己的政权达到完全地消灭资产阶级和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目的。

列宁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作的分析，是概括地论述辩证法的典范，因为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证明，发展就是矛盾从它们发生、从初级形式到完全地、全面地将萌芽时期的矛盾展现出来的发展过程。

将矛盾理解成永远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周期性地相互“取胜”的力量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按照这种理解，可以解释过程的无止境的重复，发挥功能，社会系统的平衡状态，但这不是理解质变的钥匙，从而也不是理解社会系统从一种类型发展、变化成有较高组织水平的类型的钥匙。

上面已经指出，对于辩证法来说，对立面的统一（平衡、一致等等，实质上只不过是统一的因素）和“斗争”（磨擦、冲突，等等，实质上只不过是“斗争”在广义上的因素）是彼此分不开的。

在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中，与辩证法对立的一些理论，其根据或者是将平衡、一致等等绝对化，或者是将冲突绝对化了。最近几十年来十分典型的是企图在折衷主义的基础上将这些理论综合起来。第一种理论的最有影响的流派是结构功能主义，第二种理论最有影响的流派是“社会冲突”论。这两派中每一派都较多地注意了或者是统一、一致，或者是斗争、冲突。但是他们对这两方面都理解得表面、主观主义和抽象。关于这些理论，由于适合于分析国际关系体系，将在第三章中加以论述，而这里必须研究这些理论的哲学基础，那些解释社会机体内部发展的尝

试正是采用了这些理论。

表面的方法，即只求将投入眼帘的东西记录下来，这就是这些观点的第一个特点。任何一个观察者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某种稳定性也好，存在着不断的，有时是非常尖锐的冲突也好，都不会不注意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在其理论体系中将这些因素加以绝对化了。但是，将某些现象记录下来是一回事，在这些现象后面发现发展过程的实质又是另一回事。唯物辩证法为社会学确定的方向是要在盘根错节的事件中揭示出由于在经济关系体系中阶级地位的差别，以及因他们的客观利益存在矛盾而引起的阶级斗争。

其次是资产阶级社会学所特有的抽象的方法，就是把现代社会看作为“一般的社会”，不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关系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固有的阶级对抗。采用这种方法就会产生泛泛地论述一般的“冲突”和一般的“一致”的现象。

主观主义同样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在研究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时的共同特点，因为分析社会发展过程基本上局限于意识范畴，研究目的、理想、已认清的利益和矛盾。

上面所分析的两流派无疑都是片面的。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著名代表人物 C. 利普赛特的自白：“在分析系统中或者突出冲突，或者突出一致，以及千方百计地强调这些现象中的一个现象的无关紧要，这种趋向是大部分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困难。”^① 上述的片面性早已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所克服了，但 C. 利普赛特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反对者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对它们逐个进行较具体的分析。承认社会体系的

^① C. 利普赛特著：《政治社会学》，载《当代社会学，问题与前景》，莫斯科，1965年，第147页。

平衡是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出发点和关键。该派于30至5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这个流派直接继承了19世纪末社会学称之为有机流派的传统。该流派的政治保守主义来源于它的一些理论观点。例如，对T.帕森斯来说，平衡被理解为动态的“自动恢复的”平衡，是由社会结构在其组织的以下四个层次上的稳定性所决定的：“技术上的”、“经营管理上的”、“制度上的”和“社会的”。平衡在以下两个方面被看作为系统发挥功能的基础：（1）在确定“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方面”，（2）系统内部“在保持集团的稳定性及其彼此对整体化的适应能力方面”^①。帕森斯派将平衡的破坏和冲突看作“功能紊乱”，而这种紊乱的消除要靠系统的稳定性。

结构功能主义的这个根本的哲学前提遭到了批判，并且不仅仅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因此在60—70年代平衡理论开始体现在结构比较精练的理论体系之中，这些理论体系的作者依靠从控制论中借用的概念，将社会与有机体的类似之处加以“现代化”。我们将A.埃特齐奥尼在60年代末提出的，并提交第九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作为分析发展中国家取得进步的可能途径的“主导理论”的《积极的社会》^②的观点作为例子。

这种理论有三个不同的特点。

第一，埃特齐奥尼是用控制论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发展的主客观因素的。为了说明社会是一个系统，他引进了“上层”和“下层”的概念；他称前者为监督者阶层，后者为执行者阶层。“上层”能看清社会情势，对它作出判断，并能在已有情报的基础上采取一定的决策，发出控制的信号，使这些信号体现在一定的

① T. 帕森斯著：《社会学总体理论问题》，载《当代社会学，问题与前景》第28页。

② A. 埃特齐奥尼著：《积极社会，社会和政治进步的理论》，纽约，1968年。

战略之中，并为这一战略提供一定的力量。这就是管理这个被他比作为“船舶”的社会的机制的对应物。“下层”是由社会的本体、内在资源（从原料到人力）和社会集团组成的。它的对应物就是船身。①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一艘船应该是有人操纵的，特别是当它行驶在狂风暴雨的大海里，而现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与它相比拟。埃特齐奥尼描述着一艘“社会的船”必须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只能在服从船长和全体操纵人员的指挥，并按照指挥而运转的全部技术设备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平衡论”应用到资产阶级社会时——运用控制论或者不运用——是对这个社会使用了类推法，这一理论用来论证不“动摇基础”而获得社会进步前景的可能性。这就是《积极的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

第二，A. 埃特齐奥尼狭隘地解释了社会生活的主客观因素，他的观点的社会学基础是鄙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定形式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体系，因此也就鄙视社会的阶级结构，这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典型理论。事实上这些恰恰是技术经济发展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必要的中介环节。因此，在客观因素中不包括经济关系和阶级，正如在主观因素中不包括为争取已经认清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一样。结果，社会发展导致这艘船上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冲突，为了社会系统的“稳定性”，我们应该在有利于“上层”的情况下解决这些冲突。

第三，埃特齐奥尼将每个国家（而国家正是他分析的基本“单位”）与所有其他国家隔绝起来，看不见外部联系对它的影响，虽然他补充地说，这是为了便于研究起见。在社会学方面，这意味着将每个被研究国家的发展过程与国际的经济关系和政治

① A. 埃特齐奥尼著：《谈谈发展的指导理论》，乌普萨拉，1978年，第4页；
《积极的社会》，第110—111页。

关系的作用隔绝开来。但是实际上，众所周知，那样的隔绝本来就不存在的，而在我们这个世界特别不存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国际管理。

埃特齐奥尼在乌普萨拉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相当明显地反映了《积极的社会》的观点在方法论方面的弊病，因为他在这里提出的目的是，要将他的理论用于分析“不太发达的国家”取得进步的途径。这个报告的题目很概括：“谈谈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实际上却只适用于发展中的国家。^①

埃特齐奥尼将这些国家中的每个国家与全世界的发展进程隔绝，完全用它们的内部因素来解释它们的落后问题。他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并不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别，而是根据国家运用资源，从而加速发展速度的能力上的差别。换言之，埃特齐奥尼所提出的不太发达的国家的分类法是旨在发掘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哪里资源（原料储藏量、众多的人口、文化达到一定水平，等等）丰富，即“下层”自己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足够的先决条件，那里只要组织、管理以及建立能运用这些资源的“强大的政权”就可以了。在具有资源、但缺乏组织的国家中可以举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为例子。

在资源微薄、“下层”的发展受到限制的地方，当“上层”具有足够的能力使用和利用资源的时候，任务就在于寻找资源，扩大资源。A. 埃特齐奥尼举了坦桑尼亚和……以色列作为例子。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想起美国对以色列的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实际上他为其侵占别人的具有丰富资源的国土的企图开脱罪责。将以色列列入不太发达的国家这一类，总的说来是专断的。最后，将中非的一个国家乍得作为两“层”都是薄弱的例子，因为那里缺乏自然资源，人口稀少，文化水平低下，与国家领导很

① A. 埃特齐奥尼著：《谈谈发展的指导理论》。

薄弱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了。对乍得，如同对这一类型的其他国家一样，埃特齐奥尼想不出什么主意了。

上面所指出的，以平衡论作为基础的一些社会学观点的共同缺点是片面地强调系统的稳定性，对社会关系抱着主观主义的态度，抽象地对待“一般的”社会，不考虑阶级结构方面的差别，最后是显而易见的表面化，尽管已采用了控制论的术语。上述种种都完完全全是《积极的社会》所固有的观点。

50年代末，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冲突社会学》(P.达连道夫、J.科塞尔等人)开始广为流传。从60年代末起资本主义矛盾的加剧促使这一流派的声誉增长，这一流派以自己对待“秩序”、“权势集团”“稳定性”等等所持的批判态度吸引了西方的大学科学界代表人物中的急进分子。这个流派，正如从它的名称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将冲突看成是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时代的“冲突学”有着自己的起源。T.霍布斯在17世纪提出的作为人类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被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武器，将关于生物竞争的学说用于社会，或是作为人种范畴内的种内竞争，或是作为生物学方面彼此不同的种族之间的种间竞争(A.龚普洛维奇)。

在结构功能主义统治时期，冲突大多被看作为使社会体系中功能暂时遭到破坏的(T.帕森斯)，以及由于某些个人或集团的“错误”行为(J.兰德斯别尔克)和破坏相互关系(Э.梅奥)而引起各种“紧张状态”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重新对冲突问题产生兴趣，是由于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影响，企图以承认社会冲突的作用来“补充”结构功能主义。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现代“冲突论”的“鼻祖”之一J.科塞尔公开地将

冲突置于从属的地位，因为他特别强调冲突的“积极功能”，强调将它列入“法规的范畴”，从而特别强调它在保持社会系统状态平衡方面的作用。科塞尔认为，与其说冲突“减弱某些社会集团的适应能力，还不如说为其增加适应能力而效劳”^①。结构功能主义最著名的代表P.默顿认为，冲突理论只不过是一种“中间层次”理论，即对于结构功能主义这一总的理论来说只是一个辅助理论，这并不是偶然的。著名的联邦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P.达连道夫的观点有些不同，他赋予冲突以较广的意义，认为整体化和冲突是“任何一个社会的两个可以作为同等依据的方面”^②。

毫无疑问，承认冲突就包含着不仅承认运动、发展，而且还承认作为发展泉源的矛盾。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之间的个别的差异，我们要指出这个流派的共同的根本性的缺点，那就是片面地、狭隘地、不彻底地承认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于“冲突学”完全可以引用列宁的一句话来说明，他说，20世纪对发展原则“大家都已经同意”^③，对20世纪末存在着矛盾“大家都已经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都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了。

这样承认矛盾就产生了主观主义、狭隘、不彻底和表面化，这是因为冲突和矛盾不是一回事的缘故。唯物辩证法所指出的目标，首先是要分析客观的社会矛盾，以及由于在经济关系体系中地位不同，从而客观利益也不同的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渐渐地被人们认清，并成为自觉的政治行动的刺激因素。例如，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但随着理解的加深，它就从“自发的阶级”变成一

① J.科塞尔著：《社会冲突的职能》，格伦科，1958年，第8页。

② P.达连道夫著：《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冲突》，1959年，第104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80页。

个“自为的阶级”。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就要求建立能领导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组织，首先要求建立以社会发展规律知识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那时，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从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转到为建立国家政权的斗争，为把政权变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改造社会的工具的斗争。

冲突是阶级、社会矛盾、个人之间有意识的冲突，因而它反映出社会矛盾，其发展程度和解决的手段。“冲突社会学”中冲突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中矛盾的范畴之间有一条鸿沟，“承认人类这一生物是社会的，但又是善于闹冲突的动物，这是冲突论的认识基础”^①。P.柯林兹就是这样说明这个理论的出发点的。不难看出，这一观点的来源就是前面所提到的T.霍布斯的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冲突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们懂得，在20世纪里已不可能将事情归结为个人的冲突，冲突存在于社会的社会组织之中，因此，对于由个人冲突转为社会冲突这一点，他们不得不采用某些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P.柯林兹遵循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传统，把职业的种类作为自己社会分层图式的基础。职业种类在人们之间形成的差别不仅是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是生存的手段，而且还因为人们在这个生活必不可少的领域里必须介入各种关系。柯林兹故意将分层理论与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的理论对立，将社会冲突与阶级斗争对立。他断言：“马克思错了，他把受历史限制的权力形式看作为一般权力关系，如果赋予他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冲突的理论以较抽象的形式，那么，就可以使这一理论在众多的情势下变得有用。”^②柯林兹赋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以更抽象的形式，这就使它变成一个空洞的图式，从而为现有的制度开脱罪

① P.柯林兹著：《冲突社会学》，纽约—伦敦，1975年，第59页。

② P.柯林兹著：《冲突社会学》，第61、6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责。

P.达连道夫论述得比较婉转，他较多地重视欧洲精神方面的习俗和日益增长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的一部主要的、多次在西方不少国家再版的著作《工业社会中社会阶级和阶级冲突》，几乎一半篇幅都是用来分析和批判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达连道夫在很多方面是“同意”马克思的，“承认”他的理论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学的意义，这一切都是为了将马克思的学说搬到自己“比较广阔的”、适合“现代工业的（请读作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图式中去。

达连道夫所作论断的主要哲学前提是整个实证论所固有的，即将作为“思辨”科学的社会哲学从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学中分离出来的企图。而经验科学的设想是经得起经验研究的检验的。前者似乎对各种形式的更迭作了解释，后者则解释了现有社会的结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仅仅是为了解释形态的交替，也包括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但是他对解释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似乎并不感兴趣：“阶级的理论对马克思来说并不是关于现行社会的理论，因而也不是社会阶层的理论，而是解释社会形式变化的工具。”^①事实上，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对马克思来说，阶级的理论同时既是解释社会发挥功能的矛盾，又是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工具。

达连道夫企图“超过”马克思所根据的第二个主要的哲学前提，是来源于他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主观主义者们的态度。达连道夫与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不同的是，他并不全部否定阶级冲突的客观基础。他将利益区分为“潜在的”和“公开的”。他写道：“真正潜在的利益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已经认清

① P.达连道夫著：《在工业社会中社会阶级和社会冲突》，斯图加特，1957年，第17页。

的、有目的的、我们相应地称之为公开的利益。”只有当这些“潜在的”利益成了“公开的”利益、“心理上的现实”的时候，当某人的“感情、动机、愿望贯注在某个目的上的时候，”^①阶级才会出现。换言之，只有当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自觉地参加阶级冲突的时候，阶级才会出现。

对于达连道夫来说，按照逻辑实证论的方法论，“潜在的利益”仅仅是一种“理论结构”，而“类集团”（他这样称“自发的阶级”）是“虚构的单位”^②。这样，客观的矛盾看不清楚，事情的本质被归结为冲突，其结果是（带有一些不改变事情本质的附带解释），达连道夫完全否定了阶级的客观存在，包括否定“工业社会”中阶级的客观存在。

同时，达连道夫企图将自己构造出来的图式说成是马克思的，似乎马克思认为“只有有组织的利益一致的政治集团”^③才是阶级。达连道夫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成为政治斗争这一事实作出任意的结论，说什么阶级只有在阶级之间存在政治斗争的情况下才存在。

这就是达连道夫的社会哲学前提。他以此为根据企图将冲突“限定”在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平静”的发展图式中，他认为，阶级冲突可能导致：（1）社会结构的变化；（2）部分占据统治地位的人员的调换；（3）即使没有调换也会发生结构的变化，那是在通过民主过程调节的阶级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④最后一种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在这种社会中，“工业冲突”已经不会跨出企业的大门，因为在工业中，“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再也不是在政治领域中相应的阶级的各

① P. 达连道夫著：《在工业社会中社会阶级和社会冲突》，第169页。

② 同上书，第171页。

③ 同上书，第173页。

④ 同上书，第200页。

个部分”。在政治中统治阶级就是“官僚、部长、议员”^①，因此，“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冲突，从阶级斗争变成了假民主的辩论。”^②

从例举达连道夫的论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是如何被用来与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第二，“冲突社会学”是如何在实际上“被按进”盛行的“一致”的理论中去，即，资产阶级社会在企业家和工会，也就是工业中的“社会对手”，在政治方面通过被资产阶级民主作了补充而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保持“动态平衡”。

特别要详细叙述的是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将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学”加以综合的一些新企图。Γ.兰斯基就作过这样的尝试。他将这些流派之间的争论看作为保守分子、急进分子和他们精神上的继承人——现代功能主义者、冲突论研究者之间的争论。前者是根据社会与系统的比较，“在这个系统里，整体的生存和安宁的取得是依靠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合作。”在“反系统的”冲突理论中“把研究力图破坏系统结构的冲突和斗争放到首要的位置”。兰斯基的目的是要对两种概念加以“综合和整体化”，为此提出要重新研究有关系统的概念。他认为，“一切人类的组织都是不完善的系统。”^③这种“不完善”在于存在着矛盾，他写道：“要让社会的利益与社会成员的利益并行不悖是不可能的，如果后者之间哪怕只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不相容的话，在这种条件下，最大的可能是，社会利益与某些社会成员的利益一致。”Γ.兰斯基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少数人的利益被社会

① P.达连道夫著：《在工业社会中社会阶级和社会冲突》第240页，256页。

② 同上书第257页。

③ Γ.兰斯基著：《社会的本质、关于冲突观点的社会学读物》，马萨诸塞，1973年，第42页。

的利益破坏，或反之。”^①这样，作者几乎完全接近于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对社会抱着抽象的态度，以及不懂得作为阶级关系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而阶级关系在社会生产的每一个时代都具有特殊性，这就使他的“综合”企图成为宣言性的了。

另一个“综合”的尝试是P.凡杰尔别尔格提出的，他企图将辩证法与冲突论混为一谈来“超过”辩证法。在《辩证法与功能主义：谈谈综合论》一文中他的目的是要提出，“这两种理论作为完整的社会模型”都有局限性，并提出了一个“联合的”理论，但是要想“超过”辩证法的企图却建筑在对辩证法蒙昧无知的基础之上。凡杰尔别尔格毫无根据地为辩证法是，第一，轻视外部条件对该社会的作用，第二，将矛盾简化成在“平衡模型”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的“两极”。^②

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继承与否定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是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在确定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途径时，用部分地掌握辩证法的一些方面来反对辩证法。

继承在社会史中是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着的。在新事物的内部直接保留着似乎已经失去原有状态的旧事物的某些特征，因为战胜旧事物总是在斗争中进行的。比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都意味着旧的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一些形态的更迭，因为从一些形式过渡到另一些形式时保留私有制和剥削，就是在这些社会形态的基础内部保留了共同的东西。

旧制度的残余能以经济结构的形式保留下来，时间或长或短，例如，在俄国，村社土地占有的残余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

① П.兰斯基著：《社会的本质、关于冲突观点的社会学读物》，第43页。

② 《美国社会学评论》，1963年，第5期，第695—705页。

还存在。旧的因素在精神发展领域中存在的时间可能更长些。特别是在象宗教这样最保守的思想领域之内。大量的宗教残余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并且从中可以看到从原始公社开始以来的各个时代的特点。

但是旧事物也可能以另一种形式被“扬弃”，即经过改造的形式保留下来。任何新的质在向前发展中都在前面一些阶段的基础上产生的，甚至不重复这些阶段的特征，而是将他们如“吸入”一般。这种辩证的保留好的东西的“扬弃”，一眼看来可能完全不被察觉，但后来会突然表现出来，重复某时有过而后来又丧失的特征。在向前发展过程中，这种类似重复以前有过的东西，黑格尔称之为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从而又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中看到了“合理的内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到这一规律的实质是在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发生了向旧的东西的回归，似乎重复了以前各个发展阶段存在的某些特征、特性、因素，后来失去了，并又重新获得，但已改变了形式。“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①。这就是列宁对所研究规律的实质所下的定义。

社会主义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时，意味着“似乎回归”到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原始公社制度。但对这种回归不应作机械的理解。社会主义必须保留人类在阶级社会时代中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它为生产力无止境的发展开辟道路，而原始公社制度则不可避免地要与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冲突。

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明向前的发展是螺旋式的。由于进步一般是发展的重要的分支，因而这个规律照恩格斯的说法是“一个极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6页。

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①。这个社会发展规律对理论社会学具有很大的方法论意义。然而，掌握辩证法这个规律，就象掌握其他辩证法规律一样，不可避免地要研究一些具体过程，找出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并在规律性中寻找比较普遍规律的表现，以及找出辩证法的规律是怎样的。用各种推断证明事物必然（在这个或那个方面）回归到过去经历过的阶段，这是不正确的。H·米海洛夫斯基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三段式作为理想结论的根据，列宁在与他辩论时写道，“恩格斯在驳斥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想到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东西，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于‘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的黑格尔公式，那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是自然界中全不是稀有的现象。”^②

只有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才能在这一有机地结合了继承与否定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认识社会发展的前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强调指出，辩证法的革命实质：“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

然而，对于作为继承和否定的相互联系的历史过程的认识，各门学科也从另一些阶级立场出发作一些尝试，在这些尝试中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5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43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页。

主导作用的正是社会学。

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对立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一些辩护观点，许多观点都是由资本主义的一些直接庇护人所提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利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依靠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而获取巨大的超额利润从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作出某些让步，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动员了资本主义的潜力。为了保持已经衰亡的制度，许多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些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化”或“产生变体”的思想以及由资本主义目前的阶段逐步长入类似“后工业的”社会的思想。在这里进化与革命相对立，而继承完全超越了对现有的否定。这种趋势最明显的是表现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中。我们可以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甚至这一保守的流派，为某些事实所迫，也不得不“吸收”某些辩证法的要素（对现实采取系统分析的方法，在概念的范畴中承认系统性）。

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各种变体承认社会在保留其基础的情况下的进化。科技进步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进化的源泉，例如，Y·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各阶段》^①理论就是论述这类观点。苏联的科学书刊以充分的根据批判了这些观点，同时也批判了一些将“后工业”社会的前景与人类的共产主义前景对立的企图。

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其社会学相对立的另一些观点，越来越强烈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急进派，以及流氓无产阶级阶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终身伴侣的失业现象的存在，特别在青年人中间，这使流氓无产阶级阶层的人数日益增多。这些流派的特

^① Y·罗斯托著：《经济增长的各阶段》，坎布里奇，1960年。

点是赞扬否定，认为未来是可悲的，因为他们看不到能结束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首先是结束象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世界大战、核灾难的可能性等现象。悲观情绪特别厉害地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O·施宾格勒的《欧洲的末日》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欧国家和美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及其相近的思想流派中又继续存在这种情绪。

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们乐意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同时吸收了萧鲁东、新黑格尔分子、现代存在主义者等等的观点），而且企图将按自己方式解释的辩证法作为一面哲学的旗子来阐明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和政治的观点。这一流派的著名活动家T·阿多尔诺将自己的一部主要著作命题为《否定辩证法》，这并不是偶然的。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的实质在于否定，他所作的结论正是指向社会的。这一点就在许多其他的作者那里也占了上风，他们倾向于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甚至还产生了一个流派，它集各种理论成分之大成，得名为《辩证法社会学》。它的一些追随者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事实上他们离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唯物辩证法很远。为了使读者了解现在在社会学中仍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对立的《否定辩证法》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和H·古尔维奇的观点作为例子加以研究。

T·阿多尔诺、M·霍克海默尔、Γ·马尔库塞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特别是早年马克思的继承人。但是，第一，在他们的著作中所介绍的辩证法被宣布为只属于社会发展的，从而失去了普遍性、通用性。拒绝总的唯物主义，其中也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后者似乎是恩格斯“发明”的），这一点在使社会发展规律脱离自然规律的企图中就感觉到。按照他们的意见，辩证法是意

识所特有的，在社会中生存着有意识的人们，因此，那里就有辩证法；而自然界中没有意识，因而没有辩证法，除非人在用自然界的物质创造了技术设备时，将辩证法带进了自然界。

第二，拒绝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视为同一。而这两者是融合在统一的“总体”实践之中，在实践的内部发展着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这种同一直接表现在，意识的产物，首先是时代的社会思想是与这一时代的社会关系同一的，因而时代的现实关系的辩证法就成为该时代所产生的意识辩证法的形式。请看Γ·马尔库塞是怎样写的：“马克思称之为经过史的人类形成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人类的当代史将从这个社会被废除之时开始。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了史前发展的抽象的逻辑形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提供了它的现实的、具体的变化。这样，马克思辩证法与经过史时期还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①似乎是T·阿多尔诺、Γ·马尔库塞、M·霍克海默尔和他们的战友们的“否定辩证法”完全恰当地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就是它也注定要与资产阶级社会一起灭亡的。

第三，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就是否定辩证法。对于马克思来说，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否定这些或那些过时的形式与承认在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是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矛盾对后者的制约性使得有可能发现那些为了对新事物而否定旧事物的社会力量，而新事物的萌芽及其代表者是一起出现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提出了论据，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作为这一制度的统治阶级的同时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和社会文化。

对资本主义采取无政府主义的、反抗的否定，概括地说，采取任何一种“左倾的”否定，都是在历史转变的情势之下，小资

^① Γ·马尔库塞著：《理性与革命》，波士顿，1964年，第316页。

产阶级和流氓阶层遭到破产和感到绝望时所产生的，这不是一种新的现象。法兰克福流派的代表们看不到能根本改造当代社会的现实力量，因为按他们的意见，西方的工人阶级失去了革命性，因为它已经“整合到体系之中”。他们指望那些“非职业的投机分子”，脱离生活常轨的社会力量，首先是青年的“左倾”运动。他们认为这种运动可以在适当的时刻“摧毁”体系。60年代末这些观点与“左倾急进分子”思想相符合，而那时马尔库塞在大学生运动中作为“新左派”的首领受到大家的欢迎，也不是偶然的。

另一个“巴黎的”“社会学辩证法化”的尝试和法兰克福学派有些不同，因为索尔邦的一个社会学教研室前主任Ж. 古尔维奇与其说是一个社会学家，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哲学家。根据古尔维奇的意见，“在一切人文科学中社会学最需要应用辩证方法”^①。但他所提出的“经验现实辩证法”是黑格尔、马克思、蒲鲁东和萨特尔等人观点的混合物。它将矛头指向马克思的辩证法，古尔维奇指责马克思为“教条主义”。

古尔维奇象法兰克福派一样，否定自然界的辩证法。对于他来说，辩证法只与人的实践一起出现的，只有人才能将它引进自然界，人们在作用于自然界的过程中才使它“沾染上”辩证法的。古尔维奇的辩证法反对一切“稳定性”和“固定化”。由于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他看不到这些变化的历史规律。对思维持相对论的态度使古尔维奇否定“僵死”的概念，即概念的任何稳定性，以及与僵死的概念同时，否定作为思维科学的形式逻辑。^②古尔维奇在向黑格尔和马克思借用对立统一的原则时，又加上了自己的原则：“补充性”（这一点下面再谈）、相互辩证法的蕴

① Ж. 古尔维奇著：《辩证法和社会学》，巴黎，1962年，第17页。

② Ж. 古尔维奇著：《辩证法和社会学》，第26页。

涵、“辩证法的两面性”（确切地说“模棱两可，后者似乎是弗洛伊德发现的）等等^①。古尔维奇提出的“将辩证法非教条主义化”和“将它辩证化”^②的任务，事实上是使辩证法主观主义化。这导致他对社会实践以及对与实践罗织在一起的人的意识的多层次、活动性和矛盾性作出十分含糊不清的论断。

“否定辩证法”和以它为基础的社会学实际上并不能给予从事具体研究的社会学家以任何东西。西方资产阶级经验社会学过去和现在都脱离“辩证社会学”而发展着。使一些职业社会学家放弃它的原因是，无法从由它提出的一般哲学范畴转入操作主义概念，它的公开鄙视数量和数学的方法，以及明显的非理性主义风格。

这样，在上面所研究的两个“辩证社会学”的变体中（这也是其他变体的特点）企图以按其实质是反辩证法的概念来代替作为发展观点的辩证法，这些概念的中心是在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否定现行社会。在思维范畴中他们企图以诡辩代替辩证法，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专门加以研究（见第三节）。

与主观主义地解释辩证法相反，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忠实地反映了现实历史过程中继承与否定的统一。它“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③

第 二 节

辩 证 法 是 社 会 认 识 论

辩证法作为发展的普遍观点不仅包括客观世界，同时还包括

① 见古尔维奇著：《辩证法和社会学》，第246—275页。

② 见古尔维奇著：《辩证法和社会学》，第307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44页。

它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处在相互联系和发展中，并由矛盾“编织”而成，那么，人的意识和思维也能忠实地反映世界，也应该具有这些特点。辩证法的世界观职能，同其作为认识理论的认识论职能，和作为思维科学的逻辑职能是不可分割的。在列宁的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的著名的公式中表达了这些职能不断发生联系的思想。在这个公式中辩证法不仅被理解为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而且还被理解为关于认识和思维的科学，这里所说的也正是唯物辩证法。

在转到研究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社会学中的作用时，应该，哪怕是简略地论述一下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好。首先论述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依照列宁所说，辩证法“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①

有时由于这一点的缘故，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辩证法是否包括认识论的一切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对于这个问题既可答是，又可答非。答是，是因为如果不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上的话，认识论的无论哪一个问题都不可能正确地得到解决，辩证法要求对人的认识过程作全面的研究，以及通过这一过程的相互联系和由矛盾所决定的历史发展加以研究。答非，是因为不管是辩证法关于人的认识发展的论题，或者是唯物论论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和它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因而当列宁说到辩证法包括认识论时，这一点应从真正的辩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因为它似乎“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认识论，任何一个认识论问题不仅列入唯物论问题的范围，同时列入辩证法问题的范围。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既是唯物的，又是辩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6页。

证的。

辩证法在社会认识中的认识论职能，总的说来，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性，此外，将使我们感兴趣的特点可以说是第二序列的，是由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那些特点。一切认识论的问题同样也是社会意识的问题。这里我们要论述的仅仅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在社会认识中的相互关系。

主体和客体在社会认识中相互关系的特性，首先是由社会作为认识客体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一客体又包括从事认识的主体。这对通常的意识来说也是正确的，但对科学认识，其中包括社会学认识来说，则显得特别重要。与自然界中自然力的变化万端不同的是，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形式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的整体化的结果，而人们又遵循着各种互相矛盾的利益，按照这些利益提出行动目标，他们之间又发生冲突，并或多或少意识到发生这些冲突的原因。和自然界不同的是，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思维不仅存在于研究者的头脑之中，它作为一个主观因素贯穿到对过程进行实际的研究之中，这些过程的实质经常不外是人们的行动。

主观因素，即意志与意识的因素，和客观因素，即存在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为改变这些条件所进行的物质与实践活动的因素，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是对任何一个社会过程进行研究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在关于自然的科学中，认识的客体虽然也被包括在社会实践之中，但处于真正的社会之外，那么，在认识社会各种现象时，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都处于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范畴之中。在社会学中尤其要考虑这一点，因为在经验社会学研究中象调查、征询等等的结果那样的一些科学事实，即通过人的意识对他本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评价，以及对与其他人的关

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的评价，都是认识的直接客体。

如果判断一个人不能仅仅根据他自己对自己的想象，那么也不能不考虑他“对时间和对自己”的想法。编写出一个真正科学的、社会学调查的提纲的本领恰恰就在于能以最大的正确性，在其相互关系中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主客观因素。例如，在大学生评价自己被迫提前离开高等学校的原因中，应该善于找到“淘汰”的客观因素，例如，在中学所学的知识存在着弱点，物质上有困难等等。在分析企业中工人流动的原因时，必须看到客观因素的作用，如，缺少住房和儿童设施，工人在该企业中技能水平的提高可能性不大等原因。

资产阶级社会学对上面所研究的社会的根本特点，因而也是社会认识的根本特点，考虑得很肤浅，因为它基本上只局限于研究人们行为的精神因素，倾向于根据意见、判断、价值取向来判断他们现实的或意料中的行为。由于在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中，在调查、询问、访问过程中要研究“意见的世界”，所以采取肤浅的态度就自然地使研究者将主观的评价、“关于世界的意见”与应询者的客观状况视为同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在承认研究人们总的意见、评价、意识的重要性时，要求看到现实在其中的反映，而现实则理解为现实存在的条件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们客观的需要。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又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提出最重要的要求：研究全部客观资料的总和，以及通过研究社会意识对资料加以补充，并将后者与前者作对比，而研究全部客观因素的总和就需要采用所谓的附加观察的方法等来利用统计资料、文件以及对人们的生存活动的分析。

是否仅仅因为这些因素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经过意识并由我们的询问，即了解“意见”而被我们所认识，就可以将这些

因素解释为主观的因素呢？当然不行。因此不能同意那种相反的观点，这种观点有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著作中也会遇到，并与任意解释术语“主观的”有联系。例如，P.B.雷夫金娜写道：

“不能不指出，在自然界中除了主观的（即人的）评价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评价。因此抱怨评价的主观论据如同对因昼夜或四季的长短而感到遗憾一样。”^① 是的，意见、评价是属于人们的，但是否由此得出结论，它们仅仅是主观的？怎样来理解它们的主观性呢？作者认为，既然在劳动生产力水平或劳动力的流动性中“有着一定的意识状态”，那么它们就属于主观因素。

这里将“主观的”这一概念的两个意思混淆了：（1）属于主体，人的意思；（2）由意识决定的意思。在第一个不是该术语最基本的意义中，人的思维和感觉是主观的，因为属于作为意识和行为的主体的人的，“除了人的、即‘主观的’感觉之外，没有其他的感觉得，因为我们都是从人的观点而不是从魔鬼的观点来判断问题的。”这是列宁在批判巴扎罗夫引进了“主观的感觉”这一术语，并认为这一词组是“毫无意义的”^②时说的。P.B.雷夫金娜所用的术语“主观的”正是上面的引言中所说的第一个意思，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社会学中，“主观的”这一概念首先用于第二个意思，作为总的表示由意识决定的一切东西，与不受意识决定的客观的东西不同。如果将主观的认为是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的东西，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站到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立场上去，因此，P.B.雷夫金娜将客观因素列入主观因素，仅仅是因为它们属于人，属于社会，这时她就犯了一个错误。

至于社会学家干预所观察事件的进程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影响

①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和方法问题》，第3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09页。

别人，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主观因素。社会学家在研究自己的同胞的生活时，不知不觉地和不由自主地影响了研究过程，并且这种影响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众所周知，应询者对调查表中问题所作的回答在很多方面是与怎样提问有关的，被询问者在思考问题时，是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分析事实的，这就影响他的回答，而这些回答却给调查者记录下来。这种情况在座谈、与被询问者的“谈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学家参加座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刺激”因素，这种因素在研究过程中给“客体”打下了烙印。这种干预可能是“设计好的”，有意的。比如，从西方询问社会舆论的实践中知道，“巧妙地”提出问题常常使被询问者处于二者必须择一的窘境，而将所得的资料经过加工和公布，询问的结果就成了一种制造理想的社会舆论的强有力的工具。

但调查者可以争取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同时又影响被询问的人和所研究的社会生活现象。是否能基本上排除这种影响呢？这不仅对于社会学，同时对一般的社会认识来说都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何况，这一问题实际上产生在任何一个认识过程中。因为在实践中我们作用于一个物体时，就是改变它，实践以外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因而问题可以归结到下面一点：在认识一个物体的过程中能否知道作用于物体的性质和程度，以便在进行理论概括时排除观察者的作用，并使客体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即获得客观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在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答案时，是根据人对事物的实际上的作用，就象自然界中的任何相互作用一样，是物质的，可以认识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这是因为我们在将受作用前和受作用后的客体状态进行比较时，可以根据实际应用理论所得的结果证明它们的真理性。这一个对认

识过程来说是主要的思维顺序，要求对我们实际作用于世界的客观结果加以说明。

以“原则上不能”将人对客体的作用，以及真正客体的本身加以分解作为幌子，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进行的攻击，从出现量子力学起得到了补充的刺激因素。实证论者为了这个目的企图利用由H.玻尔于20年代在物理学中提出的“互补原理”。

对于“互补原理”，当时曾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在苏联的哲学和物理学著作中作过分析。^①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只须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已足够了，那就是，用实证观点对这一原则（作为认识论原则，而不是作为物理学原则）的解释必然要求建立两个概念系统，其中每一个系统能说明的仅仅是现实矛盾中的一个方面的特点。这些概念系统的“补充性”表示，在每一种情况下必须采用或者一个或者另一个系统，但是不能两者都采用。不难看出，采取那样的态度，现实的相互关系，现实的对立面的统一就会遭受到破坏。

但所有这些都与社会学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由于当时H.玻尔所指出的“互补原理”也能适用于其他科学的意见，一些社会学家企图作出这一原则能应用于社会学中的结论。在法国Ж.古尔维奇就作过这样的尝试。古尔维奇在阐明自己的辩证法超过马克思的“沾染上教条主义”的辩证法原则时，第一次将这些原则称为“辩证的补充性”，并直接引用“波粒二象性”和H.玻尔的“互补原理。”^② 在苏联的社会学著作中，在N.阿列克谢耶夫和Φ.博罗德金的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尝试。作者

① 参见M.Э.奥梅利亚诺夫斯基著：《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莫斯科，1956年，第2章等。

② Ж.古尔维奇著：《辩证法和社会学》，第246—247页。

们推理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研究的客体已不是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的现实本身，而是一种由客体（从正统的意义讲）和观察的条件所构成的系统，我们将这些理解为测量程序的总和……，同时还有与被观察的系统相联系的观察者（研究者）本人。他们将说明社会学测定的客体性质的参数分为两组。对第一组参数来说，度量是“由公理确定的”，不由观察条件决定，这样的参数就象公民证上的性别、年龄、出生地、民族等，简单说来，这是客观的参数（“O参数”），这些参数不知为什么被作者称为“公理”，并仅仅“能被算作是客体的”。第二种参数（“S参数”）与测定的方法有关，与“客体——观察条件”这一系统的类型有关，与系统中的相互作用有关。^①这里指的是征询、调查等等的资料。在社会学中正是研究这些参数，作者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这上面。因此，作者们抱着错误的观点，认为似乎是在社会学中研究的客体，不是取之于客观的个人、集体、社会本身，而只能是与社会学家，即观察者的作用混在一起的东西。在社会学中作者们将“互补原理”的实质看作是，“至少始终存在着两个参数，对它们同时进行测量是不可能的”^②。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描述系统应该利用“两个不能并存的（矛盾的）概念系统”，这些系统“在描述个人作为本身和集体的一个成员的行为中的二重性时”是必需的，存在着“个人作为具体的个人的行为和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人行为之间的矛盾”^③。

这样，个人和集体成了社会学中某种类似“波”和“粒子”的东西，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东西，需要不同的概念系统对它们进行描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就象个别与总体

① 《社会过程的模式化》，莫斯科，1970年，第41页。

② 同上书，第43页。

③ 同上书，第47、48页。

之间的联系一样，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他看到了个人在该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和中的本质。这种相互关系仍然为作者们的论断排斥在外。

当然，依靠征询反映出人们真正的意见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这里许多东西都与调查表格中的提问有关，特别是在“保密的”调查表格中。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到，即使人们非常希望对提出的问题回答一个“是”或“非”，但他们不是总能摆脱思维模式的影响，不总是十分善于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困难，是社会学在准备研究方法时应该加以考虑的。然而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这些困难的存在不应导致“社会学的不可知论”，不该为在社会学中应用“互补原理”辩护。

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直接引出了一个关于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兴趣的作用问题，即学者的社会立场对所提出的目的、进行研究和认识研究结果的影响，因为集中反映社会集团利益（而每一个社会成员，其中包括学者，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属于某些社会集团）的是一种思想体系，这一问题具有比较普遍的性质：关于在社会学中思想因素的作用及其与科学客观性的相互关系。

毫无疑问，以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学，反映了阶级的根本利益，而社会学中的思想斗争在其整个历史发展阶段里，归根到底反映了思想体系范畴中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与党性，这一点与社会学的力求认识客观真理并不矛盾。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此领域中一些学者承认自己科学的思想性，而另一些学者则否定）不可能不受到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统治思想体系的影响，这种思想体系与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是相矛盾的。这就有碍于得出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概念。

因此，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学时，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双重任

务：取其客观的、精华的东西，并其由阶级立场所决定，并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糟粕。有关这一点列宁写道：“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面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①列宁所说的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完全适用于社会学。

不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有多少形形色色的流派和派别，它们的代表人物都将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社会学看作为自己的敌人。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看到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与表现出某种容忍态度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间，在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与无法提高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领袖之间，存在着相当重要的区别。但是不管人们对自己是怎样想的，既要生活在社会中，又不受社会的约束是不可能的。思想家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依赖形式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其中也包括十分间接的依赖形式。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学代表人物的观点时，特别需要看到那些真诚地坚持科学研究的自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62页。

由，并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如反对种族歧视或核战争威胁的学者。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党性，它的公开的阶级性被它的敌人们用来作为指责其脱离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借口，为此目的，他们采用了一个老的手法——将思想体系与科学对立起来。

伪善的、非彼即此的抉择：是科学还是思想体系，是客观的科学知识还是阶级利益的反映——这是新康德主义者还在19世纪下半叶时就已提出了，那时就已将反对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说，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它应提出不依“观点”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知识；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那么它反映客观利益，并且因而也不具有普遍意义和客观性。

在现代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可以看到两种“互相补充”的趋向，它们以共同的前提作为基础：因为思想体系反映了一定的居民集团的利益，所以它始终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例如，A. 古德纳尔在一本专门论述思想体系和工艺学之间相互关系辩证法的著作中断言，思想体系的实质在于“部分与整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思想体系——这是旨在支持特权的、对现实的系统的歪曲”^①。但是从关于思想体系是虚假的意识的总前提中作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

一方面，以实证论为方向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继续着新康德主义路线，并要求将思想体系从社会科学中“清除出去”。第六届和第七届社会学大会上（1966年，埃维安；1970年，瓦联那）关于社会学与思想体系的相互关系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敌人的争论中心。后者如P. 阿隆和M. 贝尔建议从社会学中“清

^① A. 古德纳尔著，《思想体系和工艺学的辩证法。思想体系的起源，基本原理和远景》，纽约，1976年，第276页。

除”思想体系。在苏联学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发言中，在“思想体系”这个术语的思辨上表现出根据很不充分。^①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思想体系就是最终反映阶级和社会集团的经济地位和利益的思想体系。

• 在社会学中，象在一切社会科学中一样存在着思想体系的因素，其根据的主要事实是，社会理论无论如何是由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用之于实践，有的学者企图否定这一点也是办不到的。一切社会科学都研究社会世界，人的感情、思想和行动的世界。没有反映个人的、社会集团的和民族的利益的自觉目的，是不可能行动的。因为科学理论系统地反映阶级的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斗争最重要的一个领域。须知问题在于谁的利益在科学理论中得到了反映。客观的科学忠实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向，担负起武装先进的社会力量的任务，而这些力量的利益是反映在这些趋向之中的。在现代条件下，人类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接近的，工人阶级是为和平和社会主义奋斗的力量和领导者。作为哲学理论的唯物辩证法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工人阶级及其先进的和自觉的部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左派激进主义”社会学在承认思想体系是利益的反映和行动的指南时，否定在社会学中能够建立客观的科学理论。这一流派从60年代末开始，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危机现象的加剧，一度很活跃，要求使社会学“重新思想化”，并给它“恢复”思想的职能：似乎需要“恢复”那从未失去过的东西！

上面提到的A.古德纳尔是这一流派著作最多的代表之一，他自认为是“超越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证明这一论题，他诉诸辩证法。事实上，他的“辩证法”导致承认思想体系既是为现实辩

^① 参见《社会学和思想体系》，莫斯科，1969年。

护，同时又是对现实进行批判的一种工具，因为，他的依据是：

“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是思想体系的一个必然的论题。”^①而每一个“部分”又企图将自己的利益冒充为全社会的利益。这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被“相提并论”了，因为，按A. 古德纳尔的意见，社会对立永远不会消失。至于谈到思想体系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他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也象一般的社会矛盾一样，将永存于世。思想体系“借口它所宣传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希望得到精神上的优势”，同时社会科学也“希望得到优势，正是因为它们否定这个统一”。^②

这样，古德纳尔的“辩证法”就在于把解释世界的理论与改变世界的实践对立起来，从而也将理论与作为实践行动指南的思想体系对立起来。与此相反，马克思辩证法的根本思想则建立在正确解释世界的理论与按照正确理解的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的实践相统一的论题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于社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顽固的敌人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敌人实际上就是“超越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其他“左倾”社会学家利用被任意作了解释的主观辩证法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 三 节

社会学中的概念辩证法

对辩证法的认识论职能的研究，使我们接触到关于辩证法的逻辑职能问题以及关于社会学中的概念辩证法问题。列宁指出：“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③这一点特别是与概念

① A. 古德纳尔著：《思想体系和技术的辩证法》，第282页。

② A. 古德纳尔著：《思想体系和技术的辩证法》，第35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10页。

中的思维有关。人们能自然而然地，但毫无意识地、辩证地进行思维。不少辩证思维的出色例子包含在人民的俗语和谚语之中，包括在人们日常意识和每天的谈吐言语之中。思维过程的辩证法象在自然过程和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一样，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辩证法作为关于思维的科学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哲学传统（见第一章第一节），并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得到高度的反映，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不仅是关于物质世界辩证法的科学，同时又是辩证逻辑学，即关于辩证思维的科学。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对一些自然科学家们提出，他们有必要掌握作为思维方法的辩证法。自然科学不应忘记，“那些把它的经验概括起来的结论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① 恩格斯所说的“真实的思维”在这里是指考虑全部哲学成就的辩证思维的全部外延。

掌握作为科学的思维方法的辩证法以及辩证逻辑是很必要的，就如掌握关于现实和认识者对待现实的态度辩证概念一样的必要。列宁在分析造成20世纪初发生在物理学中的哲学基础危机的原因时指出，作为引起危机决定性原因之一的一个事实：“在最杰出的理论家的身上也表现在对辩证法的完全无知。”^② 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于社会学，正如对于整个社会科学一样，特别必要，因为社会生活是最善变和充满矛盾的认识客体。

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一领域的状况根本区别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情况，^③ 现在，相当数量的自然科学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而在世界舞台上，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7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80页。

已占据了领先的地位。它对受到资产阶级哲学传统熏陶的人文科学的学者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社会学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一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致1978年第九届社会学大会上当选为国际社会学协会新主席Y·希麦尔斯特兰德（瑞典）的贺词中指出：“战后的几年在西方社会学中完全占统治地位的、以宣传为目的的和极为肤浅的反马克思主义尚未彻底失败，但作为主要趋向，它已经属于过去。”①

上面所述的当然并不说明资产阶级主要的社会学家兼理论家已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学者掌握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复杂的和长期的过程，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一过程的进行也是不可能没有困难的，因为一些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还相信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方法论观点和概念工具。

研究社会学中概念的辩证法问题，从讨论比较普遍的问题开始是适宜的，即从唯物辩证法和作为思维科学的辩证逻辑的相互关系问题开始。这个相互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辩证法的规律包含了那种既为客观世界，又为反映它的思维所固有的、普遍的东西，换言之，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和方面。

然而，关于辩证法和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不只限于此，因为除了辩证逻辑外，还存在着形式逻辑，它是由亚里士多德奠基的。古典的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最简单的规律和规则，遵循上述规律和规则是正确的思维所必需的。上面所说到的关于思维的自发辩证法的内容用于形式逻辑则是较为合适的。绝大多数的人在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则、规律、推理格时，甚至并不考虑到这些规律、规则、格是怎样的，它们是怎样出现在他们的思维之中的。

① 《以萨简报》，秋季版》，1978年，第18期，第2页。

而实际上它们是产生于人们按客观世界的规律行动的 实践 之中的。列宁强调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①

辩证逻辑、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相互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关于物体及其作为得到稳定的和为思维所记录下来的相互关系的概念是形式逻辑的哲学基础。形式逻辑坚持概念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规定性，在这点上它是正确的。概念应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反映在概念之中的现象的特性：桌子此时此刻是桌子，一小时以后，如果它不被毁坏的话，它还是桌子；资本主义制度一百年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

辩证法被用来说明概念时，则要求作更深一步的研究。它并不排斥形式逻辑，承认它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它确认，这些界限是相对的。

如果按辩证法所要求的那样对待现象，正象对待某种不断变化着的事物那样，那么，显然，概念和判断同样也不能看作始终是与自己相同的东西，甚至即使是桌子在每一特定时间内仍然是桌子本身，但也是不断变化，逐步地损坏的。这一点在发展得很快的社会现象领域中表现尤为明显。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原则上还与一百年前，即1880年时一样，但同时又不一样，尤其在最近十年中，在20世纪70年代里，那里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现在，包含在“美国社会”这一概念中的内涵，远非一百年前和十年前的内涵了，因为有些内涵已消失，但也出现了不少以前没有的东西。例如，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萧条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增长，使能源危机等更加严重化了。

辩证逻辑将任何概念和它们在判断中的结合看作为正在变化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3页。

着的、象反映在其中的世界上的现象一样。然而，在现实世界的现象后面，辩证法同时还承认某种相对的固定性和稳定性。从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辩证逻辑中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使用形式逻辑的一切规则，将概念看成是完全固定的。形式逻辑的方法在辩证逻辑方法的范畴之中完全可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辩证思维和反辩证思维（形而上学思维）的区别，并不在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是依赖于形式逻辑，而辩证思维似乎是摒弃它的。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则是在一切情况下进行正确思维的条件。但是与辩证法格格不入的思维只局限于形式逻辑的狭隘的范围内，将概念看成是停滞的、僵化的以及彼此完全不相关的。与此相反，辩证思维要求概念具有灵活性，作为使意识中所建立的形象与实际相符合的最重要的条件。列宁曾经强调指出：“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①

形式逻辑的规律是应该接受的，但必须从辩证逻辑的立场上加以接受，即把概念的固定性看成不是绝对的，而是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所以是相对的。第一，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而实践是能深入事物本质的；第二，特别对社会学来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所研究客体的发展，而概念的发展也应随之而“跟上”；第三，同时必须估计到社会认识和个人认识之间的差别。概念可能通过对判断的不断综合，即根据其在整个概念系统中的地位，在其全部外延中得到确定。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概念的内涵都是由社会意识凝聚起来的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就是从这一个部分中选出某一个方面的，这种选择取决于一定的实践的需要，以及由需要所决定的理论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概念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通过思维列入一定的判断。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12页。

因而，形式逻辑的规律是标准的要求。这样，在思维的现实过程中，不同的人们（和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所使用的同一个概念的内涵，并不完全地、绝对地同一。辩证法的敌人正是利用了这一事实来拒绝一般概念的稳定性。辩证法的这些敌人和上面已提到过的“老形而上学的”思维的拥护者们不同，将概念的易变性绝对化和实在化。在社会科学中这种主观主义者的“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有着一定的传统的。

19世纪下半叶中产生的新康德主义的巴登流派（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等）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认识方法对立起来。前者似乎与完全同类的客体打交道，因而可以利用“普遍化的”方法，即作概括。根据他们的意见，后者则与独特的客体打交道，因此，为了完整地 and 独特地复现具体历史事件的社会科学，必须用“独特化”的方法。在这一观念中，“老形而上学”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新形而上学”对待社会的态度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着重批判了“老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这种思维方法的基础上，概念的稳定性绝对化了，概念之间建立起了无法克服的界限。马克思将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对作为雇佣劳动体系卫道士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典型手法是，他们把反映商品生产，以及进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经济范畴，如商品、金钱、资本、利润等等说成是永久性的。从而，社会生产的全部历史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史，而反对这种“天赋”制度的斗争被宣告是徒劳的。

与此相反，马克思将反映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经济范畴看成为历史范畴，或者是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是与历史发展的前面几个时代相比已根本改变了自己的内涵的历史范畴。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商品生产者的最发达的社会，所以商品生产的共同范畴在这个社会中也最发达的。为此马克思曾写道：“人体解剖

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①

形而上学地理解经济范畴和社会范畴不仅是资产阶级制度辩护士的特点，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级评论家的特点，俄国民粹主义者就是后者的例子。他们对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民中所发生的社会变化视而不见。民粹主义者对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认识是僵化的，永远固定不变的。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列宁，指出了民粹主义者所特有，对待社会生活所持的形而上学态度的根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封建主义条件下，农民是一个与地主阶级对立的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还保留了相当多封建主义的残余，正如1861年在俄国进行改革后一样，农民这个概念的内涵起了变化，因为农民本身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它分化成不同的社会集团。19世纪末的俄国农民中包括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贫农，以及基本上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所有者中农。贫农是半无产阶级，而中农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意义上，农民中继续包括富农，即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和雇农，即农村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中农民是这些社会集团的总和，但它的基本群众是贫农和中农，布尔什维克党在提出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劳动者联盟的任务时，指的正是这部分人。

这样，在资本主义时期，农民这个概念又获得完全不同的内涵。由于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农民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43页。

会特性又发生了变化，并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已经变成了新的阶级——集体农民阶级，即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级。农民这一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辩证的思维方法要求估计到社会科学概念内涵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其中包括农民，因为研究的客体本身不断地在变化着。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时期都必须把农民理解成一定的社会力量，或者是封建社会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或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因而，在研究每一个社会时，应遵循形式逻辑的一切规则，把“农民”这一概念用于一定的意义上。

20世纪，在社会认识的范畴中因社会的蓬勃发展，将辩证法“强加给”思维。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化不仅表现在普遍承认联系和发展的原则，以及片面掌握作为客观世界学说的辩证法要素（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同时在理解人类思维的本质方面也有相应的进步。在思维的范畴中，我们时代的“反辩证法”不仅从坚持概念的不变性转到了承认概念的灵活性，同时在灵活性的后面也不再看到概念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主观主义在概念范畴方面的特点是折衷和诡辩。列宁认为，它们与辩证法在思维范畴方面的区别是对概念的灵活性的理解不同。“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 = 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①

诡辩和折衷主义的本质被列宁的辩论文章《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彻底加以揭露，该文是1920年至1921年间因讨论工会问题而写的。

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在这一讨论中是从诡辩的立场发言的，而布哈林则从折衷主义的立场发言的。诡辩是抓住了某一偶然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12页。

特征，并据此来说明一个现象的性质的，其本质就是片面地对待现象。折衷主义初看起来与诡辩相反，要求考虑的不是现象的一个方面，而是多方面，但是，实际上，它的多方面是虚假的，因为折衷主义的特点是将事物的各种特征加以形式上的结合，不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从中分出重要的、固定的特征。在这两种情况下，思维所构成的画面是被歪曲了的，对现实的反映是不真实的，因而也是主观主义的。

折衷主义和诡辩所特有的概念的主观主义灵活性也并不意味着拒绝形式逻辑，相反，这两者都是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也仅局限于它而已。列宁揭示了诡辩与折衷主义的实质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他以杯子的定义为例。列宁说道：“学校里讲的形式逻辑（学校里只能讲形式逻辑，而且只应当对低年级讲，并且在讲解时还要加以修正）是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东西来做形式上的定义，而且只是这样做定义。”如果只限于一个偶然的定义，那么这就是诡辩。如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

“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①

与诡辩相反，辩证法要求全面地对待事物。但是，与诡辩不同的是，辩证法所表示的不是事物定义上诸特征在形式上的结合，而是善于揭示这些特征的相互联系，并区分出那种在具体的、为实际目的所规定的条件下的基本的、主要的、决定性的特征。列宁继续写道：“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83页。

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①

列宁提出的关于辩证逻辑的作用问题对于我们时代反对思维方面的主观主义是特别重要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现代修正主义利用诡辩和折衷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以及在社会学和政治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那些概念作片面的解释，并用这种观点解释实际行动的任务。

折衷主义在理解社会生活时的典型表现是“因素论”，它在上世纪已与似乎作为社会学中一个“片面的”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根据这一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其中每一个因素都会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问题在于要考虑一切因素的作用。“因素论”的支持者们责备马克思的“片面性”、“单线解释”，毫无根据地断言，似乎马克思主义考虑的仅仅是经济因素。这一理论至今继续在主张对社会进行“多线解释”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中占统治地位，根据这一理论，社会变化的原因应在一系列彼此没有关系的许多现象中寻找。

马克思主义与“因素论”根本的区别不是在于这个理论是“全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考虑社会发展的一切方面，但同时区分出其中最主要的、最本质的一个方面。进步的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发展，它决定社会生活的一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83—84页。

切其他方面的发展，而这些方面照样也对经济产生影响。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技术决定论”占了优势，其实质是将社会生活的一切范畴的变化看作是经济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并不考虑社会制度方面的变化。“技术决定论”被用来“证明”两个相对立的社会体系的不可避免的趋同，说什么是因为在美国和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和技术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这一思想直接贯穿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许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中，例如也贯穿在Y.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各阶段》的理论之中，这一理论当时就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中遭到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①毫无疑问，“技术决定论”这些理论本身就是以诡辩、片面、突出一个因素，忘记其余因素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在70年代初开始出现这一观点的比较巧妙的一些变种。还是那个Y. 罗斯托在另一本书中，即在《政治和发展阶段》中，又把政治因素引进来加以研究，然而依然忘掉了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之下需要根本加以变革的社会的经济制度。

在多伦多举行的第八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1974年）P. 达连道夫提出了这一观点的另一种变种。达连道夫利用“共同市场”各国用于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的费用的数字（1973年“九国”的费用为170亿美元，每年增长10%），以及“运用马克思的语言”，断言，“科学既是生产关系的要素，又是生产的强大力量。”达连道夫企图把科学机构和教学机构数目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科学家、教师、工程师队伍的数量增长（毫无疑问，这会引起社会的社会结构上的变化）说成是新的“启蒙者阶

^① Y. 罗斯托著：《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坎布里奇，1960年。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请看H. M. 奥萨恰娅著：《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理论》，1963年，第3章；B. C. 卡佩林著：《社会发展的进步和乌奥尔特·罗斯托的阶段论》，莫斯科，1967年，以及其他的著作。

级”的成长和生产关系的自动变化。在这里，他忽视了这样一个根本的情况：生产关系首先是所有制关系。

达连道夫虽然承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所经历的许多困难，然而却得出了完全没有根据的结论：“社会能够发展自己的结构，以便在利用新的可能性时，避免以前常有的各种形式的异化及至最终的革命动荡。”这里又指的是“一般的社会”，因而也是指资本主义社会。这位社会学家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家和统治集团推荐了一些老药方：考虑科学技术革命的潜力，更加努力去“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社会。”达连道夫把新社会理解成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商品生产的优先地位让位给服务性生产，让位给教育和卫生保健的发展和环境保护，也就是说，让位给在西方通常称之为“生活质量”的所有的那些东西（见第五章）。

Ⅱ.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①一书中发展了一个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在社会的每一个主要的范畴中似乎有着自己的“发展的轴心。”根据第一个轴，即技术经济轴心，“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进而发展到“后工业”社会，贝尔预料在美国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至少是在20世纪末。根据第二个轴心，即所有制关系的轴心，其发展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贝尔同时还提到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轴心。^②

贝尔利用“轴心图式”来论证两个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趋同的那种思想，因为每一个社会不受其社会制度的影响，迟早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美国先于其他国家，走

① Ⅱ. 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11页，同时可参见《美国》，1974年，第215期。

② Ⅱ. 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11页。

向这种社会。贝尔认为这一社会的实质是，它将围绕着作为理论知识的科学为核心来组织这一社会，学者、教师、工程师将成为统治的社会阶层。自然，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的条件下发生的。至于说到贝尔的论断方法，那么在我们面前放着一个折衷主义的鲜明范例：一切“轴心”似乎都不相关的，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彼此影响。贝尔根据问题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复杂化了的“因素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对其不科学性早就给指出了。

在社会学这一门包括各个认识层次的科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在概念范畴中的系统方法，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把系统方法理解为辩证法中的一个要求和表现。但是这个论题在应用于概念范畴时，就要求作补充说明。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业已形成的概念系统，除此以外，还利用其他科学的一些概念、哲学的范畴以及从日常意识中借用的概念。但是科学概念的运动首先产生于该科学的概念系统内部，每一个概念对于这个科学来说是网中的“纽结”，系统的一个要素。概念的善变性、灵活性是通过其相互的配合和说明在系统的要素之间联系的总和来体现的。正是这一事实被逻辑实证论者尽情地夸大了，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见概念和判断的系统之外是客观现实，而他们正是负有使命要最充分地、全面地反映这个客观现实的。

新实证论最著名的代表 P. 卡尔纳普对这一方面的观点的实质被他的志同道合者 O. 纽拉特归纳如下：“建议”应该与建议相比较，而不是与“经验”，或者某个“领域”，或与别的什么相比较，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特别强调都属于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巧妙的形而上学，因而必须对它们加以摈弃。每一个新的建议是与已有的和彼此协同一致的建议的总和相对比。如这一建议可以列入一定的系统，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加以系统化的一

切，就作为不正确的东西加以抛弃。^①

新实证论者将概念和词汇、判断与句子、逻辑和语法相等同，因而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科学的句法”。考虑到这一情况，就不难看出，这里的“形而上学”指的是唯物主义及其承认的外部世界，而确定每一概念的内涵完全归结为确定其在“概念系统中的地位”。在系统内部对概念进行比较，掩盖了将概念的系统和这一系统的每个要素与认识的客体相比较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新实证主义来说，尽管它坚持“语言的规则”，逻辑的规律，其中包括符号逻辑，但在观察形式逻辑的一切要求时，概念的灵活性还是主观的灵活性。

辩证逻辑提出了一个原则上完全不同的方法，它本身包括系统方法，但是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的。为了保证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中的概念的客观灵活性，必须考虑到在两个主要关系方面的科学认识的系统性质。

第一，科学不是由孤立的概念所构成的，而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是在总体上反映现实的某个“断面”，这一点直接在定义中表示出来。概念内涵的定义不可能采用别的方法来确定，它是在判断系统中确定的，每一个判断能从某一个方面说明某个概念的特性。这也可以认为，判断中所引进的新概念同样需要定义，这样，直到无限。结果，在一个概念的内涵中整个概念系统都在起作用。因此，当实证主义者们断言，概念的内涵除了指出它在概念系统中的地位以外，不可能用别的方法来表示时，他们是对的。但他们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理解，这门科学的概念系统一定与认识的客体互相关联着的，即与一定范围的客观现实过程相关联着的。这样的对比是在实践中进

① 摘自M. 科恩福尔特著：《反对唯心主义的科学》，莫斯科，1957年，第216页。

行的，这种实践可以以新的客观的内涵丰富整个系统，其中包括这个概念。

第二，认识是以不同程度深入到现象本质的各个认识层次的统一。在每一领域中科学认识的每一层次都有着自己的概念系统。但是这些层次彼此并不孤立，它们相互联系，而这一垂直（或称层级）联系应与水平联系，即这一层次概念的联系，同时加以考虑。

在一些科学中（例如在物理学，或者社会学中）联结着许多层次的认识，同时较普遍的，即高一级层次的概念在一些认识的低层次概念系统之中得到具体化。例如，普通物理学理论中的古典力学，有着自己的概念系统，概念在这些科学中具有应用性质，象材料力学等。正如量子理论的概念在固体物理学和许多其他的专门物理学理论中都是必需的。此外，每一种专门的物理学理论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概念系统，而这一概念系统是围绕着普通物理学理论的概念而“建立”的。与此相似，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总体社会学理论的概念，都是概念的系统，这一系统用于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社会学理论中，例如，在个性社会学中，或在闲暇社会学中，但其中每一专门学科并不局限于总体理论的范畴，它同时也可引进自己的，为了反映社会生活某一领域所必需的概念。

不但如此，承认不同层次的概念系统之间的层级性质的联系，将我们带出物理学或社会学的范围，引向总的理论概念系统。哲学对社会学的意义（象对于其他科学一样）在于，具有最普遍性质的哲学范畴，是总体社会学理论的概念网的特殊“支点”。这就要求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系”在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系统之上，例如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样的社会学概念，只能将其与存在和意识的哲学范畴联系起来，才会被正确地

理解。社会结构的概念（第五章将专门对此加以论述）应该建立在系统、要素、结论等的辩证法范畴之上。

因此，以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要在每一认识层次中，在该科学及其概念系统的范围中进行，同时还要以间接的方式，即通过与较普遍的概念系统相比较而进行，而该系统同时又由社会实践加以检验，但已是更为充分的检验。人们为改变社会所进行的历史性的改造活动的总和乃是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系统的正确性的标准，而整个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系统正确性的标准。

因此并不奇怪，实证主义的最主要的一个困难是产生于从该“语言系统”，即概念系统按次序转向下一个系统，即“记号系统”的过程中。在概念系统中“证实”句子的正确性，而“记号系统”本身则通过列入按次序的下一个系统时得到“证实”，等等。那么，它们之中最后一个系统，即一般科学的正确性怎样来确定呢？

只有承认概念、判断、理论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对比关系的必要性后，即扬弃实证主义原来的前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要实证主义者完全拒绝承认现实，因此他们为了摆脱唯我论，不得不折衷地将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放到自己的论断中去。例如A. 艾耶尔建议“将全权观察员们，即现时代学者所接受的系统看作是真理。但这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学者们是否为了接受这个系统而接受它呢？还是因为这个系统反映了事情的本质”^①。艾耶尔并非出于自己所愿，从反映论立场上，即从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们将社会学和物理学作为“多层次的”科学进行了对照。但是不能不同时考虑到使社会学区别于物理学的非常

^① A. 艾耶尔著：《经验主义认识的基本原理》，伦敦，1962年，第92页。

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在物理学中存在着全世界学者统一的概念系统。而在社会学中有着各自的概念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社会学流派是互相对立的。这一情况（对于社会学与其他的关于社会的理论科学是相同的）使确定概念以及概念的发展问题大大复杂化了。思想上的对抗并不是排除，相反地要求进行接触，交换思想，其中包括借用资产阶级社会学在分析经验材料中和在部分的结论中，同时在研究的方法、组织和技术方面可能提出的宝贵的东西。吸收经验时应该首先对观点和概念工具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可是遗憾的是，这一点并不总能遵守。结果，一些研究人员时常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引进与之格格不入的概念，同时忽略了使所引进的概念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概念的整个系统相一致的必要性，以及忽略了这一系统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系统之间的联系。下面用三个典型的例子将所述的东西加以说明，这些例子在借用的方法上各不相同，但是在不加批判的做法上却相一致。

第一，有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从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借用的那些概念，在哲学内涵上比他们要反映的那组现象的含义要广泛一些。“社会流动性”这一概念就是如此，这个概念是 P. 索罗金于1927年在以这一名词命名的那本书中所提出的。

根据索罗金的说法，社会流动性是“个人和社会客体或是珍品，即凡是由人的积极性所创造或改变的一切东西，从一种社会立场向另一种立场的任何一种转变。”^①他所持的出发点是，社会是一个具有许多种社会立场的系统，即可以通过多向度测量的某种固定的、稳定的结构。索罗金借助于“流动性”这一概念企图将社会结构的一切变化过程都包括进去。

“流动性”这一概念翻译过来就是 подвижность（可移动

① P. 索罗金著：《社会流动性》，纽约，1927年，第133页。

性——译者注），仅此而已。流动性的补充和对立面是稳定性，正如运动与静止，变异性与稳定性连缀在一起一样。P. 索罗金不仅说的是个人和集团，而且还说到一般的“社会客体”，即社会生活的任何一种现象都可算进去的“社会客体”，例如文化珍品。这样的结果是，某一文艺作品的社会评价降低，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垂直流动”，同时还是“下降”，而将公民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城市（在不改变社会地位的情况下），看作是一种“水平流动”。

后来，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在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的国家里，对社会流动性的实际过程广为研究，并集中研究了个人从一些社会阶层转入另一些社会阶层的过程。不管社会学家对于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方法持什么观点，在一些论述社会流动性的作品中，事实上是研究从一些阶层转入另一些阶层的过程，同时是根据数量测定区别的标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根据这样的研究任务，就给予“社会流动性”下了一个含义较窄的定义。这样，B. 巴伯尔认为，流动性“在较高的和较低的社会阶层之间或者是上升，或者是下降，或者确切地说，由一个比较固定的社会角色转向另一个社会角色，而角色可以看作是高的，或是低的”^①。例如，K. 鲍尔捷也有类似的论述：一些人从一些集团转向另一些集团，或在社会分化所限定的一个集团的内部流动^②。C. 利普赛特和P. 本迪克斯给社会流动性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即“个人从一个社会立场转向另一社会立场的过程”^③。类似的定义可以举出许多。Л. 米列尔在论述社会流动

① B. 巴伯尔著：《社会分层：结构和变化过程的比较分析》，纽约，1957年，第356—357页。

② K. 鲍尔捷著：《我们社会中流动性的内涵》，载《科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1958年，第40页。

③ C. 利普赛特、P. 本迪克斯著：《工业国家内的社会流动性》，伯克利—洛杉矶，1959年，第10页。

性的综合性著作中作出结论认为，有必要对流动性的最初的扩展了的认识，即认为流动性是社会系统中发生的任何变化的观点作出限制。他指出，一方面，系统的动态不只限于流动性；另一方面，对于流动性的研究不一定要固定在变化的动态上面，他所作的结论是：“流动性事实上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过程，但是在解释社会动态和个人行为时不应滥用它^①。”

Ⅱ。米列尔在这种情况下所提供的证据特别珍贵，因为他所比较的不仅是在西方一些国家内所进行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比较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学家们所采用的术语的含义。西方绝大多数的研究者离马克思主义甚远，但是采用数量方法专门研究该过程，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流动性，并不是社会的可变性，不是社会系统的动态和“社会客体”抽象的运动，而是一些个人从某一些社会集团向另一些社会集团的流动。

可见，甚至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实质上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将“社会流动性”这样一个相当普遍的术语用来表示一些个人（和小群体）从一些阶层、集团、阶级向另一些社会阶层、集团和阶级流动的一个重要的，但又是特殊的过程，是不适当的。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说更为重要，它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作为出发点，并将社会学范畴“依附”于它们。

承认相互对立的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这是辩证法的出发点。运动和静止，可变性和稳定性，这就是辩证法的范畴。没有这些范畴，就不能正确反映任何一个发展过程。社会中的流动性和稳定性，这是直接建立在运动、可变性以及它们的对立面——静止和稳定性的哲学范畴之上

① Ⅱ。米列尔著：《比较社会流动性》，载《通用社会学》，1960年，第4卷，第3、4页。

的。

但是如果懂得术语“流动性”的辩证的对立面是“稳定性”的话，那末，对于这个概念所存在的各种不同意义的任何补充解释都不会改变事情本身，因为这个术语本身就会使读者注意到对它所作的普遍的解释，即“一般的变化”。“社会流动性”这个术语事实上已有了一个比较狭窄和比较确切的内涵，因此，在我们看来，为了表示从一些社会阶层向另一些阶层的转变，采用比较确切反映过程本质的术语，即社会变动^①较为适当。它并不代替社会流动性的概念，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后一个概念现在使用时通常带附加条件，即不管术语字面上的意义，要缩小它的含义。

第二，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对立的方法：从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有时企图搬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并不考虑它与高一层的哲学认识层次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系统不相一致。比如，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们在说到“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时并不从空间和时间的哲学范畴来分析这些概念和解释它们之间的联系。“社会空间”的直义一般没有什么意思，只能用于转义，并带有那样的附加条件：“我们将社会空间理解成什么和什么”。结果赋予这一概念以随便什么意义。

至于说到“社会时间”这一概念，倒是值得作较详细地研究的。苏联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 А. Я. 图列维奇把“社会时间”理解成“社会过程流逝的节奏”。这些过程因阶级不同而各异，并且是非客观的节奏，而是它们在心理上的反映。他确信，“社会时间不仅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是不同的，同时它在每一个

① 参见 М. Н. 鲁特凯维奇著：《社会变动的过程和“社会流动性”概念》，载《哲学科学》，1970年，第5期，第14页；М. Н. 鲁特凯维奇、Ф. Р. 菲利波夫著：《社会变动》，莫斯科，1970年，第1章。

社会文化系统的范畴中也是分化的。”^① 在我看来，对“社会时间”这样的理解与唯物主义的时间概念，即作为不以人和人类为转移的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完全不一致的。

Г.Е.兹博罗夫斯基在一本专门论述该问题的书中，将“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一样）看作为时间的“特殊的形式”。他确认，“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是在人们所完成的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对活动本身的性质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是人与人之间积极的“关系调节器”。^② 对于兹博罗夫斯基来说，也象对于А.Я.图列维奇一样，不管一切附加说明，这种说明在他的书中有不少，但时间的客观性是失去了。

而且，经常把“社会时间”随便地理解成人们利用时间的方法，例如利用空闲时间的方法。Г.Е.兹博罗夫斯基就是倾向于这一结论的，他认为，“模型就是概念的社会时间的实例。在这模型之中可以分出两个基本因素——必要时间和自由时间。”^③ 一些从事居民时间预算的具体社会学研究的苏联社会学家使用这一术语来说明在自由时间内调和各种不同形式的非生产性活动的方法。

一切想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采用“社会时间”这一概念的尝试的共同特点是，在“标新立异”和“别出心裁”的掩饰下，采用该术语是为了说明历史学和社会学早已清楚和研究过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根本无须这一术语，同时社会学中的时间概念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时间概念是相脱离的。事实上，时间中

① А.Я.图列维奇著：《时间是文化历史问题》，载《哲学问题》杂志，1969年，第3期，第112—113页。

② Г.Е.兹博罗夫斯基著：《空间和时间是社会存在的形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4年，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29页。

的不同的密度，历史时伴有节奏的变化，早就为编年史的编纂学者们所注意。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比较，将平静的和平发展的二十年与一天相比较，“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①。在认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同样存在着差别。

至于说到人们度过时间的方法有差别，那么这些差别取决于他们的生存条件，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选择不同活动（种类）形式的自由。但这是人们在时间中的活动，而不是时间本身。从较为普遍的意义来看，这个问题是关于时间中变化的联系以及时间本身。恩格斯为此在回答杜林时写道：“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②将客观的事实与时间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相混淆（是在意识层次上或在抽象层次上，都无关紧要）是不应该的，就象不应该将人们在时间中的活动与时间本身相混淆一样。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任何一个概念和整个社会学概念系统时，必须依靠辩证唯物主义，不然就可能把随便什么意义放进概念的内涵之中，而这种做法将使概念发生混淆。

第三，从资产阶级社会学著作中有时不加批判地借用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总的理论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系统格格不入，而且甚至与它相矛盾。

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产生了群众意识这一概念是因为研究社会舆论、大众信息工具和所谓的群众文化的缘故。使这一概念得以通用的那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远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群众意识”是居民、人群的意识，这种意识在考虑到性别、年龄、收入和居住地点等差别的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可以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56卷。

方便地“测量”到。B.A. 格鲁申为了分析研究苏联社会舆论问题，建议将它引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社会舆论”确定为“社会意识的特殊现象”^①，为“打破隔阂”的意识，换言之，是偶然集聚起来的人群的意识，如同电影院或体育场观众的意识以及街上来往的行人的意识等等。B.A. 格鲁申将“群众意识”与“群众行为”对比，因为据他说，人们有什么样的意识，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根据格鲁申的说法，“群众行为”的特征是这样的：“众多的行为主体，众多的行为举动，行为举动所产生的现象的相对一致性以及表现为没有秩序、‘没有组织性’的行为举动的、随机的群众性质。”作者以为无组织性这个特征是主要的，从中他看到“与一般的集体行为的根本差别”。^②简言之，“群众行为”和“群众意识”这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行为和意识。

在群众的行为和意识中是否存在着自发的因素呢？无疑是存在的。研究这些现象是必要的，当然要考虑到意识中自发的东西是反映存在的。在对自然的非常现象（如地震）、交通事故、刚刚看过一部供娱乐的电影等等所产生的自发的反映中，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别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反映发生在通常意识的层次之上，并且是情绪因素占优势的时候。但是同样“这一群人”对一部具有强烈政治性的电影，或者对街上举着写有一定口号的标语的示威者游行队伍的反应是不同的，因为这种反应已经明显地与社会地位有关。在群众的行为和意识中区分出自发的因素，与自觉的因素作对比，并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将社会意识中这一因素确定为“群众意识”是不对的，

① 参见《哲学问题》1970年第7、8期；1971年第6期；同时参见B.A. 格鲁申著：《关于世界的意见和意见的世界》，莫斯科，1967年，第56—63页。

② 《哲学问题》，1970年，第7期，第49—50页。

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说，群众是人民群众，群众的意识是反映存在，并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都具有阶级性。

人民群众不是一个同类的整体。列宁曾经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阶级的；把群众和阶级拿来对比，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比才可以”^①。这就是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考虑人民群众的阶级构成，可以和必须将整体中的群众作为“下层”，与它的“上层”，即垄断文化和传播文化工具的剥削者上层分子加以对比。这同样既属于存在范畴，又属于反映存在的意识范畴。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在意识、精神文化的范畴内，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的对立体现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对立中，这一事实以特殊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文化社会学所反映，它利用群众文化的概念，与它的“英杰”文化相对立。例如，我们熟悉的一个美国社会学家 J. 科塞尔写道：“群众文化的实质在于群众要求或使用的文化，是与社会的英杰人物现在和过去所要求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别的。”^②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被消灭了，但社会差别仍然保留着，因而在分析群众文化和意识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别。如果在我们的条件下已经使用了“群众意识”这一术语，那么这仅仅指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人民群众的意识，而不是为了反映自发的和没有社会差别的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社会意识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并非停止反映（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和正确的）社会存在，它反映了社会差别，这些差别在研究社会舆论和行为时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3页。

② 《社会科学词典》，纽约，1964年，第411页。

“借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术语来赶时髦，使一些苏联社会学家所写的书和文章的语言变得混杂不堪，甚至连一个有修养的读者也不是总能琢磨出其中的涵义。不知为什么不用“Общество”（俄语“社会”——译者注），而用“Социум”（拉丁语“社会”——译者注）一词。我们举Э.В.索科洛夫所写一书为例，他是用下面的文体表达的：“赞同和交际为移情作用的特殊性所简化了”，“……文化就是在我们时代中仍保持着自己的自动平衡的职能”①，等等。在这里不能不想起列宁在20世纪初曾这样评论过类似的作品，“用不可思议的废话来充塞马克思主义”②。上面所指出的苏联社会学中的“混杂”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上面提到的反对不加批判地从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借用概念，不能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反对者总是不使用相同的术语。例如，社会阶级结构理论的概念，如阶级、阶层、集团等实质上所有研究这些问题的社会学家都使用。问题在于这些特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而其内涵又直接关系到这些概念包括在哪一个概念系统之中。大家都知道，“阶级”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就有了，马克思也曾指出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他的功劳。③但是关于阶级的科学概念正是马克思所定的。“阶层”这一概念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即为马克思主义者，又为它的反对者所使用（参见第五章）。问题是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涵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职能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苏联的社会学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占统

① Э.В.索科洛夫著：《文化和个性》，列宁格勒，1972年，第60，107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53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09页。

治地位的社会中发展着的。在新的条件下学者们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自己的领域内，同时还受到来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压力，这就阻碍了他们进一步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因此，深入掌握唯物辩证法，将它创造性地应用到社会学研究各个层次上面，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三章

辩证法、社会学与当代的全球性问题

在上一章里，辩证法作为关于社会的最一般的科学在社会学发展中的作用，主要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解释来加以考察的，而社会则被看作为一个系统，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每一特定的社会，部落、部族和民族都是这样一种有机体和系统。各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前面只是探讨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探讨到了认识辩证法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上的作用所必需的程度。但是，在我们时代，对于在世界性的全球范围中，民族间乃至在地区性大范围中的国家之间的上述相互关系，还需要作补充分析。我们时代的社会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都特别注意这方面的两个问题：与全球过程预测有关的，以及与国际关系，特别是与预防核导弹战争有关的全球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于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的社会学方法的意义何在呢？以下将从这一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

第一节

全球发展的预测：哲学与社会学方面

近十年来，全球发展过程的预测，突破了个别社会科学的界线，并且具有了社会学的性质。这涉及到一组综合为一体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产生于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克服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经济落后状态的道路问题。正是这一组综合问题获得了“全球性问题”的名

称，而它们对于未来的人类确实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学者们关注的是“人口爆炸”这样一些问题。所谓“人口爆炸”，就是说地球上居民的数量，以及确保其食物供应方面的困难突然猛增，原料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储藏枯竭的威胁，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原料和能源的危机；大气层和世界各大洋日益为工业生产废物所污染，以及因此可能造成的地球气候的改变等等。环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思想斗争，其核心是反映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与保护垄断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

“全球性问题”这一术语的意思是，它们涉及到整个人类以及人类同自然的相互关系。这些问题始终都存在，然而，在20世纪下半期，在地球的大部分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这些问题突然尖锐化了。问题既涉及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涉及人类本身的生物性质。在研究社会人口过程（出生率和死亡率指标，人口增长率）和各代人的健康状况时，必须对这种生物性质加以考虑。对人的发展过程来说，由于在社会和自然、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的相互关系中，社会因素是积极的方面，因而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人类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以便保护和改善自己在地球上的生存条件，以及保障往前进步的根本前提。

全球性问题的综合性促使各知识领域的代表人物对它发生兴趣。论及这些问题的文章和书籍以几何级数增加。它们是由物理学和生物学、医学和动力学、海洋学和经济学、时事评论和政治等方面的专家和各种社会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所撰写的。

在有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提出了不少深入的见解。例如，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方面，希望通过采用当代农艺成果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现代

农业技术的切实应用和新地区的开垦（或者不久前改良而成的土地，如在非洲的撒哈拉地区）使得成百万人的食物将有可能得到保障，使许多国家避免经常性的饥荒。人们对于世界海洋的浮游生物和其他蛋白质资源新的利用手段进行了科学研究，假如这些资源能得到广泛使用的话，能够大大地改变世界食品的情况。由于现代医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类已能够防止鼠疫、霍乱、天花、疟疾、热带热、嗜眠症、小儿麻痹症以及一系列其他的危险传染病的流行。

美国和其他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遭受的能源危机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科学已经研究出，或者正在探求，如何通过技术手段首先是减少，然后是完完全全地停止利用如石油和天然气（它们目前提供世界能源消耗量的大约70%）这样一些矿产资源作为燃料。通过铀重核裂变同时得到新型燃料钚核的原子动力学的发展，后来又以在苏联发明的采用激光技术的“托克马克”（“TOKAMAK”）设备为基础的核聚变问题的解决，以及转化太阳辐射的经济节约的设备和利用海潮能及其他回收宇宙资源等辅助能源设备的建成，使人类实际上掌握了取之不尽的能量源泉。工业生产废物对周围环境的污染能够借助较完善的（虽然更加昂贵的）工艺而得以大大减少，这种工艺把生产限制在一个封闭的循环过程内，使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所排除的废物和垃圾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换句话说，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医学、农业科学以及其他应用科学相结合，在保持和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情况下，为解决保证社会征服自然的力量增长的一些重要的技术问题方面，或者已建立了前提、或者正在为建立前提而向前进展。科学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能够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科技革命的最初阶段，也就是20世纪的下半叶。但是，十分明显，科

学建议的采用，取决于世界上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并且不仅在考虑到这一代利益，而且在考虑到下几代的利益时，要求这些条件为卓有成效地保证在全球范围内社会有步骤地作用于自然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为了使被自然科学所创造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可能性成为现实，要求采取一整套经过周密考虑的和步调一致的措施。后者应该首先由管理机构在国家范围内着手进行，但是，在大部分问题上，这些措施的实现则要求地区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合作，要求在属于不同社会制度的政府之间进行协同解决。

这就是在全球性问题的研究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劳动分工的原因。自然科学以及基于其上的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和医学科学为解决“人-自然”系统的全球性问题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对这些前提的利用和科学研究的定向则取决于经济和政治条件，而研究这些条件则是社会科学的事情。苏联科学院院长A.亚历山大罗夫谈到关于能源危机时正确地指出：“合理的能源政策和利用科学成就，使人类有可能避免这个危机。”^①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社会科学中间，也存在一定的劳动分工，它们中的每一门都在集中致力于全球性问题中的“自己的”一个方面。但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关于社会发挥功能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以及关于这个发展的道路和前景的科学，在研究全球性问题时，无疑应该在社会科学的行列里占据中心的位置。

初看起来，下列一个事实与这个论点有矛盾，即，在几组研究者对综合为一体的全球过程预测所作的最重要的尝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第一，因为现在正在从经济增长预测向综合性预测过渡，这种综合性预测考虑到生态问题和政治

^① A.亚历山大罗夫著：《动力的前景》，载《消息报》，1979年4月10日。

问题，并且是基于对经济前景的预见之上的。第二，因为如此复杂的任务要用数学方法加以保证，这就要求深入研究系统分析的新方法和采用电子计算机。

Л.И.福莱斯坦制订的“系统动力学”^①考虑到非线性的反馈联系，这是“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的基础。被称为“人类处于转折点”的第二个报告，是以M.密萨罗维奇制订的层级性多层次系统的数学理论为基础，并要求解决一系列同计算机“合作”研究的复杂问题。^②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非政府性的组织，由大约百名基本上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企业家和政治家联合而成的。俱乐部领导正式保证他们的组织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的方案没有明确的思想目标。用于方案的经费是由大垄断集团提供的。俱乐部的组织者对俱乐部的目的说明如下：研究人类发展的动态，及其对社会舆论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合理地”和“人道地”解决未来的问题。根据俱乐部任务准备的报告，在苏联的科学文献中已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在这里，我们联系课题来详细研究一下它们的哲学社会学基础，同时，我们也将试着指出，这一基础的不牢靠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著名学者们所作出的成果的价值。这样说并非贬低系统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关于克服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以及诸如此类危机的途径的局部方面结论的价值。

根据Л.И.福莱斯坦的方法，Л.密多乌兹小组制订了一个全球发展的模型，他们在《增长的极限》^③一书中对此作了叙述。作者考察了全球范围内五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人口的增长、工业

① 参见Л.И.福莱斯坦著：《世界动力学》，莫斯科，1978年。

② 参见M.密萨罗维奇、Л.马柯、Н.塔凯哈拉著：《层级性多层次系统理论》，莫斯科，1973年。

③ Л.密多乌兹等著：《增长的极限》，纽约，1972年。

生产的增长、农业产品的增长、原料资源的状态和周围环境的污染。用来作为基础的是20世纪初至1970年这段时期，而按照不同方案的外推则预测到2100年。作者在假定现有的发展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时，得出生态、原料、粮食等方面的危机将不可避免的结论，并且认为这些危机必定导致大规模的饥荒。结论是这样的，必须稳定世界人口数，还要减少原料资源的消耗，这虽然会导致工业生产增长的暂时中止，但是能够减少工业生产废物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哲学基础是我们所熟知的平衡论，同时还是其非常简单化的方式。作者把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看作为一个统一的、未分化的整体。全球平衡一方面被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爆炸”所破坏，另一方面则受到西方国家工业生产不加控制地增长的破坏。J. 密多乌兹及其合作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指出克服已经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危机形势”和恢复“全球平衡”的途径。主要的方法是停止生产增长。如果人们接受报告提出的“零度增长”的观点，则人类似乎就能“开始逐渐有控制地从增长转向全球平衡”^①。

在上面作了简要叙述的全球发展模式受到了有充分根据的批评，而且批评还是从各种十分不同的哲学和政治立场出发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零度增长”的空想性质。在解决当今社会生产力增长的矛盾时，社会进步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是不可分割的，中止社会进步是同世界人民的利益相左的。“零度增长”的提议显然不符合世界历史的经验。矛盾的解决总是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不是导致社会生活的停滞。

这种类型的全球模式的特点是忽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条件方面的现实差别。J. 密多

^① J. 密多乌兹等著：《增长的极限》，第183页。

乌兹及其合作者的模型的社会学基础是趋同论。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作者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友好国家也将走上西方发达国家所铺设的道路。

M.密萨罗维奇和Э.彼斯特为首的一组学者，在准备“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时，部分地吸取了对Л.密多乌兹的批评，第二个报告题名为“在转折点上的人类”。这个报告的作者也把构成世界上“危机形势”的全球性问题同下列问题联系起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人口爆炸”、周围环境的恶化、粮食问题、能源危机等等。^①

该报告在哲学和社会学方面同上述第一个报告略有不同。作者宣称自己的模型是“控制论的”，并已作了努力以克服福莱斯坦-密多乌兹模型所具有的明显的机械论。其次，该报告把世界划分为10个不同的地区，然后把它们归组，作者其实接近于承认基本的三组国家（用他们的术语来说，是“西方”、“东方”和“南方”）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虽然，世界舞台上这些矛盾的性质问题以及它们同各地区和各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在报告中仍然是暧昧的。

世界已不再被看作一个同质的整体，而被看作相互作用着的地区系统，因此，Л.密多乌兹关于（在保持现存趋势条件下）21世纪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灾难的预言，被关于无数地区性灾难的预言，首先是关于在东南亚因饥饿将出现大规模的儿童死亡的预言取代了。同时，对于在上述国家中会发生根本性的社会变化的可能性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密萨罗维奇和彼斯特却没有加以研究。

最后，该报告的作者与密多乌兹小组不同，他们并不采纳为

① M.密萨罗维奇、Э.彼斯特著：《在转折点上的人类（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纽约，1974年，第143、144页。

了“平衡”增长而暂时中止经济增长的建议。平衡增长就是把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看作是相互联系的，同时还考虑到西方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财政和经济援助的措施。在这个报告中，实际上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过去的殖民主义大国首先对今日许多发展中国家正经受着的贫困和困难（其中包括粮食的匮乏）是负有责任的。

作者分析了世界整体各部分相互作用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并通过形形色色的“情景分析法”制订出克服危机形势中每一个问题的策略。这些“情景分析法”在关于发展的基本因素进一步自发变化，以及国家和地区范围内管理机构所采取的解决办法的性质等方面是和各种假设相符合的。不仅如此，密萨罗维奇和彼斯特还号召制定“全球规划”，并把这个责任委派给现有的和将来可能建立的国际组织。

该报告中所提出的规划工作的作用，是要求对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予以充分的估计。这种相互作用的实现通过三个层次：因果层次（这里取的是客观过程，也就是经济过程和生态过程）；组织层次（这里考虑到我们对“因果层次”影响的后果）；以及社会规范和社会目标形成的层次（这里实际上涉及第二序列的主观因素，首先涉及理论）。

密萨罗维奇和彼斯特提出的“有机增长”观点的哲学实质在于，全球社会有机体的各别部分在增长过程中的分化，似乎应该保障这一过程在整体上的平衡。作者实际上试图恢复已有世纪之久的Г.斯宾塞的关于社会的观点。Г.斯宾塞把社会发展比拟为有机体的生长，并把这种类比应用于各个具体的单独的社会的发展；而密萨罗维奇和彼斯特则把这种类比应用于全球范围中人类的发展。根据他们的观点，“世界犹如活生生的生物一样，乃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各个器官相互之间都应当处于完全平

衡的状态中工作，以便保障分化了的同质增长。这种增长，我们称之为有机增长。”^①

在对不同性质的系统进行比较时，作者显然疏忽了采用类比法的局限性。个别民族的发展乃至全球发展，不可能通过与有机体的个体发展相比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些系统本身及其要素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所以，社会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同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按其性质来说，同样存在着质的不同。

系统论提供了一整套数学工具，这套工具可以对任何系统进行分析 and 模型化：技术装置、活的有机体及其群落、各种不同种类的社会体系。一般地说，数学是离开系统之间质的不同而抽象地思考的，这正是其力量之所在。然而，应用数学工具分析这样或那样的系统，要求在提出任务时必须考虑到其质的规定性。如果在制订任务时是出于对系统各要素联系的特性的随意的假定，那么，即使采用最完美的数学工具也只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在这样一类社会部门中，假定的基础应当是作为更一般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的社会学。

密萨罗维奇和彼斯特模型的哲学—社会学基础也经不起批评。虽然他们的理论是平衡论的进化了的变种，但同密多乌兹一样，不能摆脱平衡论的框框。如果说，他们不可避免地用“冲突论”来补充“平衡论”的话，则“冲突论”在他们的图式中占着次要的地位，而冲突本身也被看作是处于现时代根本矛盾之外的。在他们的模型中，矛盾首先表现为发达的“北方”和不发达的“南方”之间的矛盾。作者不顾现代世界上两个共同存在的社会体系的差别，忽视了阶级矛盾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阶级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在个别国家范围内，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有机体的改造。报告的作者宣称的对“意识形态中立”的倾向，实

① 《在转折点上的人类》，第9章。

际上是掩饰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忠诚，对在一个国家内部，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市场经济”的忠诚。

因此，“零度增长”和“有机增长”观点，尽管两者之间有所不同，但都渊源于为马克思主义所不能苟同的同一个社会学基础。在分析当代全球性问题时，不能局限于上面列举的说明社会同自然关系的变化、社会的技术经济发展的特点那样一些问题，也不能不考虑社会制度的日益成熟的变化，作出将现在存在的技术、经济和人口发展的趋势推向未来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实际上，在经济领域采取解决办法（密萨罗维奇和彼斯特的“组织层次”）直接地同社会制度，同国家政治，即执政阶级的政治发生联系。

以上业已指出，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全球性问题，在其实质上，乃是社会的问题。调整空域和水域的状况、矿物资源的利用、海洋资源和土地肥力的利用、技术设备中的能量和物质转化过程、致病因素对人的机体的影响、食品的生产水平和分配，以及人的本身繁衍过程，已经是现在科学水平所能做到的。当然，要考虑到，即使科学，也不是原地不动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如能变为现实，首先取决于完全属于社会关系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第二个报告多多少少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报告具有较为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全球预测是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的。

以著名的荷兰学者凡·丁贝尔根为首的一组学者提出了第三个报告——“重建国际秩序”。在这个报告中，全球性问题首先被看作国际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是决定凡·丁贝尔根及其合作者的报告的基本方向的客观形势。其合作者中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这给整个报告，也给在其中的哲学社会

学基础打上了某些烙印。

报告作者写道，他们是以建立在“普遍公平原则”基础上的“进步哲学”为依据的。这种“进步哲学”把“世界和谐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他们把这个观点称为“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丝毫不提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这实际上只涉及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种关系应该重新调整到使“新的国际秩序”能够建立起来，有了这样的秩序，“尊严而幸福地生活，成为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①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提出改造国际权力结构，以便确保共同利用资源和生产资料。实际上，丁贝尔根的抽象的“人道社会主义”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

尽管报告的思想观点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性质，但报告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令人发指的不平等地位却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描绘。现阶段，两者按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是13:1；在发展中的国家里，有70%的儿童吃不饱，十亿文盲中的大部分都在这些国家。作者提出了一个战略，实现这个战略的结果是，在40年内，上述差距将缩短至3:1。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作者建议发达国家（他们把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也包括在内）将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降至1.7%，而40年以后，这个指标将达到0。作者还预计发展中国家每年的人均收入将增加5%，而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下降。前者应该增加对后者的援助，而后者基本上应该指望自己的力量，并且首先应该采取增加农业生产的措施。

上述对“贫穷”国家的援助在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7%的范围内（联合国如此建议）^②，应当在专门为了该目的而建立的

① 见丁贝尔根著：《重建国际秩序》，纽约，1976年，第4页。

② 事实上，在1976年，这一援助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0.35%。

国际组织的控制下进行分配。作者认为主权的领土观念必须向主权的“职能”观念过渡，这实际上意味着有主权的国家自愿接受国际管理机构的领导。按照丁贝尔根小组的看法，这些建议可以通过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即一种独特的“全世界政府”来加以实现。事实上，这类国际组织即使能建立的话，最终也将成为国际垄断组织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不过让它们以稍微收敛一些的方式继续剥削昔日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类似的组织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是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最大银行手里。大家知道，这样的“援助”决定了一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让步，使帝国主义在同意接受贷款的国家中的地位更加巩固。

凡·丁贝尔根的报告是从“全球相互依赖性”的原理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这个原理本身在扩大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确定所有地区和所有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这是无可争辩的。看来全部问题在于，只是简单地指出相互联系，以及如何理解这个联系，是否就行了。“罗马俱乐部”第三个报告的基本论点证实，在西方原料垄断崩溃的条件下（由于石油生产国成倍地提高石油价格所至），报告作者徒劳地试图调解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原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似乎借此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一下构成这些国家关系中的实质——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内部阶级矛盾，几个资本主义基本中心之间的矛盾，以及时代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被凡·丁贝尔根的议题排除在外的。他站在趋同论的立场上，把苏联以及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随随便便地归入“富裕国家”一组。^①

除了上述三个报告以外，还出现了“罗马俱乐部”一系列其他的文件，也出现了类似的方案，其中有一部分是地区性质的，

^① 凡·丁贝尔根著：《重建国际秩序》，纽约，1976年，第4页。

是在俱乐部之外准备就绪的。毫无疑问，全球发展预测在今后还将继续进行，苏联也正在沿着这一方向开展工作。^①

同联合国秘书处合作的、以B.列昂季耶夫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小组制订的报告是饶有趣味的。在这个报告中，对于到200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方案进行了探讨，并对缩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距离的可能性作出结论，这种可能性是：第一，建筑在发展中国家的深刻的内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的基础上；第二，通过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对于这些国家的粮食问题，打算以扩大耕种面积和提高作物的产量来解决。同时对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问题也提出来了。

为了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投资。报告中指出，原料危机可以通过对矿物的新产地加强勘探和对矿产的综合利用来加以克服。周围环境的保护则通过推广无废物工艺得到保障。这种工艺耗费不超过国民总产值的1.5%至2%。换句话说，全球性问题就是在目前已达到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上也能解决了。但是，这需要从根本调整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首先是西方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权利平等的国际合作，改变现有的不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这是正确的。

在当代条件下，这个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可以根据联合国的最新资料来判断。如果把由于石油提价而获得暂时利润的产油国，以及若干走上集约化工业发展和成品出口的国家（如新加坡等）考虑在外的话，这个图景就呈现如下的模样。在人均年收入水平超过250美元的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970年—1973年为4%，1973年—1975年仅为0.6%。在人均收入低于250美元的最贫穷的国家中，在这两个时期内，

^① 参见A.格维希阿尼著：《全球模式化：世界发展的综合分析》，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8年，第8期，第63页。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下降了0.2%。^①

发展中国家对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支持。F.卡斯特罗1979年10月12日在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很好地阐释了已形成的局势，他表达了不结盟国家的共同立场：“不结盟国家认为，结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不平等现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赞成建立基于公正、平等、和平之上的新的世界秩序。它将要替代所有尚存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体系。正如在哈瓦那宣言中指出的，“财富依然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强国之手，它们的挥霍是依靠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依靠占有和掠夺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自然和其他资源来维持的。”^②

我们再看看“罗马俱乐部”的几个报告。这些报告表示了对“穷国”的同情，并开了几个用于稳定其发展的处方，然而，……却是以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作为条件的。为了阐明我们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些报告的政治倾向具有其十分明确的哲学和社会学立场，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我们业已指出，全球发展预测超出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范围，这个任务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学的，因为问题涉及到对地球上自然环境的进化和人类未来发展的综合研究。此外，这一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因为总的理论社会学同历史哲学是交融在一起的。

“罗马俱乐部”所有方案的哲学基础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虽然在其中也能看出资产阶级哲学在近十年里部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方面的总的进展，然而，这样做是为了更有效地对抗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条件下，承认人类所有部分、所有世界地区的相互联

① 参见《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8年，第11期，第70页。

② 《新时代》，1979年10月26日，第44期，第22页。

系，就如同承认经济过程、人口过程和生态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一样，以及承认社会的发展，这已成为真正的“共同之处”了。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仍旧把经济发展主要地看作是“经济增长”，即从技术、经济方面，而社会关系的发展被解释为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向“后工业社会”，即处于革命改造的前景之外的社会进化。在所探讨的预测项目中，作者已向承认矛盾跨出了一步，注意的中心已被放在出现的危机（粮食的、原料的、生态的危机，等等）上，即一种具有震荡危险的矛盾尖锐化的“点”上，例如东南亚国家的普遍饥荒，或者美国、西欧、日本因能源不足而造成的生产的缩减。

报告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矛盾。但是，第一，导致危机的因素的相互作用被他们看作危机时刻的矛盾，而不是被看作客观的、经常起作用的、导致危机的持续不断的动力。在他们作品中的系统分析并不依据辩证法，所以，矛盾在他们看来是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副产品，而且是不受欢迎的。

第二，这是主要的。我们所讨论的全球预测报告的作者们，不想承认矛盾是国家和地区内部发展的根源，不力求理解无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阶级斗争的作用，以及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未来变化的原因，而且他们远不会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的基本矛盾。

这些根本性的方法论缺点来源于“罗马俱乐部”研究小组所提出的目标：在保持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并巩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在危机状态未充分成熟的时候，制订出克服危机的策略。结果，“生存战略”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制度在全世界范围里日益被铲除条件下的生存战略。

全球预测需要真正的科学社会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包含在“罗马俱乐部”方案中的有助于了解粮食、原料、生态、人口

情况前景的个别结论，及方案中可供合理应用的机械模型方法的价值。技术统治思想是“罗马俱乐部”方案的真正社会学基础，而这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部分修正和改善，使之“现代化”，从而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才能成为科学预见，其中包括全球预测的真正理论基础。这一发展观点预言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变革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我们已接近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是否能预见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转变到来的具体日期，乃至得出对往后几十年的确实可靠的数量预测呢？按照我们的观点，具体预告政治变化的日期就回到了空想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的途径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总体上允许科学的预见，因此，涉及生产力和人口的增长、周围环境状况等等的预测，也应该根据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进行必要的修正。不过，这些预测未来人类社会的方法，不可能代替理论前提。

连许多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学者也正确地指出了“罗马俱乐部”方案的社会学基础的根本缺陷。比如，联邦德国经济学家B.迈斯纳尔和Γ.阿佩尔对密萨罗维奇和彼斯特的结论给予有力的批评，因为他们的机械模型没有考虑现实在质上的结构。此外，这些学者还指出，该模型中用作基础的系统相互关系只是出现于危机阶段，而在所研究的模型中“在正常条件下层阶系统不同层次是互不相关的”。事实上，经济、政治和理论（这实际上是密萨罗维奇—彼斯特模型中的三个层阶层次）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迈斯纳尔和阿佩尔准确地抓住了该报告的基本方法论的失误，因为这一报告旨在保存现状，也就是保存资产阶级关系的统治地位。^①

马克思主义处理现时代全球性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求无条件

① B.迈斯纳尔、Γ.阿佩尔著：《来自计算机的未来：神谕抑或战略？》，载《经济服务》月刊（汉堡），1974年，第2期，第660—663页。

地承认社会和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由社会关系作为中介的，因此，社会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问题的解决实质上是同社会关系的改造相联系。这就是说，仅仅承认“社会—自然”系统的社会方面已远远不够了，必须再进一步充分考虑到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之间的辩证的相互联系。换一句话说，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相互联系，并且全面地考虑到第一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同第二类（社会关系的改造）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之间的相互联系。

有两个可以称之为当代全球性问题中“最全球性”的问题，它们应该算作第二类全球性问题。这首先就是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必然性；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社会生活从自发的过渡到有计划发展的必然性。这样的变化，只有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有利于以工人阶级为首的进步力量而得到解决的基础上，并且在总和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球进程后，才能达到。

一百年以前，恩格斯指出，人类逐渐学会正确理解自然规律，并且既预见到近期的，又预见到远期的有关人类干预自然过程的自然发展的后果。然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主要考虑到眼前的成果，因为生产的动力是获取利润。因此，为了调节我们对自然过程演变的干预，恩格斯写道：“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①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象征着世界历史的根本转折。Л.И. 勃列日涅夫说：“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这是世界革命复兴的时代，这是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521页。

② Л.И. 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讲话和文章>，第6卷，莫斯科，1978年，第577页。

处在当代革命力量最前端的是工人阶级，它的历史使命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使命的实现已导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和胜利的发展。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这一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扩大了统一战线。与当代三大基本的进步力量的日益坚固的联盟相抗衡的是以垄断资本为首的反动势力，它们妄图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就在这两股力量斗争的过程中进步了。

在个别问题上带有无数细微差别的论点和见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结论相对立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技术统治论中对资产阶级制度进行辩护，上面已经谈过了。这里还得费些笔墨讨论一下靠剥削与压迫苟延残喘的当代帝国主义的辩护士的论点。

“帝国主义”这个词本身，在现代是何等臭名昭著，它会激起昔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如此的愤怒（尤其是至今还保留着的殖民地，以及受压迫的南非黑人民居民），以致资产阶级总的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社会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思想路线，都在于企图证明帝国主义已经改变本质，帝国主义似乎已成为过去。为此，它们常常借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举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上述的那种盗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做法的实质就会暴露无遗。

在1978年的第九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芝加哥大学的教授A.普舍沃尔斯基作了题为“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报告，该报告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直接的挑战。普舍沃尔斯基的论断非常简单，而且也无独到之处。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在20世纪50—60年代崩溃了。昔日葡萄牙统治地在70年代的解放，说明直接的殖民统治只在南非和其他若干不大的领土上。

还保留着。按照普舍沃尔斯基的说法，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终结，因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似乎就是侵占别国领土，并为重新瓜分他国而争斗。既然侵略政策曾是所有剥削者政府的特征，那么，帝国主义的产生应该回溯到古代，至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则帝国主义已经走过了自己的最后阶段。

无视具体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质对帝国主义所下的“政治”定义，是这种“论点”的理论基础。列宁曾批判过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①列宁指出，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帝国主义贪的绝对不只是领土。这个定义即使在其政治方面也是片面的，极不完整的，因为，“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②

最后，而这是主要的，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本质的分析中，政治本质是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及其垄断资本的统治的集中表现。列宁看到了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的继续而成长起来的”^③，是资本主义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他为全面地、综合地剖析帝国主义作了示范。所以，在列宁看来，垄断资本的统治堪称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特征，其他特征是从这个特征演变而来的。列宁指出：“如果要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④从这个主要的特征产生出所有其他的特征：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为

①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0页。

② 同上书，第261页。

③ 同上书，第257页。

④ 同上书，第258页。

金融资本，资本输出作用增长，国际托拉斯瓜分世界市场，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完毕。试问，垄断资本的统治是否消失了呢？当然没有。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垄断资本与世纪初期相比，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更加腐朽了。不过，与此同时，自1917年10月，开始了帝国主义的崩溃。列宁写道：“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①60年来，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在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崩溃了。然而，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继续统治着地球大部分土地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改变了，甚至认为它已“消失”了。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对当代意识形态的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考茨基不是孤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出现了И.熊彼特的主要著作：《帝国主义社会学》。^②作者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是无拘无束的暴力扩张国家的天性。”从这个抽象的、纯粹统治的定义出发，他断言，应该把侵略政策看作是资本主义向“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的某一个暂时的阶段，“纯粹的”资本主义必将掌握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因而在他看来是作为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出现的，这个最后阶段的起源，他定在古代罗马。列宁允许在总的、抽象的意义上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术语。“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列宁强调指出，但是，“‘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怪诞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54页。

② И.熊彼特著：《帝国主义社会学》，图宾根，1919年。

不怪的吹嘘……”^①。

在最近问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著作中，为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熊彼特的思想被加以改头换面。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政治解放，被用作口头上“抵制”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的基本理由。在这类著作的总潮流中，普舍沃尔斯基论点的特点在于，为了在“创造性发展”的旗帜下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然而，即使在这方面，他也并非首创，因为他追随着考茨基派、托洛茨基主义……，在使用马克思的术语时，无视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本性……。

在所谈到的报告中，普舍沃尔斯基把观点的矛盾强加于列宁，因为，据他说，在列宁的分析中“并未指明为什么资本主义托拉斯，从经济上瓜分世界，与各国从领土上瓜分世界具有同样的效果。”^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对垄断集团与国家联系问题的直接回答，在战后的十年中，这种联系更加密切了。例如，美国对一些腐朽的新殖民主义制度（在巴拉圭、智利、扎伊尔等等）的援助，使得美国和跨国公司有可能剥削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和掠夺自然财富。

A. 普舍沃尔斯基把白宫的“三边”政策，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三个基本实力中心——美国，“共同市场”和日本联盟的政策理想化了。布热津斯基是这个政策的思想上的鼓舞者。“为什么民族国家为了保卫国际资本的利益就应该互相发生冲突呢？”^③普舍沃尔斯基无法理解。他不想看到，这些中心本身之间在经济政策的所有根本问题上：保护关税、兑换率、货币、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的条件等等，都处于对抗的关系中。但这并不排除它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52页。

② A. 普舍沃尔斯基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乌帕萨拉，1978年，第3页。

③ 同上。

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活动中的合作。

A.普舍沃尔斯基在另一方面也曲解了世界发展的现实过程，他认为不发达国家是“顺从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在这点上，他既忽视了这些国家为了改变世界经济秩序所作的斗争（这种斗争按其客观内容来说是反帝的斗争），也忽视了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已经走上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普舍沃尔斯基已落在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后面了（就象考茨基当年在理论上落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霍布森之后一样）。最近几年，提出了“非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概念（Л.哈拉赫尔、P.鲁宾逊、Y.威廉姆斯、I.凡莱尔等人）。联邦德国学者B.莫姆森认为在西方研究这个问题时，引进这一概念是一件最大的事。B.莫姆森认为这种观点的意义在于：“它把形式上适应自由市场的经济扩张种类包括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种类的范畴之中。”^①我们可以看到，在有关不发达国家中“自由市场”作用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教授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而“马克思主义者”普舍沃尔斯基却回避了人所共知的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统治已经适应政治上独立的（而事实上，在许多场合，政治上是不独立的！）国家的存在了。

苏联学者在发言中对A.普舍沃尔斯基的报告提出了批评。马克思主义者证明了，普舍沃尔斯基宣称列宁似乎没有预见到东方人民迅速的解放是毫无根据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在苏联共产党、兄弟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我们时代仍充分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在殖民帝国崩溃之

^① B. 莫姆森著：《帝国主义理论，解释帝国主义的新理论概述》，哥丁根1977年，第71页。

后，人民争取从政治和经济的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以新的形式继续进行着。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工人运动给予这些斗争以非常重要的援助。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带来的一切后果。但是，承认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未来，并不能随之得出结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应该摆在一边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斗争可能导致从石油以及其他种类的矿产与农业原料所得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分配，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更加巩固。

这样，必须在原则上把殖民强国对发展中国家经受的困难所应负的责任，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它们的援助加以区别。大家知道，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压迫自己边疆的人民，并且参与对波斯、中国等国的掠夺。在俄罗斯人民的帮助下，昔日俄国的边疆今天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那里的居民在富裕水平和文化水平上同中部的居民毫无区别。苏维埃政权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提供的援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现代工业，没有现代工业，经济落后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

工人阶级作为我们时代的决定性力量，对于从资本主义手中夺回的地球将是怎样的，不是无所谓的。因此，体现工人阶级历史目标的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第一类的全球性问题。在目前条件下，只要所有有关国家在保护大气层（例如，在停止一切核试验以后）和世界大洋方面有善良的愿望，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为改善自己的状况，反对专横跋扈的垄断集团的斗争，可能迫使资产阶级国家在保护生存环境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

苏共二十五大指出，苏联赞成在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中的国

际合作。Л·И·勃列日涅夫说：“这些问题将对每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对解决这些涉及全人类利益的问题不能不闻不问。”^①

当代全球性问题中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护和巩固和平，防止以核导弹战争作为解决国家之间矛盾的手段，这种手段在当代条件下威胁着文明的存在。新的世界大战或许会导致真正无可弥补的损失和破坏，而且或许会把人类抛回几个世纪去。不仅如此，单是准备战争，武器竞赛就会糟蹋大量的资源，使得第一类全球性问题不可能得到及时而合理的解决。这类问题有：广大群众的粮食供应，工业原料和能源的保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上落后的克服，自然的保护。仅仅在战后这一时期，用于军事目的就消耗了60000亿美元。发达国家每年军事开支的总额超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每年援助的19倍。^②按照密萨罗维奇和彼斯特提出的“情景分析”的一个方案，如果二十五年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的总数为25,000亿美元，则到2000年或许可以克服这些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落后状况。每年所需要的数额为1,000亿美元，少于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美国在1980年为军事目的将花费1,280亿美元以上。^③丁贝尔根的建议则更为自信，他提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0.7%，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基金，所需总额每年大约300亿美元。

然而，军备竞赛并没有停止，它使发展中国家越陷越深。众所周知，已经建立的核武器储备足以把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消灭干净。同时，美国政府还蓄意扩大中子弹和其他新式武器系统的生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78页。

② 参见《真理报》，1977年，2月3日。

③ 参见《真理报》，1978年，1月23日。

产。

这个根本的事实，在国际关系中以及在世界命运中，制造了新的局势。如果以前战争始终是人类形影不离的伴侣，而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矛盾的产物的两次世界大战，把20世纪的上半期变为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时期的话，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使世界大战从人民的生活中消失，从而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已经具备了。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社会学方法中辩证法的作用。

第 二 节

战争与和平问题：哲学与社会学方面

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国际组织日益增长的作用，是许多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用社会学方法处理国际关系是由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特点决定的。社会学分析提供了综合的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应该把内外政策联系为一个整体，因为无论对外政策，还是对内政策，都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其次，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应被看作是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军事等方面的统一。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国际关系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将重点放在阐明辩证法在这个社会学知识领域中的作用。

前面（参见第二章），我们曾力求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学如何将“平衡论”与“冲突论”相结合，来为“社会伙伴”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类型的社会进化转变的观点找根据的。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社会学是作为政治社会学而出现的，政治社会学的特殊领域就是国际关系社会学。在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之间，在为这两门学科所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界限是相

对的，不稳定的。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家是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和权力的中心的观点，同样作为当代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流派——“政治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中心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发生冲突。^①最受注意的乃是基本的“权力中心”。这些“中心”的相互关系是各种各样的。占优势的“两极”模型（美国和苏联）如今被具体化为更复杂的构造，例如化为“五极”模型（美国—西欧—日本—中国—苏联）。还提出了这样一个模型：它包括两个互相重叠的地区图式，大西洋区（美国—西欧—苏联）和太平洋区（美国—日本—中国—苏联）。具体分析这些图式和模型，并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只是指出，把对外政策同对内政策，同国家的阶级性质以及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割裂开来，从而也同国家所执行的对外政策的阶级本质割裂开来，就是这些模型的哲学社会学基础。任何国家在这些模型中都被看作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中心的军事政治势力的中心。同时援引数世纪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目的是为了说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了以剥削阶级为领导的国家所特有的对外政策。如果“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直接继承了19—20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统的话，那么“现代主义者”则用系统分析和利用控制论术语及数学工具对权力中心的论断进行了补充。

这就是上述两个学派体系对国际关系体系的解释、模型化和预测的总的理论基础。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直接影响的是第一种观点，特别因为Γ·基辛格（前国务卿）和З·布热津斯基（前美国

① 对这些观点的分析参见В·В·叶尔莫连科著：《社会学与国际关系问题》，莫斯科，1977年；А·А·科利什金著：《论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发展预测》，莫斯科，1978年；等等。

总统的国家安全最高顾问)是这个学派的著名的代表。他们来自享有特权的大学教授圈子,并且常常在行政生涯结束后回到这个圈子中去(基辛格就是这样)。

在“现代主义者”所建立的国际关系模型中,“权力场”的中心,即国家,是按经济的、金融的、政治的、军事的势力排列的,在这之后作出对于这种势力增长的一定趋势的假设,以及建立起对这些中心之间可能产生的或者加强或者减缓国际紧张局势的相互作用的“情景分析”。

H·丘克里在波士顿召开的国际关系社会学大会(1973年10月)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国际冲突模型可作为典型的例子。他在与P·诺恩合作的著作中作了更详细的发挥。为了预言国际关系的发展,作者力图采用经济方法。他们研究了下列一些因素,例如国家的领土、人口的密度和增长、对外贸易、国民收入等等对“军费开支”、“殖民扩张”和“暴力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就是这样一些因素决定了其他国家的“行为”。在这个基础上,H·丘克里和诺恩建立起该国同“敌国”结为“联盟”的国家和“中立”国家关系的图式,提出了方程式系统,并推导其系数。这些系数的值在具体采用说明该国际冲突的图式时应该代入方程式中。

此外还出现了其他类似的图式,在这些图式中用系统分析来研究和预测对外政策关系。所有这些图式的特点是,把“殖民政策”、“暴力政策”、用权力解决国际冲突的“意图”等等强加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头上。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对内政策的本质及其爱好和平的特点被忽视了,而这些国家本身则被混同于帝国主义强国……

△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应当怀疑,诉诸武力是出于政治目

① H·丘克里、P·诺恩著:《冲突中的国家,国内增长和国际暴力》,旧金山,1975年,第168页。

的，后者反映了经济利益，而且取决于国家的阶级性质。所以，在探讨象维护和巩固和平那样的全球性问题时（这在当代条件下，对于未来的人类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必须分析经济和政治矛盾，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的动力。这就要求社会学以揭示社会发展道路为使命，而与哲学相结合，特别是与关于发展的学说相结合。

“平衡论”（“力量平衡”）和“冲突论”的某种结合是我们所考察的图式的哲学基础。当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不引起直接的交锋（用战争，或受到武力威胁时作出让步而不用战争），并在国际关系中建立新的“力量的平衡”，则“力量的平衡”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制止冲突。冲突被看作是竞争的“自然”状态的表现，并且出现在强国利益发生直接交锋的时候。因此，这些理论既承认国际关系中的这两种倾向，又承认它们之间的相互不断的作用。美国总统卡特在公开演讲中，总是谈到同苏联的关系既是“合作的关系”同时又是“竞争”的关系，这决非偶然的。

然而，这种折衷主义的看法，却是国际关系体系现实方面的写照。在其中，确实可以看到合作、协定、平等、和平共处，也可以看到斗争，竞争、冲突和战争。应当考虑到，所研究的理论观点在一定范围内也可能被用于实际的目的，包括被用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然而，它不会也不可能对国际关系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提出整个的处理方法，更何况是在极其复杂和变化繁多的当代条件下呢。只有在采取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才能使用这样的方法，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两个基本特点：（1）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社会经济体系：过时的、衰老的资本主义和成长着的、胜利的社会主义；（2）存在着核武器和导弹武器，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即两个体系之间军事领域力量大致相当

的条件下，使用这些武器将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类的利益迫切要求消除导弹—核战争的危險。人类现在可以用已创造出来的武器种类和储备来消灭自己。然而，军事技术思想因为是科技革命的表现之一，不会在原地踏步的。崭新的更为危險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种类还在不断地被发明出来。这是20世纪下半期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它使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

条件的根本性变化使得保卫和平、防止世界大战成为人类进步的首要前提。在分析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进程时，既不能不考虑到维护和巩固和平过程中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不能不考虑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造、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中获得彻底解放以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历史规律性。

从没落的阶级立场上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乃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过程。长久以来，人们“拒绝”、“不理睬”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俄国，试图“把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西方强国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联盟被看作是暂时的插曲。战胜法西斯以后，企图采用核武器来威胁苏联而使它屈服的念头，长久地占据着美国和英国政策制订者的头脑，决定了“冷战”时代的来临。

然而，这些企图没有得逞，苏联制成了核武器。这一事实说明，军事、政治领域力量的均势已经建立，但是，对此西方国际关系方面的政治家和理论家远远不是立即就意识到的。曾经企图通过扩大美国的军事、政治力量，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其他侵略集团来破坏这种平衡。但是，苏联及其华沙条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出现后六年缔结的）盟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它们充分表现出来的防御能力，无疑投了一贴清醒剂。苏联及其盟国、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切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为

维护和平、停止军备竞赛和转向裁军、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已经沿着这个方向，并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行动。

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不是“策略性的方针”，而是根本原则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人民之间的和平政策是1917年10月列宁宣布的。夺取政权后不久，列宁关于世界发展的前景写道：“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今天，和平政策开始有了巨大的进展，它具体地体现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制订的、二十五大上发展的和平纲领中。所有能从实际出发进行独立思考的政治家，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都不怀疑这个政策的真诚和远见性。例如，社会主义国际的主席勃兰特在1977年2月与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谈话中表示，他确信，苏联是在诚心地力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并着重指出，缓和既符合东方国家的利益，又在同等程度上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②在华盛顿举行的专门讨论未来缓和政策的会议上，著名的美国政治活动家A·哈里曼表示，通过同Л·И·勃列日涅夫的会见，他更加相信苏联领导人真诚地谋求和平和缓和。^③

近年来在缓和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毫无疑问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政策，就是在这个重要的领域，也完全是以社会政治哲学为基础的。这种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整个哲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许多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在这一决定性问题上，都抱有明智的态度。由于法国、联邦德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批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表现出来的政治现实主义，在缓和的道路上前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31页。

② 参见《真理报》，1977年2月9日。

③ 参见《真理报》，1977年2月19日。

进已成为可能。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和预防热核冲突的愿望，使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见诸生活。在理论上，这种现实主义依据一系列范围很广的、多半互不一致的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问题不仅涉及国际关系社会学中战争与和平的不同观点，而且涉及到更广泛意义上的、作为社会哲学的社会学。

早在1960年第一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那次会议上刚成立了国际社会学学会），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L.维尔特表示，要通过和平道路，而不是通过战争道路来解决“两个对立体系中的哪一个能更好地保障文明的进步……，能更好地促进人类富裕……”^①的问题。50年代末，力主世界和平共处政策、反对“冷战”方针的著名美国社会学家C.P.米尔斯的主张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他写道：“我们必须要求大家充分采纳业已在世界上确立的两种工业文明的形式共处的思想，而且要求它们之间的竞赛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中进行，而不是在疯狂的军备竞赛领域中进行。”^②

在核弹和洲际导弹世纪防止世界大战问题上的明智立场，把马克思主义者与不同的哲学和宗教观点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了。自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并不能掩盖在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思主义不会采取抽象的和平主义的立场，如1970年在瓦尔纳召开的第七届国际社会学学会大会上，某些进步活动家身上所暴露出来的那种和平主义立场。和平主义者断言，万一发生世界核大战，再来划分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据他们说来，这样的战争有可能消灭全人类。对这

① 《社会科学国际通讯》，1951年，第3卷，第2期，第213—214页。

② C.P.米尔斯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纽约，1958年，第97—98页。

些论点我们不能苟同。在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间，在侵略者和侵略的受害者之间，在为了奴役人民的战争和反奴役的战争之间，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都存在着原则上的区别。

爱好和平的力量，因其哲学和社会学观点，因其阶级立场的不同，在社会态度上是各色各样的。这一点充分说明，如果某一最重要方面的共同利益不能克服其他方面利益的矛盾，那么，在最低限度上，也要寻求那样一些不导致核战争的解决途径。

最近几年，由于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拥护者和反对者在理论上的论争都环绕这个概念的本身。缓和，通常被理解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趋势，消除“冷战”，以军事缓和来补充政治缓和，而军事缓和正是政治缓和的具体体现。

这种趋势与国际紧张局势尖锐化——回复到“冷战”，回复到加剧军备竞赛，在狂热的战争边缘上搞平衡——的趋势相对立。这些互相对立的趋势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它们的相互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总是不断变化着的。Л.И.勃列日涅夫说：“目前正在发生从冷战转向紧张局势的缓和，从军事集结转向安全的巩固与和平的协作。我们深信，这是现阶段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主要趋向。”^①

这个转变是现阶段全球范围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缓和作为控制矛盾的一个方面，通过战胜暂时的挫折、曲折，通过反对因鼓吹加剧紧张气氛力量的活跃而出现的国际局势的尖锐化，反对增加军备以及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使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政策折回“冷战”轨道上来的企图同新殖民主义（越南、安哥拉）的失败，同想要在战

① Л.И.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讲话和文章》第4卷，莫斯科，1974年，第318页。

略要地（近东）巩固地位的愿望，同通过美国国会和其他西方国家议会增加庞大军事预算的计划在时间上相吻合，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个预算能够保障又一“轮”军备竞赛的财政拨款）。

现阶段乃是特别重要的阶段。苏共中央书记B. H. 波诺马廖夫指出：“现在具有独特的情况。一方面，发表了大量有利于和平的动听的话，另一方面，军备竞赛日益加强。”^①这个矛盾可以在著名的美国政府代表人物，其中包括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言行中仔细观察得到。一方面，他断言，美国力图“实现一种同时是无所不包的又是相互的缓和。”另一方面，他主张扩大中子武器的生产并且在西欧进行布署，他还用下列保证“安抚”社会舆论：万一发生全面的核战争，大约只有10%的人类被毁灭……。

我们赞同Г. X. 沙赫纳扎罗夫的说法，他指出，“在国际生活问题中比任何场合都更多地存在着基本概念被人们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而产生的意义。”^②在国际政治学学会第十一届大会（1979年，莫斯科）的几个最重要的分组会议上，讨论围绕着诸如和平共处和缓和那样的一些关键问题来进行，并非偶然。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总的来说是积极的。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П. H. 费多谢耶夫在会议开幕时的祝愿实现了，他曾说，“学者的天职是使敌对的那些东西为有助于加速和加深国际生活中的积极过程的概念所取代。”^③

围绕“缓和”概念在社会学界和政论界展开了论争，并且影响到政治活动家的观点和社会舆论的起伏。这种理论上的论争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呢？

首先，有人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要再使用“缓和”这个术语。

① 《真理报》，1978年1月24日。

② 《哲学问题》，1979年，第7期，第24页。

③ 《真理报》，1979年6月12日。

例如，其中就有美国前总统福特建议这样做。

但是，想从美国政治语汇中除去这一个术语，压根儿就办不到。这一事实最终迫使美国政治领导人不动摇地出来拥护缓和。1979年6月在维也纳苏美最高级会谈的共同文件中确定：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应该促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最近几年，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最反动势力及其应声虫的全面进攻，缓和属于对立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中的紧张局势的现实过程获得了进展。“缓和”这个术语足够准确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因而在社会舆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从理论观点来看，通过否定这个反映国际生活客观现象的概念来反对为争取缓和而作的斗争，是不值一驳的。

第二，反对缓和的人企图把缓和说成是暂时的、偶然的現象，虽然并非坏事，然而却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因为，照他们看来，历史经验证实了，国际矛盾通常是通过军事手段，也就是借助武器来解决的。这一派别社会学家的特点是援引似乎是始终不变的“人性”、人的“本质”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变的“国际关系本质”。例如，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P.阿隆断言，“显然，国际关系的本质，在世纪的流驶中始终保持不变。”因而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得出一个疑惑的结论：“在这个地球上人们是否愿意和平，我没有把握。”^①

关于人性的问题乃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不应当在智人种的生物学标记上去寻找它，而应当在人所属于的那个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中去寻找它。大家知道，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可是，社会关系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社会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类型的更迭，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不断地变化着。因此，把“人的本质”说成是不

^① P.阿隆著：《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巴黎，1962年，第767—768页。

变的，是同发展的原理绝对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最充分和最全面的发展理论，它早就克服了诸如此类的关于社会的形而上学观点。

至于说到国际关系，即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那么这种本质更不是始终不变的，因为它是受社会经济制度和作为这些关系的主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制约的。当代的特点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共处，所以国际关系既取决于帝国主义的永不改变的本质，也取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些复杂的条件下，要使世界大战从人民生活中消失，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力量限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的表现，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总的气氛。……*

反对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的第三种论点是，把缓和说成是“单向马路”，即缓和仅仅有利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为了加速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空谈缓和”的。为了说明这点，反对派加强宣传关于苏联近年来在“缓和政策掩盖”下获得“战略上的优势”的论点，并且公布了不少战略平衡的假统计，目的在于赢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这些“统计”每次总是在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某一个地区遭受失败的时候公布于世的。

侵越战争失败后，在美国掀起的反缓和运动，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豢养的帝国主义走狗在安哥拉失败以后，美国报刊又发动了新的进攻。而当伊朗人民赶走了美国“顾问”，并推翻了亲美的国王制度时，这种运动又以新的势头卷土重来。

我们从理论社会学角度讨论的政治问题归结为下列一个问题

* 这里删去一段作者对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世界”理论的不正确的议论。
——译者

题。国际关系中缓和和现状的相互关系如何？因为世界上的变化，并不有利于帝国主义势力，所以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建议牺牲缓和以维持现状，即维持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土地上的统治。

举个例子，在多伦多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社会学大会（1974年）的前夕，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兼社会学家K. 格雷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求让军备竞赛合法化，包括给予发动第一次打击的权利，为核武器的储备及其使用辩护。他的文章是用这样几句话结束的：“如果这个上帝——紧张局势的缓和，使军事上的雄才大略不能发挥的话，那么，最好拒绝这个上帝。”^①

确实，缓和政策不保证现状是否能够维持，不保证这个或那个国家内部反动势力的地位是否能够保持，不保证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对比是否不变。普遍的运动和变化，这就是历史的客观辩证法。世界进程和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必将导致帝国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这种规律是缓和政策所取代不了的。

最后，第四，必须简要地探讨一下常常为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中的缓和拥护者所援引的论点。他们把缓和国家间关系中的紧张局势，看作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和解的开始，似乎缓和在将来会导致两者的趋同。上面提到过的Я. 丁贝尔根在谈到关于按西方（即资本主义）样式改造苏联经济的前景时写道：“关于在东方和西方只存在一种物理学，这种观点早已根深蒂固了，因而也可能逐渐流行另一种观点：现在连经济学也只有一种了。”^②

Я. 丁贝尔根从趋同论出发暗示读者，归根到底，政治妥协

① 《环球季刊》（费城），1974年，第4期，第1023页。

② Я. 丁贝尔根著：《东欧经济思想的趋势》，载《东欧的社会发展趋势》，1969年，第62页。

会变成社会妥协，和平共处的政策应该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逐渐“接近”创造条件，而这种“接近”本身反过来又“保障了和平共处稳定形式的优势”。按照他的意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的方法是怎样的呢？丁贝尔根写道：“进一步的变化按照建立最优社会制度的道路进行，最优社会制度就是在一定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确保最富裕生活的社会组织。一切越来越清楚了，这一点很可能在集中化因素和分散化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混合制度的条件下达到。”^①

在第九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A. 埃特齐奥尼赞同苏联学者关于必须为和平而斗争的论题，并且当即对确立“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作了补充。参加大会的苏联代表强调指出，和平共处并不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

认识这一国际关系的理论立场，是以一定的社会观点和哲学观点作为基础的，这就是把客观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归结为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把关于通过“调和对立面”解决意识形态矛盾的可能性作为论题。事实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社会体系之间的客观矛盾，除了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胜利外，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在意识形态中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因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现调和是不可能的。

意识形态不可分割地同政治相联系。政治具有各种解决矛盾的强大手段——从采取和平的和强制的手段，直至发动战争。国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紧张局势的缓和或者其反面——尖锐化，也属于政治领域的。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并不在于消除世界发展的客观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在于在意识形态方面调和社会主义和

^① 《趋同理论说些什么？》，载《经济周报》，1970年，第52期，第47页。

资本主义，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在于，当采用强制手段的范围不断缩小的时候，对解决矛盾的政治手段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从排除作为解决政治问题工具的世界导弹-核战争开始，并在协同一致地为寻求用和平途径解决在世界某一地区发生的局部冲突的探索中继续，这种局部冲突包含着扩大为更大范围冲突的危险性。正因为如此政治缓和应该辅以军事缓和、限制军备竞赛以及裁军。

这是否意味着，意识形态对立的加深，其中包括使用心理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政论的缓和呢？不，并不这样。所以，当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用“冷战”的范畴来思考时，他们是不正确的。他们这样解释两个体系斗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相互关系的：“当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的时候，不能说‘冷战’已经结束了。它不过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变换了形式、方式和手段而已。”如此“承认”政治缓和，事实上是为反对缓和的斗争服务的。

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纲领本身包含着这样几个重要的建议：缔结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协定，缔结停止大规模生产新式杀伤武器的协议。苏联关于一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率先使用这种武器来互相反对的建议，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继此之后，现在苏联又补充了新的关于不首先使用常规武器以及缔结不进攻他人的条约的建议。1979年6月苏联和美国在维也纳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第2号条约，得到了爱好和平的社会舆论的很大响应。

苏联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始终不渝的方针，并不意味着他们想得到单方面的好处。缓和对所有大陆、所有体系的人民都同样是必需的。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集会的公报中指出：“缓和的道路，这是我们时代

和平和进步的康庄大道。”

这就是当代全球性问题中最重要问题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方向，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学者是责无旁贷的。

第 二 编

苏联社会的社会发展 辩证法与社会学科学

第 四 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 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辩证法

第 一 节

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 体系中的地位。社会政策

在第二章已经谈到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区别，但是社会学科学与各种社会过程的研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过程不是一般地理解为各种社会现象的总和，而是比较狭隘的专门概念。社会学科学从50年代末开始在苏联蓬勃发展，是因为苏联共产党的社会政策的作用与影响不断增长，其中也由于社会规划的发展所造成的。尽管如此，社会学还不可能是一门以研究社会过程作为自己特定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提出。

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理解各种社会过程的呢？当人们谈到各种社会过程、社会关系、社会发展以及控制反映在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社会规划中的各种社会过程时，最后当人们谈到共产党

的社会纲领时，“社会的”这一概念无疑地应当用于表达同一种含义。照我们看来，被理解为整个社会关系*的一定领域、范围和方面的“社会关系”这一范畴，应当作为从理论上研究这一复合概念的出发点。

“社会的”这个概念按一般意义和广义被用作“整个社会的”这个词的同义词是合理的，上面所说的并未怀疑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每当把社会和自然界作比较时，例如，在对物质运动的形式进行分类时，这里所说的含义是完全恰当的，因为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就是指人类社会，这正如说各种社会科学就是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当谈到人的社会属性与生物属性的相互关系时，“社会的”是和“自然界的”和“天然的”相比较而言的。因而，为了避免理论上的混淆，把“社会的”作为“整个社会的”和把“社会的”作为社会过程的某一方面区别开来，是完全必要的。

应该注意到，简单化地理解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对象，往往是由于随意地解释“社会的”这个术语，把上述两种对它的解释混为一谈的缘故。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苏联社会学著作中，曾经非常流行这样的论断：“整个社会的”，这就是指“社会的”，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科学，因而是研究各种社会过程的科学。在这个论断的第一部分，“社会的”这个术语是用来表达它的一般含义的。但是十分明显，社会学不是研究社会的唯一科学，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也是研究社会的（整个社会的）过程，而不是研究自然的过程的。因此，为了从研究对象上来区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或者应当把社会学看作为一门“关于社会的总

* “Соплач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和“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译成汉语均为“社会关系”。因本章专门讨论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故将前一词组译为“社会关系”，后一词组译为“整个社会关系”，以资区别。这两个词组在其余各章均译为“社会关系”。——译者

的经验学科”，或者把“社会过程”理解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过程的特殊形式，这样就与原来的前提发生矛盾。我们已经说过，把社会学归结为经验是不合理的。我们顺便指出，在解释“社会的”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时，不能把社会学看作为一门从这个含义上理解“社会过程”的科学。

社会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社会发展则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方面，这个方面同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发展有着辩证的联系。经济与政治的辩证法应当作为研究这种相互关系的出发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经济关系的第一性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关系的形成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同上层建筑关系，同通过意识的意识形态关系，其中包括政治关系相比较，经济关系则是基础关系。列宁曾经强调指出，马克思在社会学中的“基本思想”是，他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把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划分出来，并把它们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论点是，“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①，因此政治也象整个上层建筑一样，是基础的反映。但这并不是消极的镜面反射。经济生活是自相矛盾的。政治则反映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又在人们改变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和继续下去。但正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按照列宁的说法，“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②

因此，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必须包含辩证法。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正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一样，是辩证的关系：政治同经济相比是第二性的，因为它反映经济关系、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18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4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71、72页。

利益和矛盾，但在解决这些矛盾时，它同经济相比又是“占首位”的，因为它使政党、阶级和群众行动起来，并指导它们的实践活动，而在实践活动中，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改变人们之间的客观经济关系。

我们之所以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是因为有两个问题对研究我们的课题很重要：（1）在区分经济和政治时是否还保留社会关系的地位？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阐述自己历史观的基本思想时，曾在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2）如果说政治一般是集中地反映人们的需要和利益，那末这对反映人们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方面的需要和利益的社会政策来说，也是正确的吗？不言而喻，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说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有社会关系的特殊方面，那末它一定会集中地反映在社会政策之中。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个方面的界限，阐明社会关系的特点，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与资产阶级社会学所提供的解答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认为社会政策的实质一般是指“社会的”整个方面这种狭隘的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这个概念是从资产阶级国家为满足基本人民群众的社会需要所追求的那些狭隘的目的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在首先实现镇压群众的职能时，又不得不为缓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而辅之以由某些私人和社会团体所提供的慈善事业，并在一定规模上实行社会救济。在今天西方的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国家发给失业者一些救济金，尽管还远远不是发给所有的失业者，而且也只在一定的期限内发给。例如，在美国就有数百万人失去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页。

利，因为他们长期不能找到工作；由于没有空缺而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青年也得不到救济金。国家给几类劳动者发放养老金和救济金，但这笔款项通常是从他们多年的工资中克扣下来的。国家有时还给予那些处在“底层”的人们以医疗和粮食救济，等等。近几十年来，在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进行竞赛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国家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越来越大的压力下，用于救济社会贫困的款额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增加了。这一迫不得已的措施正在被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广泛地用来作为宣传所谓“福利国家”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述职能（但完全是另一种规模、意义和阶级目的）也列入国家的社会政策范围之内。普遍的公费医疗、免费受各类教育、为各类劳动者提供退休金——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我国已在1930年消灭了失业现象，因此失业救济金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它的成熟阶段，国家和共产党的社会政策还不限于上述内容，因为它还包含着更广泛的社会任务。

在阐明苏共和苏维埃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的社会政策的实质时，应着重指出，“社会的”这个术语同“政治的”这个术语结合起来，在原则上也具有诸如在“社会纲领”、“社会规划”、“社会需要”、“社会关系”这类概念中的相同含义。所有这些概念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政策反映于纲领，体现于规划等等之中。

在苏联有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反对狭隘地理解社会政策而流行着一种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在将“社会的”与“政治的”两个术语结合为词组连用时，“社会的”这一术语往往用于一般的、广泛的意义。结果，就把“社会的”置于“经济的”和“政治的”之上，把社会政策和整个政策混为一谈

了。例如，E.Φ.苏利莫夫企图根据活动的客体和主体来对整个社会关系进行分类，自然，他不可能拟定一种标准，以便把社会关系当作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分出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社会关系就是人们活动的客体，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过程中改变着这些关系，同时他们又与活动的主体交融在一起，因为人们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独特的“凝结体”，他们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活动的。任何团体在作为活动的主体时，都包含着这个团体的各个部分和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定制度。因此作者倾向于认为社会关系与其他关系的区别，似乎在于它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但是有人会问，难道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人们不也是按照自己的利害关系行事的吗？利害关系作为人们活动的刺激因素，具有真正的普遍性。E.Φ.苏利莫夫承认这一点，因此他不得不按照如下的方式更确切地阐明自己的想法：在社会范围内利害关系是以整体化的形式出现的，而在其他一切范围内，它只是以局部的形式起作用的。这就是说，社会关系对经济、政治和精神关系而言，正是一般对特殊的关系。总之，如果说社会关系是一般的，那末经济关系就是这个一般事物的特殊表现。^①这样，逻辑上就说不通了。作者为了要将社会关系的特性区分出来，就要我们重新回到社会概念的一般意义上来。因为如果说“社会的”就是“整体的”，如果它包括一切社会关系，是最一般的概念，而只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表现是特殊的，那末就其实质来说，它就与“整个社会的”概念意义相同。大家知道，形式逻辑作为辩证法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在辩证法中。逻辑学的首要法则要求在进行这种推论的整个过程中使概念用于

^① 参见E.Φ.苏利莫夫著：《论社会关系的本质及其在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载《科学共产主义》，1976年，第5期，第52页。

同一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学的这一要求似乎已被破坏了。

另一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把社会关系理解为整个社会关系的一种独特形式，但是它被置于与经济、政治、精神关系同一序列之中，序列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又与别的成分相区别。显然，这样地提出问题就要求弄清楚社会关系与其他一切关系的区别，划清它们之间的界线。但是采取上述的态度，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马克思在这个经典性的定义中一点也没有谈到社会关系在“基础——上层建筑”系统中的地位，但这决不是偶然的。一切想给“社会关系”在经济和政治之中找个位置或把它们并列起来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十年来反映在苏联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这类的企图吧。M.H.佩尔菲利耶夫为了阐明社会关系的特性，而把社会关系分为如下四类：第一类是“保障生活资料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分配关系，它无疑是经济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第二类是“人的自然资料再生产的关系”。大家知道，“自然资料”是通过繁殖而得到再生产的。人种（按作者的话，就是“作为个体的总体人”）。再生产的社会方面，首先包括在家庭关系之中。这种家庭关系具有综合的性质。因为它同时是经济、法律、道德等等关系。第三类是“参加生产的关系”，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因而是经济关系的一定形式。最后，第四类是“与人们交往的关系”，“它们与总体人加入受历史制约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有关”^②。这里指的是，在世代交替过程中的整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页。

② M.H.佩尔菲利耶夫著：《社会关系。方法论与社会学问题》。列了格勒，1974年，第164—181页。

社会关系体系的再生产。

这样一来，M.H.佩尔菲利耶夫一方面使经济关系的内容大大地减少了，因为他为了以后把经济关系统一称作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中一类特殊的关系——社会关系，而排除了它的最重要的要素。另一方面，他倾向于把社会关系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发展，即从广义上理解社会关系。

具有这类论点的人所犯错误的逻辑基础是，把社会现象和政治、经济、精神诸方面的现象等量齐观了，换言之，他们认为，似乎整个社会关系或者可能是经济关系，或者是政治关系，或者是社会关系。但是这个逻辑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符合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相互联系的辩证法。辩证逻辑学既能使人看到现象中的此，又能看到现象中的彼。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确实可以按照这样一种特征区分开来：政治关系是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经济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政治关系则是它的反映。社会关系根据该逻辑标准是划分不出来的。这里按“或此或彼”的原则产生了形式逻辑上的对立，这是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同时既是经济关系，又是政治关系和精神关系，因为它是按另一种标准从基础关系和上层建筑关系中划分出来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再谈。

在对这两种给“社会的”下定义的企图进行总结时，可以说，社会过程与经济、政治和精神等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既不能概括为一般与个别的相互关系，也不能认为社会关系与经济、政治、精神关系具有并列地位，并按同一逻辑标准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划分出来。

解决社会关系的特点问题，对理解社会政策的实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把“社会的”（狭义的）置于“经济的”和“政治的”之上，那末社会政策就应优先于经济政策。如果社会政策同经济、政治、精神关系处于并列地位，那末社会政策就有它自

己的不同于经济政策或文化政策目的的特殊目的，正如不同于属于政治范畴本身的政策的目的一样。关于党的社会纲领和社会规划等，也同样可以这么说。

我们认为，应当在理解社会关系同整个社会关系、社会政策同总的政策、社会规划同总的规划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来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所持的出发点是，社会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方面和一个侧面，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和侧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政策是共产党的总的政策的一个方面和侧面，并且首先是它的经济政策的方面和侧面，而社会规划则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内的综合规划的一个方面和侧面。

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党的文件中广泛应用“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政策”等术语，这个事实并非偶然。例如，И.И.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中说明今后十五年国家经济发展远景时指出：“这就为解决党纲和最近几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基本社会经济任务创造了新的条件。”接着就把这些任务规定如下：“这首先是指苏联人民福利的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卫生、教育、文化事业的重大进步，即有助于新人的造就、个性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完善的一切方面。”^①

在《1976—198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中的“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纲要”这一部分也谈到党的社会经济纲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政治文献中广泛应用如下术语：社会政治关系，社会政治发展，世界社会政治面貌等等。还应用“社会文化发展”这类术语。比如，在确定劳动集体的法律地位时，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58页。

谈到这些集体在讨论和解决有关使用社会文化设施资金问题方面的权利。我们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社会现象被看作是经济、政治、文化现象的某个方面。这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的。但是如果社会关系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那末它对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来说就不可能是“一般的”，就不可能同它们处于并列地位。

说到这里，必须涉及一些波兰学者不久前在他们集体编写的专著中所提出的如何理解社会政策的问题。他们对社会政策下的定义是：“国家和其他主体在形成人民生活条件及人际关系方面的目标明确的活动。”在这个定义中正确地指出了社会政策的某些重要因素。改善作为个性全面发展前提的生活条件，以及完善人际关系，都列入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的社会政策的范围。作者们把社会政策看作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执行的总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正确的。^①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政策是狭隘的。

诚然，社会政策不仅是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和一个侧面，而且是指导社会精神发展的文化领域的政策的一个方面和一个侧面，同时也是指导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发展的政治领域本身的政策。因此，书中被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目的而提出的社会进步，应当理解得更广泛一些，即应当理解为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进步不仅要求改变生活条件，而且要求改变人们本身，要求社会全体成员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要求既完善人际关系，又改善阶级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变化应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即走向无阶级社会。遗憾的是，社会政策的这一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著作中却未得到阐明。

在波兰其他专家的著作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社会发

① 《社会政策》，莫斯科，1977年，第6—7页。

展理解得较为全面。例如，Γ.霍拉伊写道，社会政策包含着“既是在整个社会、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的层次上，又是在各个劳动集体范围内的”^①整个社会关系的完善。但是个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完善是彼此分不开的。

为了对社会关系的实质问题作出较为全面的回答，就必须理解“社会地位”以及与其有关的“社会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的概念。列宁在回答那个力图以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在未来象建立人们的才能平等一样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观点，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M·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时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平等“一向是指社会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决不是每个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平等”^②。列宁指的社会平等是由于消灭阶级而获得的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是与资产阶级把平等理解为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上的平等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中经常强调，完全的社会平等的建立必须以消灭阶级为前提^③，即要消除社会阶级差别。

只有在建立单一性社会，即整个社会关系得到根本的改造以后，社会成员才能逐渐在经济地位上得到平等，这是共产党的社会政策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根据阶级差别的基本特征，这种平等就是对生产资料关系的平等，就是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分配方面的平等。

此外，单一性社会的建立还要求消除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根本差别，其中包括消除居住地点与劳动性质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现象^④（见第五章）。

① Γ.霍拉伊著：《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与社会进步的统一》，载《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1978年，第8期，第3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39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21—322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96—97页，第375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83页。

如果生产资料关系的平等能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达到的话，那末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克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之间主要差别的这一根本变革，以及向按需分配过渡，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才能实现。只有完全的共产主义才能保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能以极大的、不断增长的规模生产出社会财富，以满足社会所有成员不断变化的需要。为此，必须要求在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劳动中来一个根本的变革，必须使每个工作者的劳动成为谋求社会福利的高效率的自觉劳动，使脑力因素与体力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把克服原先的把人变为奴隶的劳动分工情况与“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联系起来，与“个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由于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实现这样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因此，要保证社会地位平等，实现社会单一性和完全克服社会差别，就必须以社会每个成员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提高全体公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个性，也是共产党的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

因此，苏联共产党的社会政策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在消灭包括城乡差别和脑力与体力劳动差别在内的一切社会差别的基础上达到人们社会地位的完全平等，二是在提高社会所有成员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的基础上保证个性的全面发展。

在实现共产党的社会政策和克服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本质差别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显示出这些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统一性。一方面，这个过程是走向单一性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象征着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接近和随后的融合。另一方面，它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个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页。

分，在他们的劳动中，要求具有高度智力发展和文化水平的高度专业化的脑力劳动同管理机器、机器系统、机械和仪表的高技能的体力劳动将有机地融为一体。体力劳动职业的智能化，以及脑力劳动职业的技术化和机械化，这就是今天正在如此积极地进行着的过程，这些过程说明，在生产活动中，人的发展已达到高质阶段。

上述两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在苏联新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一章中的头两条说明苏维埃国家的社会政策是加强社会单一性的政策，是以全面发展个性为目标的政策。以后几条都是具体说明这两个主要目标的^①。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和工人党正在实施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划，它们现阶段的社会政策的目标是根据这一总目标确定的。例如，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C.托多罗夫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中的社会政策的目标具有如下几个最重要的方面，诸如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形成社会单一性。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J.什特劳加尔也提出这样的问题^②。

各个执政共产党通过制定和实施它们的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规划的目标，这意味着彻底改变社会关系。所有这些概念都紧密相联，并要求对“社会的”这一概念的实质有统一的理解，因为社会关系的概念应当与社会政策和社会规划的概念相适应。综上所述，社会关系是社会、阶级、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并

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莫斯科，1978年，第12页。

② 参见C.托多罗夫著：《现阶段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社会政策》，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8年，第3期；J.什特劳尔著：《党在发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政策》，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7年，第4期。

非所有的上述关系，否则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活、家庭等等关系就没有地位了。社会关系是上述关系的某个方面和侧面，即由人们和集团在社会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关系（见第五章）。人们和集团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不平等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社会关系总是存在于经济关系之中，正象存在于政治和其他社会关系之中一样，但是不包括所有这些关系，不失去符合于把社会生活中每一个方面与“基础——上层建筑”体系中所有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的标准的特性。

同时必须将社会需要和社会规划这类概念列入“社会的”有统一理解的那一组概念中去。共产党所提出的这个或那个时期的社会规划和已被管理机构采纳的社会发展计划，其目的是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

社会需要——这首先是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的需要，满足他们的需要是每个公民个性发展的先决条件。这同样也是更充分地实现社会平等，克服阶级与集团之间、阶级与集团内部阶层之间差别的需要。与此相适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满足已成熟的社会需要而提出的社会规划，包含着旨在提高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水平和全面发展社会成员的个性的具体措施。

由此可见，社会规划包括了在提高物质福利、文化水平、社会主义觉悟以及朝着充分实现社会平等的方向完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公民的个性。关于社会规划是社会经济综合规划的组成部分，或者是经济规划和社会规划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在规划、管理和发展的客观过程中经济方面同社会方面的辩证联系的组成部分，将在以后详细论述。

这里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谈谈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社会学确实是和研究社会过程、社会发展的规划与管理密切联系的。但是

这并不说明它在研究整个社会过程，即广义的社会过程中取代所有其他的学科，或者向它们“提供”经验资料。这同样也不意味着（狭义的）社会过程是它的独特的研究领域。例如，分配关系首先应当由政治经济学（和一系列具体的经济学学科）负责研究的，而个性的全面发展则归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负责研究。正如前面已经阐明的那样，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并且是建立在社会学知识所有层次上的从一般理论到具体调查的学科。正是由于社会过程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侧面，按其实质来说，是具有综合性质的，因此社会学对认识上述过程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形式的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中心，社会学在苏联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起作用的日益增长，正象在许多兄弟国家的发达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样，是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方面的作用的增长分不开的，这直接反映在对社会过程的规划和管理的管理的完善上。

第 二 节

社会学与社会规划

对社会发展的计划管理是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最重要的特征。计划管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得到改善，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好，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好。因此在现阶段（苏联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条件下，规划应当从广阔的历史发展前景的角度上加以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已经预见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将不是一瞬间的和一次性的行动。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生产资料变为公有制后，社会发展的自然力“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因此人们将“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

他们所预期的结果”^①。

社会主义社会对自然界和对其本身自由程度的增长，直接反映在对规划 and 管理的完善上。从社会对自然界的关系来说，这种自由表现在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表现在不断估计社会对自然进程进行干预时所产生的比较深远影响的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对其本身的自由程度的增长，则具体表现在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和利用社会发展的规律，表现在有计划的领导和完善人们自身的发展及人际关系的发展上。

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年代，尽管国内战争和经济崩溃的情况非常严重，还是遵照列宁的指示制定和开始实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第一个长期发展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编制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列宁曾多次指出：

1. 在经济规划中必须采取如下的综合处理方法：“个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②。

2. 经济规划必须与社会规划联系起来。列宁把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看作是第二党纲，它会得到“改进、修改、完善和变更”^③，因为计划中已经考虑到国家电气化的社会影响。在列宁最后的一部著作中曾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历史上相当稀有的机会，来确定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期限……”^④。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中全面地发展了列宁的这些基本思想。

在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8、304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64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③ 同上书，第467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37页。

划，在发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规划中是有特殊的作用的。在苏共中央《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十周年》的决议中指出，“这是第一个综合性的计划。它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比例提供了科学依据。”^①

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了后来使苏联登上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高峰的许多卓越的五年计划的基石。由苏联开创的又为各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在经互会的国际范围内继续运用及通过规划实践不断得到充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成为20世纪改造社会生活的革命实践的最重大的科学和社会成果之一了。

苏联进入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标志着规划和管理重大进展。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一系列标准方面都不同于前一阶段，其中包括作为整个管理系统核心的规划的发展程度。照我们看来，现阶段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规划的特点有如下几个：

1. 规划的覆盖期越来越长，具有长期的性质，并且长期计划还和中期五年计划与短期（年度）计划相结合。苏共二十大指出：第十个五年计划的草拟工作是同制订1990年前的国家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的基本方针同时进行的。现在许多问题的计划已制订到2000年。

2. 规划的科学水平提高了，这一点也具体地体现在用得越来越多的制定计划前的预测资料上。在草拟预选方案和选择最佳方案时提出了应将预测工作有机地列入规划的实际工作，数学手段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利用也扩大了。为了更精确地反映社会需要的变化和在计划中更充分地利用客观条件，以及为了提高计划初稿的现实性、根除计划中的主观主义因素和冒进因素，必须提高规划的科学水平。“在我们未来的计划中，不应当有脱离现实的情

① 参见《共产党人》杂志，1979年，第5期，第3页。

② И·И·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讲话与论文》，第1卷，莫斯科，1970年，第341页。

况”^①，党的纲领性方针就是这样规定的。

3. 社会主义规划和管理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央机关在确定发展的长期远景计划、发展的主要指标以及确定主管部门和地区管理机关的每一级，直至企业和地方苏维埃等工作中的作用和责任的提高，从而也意味着劳动者参加管理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的作用》的决议（1979年）中提出了提高人民代表苏维埃在经济建设、扩大劳动集体的权力和主动权中作用的建议。^①

4. 规划的综合性越来越加强了，它使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同科学技术进步的远景和社会目标联系起来。Л·И·勃列日涅夫指出：“除经济外，远景规划还包括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要知道，社会主义的目标还要满足人们的社会、精神和道德方面的需要”^②。根据我们的题目，我们还要比较详细地来谈谈最后一点。共产党总是把社会过程的发展同发展国民经济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然而有计划地调节社会主义社会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社会过程的条件是不同的。在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规划中社会因素的作用还在大大提高。上述决议已提出了国家计划对解决社会问题起更大的指导作用的任务。反映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发展社会主义规划的总趋势就是这样的：

第一，带有综合性的区域性庞大规划已经通过和正在实施，而在这些规划中社会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在我国东部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可以作为这类规划的例子。后来又通过了长期的社会经济综合规划；在俄罗斯联邦非黑土地带发展农业，开垦西伯

① 参见《共产党人》杂志，1979年，第12期，第3—5页。

② Л·И·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第5卷，第70页。

利亚低地带，使之变为我国主要的石油开采基地，开垦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一些新地区来建设贝加尔——阿穆尔干线等。这些综合规划都已有机地被列入国家的长期发展计划之中了。

第二，各级基层管理机构的社会规划经验已大大地丰富了。在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中，编制工交、企业、建筑工地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生产领域劳动集体的社会发展计划的实际经验已得到推广。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被邀请来参加社会发展计划的编制工作。在许多企业和生产联合公司中设立了社会学实验室。这些新出现的社会服务部门在各个企业中履行着重要的职能，调查和研究各个单位中发生的变化，给党和行政领导提供切合实际的建议。苏共二十四大对各劳动集体的社会规划经验作了肯定。

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时期，各生产集体实际上都已制订了社会规划，并推广到非生产领域的劳动集体中去，诸如科研机构、服务性企业等。由一些科学家集体制定的工作方法指南在推广这方面的先进经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各共和国和全国的各工业部门也已开始制订社会发展规划了。

劳动集体在规划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已在苏联新宪法中从法律上明文规定下来^①。

社会规划工作同时已在各个城市、农村以及各州和各个边疆地区广泛地展开了。制订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明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及许多其他大城市和大州的1976—198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计划，以及莫斯科1990年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制订城市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经验已在学术著作中得到总结。有关制

^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俄文版，第8条。

订城市社会规划的方法指南业已汇编成册并已问世了^①。苏共二十五大提出了如下任务：“改进企业、联合公司以及地区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规划工作”^②。

第三，社会问题已越来越广泛地在集中规划和预测工作中得到反映。关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社会问题部分已列入苏联科学院会同各部和主管部门制订的《1976——1990年科学技术进步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综合规划》之中。正如苏共二十五大所指出的，“制订规划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这项工作是编制当前计划和长期计划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指出方向，而不了解方向就不能顺利地领导经济”^③。

在1977年的苏联宪法中特别重视社会问题，已将社会发展和文化列为专门一章。关于经济和社会的综合规划的条款已在宪法的第十六条中作了明文规定。该条款提出，“在集中管理同企业、联合公司及其他机构经济独立自主相结合的情况下，根据部门和地区原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实行对经济的领导”^④。根据宪法的这一原则，1978年苏联的国家发展计划以及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各州、各部门以及各企业等的发展计划都定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因此，现在的综合规划确定从上到下整个管理系统的工作，即从全国计划经过部门——下属部门——总管理处——联合公司到劳动集体，或通过另一系统，即通过大小不同的地区单位——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州、各城市及各区到劳动集体，后者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基层组织。

① 《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远景规划。工作方法说明》，莫斯科，1977年。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26页。

③ 同上书，第68页。

④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俄文版，第16条。

在综合计划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这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究竟是怎样的辩证关系呢？在我们看来，要解决这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必须根据上面所作的说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既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中，又反映在对社会的管理中。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实际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正确的理论概念可能会给规划的实际工作造成各种各样的浪费。

从广义上解释“社会的”会引出这样的观点：“社会的”要重于“经济的”，必须将社会目的提到首位，因而就会过低地估计经济目标对实现社会目标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脱离经济关系，可能会产生不正确的概念，似乎社会发展是自发地追随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之后的，因而规划中的社会部分对经济部分只不过起一个“补缺”的作用，尽管是重要的补缺。

根据上面所说的解决有关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相互联系的理论问题的方法，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发展规划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性在提高物质福利文化水平、社会主义觉悟和完善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发展。第二，整个社会关系，首先是社会的社会结构向着充分的社会平等的方向日臻完善。在这两个方面，社会规划不仅同经济规划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同经济规划“交叉”的，因此它们好象是互相重叠的。

诚然，一般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属于社会的范畴，但它首先是经济关系。个性的发展无疑应列入社会范畴，但是这一发展首先是在生产劳动中进行的，即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的。

因此，社会发展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即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发展的制约。所以，如果不考虑到社会由于扩大生产和技术进步而对各类专家需求的日益增长，如果不

确定用于兴建学校、出版教科书和培训师资的物质，就不可能制订出切合实际的社会发展远景规划，例如教育远景规划。文化、卫生等等的远景规划也同样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在我们的各种计划（其中包括五年计划）内的社会部分是以经济部分为基础的。经济目标达不到，社会目标也就得不到保证了。

把社会因素的作用加以绝对化，势必会导致过低估计经济因素，并可能使实际工作的方向不对头。因此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社会规划是“对人的规划”，不同于经济规划，而经济规划似乎是“不对人”的。这在理论上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经济是达到社会目标的手段”。把经济归结为“达到社会目标的手段”，我们是有异议的。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无疑是我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最远大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同其他目标密切相关，例如，完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造就新人。社会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间的相互关系辩证法并不把经济理解为“手段”，因为经济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基础。生产劳动是人的主要活动。人不是经济的人，人的实质不能归结为生产，但个性的发展首先是在劳动中进行的。

理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实际相联系的。如果在理论上认为“社会的”高于“经济的”，那末企业就应该让经济发展计划从属于社会发展计划。但生产集体的主要任务，它对社会的义务，恰恰反映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中。当各生产集体的社会发展计划同生产任务、国家计划以及集体的经济活动发生有机联系时，这些计划才能顺利执行，并能起到动员社会潜力的作用。反之，当社会目标同执行经济计划相脱节，当满足集体业已成熟的社会需要同保证完成计划的经济条件相脱节时，社会目标就不能完全得到实现，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动员作用。这样编制成的社会发展计划就不免会带有“消费”色彩，形成空中楼阁，不可能完全

实现，而它们的效果也就不会高。

同时，不能因经济因素同社会因素之间有着辩证的相互作用而把社会发展看作为经济发展的简单结果。社会因素起着积极的作用，这应当反映于综合计划的社会部分。劳动集体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心理气氛的改善，直接表现在生产指标上，这不仅对劳动集体是如此，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关系的完善，劳动者个性的发展，他们文化水平、教育程度和思想觉悟的提高，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加快经济进步的强大动力。但为了使这一动力能更有效地起作用，用于完成社会规划的资金，不仅应当有助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促使社会平等的加速实现，而且还应当有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加强每个人的纪律性和责任心。现在劳动集体发展计划的社会部分还不能充分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还不能加速社会财富的增长，如果缺少这些条件，就不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规划。

不顾及生活方式和需要系统的变化而规划生产发展，特别是“乙类”和服务性行业的生产，“在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增加一定的百分比，往往会与人民的实际需要变化发生矛盾。结果人们的许多需要仍然得不到充分满足。当一些商品的剩余量在增加，而工业部门又无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满足对另一些商品的需要时，就会产生某些品种的商品以及服务机构的短缺现象，或者这种现象的进一步加剧。企业（联合公司）这一层次的社会规划，是为了日益改变生产集体的结构，提高工作人员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技术水平，完善生产活动的性质和内容，发挥劳动人民的社会积极性和促进思想上的成熟程度。在这些计划中，对每个社会集团（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职员）和社会人口集团（青年、妇女、即将退休的工作人员、退休后继续工作的劳动者，等等）以及各

个集团中不同层次的特点考虑得越具体，社会发展计划就越有成效。在许多企业中，这类计划（现在是综合计划的社会部分）是在预先对生产集体的职业和技能结构进行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制订的。职业和技能结构在企业的“社会注册证”中作了规定。

第八个五年计划中社会发展的初步计划虽然考虑到企业经营的国家计划，但是与后者没有有机地联系起来。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则制订了各个生产集体统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计划。然而在这些综合计划中，社会部分往往只是对计划的经济部分作些“补充”而已。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通过的编制工业企业国民经济计划的示范（工作）方法中，各生产集体的社会发展问题在综合计划中只占很小的部分（XI）^①。根据这一（工作）方法编制的计划，对发展社会关系和工作人员个性的目标是反映得很不够明确的。

我们（我和И.И.伊凡诺夫）对基辅、弗拉基米尔斯克州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许多企业执行社会发展计划的情况所作的分析表明，实际上完成的指标同原定计划有很大差距。例如，中乌拉尔炼铜厂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废除20种繁重的手工劳动，但实际上只废除了13种。从事这些手工劳动的工人人数只减少了320人，而按计划则应减少432人。根据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综合计划规定，在1975年之前，从事机器和机械操作的工人将占总人数的43.1%，而不从事机器和机械操作的手工劳动的工人则占13.5%，但实际上这些指标分别为40.2%和23.4%。基辅的И.列普谢和捷尔任斯基工厂1976—1980年的综合计划规定低熟练和非熟练的手工劳动的工人人数不是降低，甚至有所增加。这些实例表明，生产集体的社会发展综合计划必须同企业的国民经

^① 参见《制订生产联合公司（联合企业）的企业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示范（工作）方法》，莫斯科，1979年。

济计划有机地统一起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计划的各个部分必须密切地结合起来。

由于即将编制企业和联合公司1981—1985年的综合计划，改进（工作）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照我们看来，有关劳动集体的社会发展部分应当紧接在有关劳动和干部的那些部分之后，因为在考虑技术和劳动组织的必要变化时，社会问题会直接使保证劳动集体稳定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且在很多方面使这一工作具体化。

重要的是，要使这个部分尽可能完整地说明有关改进生产集体社会结构和职业技能结构的任务和目的。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示范方法中，用于改进这种结构的指标系统带有十分一般化的性质，在其中没有考虑到对下列变化进行规划：

- 1.在规划工人技能结构的变化时，不仅没有划分出非熟练（即甚至未经过3个月培训的）工人，而且也没有对低熟练程度、中等熟练程度和高熟练程度的工人（按六级制分为Ⅰ和Ⅱ、Ⅲ和Ⅳ、Ⅴ和Ⅵ级）加以划分。

- 2.在按劳动的技术装备程度规划工人结构的变化时，没有根据中央统计局按机械化程度制订的分类标准，而使用这一标准对于如何加速废除手工劳动，首先是繁重手工劳动的进度能够作出更精确的规划。

- 3.没有规划妇女劳动结构的变化，妇女的非熟练手工劳动首先应予减少。

- 4.没有结合有文凭专家的实际使用情况，对改变工程技术人员的构成（按职务）进行规划。目前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人的岗位上工作，这并不是技术和工艺的要求，而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因工程技术人员不在其位，以至相当多的“实际工作者”却担任工程技术人员的职务。如将这些措施列入计划就能更合理地使用工程技术人员，并将有助于向计划机构更切合实际地要求分

配年轻专家的人数。

现行的制订规划的方法没有考虑到如何降低工人的流动率、旷工率、停工率等问题。在规划中有关劳动集体的共产主义教育部分如能拟定争取减少旷工和其他违反劳动纪律行为的措施，以及实际（根据工作人员的基本范畴、性别、年龄组及社会集团）使用工余时间的指标，那就更合理了。

由于极大多数的企业和联合公司中还没有设立社会学服务部门，编制计划的社会部分和对其执行情况的监督，在多数场合下暂时还采用非科学的方法。许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诸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经验证明，社会学服务可以为各工业企业、建筑工地、运输部门、商业机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带来好处。在那里，现在就领导提出的任务经常对劳动集体工作的某些方面组织及时的社会学调查。例如，对曼斯菲尔（民主德国）的皮克采矿冶金联合工厂的人员流动和工作人员患病原因的调查就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该联合工厂的工业社会学部门一共只有六位工作人员，但依靠着社会上二百个研究小组。同时还吸收前来联合工厂进行教学实习的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参加调查研究。联合工厂的领导干部也学过社会学。进行社会学调查研究，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部门根据调查研究而提出的建议贯彻到实践中去，这成了管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①。

苏联已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许多企业中积累了组织社会学服务的大量经验。在莫斯科的“红色无产者”工厂里，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对该厂制订具有科学根据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起了促进作用^②。在各企业人员编制各册中缺少社会学者

① 参见B.利辛著：《社会学者在进行探索》，载《真理报》，1978年11月13日。

② 参见H.吉洪诺夫著：《何处去找社会学者？》，载《真理报》，1978年4月27日。

职位，这是苏联工业中发展社会学服务的严重障碍，而有些企业虽设立这些职位，但往往为一些不搭界的人所占有，因为国内没有一所大学培养工业社会学方面的专门人才。

培养这类人才是有关在哲学教育和经济学教育基础上培养社会学方面人才的更带有共同性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社会舆论一再呼吁，但关于把我国的几所主要大学开设社会学系的这一问题迄今仍未得到解决^①。

联合公司、企业、建筑工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一层次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还碰到另一种困难，因为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超越劳动集体管理机构的权限。这一级的管理机构受上级管理机构的双重管辖：（1）通过联合公司、部门、主管部门，受各中央机构管辖；（2）通过地方管理机构——区、市、州、共和国，受各中央管理机构管辖。

不能离开区、市的条件来制订改善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安排常设学校的教学和补充劳动力的计划。正是社会规划工作在企业得到发展，规划的范围才扩大到区、市、州、边疆区、共和国。同时企业领导能够用来提高职业技能水平、改善生活条件以及履行社会发展计划中的另外一些条款的基金值，都直接取决于新技术运用的情况、各企业已获批准的各项计划任务的性质、物资的供应，从而也取决于在该部门范围内上级管理机构所作出的决定。

因此，有计划地解决计划方面的社会问题需要地区规划与部门规划的“配合”，既要克服各个城市和各州等的地方主义的倾向，又要克服各部门的发展计划中对地方条件的特点考虑不周的缺点。如果这种配合在纯粹的经济规划中不能很好地实现，那末

① 参见《苏联科学院公报》，1973年，第12期，第61页，载《真理报》，1973年6月27日。

在包含社会问题的综合规划中就更难做到了。现在一些主管部门往往拥有为数很少的社会生活设施，它们基本上都归地方苏维埃管辖，而部门却拥有大量的财力和物资，其中包括用于满足劳动人民社会需要方面的财力和物资。

地区规划与部门规划的统一已经取得初步成绩：在一些不大的居民点里有了“工厂——城市”、“工厂——新村”系统的综合发展计划，在那些居民点里只有一个城市型的企业，例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北方管子厂新村就是这样。在集中了许多归不同主管部门管辖的各类企业的城市里，协调地区规划和部门规划就显得更复杂一些。在那些地方，城市管理机构往往不得不向各个企业要资金和物资，以便用来建造商业点、学校、俱乐部、医院，发展城市经济。地方苏维埃可以动员劳动人民来自愿参加公共事业工作，责成企业领导人（在一定范围内）去做全体城市居民所需要的事。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地方苏维埃拥有的各种杠杆还不足以解决城市居民生活中紧迫的社会问题。

正如报刊上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各企业和各专业部想要把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推给不拥有足够资源的地方苏维埃。同时根据地方苏维埃的指示，不恰当地抽调企业和机关的资金和人力去干那些不属于企业经济计划之内的事情，这类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企业和城市的社会发展计划的相互不协调对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往往产生消极影响。例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些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大型工业企业很少参与解决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特别是社会发展问题。^①

企业的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的社会发展规划的相互配合，对企业来说也是必要的。例如，人员流动不仅决定于该企业的劳动条件，也决定于该企业所在的区、市、州的一般条件。在生产集

^① B.马纽欣著：《与大型企业并驾齐驱》，载《真理报》，1977年12月4日。

体综合计划的社会部分中规定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它取决于学校的数量和校名录，这些学校（除附设于企业的生产教学联合工厂和职业技校外）或者归地方苏维埃管辖，或者归各主管部门管辖。

在城市发展方面带有社会性质的一些基本问题受城市不按比例地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受服务领域（日常生活服务、学校、医院等等）的落后状况所制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且与下面一些客观因素有关，诸如过去遗留下来的城市经济的落后状况、战争时期的破坏、战后时期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观因素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诸如在设计和建设新城市时的经验不足和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上的缺点。这些消极因素特别在社会方面产生影响，表现在不合理地浪费居民的自由时间，其原因就在于城市运输业、商业、生活服务工作发展落后，居民迁徙频繁，破坏社会秩序的事故大量发生等。

在制订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综合规划的过程中发生种种困难，其原因还在于国民经济规划工作迄今还没有一整套指标，还没有在各种类型和位于不同地区的城市中所形成的、在社会方面有科学依据的消费标准。

近几年来，苏联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城市设计家们提出了旨在强化地方苏维埃的管理杠杆的各种措施，诸如规定企业要为所占用的土地付款，使这些款项列入地方预算。这些建议也象其他具体建议一样，需要进行讨论。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地方管理机构为实施一定的社会政策，在制订区、市、州的发展规划时所使用的财经杠杆还需要完善。这样，在发展大小不同的居民点方面的社会问题定将更充分地反映在计划之中，并将更顺利地得到解决。

各级经济和社会综合规划工作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问题

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但是在每一级的管理工作中及其“交接点”上，还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照我们看来，在有关各层次管理和规划工作方面，有两个问题必须强调一下：为了提高生产效益，必须更充分地考虑规划工作中的社会过程；必须更全面地利用社会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大完善规划的实际工作。在理论方面，对于这些问题，要求在研究社会生活中经济方面与社会方面之间的辩证联系，在研究客观和主观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以及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其在规划和管理中的反映等问题的基础上，来加以解决。

这里应该特别谈一谈关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益的社会潜在力量这一重大实际问题。在理论方面，这是关于社会因素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问题，即经济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辩证的相互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苏联生产增长率的主要部分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得到保证的。1978年工业生产增长了4.8%，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增长了3.6%，即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得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增长率^①。在我国许多地区，其中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生产的全部增长率实际上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得到保证的。在80年代，由于人口情况复杂化，在我国大多数区域的物质生产中，工人人数的增长是不大可能的，而在许多区域则将一点也不会增长。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靠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和把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推广并运用到生产中去而得到保证的。然而下面一些社会因素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其作用还日益增长，诸如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他们劳动纪律和责任心的提高，组织工作的改进和劳动奖励制度的完善，人员流动率的下降，等等。这些因素的

^① 参见《真理报》，1979年1月20日。

作用将随着工作人员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健康状况的改善，积极性、创造性和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发扬而逐渐得到加强。劳动者的个性发展是提高劳动积极性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源泉。但是，要充分发掘蕴藏在个性发展中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则直接取决于劳动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制度，取决于作为社会主义整个社会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这一制度的完善。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根本优越性在于，社会主义靠提高摆脱了剥削的人——生产资料的主人的劳动和社会政治积极性来保证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长。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这一根本的优越性，必须对完善整个社会关系的进程实行有计划的领导。苏维埃国家为完成社会规划花费了大量的并不断增多的资金，这些资金在刺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提高生产效益的同时，应当提供更高的“产值”。

为了更充分地考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社会因素，首先要完善工资制度。目前在产品的量与质、生产基金的使用效果、劳动的组织性和紧张程度、文化服务以及劳动奖励和劳动报酬之间的关系还不总是十分明确的。劳动报酬制度中的缺点降低了对有专长的工作人员的劳动的刺激作用，同时没有为那些无专长的工作人员制订一套足以促使其专业水平提高的措施。

工作人员关心他们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可以产生非常大的社会潜在力量。例如，伏尔加格勒州的机械化生产小组的劳动报酬是根据劳动的最终成果付给的。每一个在机器上工作的人员的产量比其他生产小组几乎提高了3倍，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比俄罗斯联邦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出几倍。这类事实（数量不少）证明，通过劳动集体的小组利益使个人利益和全民利益更紧密、更灵活地结合起来，这是完善劳动报酬制度的主要方向。重要的

是，要在规划中规定推广已取得的先进经验的速度和期限。群众的主动精神，在改进劳动组织工作和挖掘社会潜力方面的许多创举已在有明确方向的探索和进行有科学家参加的新的社会实验中得到充实。科学概括能更精确地估计劳动组织各种新形式的效益，精确估计劳动奖励在各个经济领域、各个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活动中的作用，能在综合计划中确定推广有关调动劳动集体中社会潜力的先进经验的指标。

劳动奖励方式的完善同时要求提供条件使工作人员更合理地使用其所得的现金收入。国家计划提出，通过扩大商品生产，提高商品质量，调整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扩大服务范围，特别是在农村，来克服各类大众日用品供不应求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因为它能大大地缩小收入“无组织的”再分配范围，能更顺利地与商业和服务行业部分工作人员中的不良倾向进行斗争，根除投机倒把、贿赂以及其他弊端。群众能不折不扣地和及时地按劳领取其工资和其他货币收入，这就会大大提高按劳付酬的物质刺激的作用。

不能把共产党旨在全面发展劳动人民个性的社会政策片面地理解为仅仅是改善社会成员物质生活境况和提高他们文化程度的政策。这项政策旨在提高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全体人民利益正确的结合和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基础上，培养他们勤勤恳恳地为社会劳动的意愿。真正无穷无尽的社会潜力存在于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首创性之中。这种主动精神的发扬光大表现在参加科学技术进步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众性的创造活动中，它可以从发明项目和合理化建议的发展情况中看出。在第八个和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发明者和合理化建议者所提的建议数字从407.6万增加到511.3万，而年度节约总额则从19.08亿卢布增加到48.05

亿卢布。

如将1965年的水平定为100，那末十年来的建议数已增长到125，而年度节约总额则已达到252。这说明每项建议的经济效益已提高了一倍。

挖掘社会潜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针，是改善劳动组织工作，这样就能缩减对劳动力的需要量，首先是缩减对不要求技能或对技能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者的需要量。

最近，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各企业在“手工劳动由机器来承担”的口号下帮助工人摆脱手工劳动的创举已产生巨大的反响。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个州依靠机械化减轻了3万多人的劳动强度。在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三年内，该州的各工厂和建筑工地已有210个工段和车间实现综合机械化。这就保证了超额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任务。扎波罗热州的经验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许。^①

图拉州谢基诺市的制氮联合公司所作的经济试验也是享有盛名的。

在进行这一试验的十年中，该公司的人员编制已减少了1,500人，而产品的产量则增加了1.7倍。仅在化学工业中，谢基诺市的经验就已在150个企业中得到推广，结果腾出了45,000名基本上从事对技能要求不高的手工劳动的工人。在推广这一试验时也碰到一些困难，其实质是：“……这里，工厂生产的组织和规划的新方法与部门规划的习惯方式及改造现有企业中存在的缺点发生了冲突。”^②

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实验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因为不可能使

① 参见《真理报》，1977年9月16日；《真理报》，1979年9月10日。

② B. 帕尔菲奥诺夫、B. 舍夫佐夫著：《十年以后》，载《真理报》，1977年3月29日。

一大批人脱离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制氮联合公司进行的实验与部门生产的安排发生了矛盾，因为一个企业或一个联合公司是不可能与一个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与整个社会相隔绝的。

上面所说的情况在其他的社会经济实验中也存在，例如，建筑业中的实验也有类似的情况。H. A. 兹洛宾首先采用的遐迹闻名的工程队承包制收到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广兹洛宾经验能腾出大量工人，大大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节约物资，等等。在实行这种承包制的工程队里，裁减对技能要求不高的人员的人数可以靠兼职得到解决。建筑业的工程队承包制雄辩地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社会优越性和经济优越性。到1979年年初，全国采用兹洛宾经验的建筑工程队已达6.3万个，即有约三分之一。但根据1978年的总结，只有三分之一签订承包合同的生产集体能完成合同的条款。各建筑公司的领导人不能保证所有执行经济核算制的按劳动最终成果支付报酬的工程队及时得到材料。^①

实行工程队及工程小队等等的经济核算制，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作为经济部门的建筑行业的范围。这种生产组织方法也在工业、运输业、农业以及所有物质生产领域内得到推广。在基层劳动集体这一级实行经济核算制，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在于，生产集体成员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与此同时，使他们对集体劳动成果更加关心，更快地掌握各种职业，其中包括新的职业，有助于积累知识和技能，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创造性和主动性。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筑工人关于在保持计划任务原有水平的情况下缩减工程队数量的创举，其意义也超出本部门的范围。该州的建筑工程队人数平均缩减了十分之一，并且这种缩减还是通

^① 参见《真理报》，1979年2月5日。

过把熟练的建筑工人调往其他工段去工作来实现的。每个工人产量提高了10%~35%，建筑业的创举已在中乌拉尔地区的各个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那里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建筑业的创举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制订的在1985年前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合理使用该州劳动力的综合规划的实现起着很大的作用。制订这一规划的目的，是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保证产品产量的全面增长。^①

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说明，挖掘和利用提高生产效益的社会潜力具有巨大的意义。开展社会学的调查，特别是与各种专业的学者一起进行的综合调查，有助于查明社会潜力，提高社会因素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进行预先规划好的、目标明确的社会经济实验既可吸收实际工作者参加，又可吸收各种专业的学者参加，这将促进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的新形式的出现和推广这些新形式，也就是说，能促进苏联社会的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

1979年通过的党和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经济机制的各项决议提出了大力支持、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的任务，其中包括动员和利用社会潜力的成功经验。由上述各项决议所规定的一整套措施，正如A. H. 柯西金所指出的，“既考虑到近几年来在某些企业，又考虑到国内某些部门与区域所进行的一系列大型试验的成果和所采取的完善规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措施。”^②

结合我们的题目，我们特别应当指出，在这些决议中规定的关于在近期内制订出减少使用手工劳动这一专项纲要，以及把各企业和各工业部报告中的有关指标列入五年计划（按年度分开）的要求。对于确保工作人员和劳动集体的工资与提高劳动生产率

① 参见B. 叶利钦著：《不是靠人数，是靠技能》，载《真理报》，1978年1月28日。

② 《共产党人》，1979年，第12期，第17页。

和劳动的最终成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各项措施也作了规定，在紧缩工人人数的情况下的兼职和兼营业务将得到鼓励，因为各企业有权将节约的工资基金给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增发超过工资率和工资额的款项。

现在让我们对上面所说的情况作出一些结论：在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早已为马克思概括地预言过了。马克思指出，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后出现的新的社会条件下，“个人的充分发展”这一社会目标必将成为社会的主要任务。而这一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①。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是极其复杂和多方面的：（1）既是客观过程的辩证法，（2）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辩证法，（3）也是主观因素内部的辩证法，首先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社会因素作用的增长，既属于历史过程的客观方面，也属于历史过程的主观方面，并且是与主观因素——共产党的政策、管理工作和规划工作的作用的增长同时发生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一般的社会学规律还是辩证法规律，其作用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特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第225页。

第 五 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 及其发展的辩证法

第 一 节

社会结构的概念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的一个公认的关键性概念，它与前述的**社会关系**概念是有直接联系的。

“社会”这个概念的含义很广，它既是社会集体的同义词，又具有社会阶级的意思，这样就导致人们对社会结构的解释产生了歧义。这个术语的后一个部分，即结构概念，含义也很广，由于解释不一，情况也是很复杂的。

结构概念在20世纪已成为西方国家人文科学中诸如**社会学**（英国的 B. 马林诺夫斯基和 A.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美国的 T. 帕森斯和 P. 默顿）以及**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法国的 A. 列维·施特劳斯）等一系列主要学派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些学派有的属于社会学，有的就其对社会生活所作的总的理论解释来看，实际上也接近于社会学。有一个事实足以反映西方对结构概念的青睐，譬如美国社会学学会1974年召开的第六十九届年会就是在“社会结构的核心”这样一个口号下举行的。^①鉴于上列各个学派都在对社会结构作出一定的解释，并且把总的结构概念当作一个哲学范畴来加以探讨，因此，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实事求是地对这个概念进行分析，就必须同时对资产阶级的观念附带作一些批判分析。

^① 参见《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纽约—伦敦，1975年。

结构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跟要素和系统两个范畴的关系最为密切，原因在于任何一个自然体，任何一种社会生活现象，客观上都是一个由要素组成并具有结构的系统。列为辩证法范畴的概念有一个条件，就是它们必须反映存在和意识二者的共性，而上述这几个概念是合乎这一条件的。科学的理论——我们把它看作是人类思维能力的最高体现——也始终表现成由要素组成并具有结构的系统。

以上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在20世纪中期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决不是偶然的。生物学已把生态系统、种群、活的有机体、细胞及其组成部分视为具有一系列串平列层次的复杂的自控系统，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控制论这门旨在总结人类建立自控系统方面的技术经验的学科获得了发展；另外，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过程也变得复杂化了——这些科学进步的基本因素都要求人们去探究上述这些范畴，并丰富其内容。研究这些范畴的学科不仅有生物学、控制论、社会科学，而且还有作为它们的总结而产生的系统论。系统论是一种总的科学理论，其任务在于研究系统结构方法的某些普遍原理和一般方法。

这些变化过程对于哲学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运用系统论也好，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对这个理论的评价还有个别的失当之处，这都不意味着辩证法可以不顾系统结构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概念的发展。相反，这些理论和概念如今已处在辩证法的注意中心了。

大家知道，系统、要素、结构这三个概念并不是20世纪中期才在科学领域中产生的某种新东西。其实马克思早已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看作是一个具有要素和结构的复杂的经济关系体系了。^①而

① 在“结构分析”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的理论所起的作用，甚至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们也是加以肯定的。例如见M. 克卢克斯曼著：《近代社会思想中的结构分析》，伦敦—波士顿，1974年，第16页。

且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成就也在于提出了元素周期系统和关于分子（由原子构成的系统）构造（即结构）的理论。

20世纪，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人们深入分析关于由要素组成并具有内在结构的系统的观念。这几个概念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因此必须把它们（连同与其紧密相关的“部分——整体”、“整体化——分化”等范畴）当作哲学范畴来加以研究。

在辩证法看来，所谓系统，就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而结构则是系统的构造。^①毫无疑问，系统并非总是自然界的具体事物。自然界或社会中种种关系的一定总和，也是一种系统。这种系统的要素，是这类关系的“基础单位”，而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则是它的结构。要对关系系统进行结构分析，首先就得以关于事物的一个根本观念作为出发点：事物作为一个物质系统，是整体与部分、要素与关系的统一，而部分与要素则彼此依存在关系之中。唯心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关系提到首位，而对这些关系的载体即物质要素本身却置之不顾。对于社会来说，这就是在片面理解社会关系结构的同时，又把它绝对化了，有时又忽略这些关系的载体，即人以及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物质生存条件。

这种趋势目前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表现，就是结构主义的流行。它赋予结构以主导作用，这是与要素和构成要素的物质基质相比而言的。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跟一切唯物主义一样，总是把物质世界当作自己的出发点。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这种客观属性是由物体以及物体所包含的诸要素的客观存在规定的。然而，由

^① 在C. И. 奥诺戈夫《俄语词典》（1960年莫斯科版）中，结构一词的定义是：“构造，内部体制”（第765页），俄语的“构造”一词跟拉丁语的“结构”是类似的。

于对社会领域进行系统结构分析会产生不少很复杂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研究得又很不够，所以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中，对于结构这一范畴也还缺乏完全一致的认识。

首先，上面引述的结构定义，是把结构视为要素的联系方式，也即要素之间的全部联系，可是这个定义有时却被缩小为系统中的“要素联系规律”。这就是说，要素之间的全部关系中，只有那些基本的、主要的和规律性的联系才在结构之列。诚然，对于要素之间的全部关系来说，首先应当研究的，正是这些赖以保证客体的稳定性及其对自身的统一性的联系。然而，我们是否就此可以忽视其他一些联系，比如说不顾固体结构中杂质的渗入和晶格的被破坏呢？其实，固体的许多特性，包括它的导电性，主要是由杂质的渗入量和晶格的被破坏程度来决定的。

社会的情况也相似。譬如当代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其基本成分是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但是，即使在成熟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残存着小生产者和自由职业者，尽管这些居民集团的人数极少，但忽视他们的存在显然是不对的。苏联1977年的宪法也已肯定了自食其力的个体小生产者的合法存在。这些集团（在许多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些集团的人数还很多）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体系时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其次，我们认为，把结构的定义归为“要素、关系和整个特性的统一”也是不确切的，更不用说是把它视为“系统的规律”或“系统的不变量方面”^①了。

第一个定义把结构跟系统视为同一，第二个则把结构跟系统的存在规律混为一谈，因为“不变量”已被理解为全部变化中的某种稳定的、保留下来的东西。

至于把系统视为要素与结构的统一这一种看法，则应根据系

① 《哲学百科词典》，莫斯科，1970年，第6卷，第140页。

统的内部运动及其与别的系统也即与其存在条件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加以引申。如果一个系统正处于定态中，它的运动一般被叫作发挥功能。有机体的种种功能虽然是由器官、组织和细胞基质予以严格规定的，但是，即便在有机体中，某些系统也在相互重复作用，借以提高其可靠性。

从功能角度来研究社会，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方法，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同时担负着各种各样的职能，或者诚如社会学中通常所说的，担当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在生产单位是一种角色，在家里是另一种，在俱乐部活动中又是一种，而在管理社会事务方面则又是一种，等等。不仅如此，人们还有可能失去某些职能，同时又获得另外一些职能。社会上不断产生的设制也在执行各种各样的职能，它们在很多方面是交叉、重叠在一起的（比如教育这种职能学校和国家就都要担负），在某些方面又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替代的。另外，还必须考虑到，社会及其内部的集团为了执行一定的职能，都在自觉地建立各种各样的机构，使之按一定的目的来进行活动。

功能方法和结构方法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把系统区分为要素必须按其担负的职能来进行，而二者加在一起，就表现为“系统方法”的特征。我们认为，必须把上述这几个个别的认识方法跟“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在客观上（有时是有意识地）是跟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

法国的结构主义跟英、美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别，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它们的共同哲学基础。这两个学派跟辩证法的对立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它们把发挥功能跟发展也即把共时性跟历时性对立了起来。法国的结构主义者毫不掩饰地偏向于共时性，社会人类学

的代表人物 A. 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同样认为，社会结构“构成了特定时期每一个个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在他看来，社会结构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静止”的方面。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后继者在这一点上“修正”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点，他们认为，“结构原理”并非经验实际的本身，而是对实际的抽象，因而这些原理是适用于经验实际的各个时间段的。

T. 帕森斯的立论也相似。在他看来，“社会实际乃是一个‘动态过程’，但是要描述和解释这个实际，研究者就必须把它的个别部分先行‘冻结’起来，然后再确定其结构”^②。

辩证法坚持认为联系和发展是两个始终统一的原理，因为实际本身的特定时刻内的现象联系与其不同时间内的状态联系彼此是不可分割的。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注意发展时期、发展阶段和分阶段的相对稳定性，再者，自然界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客体，我们对它们的发展时间至今一无所知。因此，对于性质上相对稳定的系统（如活的有机体、社会、语言等），就必须把它们发挥功能的规律与其历史发展规律加以区别。但是，一个系统的发挥功能是其发展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该系统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对它的全部功能发生了影响。举例来说，人体组织的功能在其生长和成熟期是在不断地演化的，随后就开始衰老；各种功能发挥得已欠活跃，频频出现扰乱和“损伤”等等，最后由于某个十分主要的子系统（如血液循环、营养、呼吸等等）无力保证机体这个系统的工作而使它死亡。

功能发挥和发展的联系在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此种情况下，系统方法、功能方法、结构方法和“系统”、“结构”、“要素”、“功能”这几个概念不仅适用于系统的功能发挥，而

① A. 拉德克利夫·布朗著：《社会自然科学》，伦敦，1957年，第89页。

② 《社会学词典》，伦敦，1975年，第189页。

且还适用于它们的发展。辩证法作为系统方法的一种相应的哲学基础，其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结构主义在具体科学中的一些最著名的人物，如语言学家索绪尔，人种学家A.施特劳斯，都把研究原始部落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作为自己的任务。这些部落发展甚慢，因而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稳定的系统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研究原始部落的生活时能够把功能发挥的规律跟发展规律区分开来的话，那么，“共时性”被赋予的优先地位一旦施之于当代社会，就只能把研究者引入歧途，让他们为资本主义去进行辩护，因为这时功能发挥同发展已是不可分割的了。

美国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把20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看作是一个稳定而平衡的系统。该学派把阶级斗争跟犯罪、吸毒置于同列，并把它们归为功能失调，也即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过程暂时发生了障碍。这个学派是“平衡论”的变种，它貌似“客观”而实质上却在为资本主义进行彻头彻尾的辩护。

其次，上述各个学派都有一个倾向，就是对结构概念因而也就是对社会这个研究对象进行唯心主义的解释。在这方面同样表现出它们的片面性，不过这种片面性已表现在如何评价知识的形式化和数学化所起的作用问题上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经指出：“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产生的”^①。数学方法对人文科学包括对社会学的进一步渗透，无疑是20世纪科学的一大进步；知识的形式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尤其是在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为人们揭示了一个新天地。当前，数学模式已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模式是人创造的，然而在创造模式的过程中人的意识不能只“抓住”表面现象，而要把握现象的规律，从而越出经验实际，从理论上上来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25页。

阐明现象的实质。这就是辩证法的态度。

A. 拉德克利夫·布朗明显地受到Γ. 斯宾塞有机论的影响，倾向于自发的唯物主义。这一点在他对作为自然科学的社会人类学对象的认识上以及对其核心概念即社会结构所作的解释中便可看到。他曾经说过：“社会结构十分实际，就象个别的机体一样”，接着又解释道，他是把社会结构概念列在“实际存在的，在野外研究中可以看到的社會关系”之中的。^①不过，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下一代由于受到20至3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在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对他们的奠基人提出了批评。比如M. 福莱斯坦就明确地说：“在具体现实中，结构是看不到的”，当我们描述结构时，“我们是在跟一般原理打交道，这些原理跟结构现实社会生活这匹织物的感觉、信念这一些线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以为，结构“是语法和句法的领域”^②。

法国的结构主义更加明显地把现象实质、经验实际同理论体系和模式置于相对立的地位。比如A. 列维·施特劳斯就这样说：“根本的原则是：社会结构概念跟经验实际并无关系，但是它根据经验实际建立起来的模式却是有关的”^③。

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结构主义跟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前者对Θ·涂尔干亦步亦趋，把社会心理学当作根据，从中寻求“集体的无意识之物”，也就是制约原始部落生活的不为人们所意识的那些结构。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诚然是心理之物，可是这样一来，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实际上就不在研究之列了。

美国的社会学没有关注原始部落，而是着眼于当代的资产阶

① A. 拉德克利夫·布朗著：《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伦敦，1952年，第190、194页。

② M. 福莱斯坦著：《时间和社会结构》，牛津，1949年，第56页。

③ A. 施特劳斯著：《结构人类学》，巴黎，1958年，第305页。

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一切行为规范都用法律、教义和道德原则一一加以规定,并通过强有力的信息渠道作用在人们身上。

由此可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有所不同,它把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发挥规律最终都化为价值和标准。比如按 T.帕森斯 的说法,社会结构就是个人的社会态度及其担当的社会角色交互作用而得的结果,而二者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行为的规范来加以规定的。社会的完整和统一也是人们意识到彼此存在着共同的“最高价值”的结果。

20世纪资产阶级思想界在概念和实际的相互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对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所产生的分歧毕竟是次要的,因此法国社会学家P·布东对结构定义所作的分类,以及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Γ·霍曼斯对此作出的评价^①就饶有趣味了。

布东把结构定义分为两大类。被他归为第一类的,是能以区分“社会系统”、“社会机构”、“社会结构”和“情势”等概念的定义。霍曼斯赞同布东的观点,认为这一类概念“至少是模糊不清的,就象它们必须确定的对象一样”。换句话说,两位作者对于旨在表现现实结构的各个定义都觉得“不称心”。

布东和霍曼斯比较倾心的是第二类关于结构概念的定义。这一类定义是按照它们对社会实际进行科学阐释的不同角度来加以确定的。这些定义“把结构概念同逻辑结构联系在一起,而逻辑结构是作为一个对象被运用于社会系统概念的,因为它同时说明了该对象的特点”^②。在这里两人又发生了分歧。那么,这种分歧的实质是什么?重要到什么程度?

在布东看来,对社会系统进行“结构描述”,首先得搞清下

① P·布东著:《“结构”概念分属几类?》,巴黎,1968年;Γ·霍曼斯著《何谓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纽约—伦敦,1975年。

② Γ·霍曼斯著:《何谓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第55页。

列三个要素的相互关系：

A (Axiomatic) + Str. (S) $\xrightarrow{\text{calculation}}$ App. (S)①

这个公式的起点是研究人员采用的“公理”，然后由公理过渡到结构，再经研究人员的“计算”（即“运算”、“斟酌”，这些步骤无非是逻辑演运而已），最后就进行“应用”，即运用总的结构概念来解释给定的经验实际，也即解释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

但是，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心理学按照传统习惯是不使用公理的，于是霍曼斯在对社会系统进行科学描述时，就把这个起点用“总的假设”来取而代之以（对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来说，假设是导源于公理的），并把上列模式转换成这样一个形式：

General Proposition + Structure $\xrightarrow{\text{Calculation}}$ Furthe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总的假设 + 结构 $\xrightarrow{\text{计算}}$ 更大的行为差别)②

这样一来，霍曼斯就认为，“总的假设”产生出结构，研究者根据这个结构就可以对特定的社会对象即人们的行为差别作出解释了。

不难发现，在这两位作者的论断中，结构是被当作科学理论运动的一个中介因素来加以论述的。这个因素虽然受到较为一般的思维结构的制约，但它并非实际存在的客观社会结构的反映。

第三，上列两个学派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采取折衷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复杂的系统。确实，倘使我们把任务仅仅看作是使经验实际“屈从于”人们设计的结构模式，那倒不妨设问，如果一个系统的每一种功能都必须以专门的模式来加以表现，而该系统的各项功能却彼此相关，那又该如何处置呢？从这个角度来提出问题，恰恰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特点，因为象社会这样一个具有

① P.布东著：《“结构”概念分哪几类？》，第90页。

② T.霍曼斯著：《何谓社会结构……》，第64页。

大量功能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很难用一个结构概念来加以概括的。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在这一点上,总的说来,是在步 M. 韦伯的后尘。而早在20世纪初期,韦伯就已按照当时资产阶级思想界非难马克思抱有过度的“经济主义”这种习惯做法,把他的社会差别模式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对立了起来。根据韦伯的说法,经济差别是建立在所有制基础上的(在这一点上他是“赞同”马克思的观点的),但是,韦伯却提出了另外一些说是同经济区别一样重要的差异,即由于政党归属不同以及小的集团或个人在政治权力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势力”和“权力”上的差异,由于小的集团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不同而产生的威望上的差异。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根据经济的第一性来解释经济、政治和意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而韦伯却利用阶级的客观状态与阶级自觉和政治行动的不完全一致性,用折衷主义来跟辩证法相抗衡。

继韦伯之后又出现了许多社会分层模式。它们的共同哲学基础是:为了把社会生活解释得更充分些,必须建立不同的结构模式,先把对象置于不同的“视角”,再来研究它们的“相互作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总是喋喋不休地用陈词滥调来非难马克思主义,说它犯有“狭隘的经济观”这种毛病,好象只有他们才是注意社会生活的其他各种因素的。

某些根据经验资料来研究“社会分层”的专著,硬是把韦伯的这些模式说成是可以当作指标来加以测定的“操作主义的概念”。比如 M. 秋明在《社会层次》一书中跟 M. 韦伯一样,也在探讨所有制、“势力”和心理满足(它是由个人对其地位作出评价而产生的)等问题。^①然而,当话题一转到经验指标时,他

① M. 秋明著:《社会层次。不同的结构和功能》,新泽西,1961年,第40—42页。

就转而论述起美国社会学界所常用的那几个分层标准了，即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职业种类。作者以为，这几个指标是“紧密相关”的，他又援引了一些经验资料，说明这些社会集团指标是相互依从的。作者用来区分社会集团的办法极其简单：按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把他们划分成“上”、“中”、“下”三等。他对职业种类所作的分类是：把产业主、管理人员和职员归为一个集团，把各企业的技师跟手工业者（一起）归入另一个集团，把商人和神职人员又（一起！）归并成第三个集团，至于工人，他则按照他们的熟练程度和劳动领域区分成完全不同的集团。^①

事情很明显，对于社会差别来说，收入、工种和教育程度这几方面的差别甚至连浮在表面上的那些差别也是囊括不了的。难怪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E.巴伯尔在一篇有关社会分层问题的总结性文章中又提出了六条衡量社会阶层的“独立标准”，即“职业威望的高低”、“权势的大小”、“收入或财产的多寡”、“教育程度或知识水平的高下”、“对宗教或宗教仪式的虔诚与否”和“所属宗教集团或民族集团的地位”。^②其实，每一个社会学家都能另立规范，因此T.盖格尔的说法是对的，他早在30年代就已指出：“能够用来区分这个或那个社会阶层的标准以及根据这些标准所建立的社会分层模式，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③。

辩证法跟折衷主义不同，它不能仅以指出区分社会集团的标准是无穷无尽的这一点为满足。持折衷主义观点的人，不管怎么说，总得在这无数的标准中选出他们“需要的”、“爱好的”等标准来，同时，他们又无法把这众多的结构整理得泾渭分明，

① M.秋明著：《社会层次。不同的结构和功能》，第57、63、77、83页。

② 参见《美国社会学。前途、问题和方法》，莫斯科，1972年，第235—242页。

③ T.盖格尔著：《德国民众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1932年，第5页。

于是只得宣称，其中有几个（如B.巴伯尔的六大标准）是“独立”的，以便过后再来证实，它们在现实社会中是如何“重叠”在一起的。而持辩证法观点的人，则指出主要的差别，并对各种标准的相互联系进行研究，以便说明主要差别如何制约着次要差别，而次要差别又怎样作用于主要差别。对于折衷主义来说，把社会差别及其标准加以系统化，是一件带有任意性的事，而辩证法则要求深入差异的实质，把上列标准组成一个严整的系统，使之尽可能精确地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各种联系的体系。

列宁在论述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的根本区别时曾经指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的是从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对比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①列宁的这个原理对于社会学，包括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

根据上述对社会结构的总的认识，现在再来谈谈社会结构的分类问题。社会，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是一个最为复杂的系统，同时，社会进步会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得到反映。仅以数百或数千人组成的氏族公社或部落，就其组织的复杂性和职能区分的水准而言，是难以跟拥有几百万或几千万成员的现代民族相比拟的。

很明显，社会系统是由无数结构组成的，而每一种结构又都是有级层的，也就是说，它们各含有层次（序列）不同的结构，这些结构又分别与其他一些层次的结构相互作用着，这一点并非仅是我们的看法，而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要是借口结构是无数的，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现象实际上是极其复杂的，而不去探讨那些最为根本的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途径，那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在我们看来，这多种多样的社会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80页。

在第一类结构中，社会系统的诸要素就是社会生活一定的侧面和方面。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所置身的社会活动领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他们都能按照自身的活动面，分别被列入这类结构的任何一个种类中。换句话说，社会结构以独特的折射方式，同时表现为个人的活动结构。

在第二类结构中，社会系统的诸要素，是人们组成的一定的集团，如阶级、阶层、小群体，直至个人。在这一类结构中，每一个人只能属于一个阶级、一个集团和一个阶层，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只能是社会结构的某一因素和“子因素”，而作为后者，它也是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一个因素。

在第一类结构中，“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一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含义跟“社会集体”相当。而在第二类结构中，它则是个狭义概念，在于表示各个社会集团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至于每一类结构的内部分类问题，那是由方法论上的一般观点来加以决定的，而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在这方面也是存在着原则性区别的。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来越强调社会生活的心理学化。一般地说，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都存在把研究工作局限于探讨人们的活动动机这一种倾向。不过，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也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或着重于研究纯理性的因素，如思想、纲领、计划等等，或着重于探讨情绪意志方面的因素。20世纪资产阶级哲学追求非理性主义的总趋势对社会学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表现就是好用愿望、意志等等来解释个人、集团、民族和社会的各种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验主义的方法，也即强调向人们进行征询并查明他们的意见、愿望、估价和心理定向的方法，得到流行而造成的

这一派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用来确定社会系统的一般程序为：

先从心理学中选取一个个人行为模式，然后设法把它套用到整个社会上去。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A·莫克尔斯在《个人与社会结构》一文中指出，在西方社会学中，心理学方法所起的作用正在日益扩大，并且出现了这样一个论题：“不管人们怎样评价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对于另一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个性系统始终是一个基本的中间变数”^①。

诚然，个人的行为，在形式上是有可能表现为具有一定结构的某种系统的。这里举一个这种结构的典型形式。人总有一定的需要（生理的或社会性的）。人们从这种需要出发，（或者在思维中自觉地，或者在情绪意志上）提出一定的行动目标。提出目标，就要选择达到目标的这种或那种手段。沉思默想或外界效应迟早会促使他在生活中采取实现这个目标的实际行动。行动在结果中得到表现，结果跟已经提出的目的或者完全相符，或者更可能是部分相符。人作为行动的主体，是意识到这种效果的，并能对它作出一定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是根据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系统来作出的。最普通、最常见的衡量办法，是按照原始需要的满足程度和主观满意感（或不满意感），对行动结果及行动本身作出评价。这种评价指标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著作中用得最多。满意感，甚至是不充分的满意感会改变人们的原始需要，使他们对生活提出新的要求，如此周而复始，往复循环。

我们在这里援引的只是一种典型的，也就是所谓“中性的模式”。在不少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模式，有的还比较复杂。不难看出，人作为一个社会的活动物，他的这种（或另一种）行为结构，对于认识集团、阶级和社会，是有一定价值的，尤其是当人们由共同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活动纲领和赖以把统一的思想变为统一行动的一个组织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

^① 《美国社会学。前途、问题和方法》，第37页。

时，这种认识价值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可观。需要、目的（战略性的、纲领性的或战术性的）、实践活动的手段与其结果以及对这些结果的评价彼此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对于解释政党的活动，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活动，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这一类模式中哪一个因素应当看作是主要因素的问题，我们不准在这里讨论了。我们只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无疑是实践活动，因为需要由实践活动产生，在理想性目的上得到反映并在实践中最终得到满足。在现代资产阶级心理学和社会学看来，实践作为一种物质活动，是由心理因素掩盖起来的。

然而，个性结构并不能成为理解社会系统的基础。社会结构所涉及的面比之上面描述的要广泛得多，因而从个性结构过渡到社会结构就需要增加几个前提。很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又力图从社会心理学中去加以择取。在这一点上，《社会行动论》一书的作者T·帕森斯的思路倒是个典型。在他看来，“社会行动”首先就是个人的行动，而个人的行动则可以用四个概念来加以表述，即“活动者”、“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条件”、“社会规范”。由于个人的行动总会作用于第二者，因此社会关系体系的最小单位即是两个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单项动作。帕森斯正是把这个相互作用的动作看作是建立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①

这种方法论立场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是对商品交换活动的理想化。对于这种独特的“视错觉”，18世纪的思想家们已经予以高度重视了。当社会上的劳动分工还是以商品交换作为中介时，单独的生产者对于社会联系象是“自由的”，他似乎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便地跟人家做交易。但实际情况是，个人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才空前地密切起

^① 参见《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第一章，莫斯科，1977年。

来。马克思说过：“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①

启蒙时代所特有的“鲁滨逊式的人物”过去和现在都有他的接班人。E·杜林曾经说过：“为了阐发根本的法律概念，我们只要有两个人的十分简单的和基本的关系就够了。”对于这个论断（它是杜林的一个基本论断，并且不限于法律领域），恩格斯所作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十八世纪所共有的。”然而，对于那时的伟大的思想家们来说，“他们主要只是充当说明的例子”，而杜林却把这种举例说明的方法“提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②。这是一百多年以前说的话。

在这很关键的一点上，T·帕森斯正是上述传统的继承人。他的理论体系跟杜林的如出一辙，也是以两个人的相互作用动作作为出发点。由于这种理论体系适用于任何一种历史形态，因此就其本质来说，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所研究的商品交换活动，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各种实质性矛盾中的一个最小的社会经济“细胞”，他的研究工作先是在于描述商品小生产者的社会概况，然后再揭示劳动力已成为商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的状况。而帕森斯却不同，他把两个人相互作用动作的心理状况搬用到一个抽象的社会（通过社会学理论的一些中间环节和中间“层次”）。在帕森斯看来，每当一个人在某种抽象的情况下与第二者相遇时（现实的或潜在的），总是对第二者抱有某种“期望”，在精神上对“感情的冲击”作好了准备，并且按照他与对方在该场合下所担负的角色作出了“定向”。一个人所担当的角色，从而也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06—108页。

是他所执行的职能，在不同的场合下是不相同的。然而，一个人不论扮演哪一种角色，执行哪一种职能，他总是把自己意识中已经形成的“价值取向”作为依据，价值取向尽管因人而异，它却总是建立在社会上通行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

有些论说还要复杂些，它们不是以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以三个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在西方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是Φ·海德尔的“结构平衡论”。海德尔很想照顾到交往手段，尤其是群众性交际手段的作用和个人“定向”的形成，于是他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个人（P）、第二者（O）和定向对象（X）三者的相互联系。比如P是一名选举人，O是一个政治评论员，X则是候选人。这个三角形能对三方的关系作出种种配置，对这个三角形的研究就是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海德尔力图以此来描述社会的结构，他说：“整个社会最终是能够表现成一张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或心理定向编织起来的薄薄的网。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处在这张由他编织而成的网的中心，在这里他跟少数几个人发生直接联系，而跟整个世界在发生间接的关系。”^①即便在这一理论中，要从“细胞”过渡到整个社会，也必须阐明个人定向中的某些共同特征，也就是说必须再次求助于通行的社会规范。

因而，问题就不得不转到这样一点上来：既然人们的行为，其中也包括两个或三个人的单项相互作用动作，是由社会规范来加以调节的，那么社会规范的本质又是什么？人们意识到的规范首先是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它们有可能表现得很直接，不过，有一部分也可能通过宗教、艺术等间接地表现出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些规范无疑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反映，并且通过

① J·M·D·戴维斯著：《定向社会学》，载《美国社会学。前途、问题与方法》，第62页。

以政治、法律设施为主的各种社会法规来加以巩固。

由此可见，“社会行动”论所提出的，是关于人们的行为跟社会规范发生关系时社会规范的实质问题。但是，T·帕森斯并未提供解答这个问题的办法，原因在于：第一，他没有看到，经济关系是社会规范的真正源泉；第二，他没有注意到社会规范随着经济体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无定性和它的历史暂时性；第三，他把人们的行为背离社会规范的各种现象统统视之为“官能紊乱”，从而妨碍社会机体正常发挥自己的功能。

从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所持的立场来看，社会规范、社会法规和人们的实际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比较广泛的问题的一个部分，就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种现象，也即经济关系、政治和法律设施及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意识这几方面的相互联系。列宁认为，是马克思把社会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广义的社会结构，是一个被视为系统的社会的结构（即第一类结构）。这种结构首先就是有类型之别的社会关系结构，也就是经济基础跟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彼此间的联系，说得更宽一些，则包括社会生活中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每一个领域所包含的各种“次领域”的相互联系。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理论社会学，它的宗旨正在于从这诸多相关方面揭示出社会的结构。

我们的目的并非在于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根据本书的题目，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二类社会结构。不过，在着手探讨这一类结构以前，先得作三点补充说明。第一，在第一类的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18页。

种结构中，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个人，正象他是社会的一分子一样，本身也仿佛能“分解”成若干部分，因为他置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是道德和法律意识的载体，是社会规范的主体和客体，而且他的需要、目的、企求又是社会的需要、目的和企求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某一社会成员虽然在物质生产部门任职，但他作为一个公民和个人，即便是作为选举者或者文化珍品的需求者，多少得介入到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去。另外，长期在行政管理机关或者文化部门工作的人员也总是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原因不仅在于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任职的人彼此都有活动交往，而且还在于他们都是物质财富分配过程的参加者，都要从国民收入中领取一个部分，用来满足个人的需要。

其次，第一类社会结构有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它们都具有层次性。我们已经说过，物质系统的结构，如晶体的结构，本身就是离子或分子这些组成该晶体的物质要素彼此间的关系和联系。可是，当我们观察一种关系系统时，不管这个系统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它的要素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凝聚体”。如果说在前述的第二类结构中，层次分析的最小单位是不可再切分的个体、人和个人的话，那么，在上面所说的这一类结构中，它的层次构造就有异了。比方说，社会意识是可以跟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和法律设施一起被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领域的。但是，社会意识本身却又是一个系统，它的要素即是其基本形式。而每一种形式又具有复杂的结构，比如艺术就有种类和形式之别，而形式又有风格之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对于“社会结构”概念能否用于第一类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还要作一点说明。近十年来，保加利亚的一些著述把社会结构区分为人们生活和活动领域的联系和各社会集团的联系手段这样两类。前一类被称作社会学结构，后一类被叫做社会结

构。^①把社会结构区分为这样两类无疑是必要的。可是用“社会学结构”这个术语来表述第一类结构就未免失当了。确实，我们所说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结构，然而，研究这个对象的并非仅是社会学一家，而是一切关于社会的科学。再者，作者们所称的“社会”结构也同样为社会学所研究。这样一来，这两种结构就都可叫做“社会学”结构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社会”这个术语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完全可以作为社会团体的同义词，这样，这两种结构又都可叫做“社会”结构了。

最后，保加利亚的这几位作者又把“社会学结构”当作社会的一个“横断面”，并按照各种逻辑标准从中区分出各类成分，再把它人为地归并在一起。这些成分是：（1）物质生产；（2）人们作为社会实体的再生产；（3）精神生产；（4）社会管理和社会交际。^②有些作者还补充了一项，叫做为居民的服务性活动。^③

被归于第一项的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物质生产的其余主要领域”；属于第二项的有：日常生活、保健、体育、教育；列为第三项的是：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及精神生产和管理的其他领域；列于第四项的有：语言、出版、广播、电视和其他交际手段。这种分类法把区分社会系统的各种标准都混杂在一起

① 参见《当代保加利亚社会的社会学结构》，索菲亚，1976年；B·多勃里扬诺夫著：《社会学结构和社会学系统》，载《社会学问题》，1976年第1期；M·明科夫著：《社会学结构及其运演》，载《社会学问题》，1978年，第1期等。

② 参见《当代保加利亚社会的社会学结构》，第7—8页；M·明科夫著：《社会学结构及其运演》，载《社会学问题》，1978年，第1期，第30页，等。另见《社会学认识。理论方法论问题》一书（1976年索菲亚出版）第二节，标题是“社会生物性生产”（第20页）。

③ 参见B·多勃里扬诺夫著：《社会学结构和社会学系统》，载《社会学问题》，1976年，第1期，第17页；M·明科夫著《社会学结构及其运演》，载《社会学问题》，1978年，第1期，第30页；《当代保加利亚社会的社会学结构》，第8页。

了。它在区分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时用的是一种标准，在区分生产、供应和管理范围时用的是另一种标准，在把社会关系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再把上层建筑区别为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时用的是第三种标准。语言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跟思维是不可分割的，跟人们的劳动和实践活动也是相对而存在的，然而，当它以出版、广播、电视这些形式出现时，则又是另一种现象。社会意识包括着精神交往，其中也包括借助群众性交际手段来进行的精神交往。教育属于精神范围，因此不能把它列于第二项，而应当把它归入第三项。虽然管理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人们的行动跟管理机构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它却被人为地跟精神生产归并在一起了。这一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承认这一类社会结构并非“社会学”结构一种，而是很多的，而且每一种结构都具有把它的以一定方式联结在一起的诸多要素区分开来的原则。^①

现在来谈谈第二类结构。上面已经说过，这一类结构跟前述的第一类结构是有原则区别的，因为这类结构的根本之处在于能够按照一定的特征，把社会区分为社会集团，而这些集团即是社会系统的要素。很明显，从社会中区分出来的各大集团，如这个或那个现代民族，若以这个特征而言，本身又具有一定的结构，因为这些集团既具有把它们结为集团的单一性，又具有在其内部区分出规模更小的集团的非单一性。在这类社会结构的层次中，每一种结构的“基石”都是个人，因为个人在这种关系中（按照这方面的特征）都属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及其较小的结构单元。这种说法并没有排除存在边缘阶层的可能性，相反，而是肯定了这一点。

①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M. H. 鲁特凯维奇著：《社会结构的分类》，载《社会学问题》，1978年，第6期。

这些结构可以叫做前面所说的那种狭义的社会结构，因为它们所包含的集团，子集团，乃至个人都应当从他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平等与否这一点来加以考察。要确定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首先得确定这样一点，就是从社会地位的总的特点来看，这些集团所包含的子集团和个人彼此是平等的，而在某些较为次要的方面，以同样的特征和标准来衡量，则是不平等的。这些特征和标准是对社会集团作出根本性区别的基础。换句话说，辩证法的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相互关系的观念完全适用于这个问题。

举例来说，要判断苏联的城乡差别，首先得找出城市居民区中居民生活条件的共同特点和农村生活条件的普遍特征。而城市又有不同的类型——从共和国的首都，巨大的工业、文化中心，到不大的城市型的工人新村。每一类城市既有一定的共性，又具有有别于其他类别的城市的不同之处。这种分类法最终得出的将是兼有共性和个性的某个城市或城市型的居民区，而这种个性正是它的居民生活条件所特有的。比如，别尔江斯克既具有中等城市的特色，又是一个工业、海港和疗养城市。

这一类社会结构有哪几种基本形式（类型）？首先就是阶级结构，或者叫做社会阶级结构。我们之所以把阶级结构叫做社会阶级结构，是想强调阶级结构总是归属于一种跟人们的社会地位平等与否有关的更为普遍的社会结构（见第四章）。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阶级结构无疑是一种决定性的主要结构，而阶级之间的关系则是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历史上交替出现的各个社会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核心。

列宁曾经提出，一部分社会成员所追求的东西跟另一部分成员所追求的常常是不合拍的，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从表面上看，一部历史很可能因为人们的追求和行动不同而显得混乱不堪，冲

突四起。“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仍然是社会阶级结构。下面集中讨论的也将是现阶段苏联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发展辩证法。

不过，我们在进行这种分析时不能不注意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一类结构中，社会阶级结构跟别的社会结构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阶级社会的产生时期，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核心是不断产生的各阶级的不平等状态，并且贯穿在整个社会关系的体系中。与此相类似，当社会主义社会向着更为平等的社会发展时，它的发展过程的关键之处即是消灭残留的社会阶级差别，而且也涉及到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从而又涉及到各种含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社会结构。那么，社会结构除了社会阶级结构外，还有哪几种主要类别呢？

(1) 社会地区结构，也即居民结构。在当代的情况下这种结构的核心即是城乡差别；(2) 职业技能结构。这种结构是由社会经济方面的劳动非单一性以及劳动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内容来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跟社会阶级结构紧密相关，跟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有着紧密的联系；(3) 社会人口结构。这种结构虽然建立在性别和年龄差异的基础上，但也是社会结构，因为男人和妇女，年青人和领养老金的人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至于这种结构跟社会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在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页。

上述各类人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是要专门加以研究的。

一般地说,民族—种族结构跟社会结构是有差别的。不过,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只要存在着民族(及种族)的不平等现象,这种结构跟社会阶级结构在很多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苏联人民是人们的一个新型的社会共同体和实现民族团结的共同体,而且这两个基本因素彼此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关于苏联居民的民族结构及其与社会结构的联系问题已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了。^①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想对各种社会结构及其变体作出全面的论述。不过仅从上述数项也足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这一类结构都具有共性,因为它们的根本之处都在于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把社会区分为集团,子集团,直至个人,它们都是社会结构,因为这些结构都关系到各个集团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这一类结构中最主要的一种,是社会阶级结构;以社会差别的性质而论,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和其他对抗社会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成熟社会主义阶段,逐步消除残余的社会阶级差别,对于消除居民、人口和职业技能结构中的这些差别来说,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纲领中所提出的关于“彻底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因而也将彻底消灭由这种划分所产生的一切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②的任务大体上已在苏联完成。

第 二 节

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苏联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以及社会关系的核心,即阶级关系,得到了根本的变革。这个变革共经历

① 关于苏联现阶段的民族结构跟社会阶级结构的联系问题请参阅《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当代经验和创造性的发展》,莫斯科,1978年,第70—8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1页。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历时二十年左右，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始于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消灭城乡剥削阶级的任务已告完成。由于实行了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小生产私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合作所有制。一个集体农民阶级就此产生。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30年代中期，在苏维埃政权下接受教育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已占这支队伍的大多数，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得到了改造，这样就形成了一支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工人阶级已是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级，它保持并巩固了自己的主导作用。

总之，社会主义基础在苏联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性质上崭新的、由劳动者的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构成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这种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新的阶级结构，目前在欧洲一些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已大体形成，虽然其中不少国家还不同比重地保留着个体小生产。

苏联在原有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过程，共进行了四十年（由于战争和部分国土被法西斯所侵占，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缓了）。目前，这个过程已使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首先是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要研究社会阶级结构完善和发展过程的辩证法，首先得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社会已经走完了一大段通向彻底消灭阶级的历史道路，并且由于剥削者已被铲除因而不是再有意义上的阶级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社会阶级差别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在成熟社会主义阶段，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依然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区别在于它们阶级构

成的基本特征都不同，从而决定了它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也不同。知识分子是一个在经济关系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社会集团，虽然它不具备一个阶级的全部特征，但是它也属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上列三大劳动者的社会集团本身又是由社会阶层和社会职业队伍构成的，这样后者又成为社会结构的“亚要素”。

一般地说，历史上是存在着其他一些类型的社会阶层的，它们由不同阶级的人物所构成。比如，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构成中就包括着阶级关系方面完全不同的成员。我们以为，“阶层”这个术语，不能因为社会分层理论家们在对它进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时，把它，即“阶层”，跟阶级对立起来运用而加以否定。如果照这种逻辑行事，那么“社会集团”这个术语也可置疑，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学也在“滥用”它。对于苏联的知识分子究竟能不能用“社会集团”这个术语来加以表述，也有人提出异议，譬如 M. X. 伊基特哈尼扬在1979年6月召开的新西伯利亚学术会议上就想这样作。

问题固然全在于概念的内涵，在于它被有机地纳入哪一个概念系统。但是，把“社会阶层”这个术语的含义定得比社会集团宽总是不对的，更不用说把它跟阶级这个基本概念相对立了。

“社会集团”概念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这样。社会集团并不是“小群体”。列宁在他著名的阶级定义中把阶级确定为“大的集团”，决不是偶然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详细讨论。

Л. И.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1977年5月全会上曾经指出：“各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步消失”。他所说的主要社会集团，就是指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在党的大量文件中，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著中，社会集团是作为一个含义比社会阶层更为广泛的概念来加以运用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由

社会阶层所构成。^①

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时仅仅被归结为把社会分成两个友好的阶级，而没有注意知识分子跟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区别，也是一种社会阶级差别。我们已经指出，采用社会阶级结构这个概念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把阶级结构从广义的社会结构中区分出来，另一方面则在于强调，不能把这种结构说成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分成两个阶级。

人们在研究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区别时，对于所应依据的标准，也各执一词，意见很不统一。在我们看来，列宁在1919年所提出的关于阶级的定义，应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这个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②

列宁的阶级定义是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问题的一个典范。这个定义的第一个部分，即关于按照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不同地位来区分阶级的论点，是对阶级的最根本、最一般的定义。诚然，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机体，都具有本形态所特有的阶级，这些阶级彼此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在该形态所固有的、决定其整个基础的经济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客观的经济关系人们多少是

① 由此可见，把“阶层”这个术语当作比“社会集团”更为一般的概念来加以运用是不很恰当的，例如“知识分子和职员阶层”这个概念就提得欠妥当（见《共产主义建设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莫斯科，1966年，第159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82—383页。

意识到的，这就决定了人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阶级关系。换句话说，经济基础方面的阶级差别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是得到反映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无理由说，列宁的阶级定义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定义，因而必须加以“充实”，指出不同阶级在政治、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特征方面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提出一个简短的定义时常常只限于阐释最为一般的东西。例如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的一封信中就说道：“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①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他指出的认识阶级的出发点。列宁在上面引述的那个阶级定义的第一部分中实际上是在转述马克思所说的意思，因为这个定义一开始就指出，各个阶级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不相同的。

在列宁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阶级”概念的定义。它们因分析的问题不同而不同，阐释概念的角度也不尽一致。然而，每当需要提出一个总的、根本性的定义时，列宁总是指出，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是不相同的，所谓社会生产结构，无非就是一定的生产（经济）关系体系，它们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7）这篇著作中在谈到马克思的理论时曾经说过：“‘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09页。

的发展。”^①不难看出，各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是形成它们其他各项特征的根源所在。

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这篇著作中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看作是在“整个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现实居民集团。^②在《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1902）一文中他指出：“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③这里特别要注意“因而”这个词，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从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产生的。但生产关系正象任何一个系统一样，也是由各种子系统组成的，这就是：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劳动的社会组织（活动交换），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分配。

列宁的这个阶级定义的第二个部分指出了阶级差别的三个相互联系的特征，即：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这几个特征跟生产关系体系的三大要素（子系统）是相一致的，因此这些特征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系统。

在分析阶级差别时，由于不能够只研究生产关系中的某一个因素，因此，对于上面列举的这几个阶级差别的特征，也不可把它们割裂开来只研究其中的一个。它们是一个具有层次关系的系统，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是阶级构成的主要特征，因为每个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获取收入的方式和多寡都是由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加以决定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简短的阶级定义中常常只指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89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95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3页。

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原因所在。然而，要是我们因为这个原因而置其他一些特征于不顾，那就不对了。不同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起着不同作用这一点，早在阶级产生时期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就已经出现了。劳动分工根本不是把劳动分为组织者工作和执行者工作这样两个部分。劳动有不同种类和不同形式之分，而这种区分首先是由人们不同的劳动性质予以决定的。

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劳动性质方面的差别跟人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是没有关系的，因而跟总的阶级差别也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比如，B.C.谢苗诺夫就这样说：“所以这个特征（是指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问题——著者）在列宁的阶级定义中，是跟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个特征的后面出现的，这说明制约这个特征的，恰恰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不是劳动的性质或劳动的社会分工。”^①这样一来，社会劳动组织跟劳动的社会分工就毫无联系了。然而，马克思却是把“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劳动组织”这两个概念当作一对相近的同义语来加以使用的。^②生产资料的掌握无疑决定着各个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可是，后者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个基础上的，因此不能够把它看作是对财富的支配。它是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恩格斯在分析阶级产生的过程时曾经指出，阶级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原始公社解体时劳动分工越来越深入而造成的。他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③

劳动有种类和方式之分，这是由社会经济方面也即劳动性质方面的差别予以规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劳动性质本身尽管不

① B.C.谢苗诺夫著：《苏联社会结构的发展辩证法》，莫斯科，1977年，第30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6页。

是阶级构成的特征，但在揭示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在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作用方面存在的差别，却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对于劳动分工，我们不仅在研究阶级结构时要加以注意，而且在探讨职业、技能区别时也必须予以重视，甚至在剖析居民点（城乡）差别和社会人口差别时在很多方面也应当把它考虑在内。

不考虑这一个因素，苏联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在现时代的区别就难以理解了。由于二者（除一小部分本人就是集体农庄庄员或从事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外）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方面的差别已经被消除，因此他们在劳动性质方面的区别，即以脑力劳动为主还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差别，就上升到首位（关于这两个概念所带的明显局限性，我们在下面再讨论）。然而，即便在这一种劳动分工中，劳动性质作为一个区分标准，它的作用也并不只限于上面所说的这一种。劳动有组织者工作和执行者工作、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技能等级上的区别）之分，这也是劳动性质方面的差异。

在党的各种文件中，当问题涉及到完善社会的社会结构时，关于“劳动性质”的概念，总被放到首要地位来加以考察。Л.И.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深入研究我们社会的发展趋势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关系到“在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性质和内容、社会结构的变化”^①。А.Н.柯西金在纪念十月革命六十一周年的报告中在谈到苏联工人阶级的情况时曾经说过：“他们极大多数是受过教育、掌握技术、政治上成熟的人。他们的劳动在性质上跟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已很接近。”^②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99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② 《真理报》，1978年11月5日（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人们的社会阶级差别是以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为基础的。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不分社会差别和职业、“工种”差别的那种观点作出某种让步。无疑要对社会阶级结构与职业结构作出区分。列宁曾经指出，把职业差别跟阶级差别混同起来是不对的。不过，在职业差别跟阶级差别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之所以紧密相关，是因为二者都是社会劳动分工系统中的不同“断面”和不同方面，只是阶级差别比之职业差别要深刻些。我们觉得，不管是把职业差别跟阶级差别混为一谈，还是把二者割裂开来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比如我们就无法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和农民在阶级构成的特征方面是有区别的，而知识分子仅仅在职业上才跟他们产生差别。知识分子跟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在劳动性质方面的差别是一种社会差别，而知识分子内部各职业队伍（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之间的差别，部分是社会差别（如平均劳动报酬的差别等），部分是职业差别，至于这些职业队伍在劳动内容方面的区别，则统统应当归之为职业差别。

第三，列宁的阶级定义的最后部分是在说明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实质。从辩证法上来说，差异包含着矛盾，而矛盾则有可能采取对抗的形式。就阶级关系而言，对抗就是一个阶级、一个社会集团占有其他一些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劳动。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阶级、社会集团对于另一些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剥削已经被消除，社会对抗也已消失，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有时却被用来当作证明上面这个阶级定义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的根据了。^①

① 如参见《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类，1973年，第5期，第83页；B. 杰. 凯勒、M. H. 科瓦利索著：《历史唯物主义教程》，莫斯科，1969年，第189页。

列宁的这个阶级定义之所以会发生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看来是因为它的几个部分被割裂开来加以看待了。在我们看来，这个定义所提出的确定阶级差别的一般标准，不但适用于阶级的产生时期，而且也适用于一个社会正在走向消灭阶级的时期。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具体情况还是要加以注意的，因为每一个历史阶段既有共性，也有它的个性，更何况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个建设阶段。

研究残余的社会差别，目的是为了探求消除这些差别的途径。我们这样来提出问题，是有一个理论前提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别和社会集团差别是建立在他们都是劳动者阶级和劳动者集团这一共性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残余的社会差别的范围和性质都受制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体系的成熟程度。社会关系体系的完善是以生产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为基础的，而随着社会关系体系的完善，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共性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到时候阶级差别的范围和作用也就日益缩小了。

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在上列每一个特征上都存在着差别。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却表明，当所有制形式的差别在某时某地被消除后，它在彼时彼地就不再是主要的区别性特征了。我们已经说过，苏联的脑力劳动者极大多数是在全民所有制部门工作的，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他们同工人大体上已没有区别，因为他们的劳动也是建立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是，单以这一事实还不足以得出结论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根本社会差别目前已被彻底消除，因而知识分子跟工人阶级的界限就不复存在了。劳动分工和劳动性质差别（这是社会差别，不是职业区别）决定着人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正是今天决定工人阶级和广义的知识分子所存在的差别的一个主要特征。

从劳动性质，因而也就是从人们在社会劳动分工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在国民经济部门工作的全体人员，可以分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两部分人。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通常被列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但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却不能归入一个单一的集团。根据劳动性质，他们可分为专家和非专家的职员。前一个集团包括从事复杂脑力劳动的人，他们的工作专业性很强，一般要求具有高等或中等专业教育的程度。当然，能以确定这个集团的主要特征倒不是毕业证书和教育程度本身，而是劳动性质，因为劳动性质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是跟人们所接受的专业训练相一致的。后一个集团是由职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由非专家的职员所组成的。他们也从事脑力劳动，不过这种劳动不太复杂，比较刻板，一般不需要具备中等专业教育程度，更不必具备高等教育水平（主要是管理部门的办事员、会计等等）。这种社会差别已为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学者所承认，并正在对它进行研究。^①

苏联的统计资料和科学著作越来越倾向于从广义的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的总和）内部区分出专家和职员这样两个阶层。^②然而，有些作者却认为，“阶层”这个概念只适用于知识分子的整体，决不可用这个术语来表述专家或职员。^③这种观点的根据是，一个社会统一体，这里是指知识分子的整体，是一个统一的

① L. 扎勃拉霍瓦著：《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结构问题》，布拉格，1976年，M. 阿纳兹、韦索洛夫斯基著：《二十世纪的社会结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华沙，1976年，第58页。知识分子和专家在这里是作为两个意义不同的概念来加以运用的。在匈牙利的某些著述中，知识分子仅被视为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专家。1978年7月在民主德国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家的学术讨论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知识分子”这个术语是具有双重意义的。

② 《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57页，《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21页等。

③ Ч.А. 斯捷潘尼扬著：《苏联的知识分子及其形成的基本途径》，载《哲学问题》，1979年，第1期，第54—55页。

社会集团，在它的内部似乎不可能再有阶层之分了。

“社会阶层”这个概念不仅能用来表示社会阶级结构的要素，也能用来表示它的次要成分，这足以反映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象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这样一个阶级特征，也是一个用来区分组成阶级和社会集团的那些阶层的重要标准。譬如，苏联的工人阶级常常被划分成三个主要阶层：非熟练和低熟练工人，中等熟练工人和高度熟练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被分为：无职业和技能的人员和有技能和职业的人员（如机械师、机器挤奶员等）。非专家职员集团被分成两个阶层：技能不高的工作人员（如门卫、记工员、收发员等）和具有中等技能的工作人员（如会计、出纳及部分售货员等）。那些担负专家职务，但缺乏相应文凭的“实际工作者”，则是一个边缘阶层。在狭义的知识分子内部，也即在专家内部，通常区分出三个阶层：技术员和其他具有中等专业教育程度的专家，工程师、医生、教师和其他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专家，另有一个阶层人数虽不多，但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却很大，而且他们的劳动最富有创造性，这就是科学界、技术界、文艺界和管理部门的高水平专家。^①

另外还有一个区分标准，它也着眼于劳动性质方面的区别，这就是组织者工作和执行者工作（后者既可指体力劳动，也可指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这个标准，还可以从知识分子内部区分出一部分长期担负组织工作的人员。他们是各企业、机关的领导人及其副职，各下属机构即车间、实验室、科室、大学教研室等部门的负责人。这一个阶层在社会劳动组织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总之，以集体农民为一方，以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另一方的残余社会差别的实质，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同形式决定

① 参见M.H.鲁特凯维奇著：《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莫斯科，1977年，第39—47页。

的。而工人阶级、农民、职员、专家以及阶级、社会集团内部的各个阶层所存在的残余社会差别（包括职业队伍之间存在的部分差别，但这是另一个特殊问题）的实质，则主要是由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来决定的。

收入形式或收入数额的差别取决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不同的劳动性质，从而也取决于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不同作用。集体所有制会造成劳动报酬的大幅度波动，因此集体农庄庄员在所在农庄集体经济中取得的报酬有可能超过或低于国营农场从事同等工种的人员的工资。不过，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集体农庄的劳动报酬还是低于国营农场的。1960年集体农庄庄员从集体经济中取得的月平均收入是国营农场工人收入的53%，1976年则为77.3%。^①

苏联的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正在彼此接近，它们的区别也在逐渐消失，这个过程是在国家不断实行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样就使社会结构的发展带上了一些根本特点。由于劳动者及其子女经常大量地从一个集团转入另一个集团，不断发生着社会流动，因此社会结构的基本成分的比重不断在发生变化。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俄罗斯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并没有占多数（看来，经济不发达或不很发达的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国和许多兄弟国家的发展史表明，只要有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工人阶级是能够凭借自己的经济作用和政治组织性，率领劳动人民的基本群众前进的。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发展工业，从而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使他们变成劳动人民的大多数，这些根本性任务已经先后在苏联和其他一系列社会主

① 参见《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350、370、472页；《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9页。（比例是作者计算的。）

义国家中得到了解决。

苏联奠定社会主义基础后的四十年来，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基本社会集团，依然是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可是居民的阶级构成在比例上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果说1939年的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还只占全国人口的33.5%，那么到1978年就已经占61.8%了，并且早从50年代起，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内人数最多的一个社会集团，而目前不仅在城市中是这样，在农村中也是这样了。1939年，职员（指履历表上的职员，即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任职的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6.7%，1978年则已占23.1%了。这表明，脑力劳动者的人数不但绝对地增加了，而且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大大提高了，再者，这支队伍中具有高等或中等专业教育程度的专家战前还只占三分之一，而目前则已经接近三分之二了。

集体农民和合作社手工业者1939年占全国人口的47.2%，1978年只占15.1%。这部分劳动群众的人口比重之所以会大大降低，首先是因为全国实行了工业化，城市的数目在增加。不过，有一个因素也得注意，就是工业劳动组合战后都被改造成国营企业了，一部分集体农庄也变成了国营农场。另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对小生产者阶级进行彻底的“冲刷”。1939年个体农民和非合作手工业者占全国人口的2.6%（1940年西部的几个州和共和国得到解放后，这个数字大大增加了），1959年降到0.3%，目前所存无几，已经难以在统计手册中加以表示了。^①

对统计资料进行社会学分析，必须注意下面一个问题。在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中“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统计部门是把他们列在工人范围之内的。这种做法总的说来还是对头的，不过要作两点修改。第一，把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工人阶级

^① 参见《1978年苏联国民经济》，第9页。

之内不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这个术语在我们看来不见得很妥当，尤其是当它运用于操纵复杂技术设备的工人时。关于这两点下面再详细讨论。

“职员”这个范畴在统计学中是有不同含义的。在填写履历、进行人口调查或其他调查时，职员是指在国营企业或国家机关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工业统计学中，职员则是指不属于工程技术人员编制的全部脑力劳动者（如财会人员、文书、厂医等）。我们认为，应当从社会关系出发，根据不同的劳动性质，把“履历表上的”职员分为专家和非专家职员两类。

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已占多数这一点，对于进一步发挥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作为一支主导力量的作用，虽然不是唯一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认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成熟社会主义阶段，虽然都有它的个性，但也有共性，这就是工人阶级正成为人数最多的一个社会集团。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就已获得了人数上的优势，这对于他们获取政权是一个先决条件。

80年代社会结构中的数量比例变化看来有这样一个基本趋势：工人阶级的绝对人数在继续增长，虽然自70年代起它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集体农庄庄员的数目跟整个农业人口的情况一样，将进一步降低。非专家职员的人数在60年代稍有增加，但自70年代初起已趋于稳定，并且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已开始缩小。这个过程将继续下去。专家人数增长最快，这是符合科学技术进步、文化和保健事业发展的需要的。1961年在国民经济部门工作的专家是880万，1979年初已上升到2,640万，整整增加了两倍。^①

由于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队

^① 参见《1978年苏联国民经济》，第187页。

伍在不断扩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劳动者将都是工人或知识分子，原因在于随着社会集团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社会系统的每一个要素都在发生质的变化，它们彼此间的界限将加速消失，在工人阶级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联盟也将进一步巩固起来。

在确定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关系时，目前还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因素，就是有相当数量的专家是在工人的职位上从事生产劳动的，因此他们也被列于工人阶级的范围之内。据我们初步测定，这一类人员在1975年就有170万之多。^①这些人员已经把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有机地结合在自己的活动中了。从他们身上尤其能清楚地看到，在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严格划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办法正在过时。

“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这两个概念是不大明确的，这一点在分析新型的生产者并把他们归入某一社会集团时尤其能感觉到。一个在自动线上操作的调试工（他们一般都具有技术员的毕业证书）所花的精力，95%是智能（神经能），只有5%才是体力（肌肉）活动，然而他们的劳动却是工人的生产劳动，因为他们也是以自己的活动来变更劳动对象的。通过计算体力和脑力消耗的比值来确定劳动的性质，会使人们有理由不把上述的调试工列为工人阶级的一员，那只会搞乱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差别问题（关于这一点下面第三节中要讲到）。

上面我们描述了有关当代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概况，对此还要作几点补充。残余的个体小生产者目前还存在，苏联1977年的宪法（第十七条）也肯定了这一点。苏联的知识分子，除职员（就履历登记而言）和从事脑力劳动的集体农庄成员外，还包括

^① 参见《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莫斯科，1976年，第67页。

自由职业者。所谓自由职业者，在苏联目前是指各创作协会的会员（作家、美术家、作曲家、电影工作者、新闻记者）、各律师公会不属国家机关编制的会员以及靠个人执业谋生的少数医生和教育工作者等。有些因为健康状况或其他原因而无法操持家务的人还雇请了保姆或佣工，后者的情况就比较特殊。另外，苏联也存在着各种宗教的神职人员。

对于这些职业繁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按照人口普查登记中有独立收入的居民总数跟统计表中所载的“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这三类人员的总额所产生的差额，大体上核算出他们的总数。根据197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这个差额是36.5万（占0.32%），这个数目比实际人数要多一些，因为有些未载明本人社会地位的人也被包括进去了。

最后还得注意这样一点，就是有一部分劳动年龄的人仅在从事私人副业经济的劳动。这类人员的数目正在迅速减少。根据1959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其总数为980万人，据1970年统计，他们已降至180万人。但这并不表明，化于私人副业经济的劳动已减少了五分之四。因为这种劳动现在更多的是由退休职工、学生以及家庭中在公有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员来进行。从事这种劳动的人1970年是590万（全年平均计算），1977年是370万^①。

这一类劳动群众的社会身分或决定于户主的身分，或决定于在公有经济部门任职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身分，或者，如果一个家庭的全部成员都是养老金领取者，仍保持原有的社会身分，从而有权使用宅边自留地。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剖析社会阶级结构的主要发展趋势时，并没有研究这一类有劳动力的居民。可

① 参见《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结果》，莫斯科，1973年，第5卷，第26、27页；《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61年，第520页；《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294页。

是，我们在分析消除城乡社会差别的途径时，却必须考虑到这一类人，因为从事个人副业经济乃是城乡社会差别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苏联社会各阶级、各社会集团相互接近的基本方向是出自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阶级差别的实质。我们在分析列宁的阶级定义及其三大组成部分（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领取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时，对于消除上列种种社会差别的问题，也必须根据这几项社会经济特征来加以研究。

第一，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方面劳动者的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正在进一步接近起来。这首先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正在通过完善二者的相互关系而日渐接近。

目前，当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正在加速接近的时候，必须越来越注意把个人、集体、全民这三者的利益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不论集体农庄还是国营企业都要更加充分地发挥集体利益的作用，也就是说，应使企业、车间、小组这一些集体更加关心提高生产效率、增长劳动生产率、节约材料并加强劳动纪律。

近年来，跨农庄企业和国家集体农庄联办企业，如畜牧综合体、建筑机构、农业原料加工厂以及农工综合体所属的其他企业等，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对于阶级和社会集团的相互接近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些企业的总数截止1978年底已超过8,600个。由于跨单位机构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一个新的边缘职工阶层。这类职工的人数，仅摩尔达维亚一个加盟共和国，1977年就已超过12.5万人。^①随着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产品交换和产品分配的差别正在逐步被消除，集体农民跟工

^① 参见《真理报》，1977年7月26日。

人阶级，首先是跟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上最为接近的国营农场工人，正在一步步接近起来。

第二，劳动者的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在劳动性质方面，从而也就是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方面，也在彼此接近。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生产领域中劳动智力化的前进步伐。科学一经变为劳动者的技术、工艺和知识后，它就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这一点反映在整个社会中脑力劳动者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在不断增加，反映在生产领域中，也反映在体力劳动的智力化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掌握并运用复杂的技术，脑力劳动的技术化，正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这一点在工厂的科研部门、试验性生产和技术科研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总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进步决定着工人跟工程技术人员、体力劳动者跟脑力劳动者相互接近过程的辩证法性质。在这个接近过程中已经存在着融合的因素。不过，这个过程很长。列宁预见到这一点，他说，“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以前”，专家和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①。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集团及其内在的各个社会阶层在分配方面彼此在相互接近。

苏联的集体农庄庄员跟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社会集团在收入方式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集体农庄的劳动报酬，比之国营农业企业，要更加依赖于农业年度的结算情况和庄员会议的决议。不过，集体农庄已经制定了每月最低现金收入的下限并采取了社会保障措施，这对于集体农庄庄员跟国营农场职工在劳动报酬方面的相互接近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种差别的第二个方面在于集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64页。

体农庄的平均收入水平目前还低于国营农场，而整个农村又低于城市。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劳动的技能水平还比较低，目前这种差别正在逐步被消除。但我们还应看到私人副业收入这个因素。1977年，集体农庄庄员这种平均收入占家庭支出的24.9%，而在工业工人家庭中它只占全家支出的0.8%。^①这样就部分地填补了城乡社会经济实际收入的差距。这一种差别还涉及到收入的获取方式问题：私人副业经济的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需要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也交付出售，就是说，这部分产品已变成了商品。1977年，这部分商品占全国农业商品产量的10%。

必须指出，目前在收入水平上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比之每一个集团内部所存在的差别要小一些。按规定，最低月工资是70卢布。但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技术最熟练的集团所得的收入却数倍于这个数目。高等学校刚毕业的专家所得的“起点”工资同高级专家（如高等学校或科研单位的博士）的待遇相比，差距也不小。不同技术级别的职工在劳动报酬方面之所以如此“参差不齐”，是因为劳动中存在着社会经济的非单一性。处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刺激生产劳动，必须用物质来促使每个职工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自己的技能而努力。

应当指出，我们公民在物质福利方面的实际差别跟他们的工资差别相比，差距要小得多；原因在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是分配的方向是朝着社会平等发展的，也即加速增长社会消费基金。1975年这类基金的金額是900多亿卢布。到1978年已达1,055亿卢布。依靠这一些基金，实际上完全可以满足教育和保健事业发展所需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可满足住宅建设和文化设施发展的需要，另外还可用来提供儿童保

^① 参见《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409、410页。

育津贴，特别是向多子女家庭提供津贴等等。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人和职员平均工资增加了20%，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提高了25%，而社会消费基金项下的支付和优惠却增长了40%。^①可以预料，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工资增长的速度。在1976—1980年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计划增加16—18%，而社会消费基金中的支付和优惠则将提高28—30%^②。

总之，从社会经济差别的这三项相互联系的特征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单一性正在发展，各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在相互接近，它们的界限也在逐渐消失。关于这个过程的辩证关系我们留在下面再探讨。

第 三 节

向社会单一性发展的辩证法

现实世界的种种现象是相互联系的，从这个角度也即从系统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发展过程，是辩证法的一项最根本的要求。这个要求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把阶级和社会集团的相互接近跟组成这些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各社会阶层的相互接近，也即跟系统的每一个要素所发生的内在变化，紧密地联系起来加以看待。

这一点在现时代尤其要加以注意，因为在成熟社会主义阶段，社会关系体系已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社会阶级领域内，各基本社会集团的相互接近，已越来越紧密地跟它们内在的，也即各社会阶层和职业队伍这些组成部分的社会差别正在被消除这一点交织在一起了。换句话说，社会单一性的增长趋势不但见诸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146、53页。

② 同上书，第154页。

J关系中，而且还存在于阶级内部关系及整个社会阶
系中。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工人阶级是如何因为本阶级的进一步团结，各阶层、各队伍彼此间的社会差别被消除，而与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步步接近起来的。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工人阶级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才能搞清社会阶级结构发展总趋势的实质所在。

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单一性在两个方面在日渐增长。第一，在社会生产各大部门工作的各支工人队伍的社会差别在不断消除；第二，工人阶级中由劳动的社会经济非单一性导致产生的各种不同熟练程度的阶层的差别也在逐渐被消除。随着农业劳动的工业化，工人阶级的农业队伍与其工业核心力量所存在的社会差别正在逐渐消失，这跟工人阶级与集体农民的接近是密不可分的。工人阶级中有一支队伍是在服务部门工作的，他们的人数已大大增加，而且还在日益扩大，工人阶级跟职员接近直接关系到与这支队伍的接近。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首先是同生产部门的知识分子的相互接近，跟工人阶级各技能阶层的相互接近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熟练程度较高的工人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这一点，是同时发生的。

社会差别的消失，社会集团及其内在的社会阶层的相互接近，是在劳动者的物质、文化水平、教育程度和专业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系统的不断变动加速了整个社会在取得社会进步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整体化的进程。举例来说，工人阶级社会单一性的增长并不是通过“拉平”工人阶级各个阶层和各支队伍现有的技能水平、教育和文化程度来实现的，而是这些社会指标得到全面提高而产生的结果。如果说战前在1,000名工人中只有34人具有不完全中学（七一八

年制)或者更高一点的教育程度的话,那么到1977年,具有这种教育程度的工人,在1,000名之中就有732人了,^①而且绝大部分青年工人又都是具有完全中学(十一一年制)的教育程度的。

近数十年来,苏联工人阶级的人数增加得很快。这种状况有利于巩固工人阶级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主导作用,也有利于提高整个苏联的文化技术水平。但是,数量上的急剧增长不免会对质量的提高产生某种抑制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苏联工人阶级的社会来源主要是集体农民,而后者无论就普遍教育、文化程度,还是就职业训练水平来说,都难以与工人阶级相比拟。不过,近年来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已在减弱,因为工农青年和城乡青年在走上工作岗位时,他们的教育、文化水平已是很接近的了,再者,工人阶级的接班人目前已越来越广泛地,甚至整个地从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或城市居民中来吸收了。

工人阶级在国民经济不同部门工作的各支队伍是存在着差别的,造成这种差别的直接原因是各个部门原有的技术装备既有优劣之分,又未彻底解决。每个劳动者与全民所有制的关系大致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是以不同方式,首先是通过每个职工所在的劳动集体表现出来的。每一个企业集体都能从社会上取得一定份额的生产基金供自己支配使用,每个集体的人均固定基金所具有的价值及其使用质量,则决定着客观上对工人技能要求、劳动生产率和工人所付出的劳动量。如果某个工厂技术装备陈旧,仍以手工操作为主,不需要很高的技能,那么这个工厂的工人跟那些以最新技术装备而成,要求多数人具有高度技能方能掌握的自动化企业的工人相比较,处境就欠佳了。一般地说,技术装备越先进,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对工人的技能要求就越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各个工业部门拥有的人均基金是大

^① 参见《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57页。

有出入的，这样就影响到各个部门的工资数额，而本部门各企业之间的差别又加大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差别。此外，同工种、同技术级别的额定工资同样存在着差距。如苏联部属大型重型机器制造企业四级钳工的额定工资就高于地方小型机器制造企业中同级工人的工资。

技术进步和劳动日趋社会化这两个彼此相关的重要因素，对于工人阶级各部门队伍的社会接近，是有决定性作用的。随着生产集中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各企业的固定基金在不断增加，并且因技术进步而在发生质的变化。

工人阶级的核心过去是，现在依旧是各工业、建筑、交通运输部门的城市产业工人，而其中首先是各大工业企业的工人。产业工人的人数在全面增长。增加速度最快的要数电子、仪器制造、机床制造、化工这一些最先进的工业部门以及其他深受科学技术革命影响的部门。人数增加得最多的，则是从事科学实验的生产单位。

生产和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建立经济联合公司能使被联合的企业得到专业化和合作化，并能加强生产与科学的联系，这样就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联合公司的产生和发展跟生产集中化过程一样，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它能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因为那些劳动组织和技术设备水平一般都比较低的小企业均被吸收入大的企业。比如说，在机器制造业中，近2,000人的企业所发生的工人流动率是28.7%，而5,0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流动率则下降至15%^①。

在工人阶级内部，社会差别最大的，要算工业和农业这两支队伍了。他们的差别是城乡社会差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两支队伍的 skill 水平目前还有明显的差别，这一点直接表现在二者

① 参见《工业部门工人干部的流动情况》莫斯科，1973年，第132页。

的分配上：1977年工业部门的工人从公有经济中得到的月平均工资是171.8卢布（社会消费基金不计），而农业工人所得的则是131.6卢布。^①我们已经指出，在收入方面，二者的实际差别还要小一些，因为居住在农村的工人是有私人副业收入的。可见，工人阶级农业队伍的特点是由他们跟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取得收入的不同方式，也就是说，是由他们在社会阶级差别方面各个根本不同点所造成的。

农业生产的技术化和正在推行的集中化和专业化使工人阶级的农业队伍跟工业核心力量缩小了相互间的差距。技术进步直接影响着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工人的职业技能构成，进而又影响到农业工人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也即影响到他们的内在阶级结构。目前，在国营农场的工人中，机械师、机修工、机械化畜牧场和家禽饲养场的职工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各国营农场、林业局和土壤改良队在生产中都已采用了现代技术，这就使工人的田间操作、林区作业和饲养场工作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成为工业劳动的一种变种，它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劳动纪律是不亚于工业企业的要求的。

集体农庄的农业生产也在进行工业化。战前，从事手工劳动或畜力手工劳动、没有受过职业训练、也不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员曾是集体农庄庄员的大多数，而今天，这类人员已左右不了集体农庄的生产面貌了。农田耕作的主要环节已经实行了机械化。农机人员已是工业劳动中迅速壮大的一支队伍。从这支队伍的技能、职业训练、文化技术水平和劳动收入的平均指数来看，他们跟工业生产部门工人的差别已变得越来越小了。

当前，在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一个社会整体化的进程，但情况有所不同。商业、饮食业和公用事业的各类职工跟工人现在已没

^① 参见《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385页。

有重大的差别。如果不是苏联中央统计局早已把营业员统统划归职员的话，今天是可以把这些人列入工人范围之内的。我们稍加注意即可发现，这个职业集团的成员是多种多样的。营业员中有几类职工跟辅助工差别不大，但商品学家式的营业员却在日益增多，他们为顾客出谋献策，帮助选购诸如书籍、无线电设备之类的东西。商业单位和其他服务性行业也在实行劳动机械化并采用自动装置，这就使这里的一部分职工跟产业工人接近了起来，使另一部分职工逐渐向专家靠拢。

服务业生产的集中化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1977年商业、饮食业和服务性行业的每个基层劳动集体的平均人数是9.7人。^①这种分散性大大影响了劳动的组织工作和对职工的教育。保留一部分小的商业“点”、接待站和作坊是需要的。然而，决定生活服务业的前途的，决定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合理使用劳动力资源的，却是不断建立起来的大型化学干洗车间、蒸气洗衣托拉斯、饮食公司和超级市场等等。在这里劳动集体的合并扩大是跟采用技术设备，改变劳动性质和组织方法同时进行的。所有这一切都将使这个部门的职工跟工业系统的工人和专家进一步接近起来。

工人阶级中按熟练程度、劳动收入划分的各社会阶层消除差别的过程也具有不小的社会意义。这里特别要注意这个过程两端的发展情况。一端的情况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差别正在被消除，从而使工人阶级内部继续发生种种变化。早在60年代初，有些社会学著作就已指出，^②一个工人知识分子的边缘阶层已经出现，他们兼备二者的特点，但无疑属于工人阶级之列。从那时起，这类人员翻了几番，有关概念也为党的领导人和马克

① 参见《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449、481页（数字是我们计算的——作者注）。

② 参见《提高苏联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莫斯科，1961年，第11页等。

思主义社会科学的许多知名人物所接受。^①

这里所说的工人阶层，是指这样一些工人，他们具有高度技能，受过完全中等教育或中等专业教育，有的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工作是运用科学技术知识来操纵复杂的机器和安装调试各种设备。据1970年统计，具有中等专业教育、大学肄业或大学毕业程度的人员在炉前工和炼钢工中占9.8%，在调试工中占16.6%，在石油、天然气开采部门的操作工中占8.4%，在化学器械工中占9.7%。^②1973年石油加工工业系统有44%的专家被安置在工人的职位上工作。^③

我们已经强调说过，教育程度本身并不是阶级构成的标志。用来确定一个工人属于这个或那个阶层的标准，是他担负的劳动的性质，当然，这对于教育程度和职业训练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因此，教育程度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助性标准来加以使用。在我们看来，我们不仅要把担当工人职务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列入工人阶级的这个阶层，而且也要把那些具有完全中学毕业程度、在训练班和实际工作中已经取得一定技术知识并在担负相应性质工作的工人列归这个阶层。

但是，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技术员或工程师学非所用，也就是说，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难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各企业合理地使用工程技术人员确实是必需的。但有些作者却认为，把技术人员安排在工人的职位上是根本不允许的。^④

① 参见B. B. 谢尔宾斯基著：《苏共二十五大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造就新人的任务》，莫斯科，1977年，第34页；II. 费多谢耶夫著：《苏联新宪法与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载《共产党人》，1978年，第2期，第60页等。

② 参见《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结果》，莫斯科，1972年，第4卷，第620—622页（比例数是我们计算的——作者注）。

③ 参见《统计学通讯》，1974年，第7期，第93—95页。

④ 参见П. А. 库拉金著：《劳动力资源和培养问题》，莫斯科，1974年，第11—15页。

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很不恰当。对工程技术人员安排不当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不足以抹煞这样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某时某地因使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的需要而把技术员，有时甚至把工程师安排在工人职位上的情况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科学技术革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掌握技术设备的人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Л.И.勃列日涅夫在谈到“知识分子工人”时曾经说过，他们的人数“已千千万万，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我们离共产主义越近，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就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现在，工人们也时常在操纵这样一些成套设备，这些设备规模之大，性能之复杂，过去连工程师也不是每个人都对付得了的”^①。

工人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应被看作是未来历史中将会出现的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融为一体的先声。这一类工人已经在自己的活动中把需要专门技能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把创造物质财富跟积极参加技术革新、社会活动、增加精神财富这几个方面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

另一端的情况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非熟练和低熟练的工人阶层正在慢慢地消失。在工人阶级中，这个阶层的比重在不断缩小，然而他们的绝对人数目前却没有减少。如何把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技能低的阶层提高到那些训练有素的职工的水平，依然是一个很紧迫的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参见第四章）。

总之，工人阶级各个阶层、各支队伍逐步接近，它的社会单一性的增长，是在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而这个过程又是另一个更为普遍的过程的组成部分：整个社会的社会单一性在增强，工人阶级跟其他劳动者在一步步接

^① Л.И.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第4卷，第223页。

近起来。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单一性程度也各自在提高。凡此种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关系体系的质变同时表现为一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一个系统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质变。

量变转为质变，从而使旧的性质状态变为新的性质状态，是辩证法的一条普遍规律。这个规律对于认识社会单一性的形成过程，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必须重视社会关系变化过程和历史时期的两方面的特点。

苏联通过革命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改造即是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质的变革，并消除其对抗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向着无阶级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种质变，不过这种质变的类型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跃进的。辩证法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可把质的区别（它们或产生于质变过程中，或在这个过程中被消除）看得很“一般”，而是必须从有关发展过程的实质出发。质的区别是根本的区别，它们跟本质一样，也有序列、“等级”、“规模”和程度的差别。^①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的性质差别是同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两大阶段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深刻度、序列和范围是有别于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差异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共同的本质，而且这种本质的深刻程度比之它们的相异之处要大得多。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是渐进的，因而社会结构的质变也具有渐进性，决定这一性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这是这一类质变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包括社会阶级结构在内的整个（广义的）社会结构，是在发生性质变化的。按照列宁的

^① 参见M. H. 鲁特凯维奇著：《辩证唯物主义》，莫斯科，1973年，第415—417页。

观点，这个过程的主要特点就在于“消灭阶级”，也即铲除社会阶级结构，使之化为乌有。至于前面提及的其他一些类别的社会结构，如职业结构、居民点结构、人口结构等等，则将继续存在，不过它们的形式将发生根本变化。由此可见，这里所讨论的质变是指消除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然而是很重要的一个“断面”，直到它彻底消失为止。

第三个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及其所包含的各阶层和各支队伍是具有相同的本质的，因为它们的人员所从事的劳动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上。他们都参与社会主义的劳动分工，都在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按劳取酬，他们不剥削别的阶级、集团、阶层和队伍，本身也不受剥削。但是，除了共性外，他们也有着种种差别，而这些差别在当代的情况下即是最根本的差别。

把社会主义社会还具有阶级属性的社会结构改变成共产主义社会无阶级的社会结构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同时消除各友好阶级、友好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主要差别。这个思想一般能用这样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当一个社会系统从一种性质状态转化为另一种性质状态时，这个系统诸要素的质的差别将在这一过程中被消除。

现在来讨论一下辩证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以我们探讨的领域而言，这个规律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即是整体化和分化在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统一性的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如果说在以往的历史中分化的趋势首先表现为社会解体或若干对抗阶级的话，那么，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把社会分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现象，就已经在被消灭了。社会趋于统一，变成劳动者的社会，这种整体化趋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体

现。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社会学是把社会当作“一般的”社会系统来加以看待的,因而整体化和分化这两种趋势也就毫无历史阶段区别可言了。早在19世纪末,列宁在批判 H. 司徒卢威时就已指出:“分化”、“多样化”等等概念本身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看把它用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①然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此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②涂尔干所持的关于日益扩大的劳动分工导致产生“有机的社会连带性”,从而取代“机械的社会连带性”的思想,^③已为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各种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所继承。

这些理论从“平衡论”出发,把社会整体化说成是一种手段,借以达到跟“环境”也即跟别的集团和社会的平衡,它们对待社会的态度是很抽象的,其表现就是抹煞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实际区别,或者毫不掩饰地坚持二者的“趋同”。即使在未来论理的观点中,它们也宣称社会分化和整体化将产生新的形式,而后者即是“后工业”社会的共同形式。譬如 A. 托夫勒就断言说:“超级工业革命……更能说是一种推动力,它促使人类社会走向另一个更为高级的分化阶段,这就象生理学上的生长过程一样。鉴于这个原因,旧的社会整体化手段就变得过时了”^④。新的分化形式和新的整体化手段确实在出现,然而,它们首先关系到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而这一点却是 A. 托夫勒所不愿看到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整体化进程是具有双向性的。从一个方面来看,社会系统各个部分和要素,也即各阶级和社会集团,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90页。

② 参见③,涂尔干著:《社会劳动的分工问题》,第150页等。

③ A. 托夫勒著:《未来的震荡》,纽约,1970年,第265页。

具有越来越多的共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阶级差别在逐步消失，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在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等方面也在一步步接近起来。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单一性在日渐增长。本章第二节已经对这个过程作过概述。

从另一方面来说，整体化即是改变社会系统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并加强其联系，从而使社会管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社会中不论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因经济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利益，对于这种利害关系他们或多或少是意识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客观地位相互在接近，这种接近即是他们的利益接近及其统一性因而也就是社会统一性的加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阶级结构的整体化发展过程虽然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分化过程将化为乌有。分化和整体化的相互联系，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劳动分工以其本身的属性而言，不但是社会的经济分工，而且还是职业技术上的分工。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技术和文化进步不断地引起劳动社会分工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因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劳动者受资本剥削的加重，在居民中不断产生脱离劳动的阶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人参加劳动，加上私有制关系造成的诸多阶层已被肃清，因此劳动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工的联系就表现得比较明显。我们反复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是有社会阶级分工的，造成这种分工的原因，不仅在于所有制形式尚有区别，而且还在于劳动的社会组织也存在着种种差异，再者劳动本身又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组织者工作和执行者工作、需要专门技能和不需要专门技能之分。这一些差别的被消除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单一性的增长。然而，劳动分工并不局限于把

它分为这样几个大类。我们只消从劳动的种类转而看一看它的方式，即可发现一个极其复杂并在不断变化的职业技能差别系统。这就是职业集团、职业、专业和专业化方面的差别，而其中每一项职业对于职工的技能又有高低不同的要求，甚至对个人也有不同的要求，这种个人差别作用也不小，特别是在某些最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如果我们置所有制形式的差别于不顾，那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工的联系，看成是一般和个别的联系。社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是各个职业集团的总和，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个社会集团的劳动性质就具有共性，而这种共性则是通过个性，也即通过每种职业性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举例来说，知识分子（狭义的，即专家）有一个共同的区别性特征，就是都从事需要专门技能的脑力劳动，而这种劳动则表现为它的各支队伍的特殊劳动，如工程师、教师、医生等的劳动，而在这每一支队伍中，它又表现成比如冶金工程师、数学教师或耳鼻喉科医生的劳动。劳动性质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工人阶级和职员（非专家）社会集团的结构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在劳动的社会阶级分工领域内，整体化过程的表现，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两大社会集团的接近与其包含的各层次的技能水平因劳动渐趋复杂而归于一体，是不需要技能或对技能要求不高的工种的逐步消失，是执行者工作和组织者工作的相互接近。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的职业分工行将消失。其实在劳动的职业分工中，也是能看到整体化和分化两种趋向的互相作用，而且后一种还是目前的主要趋势。

从一个方面来说，由于社会领域中存在着整体化趋向，尤其是因为劳动者的普通教育程度在提高，加上不需要技能的工种又在消失，因此劳动的职业分工是有整体化这种倾向的，不过有些

作者却没有发现这一点。^①这种倾向的明显表现是：大部分工人的普通教育程度和专业训练水平在提高，各行各业的工人都在掌握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学习查看图纸等，随着技术进步一道前进。近几十年来，在高级专家的培养工作中也有着类似的现象。高等学校在工程师的培养工作中普遍加强了普通技术和物理数学教学，以便学生今后进行专业上的再学习，适应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也便于他们从某个生产部门转向新的技术基地。

从另一方面来说，科学在不断发展，科学信息也在大量增加，这就势必要求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在范围较窄的科学领域内实行专业化。科学知识的分化和科学工作者的分工，跟技术设备和管理这些设备的实际技能的分化和专门化是密不可分的，因而跟各个应用领域的职业分工也有紧密的联系。

职业、专业和专长的分化以及个别职工的劳动活动的分工之所以日益发展，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社会的整体化在两个方面在不断增强。

第一，社会是一个整体，它不停地综合和整合着各行各业和个人的劳动，同时，人们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就越是需要把他们的活动组织在一起。第二，在劳动性质方面也在产生表现为相互接近的整体化过程，因为每一种劳动所包含的共同基础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可见，消除社会阶级差别和社会分化现象并不意味着职业、专业和个性分化现象的消失。相反，每一个公民的个性发展得越全面，就越是需要充分地表现出个人的才能和建立在日益扩大的社会平等基础上的个人差异。

社会集团是社会系统的要素，它们的共性在日渐扩大，这就为平衡它们的经济利益，增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方面的统

① 参见И. А. 斯捷潘尼扬著：《苏联的知识分子及其形成的基本途径》，载《哲学问题》，1979年，第1期。

一性奠定了基础。整体化过程的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

社会主义社会跟资产阶级社会在这方面是有根本区别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点在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则在于各个阶级在生产系统中所处的地位足以使一个阶级占有其他阶级的劳动。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掌握基本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同失去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工人阶级的矛盾。只有消灭资产阶级和别的剥削阶级，这个矛盾方能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是绝对相符的，也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已没有利害关系因而不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说，在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问题上，城乡居民的利害关系就很错综复杂。在提高工资定额时，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免不了损及其他劳动者的利益，在集体农庄市场的产品价格问题上（这类市场的价格一般均高于国营商业企业的价格）卖方的利益，即集体农庄和出售某些私人副业产品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跟买方即城市工人和职员利益也会发生冲突。

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但矛盾将继续存在。^①所谓非对抗性矛盾，就是指在社会关系领域中，当人们共同的根本利益超过了他们不同利益时所发生的矛盾，它与对抗性矛盾的区别在于后者是超越共同利益的。

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各劳动者阶级的共同利益获得了坚实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这种统一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因为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客观地位因而也就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彼此在一步步接近起来，这样就缩小了它们有可能发生矛盾的领域。共产党和社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57页。

社会主义国家是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的，因此它们在制定政策时总能考虑到各社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并根据它们共同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一一加以解决。苏共二十四大指出：“如果党的政策既能正确地考虑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又能正确地反映出各组成部分即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并把它们引向同一个方向，那么它就能带来所需的结果。”①

在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国家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得到了扩大。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发展成了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这三者的联盟，并构成了当前苏联的社会基础。与此相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转变成仍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全民国家。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整体化过程，是不以人们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过程的基础，涉及到政治和思想领域，并且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主观因素对客观过程发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把它从一个自发产生的过程变成一个可以根据人们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持的认识来加以规划和管理的过程。

成熟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越来越有计划性，这也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一个普遍规律的表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由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和科学这三者承担的自觉因素和有计划因素在不断地增长。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发展问题，其中也包括改变社会阶级、职业、人口、居民点等结构的问题，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规划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了。

Л.М.勃列日涅夫把发达社会主义描述成这样一个阶段，即它是“新社会的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切社会关系都以社会主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72页。

义内部所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在加以改造。”^①发达社会主义的各种区别性特征，如社会系统的本质上的整体性和可变性、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在统一性等等，全部是向着无阶级社会发展的那种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

苏联的社会学学者虽然在方法论上有着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上述过程十分复杂，涉及面又多，因此人们对社会差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消除这一点，评价是不很一致的。在最近十至十五年中，社会学界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少问题的解决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这方面也明显地暴露出两个很危险的倾向。

第一，对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所出现的那些足以证明社会集团在不断接近的各种新现象每每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著作在描述社会结构时很不注意成熟社会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一些客观变化过程，如不同社会关系人员的大量通婚、社会流动的作用日益扩大、兼备不同社会类别人员特征的边缘阶层的形成等等。有些作者还断言说，边缘阶层是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总的说来，社会阶层也是不存在的，倘或承认它们的存在，那岂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分层论作出让步？譬如，У.А.斯捷潘尼扬说道：“还必须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社会阶层这个公式是不足为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单一的社会，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非单一性已经不带有因社会阶层归属不同而产生的差异”^②。

① Л.Н.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第6卷，第627页。

② У.А.斯捷潘尼扬著：《苏联的知识分子及其形成的基本途径》，载《哲学问题》，1977年，第1期，第22页。

在我们看来，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所包含的基本社会集团都很单一因而在其内部不可能再有阶层之分的说法，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其单一的方面，这就是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除此之外，它就很不单一了，因为劳动者的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彼此依然有种种差别。这些差别不但是跨阶级的，而且也是阶级内部的，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内部所存在的差异。因此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认为，用“阶层”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些差别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种简单地对待现实变化过程的立场在一个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那就是否认生活中已经出现的社会集团融合的幼芽。按照这种观点，所谓融合，那只是相互接近所达到的最终结果，但事实上，边缘阶层已经兴起，如不断出现社会关系方面不同集团人员混合组成的家庭军，这一事实足以证明，社会单一性因素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增长，融合的苗子今天已经出现。

这里尤其要谈一谈前面提到的工人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在党的文件中，对于那些在活动中“越来越协调地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在一起的”^①直接生产者，正是把他们看作是这一个阶层的。

最近，有人对“工人知识分子”这个术语提出了两条反对意见。

第一条是：在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应当划一条精确的界限，不然的话，说是会在统计上发生种种困难。譬如，在人口普查时，每个苏联公民都得在“社会身分”一栏中填明工人、职员或集体农庄庄员。^②诚然，规定是要有的。然而从辩证法来看，承

① Л. И. 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第6卷，第625页。

② 参见Л. А. 斯捷潘尼扬著：《苏联的知识分子及其形成的基本途径》，载《哲学问题》，1979年，第1期，第54页。

认质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否定边缘现象的过渡形式。恩格斯曾经说过，“Hard and fast lines〔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①。列宁对这个思想也表示过看法：“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的某些狭隘性和片面性，因为人的认识不能洞悉事物的全部复杂性。”^②这一点在苏联目前这一种社会情况下尤其要加以注意，因为它已经走完了一大段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道路，而且阶级界限也正在被积极地消除掉。正当我们致力于寻求消除差别的各种途径的时候，特别强调差别的做法是不足为取的。

前面已经说过（对这一现象作具体研究的社会学家也持有相同的立场），工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因此，就其社会身分而言，他们是工人，但是是具有知识分子特征的工人。他们的口袋中常常装有专家毕业证书，因而确定是一个边缘阶层。

第二条反对意见是：他们坚持说，提出工人知识分子这个新的边缘阶层似乎就是提出一种关于“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的观念”^③。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观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而辩证法的立足点则在于承认事物的发展过程即是旧事物的消亡和新事物的出现。苏联社会向社会单一性的运动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例外。无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各种新的现象。辩证法认为，新事物的出现一开始总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并为自身的发展不停地开辟着道路。早在1919年，列宁在群众活动中，就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55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212页。

③ 参见V. A. 斯捷潘尼扬著《苏联的知识分子及其形成的基本途径》，载《哲学问题》，1979年，第1期，第53页。

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成分、因素和幼芽，^①如今这些幼芽在各个生活领域中都已空前地增多了。而对于工人知识分子，也不能不把他们看作是新型的生产者。诚然，社会主义是产生不出带有新的社会属性的阶层的，然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出现什么一般的新阶层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现有的社会集团在相互接近，结果在其“交叉点”上形成了新的边缘阶层。

基本社会集团是社会结构的要素，它们不但相互间存在着社会差别，而且在内部也有着这类差别。成熟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单一性程度是大大提高了，但这种单一性还不是充分的单一性。

“社会阶层”这个概念所反映的，正是这个基本事实。要是我们能解释清楚这个概念在当代条件下的含义，那对于继承列宁的理论遗产将是大有好处的。列宁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和革命后的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时是经常使用“阶层”这个概念的。例如，列宁在1919年俄罗斯共产党（布）纲领草案中就提出了这样一项任务：“在工人先锋队的监督下把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普及到落后的工人中去”^②。

即便在今天，“阶层”这个概念也常常为我们党的领导人所引用。如A.H.柯西金就说过：“基于各个阶级和社会阶层在相互接近，各大小民族又建立了兄弟般的合作关系，一个历史上新型的民族之间紧密团结的社会共同体已告形成，这个共同体就是苏联人民。”^③

总之，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用什么术语，而在于对科学术语中所表述的新的变化过程持什么态度。社会学的概念应当做到既能反映现实情况，又能促进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8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90页。

③ A.H.柯西金：《十月革命伟大思想的创造力》，《真理报》，1978年11月5日。

第二，我们时常会看到，有人总想在思想上“跑得”比别人远一些。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说是当代的苏联社会已经没有阶级性了^①，这种说法已遭到了批判。不过类似的想法今天又被改编成另一支曲调在鸣响了。如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社会差别似乎只是一种“形式”，“不含有意义”等等。

这里特别要分析一下关于一类阶级和社会集团必然会“变成”另一类阶级和社会集团的论断。И.М.扎别林曾经说过，工人和农民充实知识分子队伍的结果，会使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都“变成”知识分子“阶级”。^②原来的工人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工程师的行列，这只是社会流动的一种局部活动，决不意味着整个工人阶级都将变成知识分子。

方法论上的这类立场还有一种类似的表现：有人把工人阶级队伍因为得到集体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人员的补充而壮大起来的现象说成是即将使各个社会集团都“变成”工人阶级。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技术员、工程师和一部分科学家都“计算”入工人范围之内，想以此来“帮帮”实际过程的“忙”。

这些作者从恩格斯的《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这篇文章中引证了一些话，想用来加强他们提出的所谓各个阶级行将变成工人阶级的论断。恩格斯在1881年曾经说过：“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

① 关于对此的批判请参见《共产党人》，1974年，第2期，第77—87页。

② 参见И.М.扎别林著：《人和人类》，莫斯科，1970年，第166页。

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①

从上面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所用的“工人阶级”和“生产者阶级”这两个术语指的不是工人，而是工作人员。恩格斯在这里所表述的意思是：工人阶级是被压迫生产者阶级中最终的一个阶级，他在创造社会，而在这个社会中他本身“不再是一个阶级了”，因为这个社会将整个儿由生产者和劳动者所组成。

知识分子中从事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确实跟工人阶级很接近，比如在物质生产部门，他们就常与工人一起被安排在同一个劳动集体里，那么能不能就此把这一部分成员“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呢？对于这个问题，苏联的一些学术著作曾经展开过积极的讨论。^②

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提出了两个论据。第一，他们引用了马克思的一个关于“总体工人”的论点，说这就是工人阶级的不同称谓。苏联学者所作的分析^③却表明，马克思所说的“总体工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阶级的生产集体的同义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集体跟整个社会一样，也具有社会单一性，但这种单一性是不充分的，因而属于同一个劳动集体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非生产性专业的专家和职员等）在这个劳动集体中正如在社会范围内一样，彼此也是有差别的。

第二，支持这种观点的人用来确定阶级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其他几个标准都被他们忘得一千二净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5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② 参见O. H. 什卡拉坦著：《苏联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问题。历史社会学研究》，莫斯科，1970年，第100页等。

③ 参见《科学共产主义及叛徒们对它的伪造》，莫斯科，1974年。

要是把这个观点进一步引申一下，那就会得出这样一点：知识分子一般是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的，它主要属于工人阶级（“工人知识分子”），有一部分则在集体农民之列（“集体农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争取达到无阶级社会的使命即被归结为两种所有制形式的融合。这一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对此已在上面作过分析。必须指出，另外还有一种“中间”观点，认为从事生产的知识分子是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的，而余下的一部分则应视为独立的社会阶层。这种“中间”观点完全是折衷主义的，因为知识分子内部的区别，即生产人员和在教育、卫生、管理等部门任职的其他人员之间的差别，正在变成跨阶级的差别，从而否定了苏联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社会集团的统一性。

向无阶级社会的运动既不要求把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和职员“变成”工人，也不需要把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变为”知识分子。阶级和社会集团相互接近的结果并不是现有社会结构中某要素并吞掉另外几个要素，而是将产生一个失却了阶级性的新的社会结构。

第六章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及其发展的辩证法

第一节

生活方式是一个社会学范畴

近二十年来，“生活方式”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质量”、“生活结构”和“生活风格”等概念，引起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学者的密切关注。这几个概念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等诸多因素，涉及面广，其综合性是无庸置疑的。在我们看来，这几个概念都是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理应阐明它们的精确含义，揭示出它们在反映社会生活现象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开展思想斗争所具有的价值。在这几个概念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无疑是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我们以为，它是理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而且与这门学科的其他一些主要范畴是紧密相关的。人们对这个概念越来越感到兴趣，是由国际和国内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科学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在进行对抗，这种对抗自60年代起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来说，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一些国家在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政策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这样，两种社会经济体系进一步进行和平竞赛的前景，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了。不管资产阶级世界统治阶级的愿望和意志怎么样，这场竞赛的焦点，是看哪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保证广大群

众享有现代人所能享受的生活方式。美国共产党总书记Γ.霍尔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千百万人的心目中，正在产生一个个用来比较两种世界体系的新标准。他们的看法不再停留在表面的对比上。他们不仅注意工业增长指标和物价，而且已把生活的整个质量方面放入了秤盘。”^①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原因，那就是：自从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成熟阶段后，加速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这就需要深入分析进一步发展苏联人民生活方式的道路。在这里特别受到注意的是有关国家制订远景发展规划的问题。为了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作出远景发展的规划，首先就要进行预测，而进行预测，就必须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关于生活方式的总概念，尤其要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道路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生活方式的实质时是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遗产为根据的。“生活方式”和与此相近的例如“生活结构”等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常常出现。生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指出，生产方式不仅是个人的体力上的再生产方式，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②

人们的生产活动，是生活方式中最主要的东西。这里所说的生产活动是广义的生产活动，其中包括人们对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的消费。生活方式跟生产方式一样，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对自然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记录》，莫斯科，1971年，第1卷，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4页。

所持的实际的物质态度，取决于技术设备和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即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另一方面又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及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基础的经济制度。

但是，“生活方式”概念有三个方面是不同于“生产方式”概念的。

首先，“生活方式”的着眼点是人们的活动方式。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活方式”概念，跟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实践”概念是相似的，二者都表示人们的活动特点。这样，生活方式这个范畴又跟“个性”概念产生了类同点，因为后者所说的个人，是指活动着的有生命物，生产方式无疑包括着一部分生产条件，因为社会生产力是由劳动工具和人一起构成的。但是，若是把劳动工具，乃至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条件都列入生活方式之内，这个概念的涵义未免过于宽泛，失却了本身的特点。

其次，“生活方式”概念不仅涉及到物质财富的生产，因而也不仅说明人们的劳动活动的特点，而且还涉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政治生活、道德等非生产性活动。人们实践活动的一切根本特点都被综合在生活方式这个概念中了。在这一点上，“生活方式”无疑又跟个性概念产生了相似之处，因为个性是社会生存活动各个方面的集中表现。

第三，生产方式概念在于表示整个社会的特点。各个阶级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上彼此是有差别的，统治阶级就处于支配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才有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学说。然而，“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却不适用于个别的阶级，更不用说是集团、阶层、家庭和个人了。

“生活方式”这一概念的情况却不同。首先，它表示整个社会的特点。人们的生活方式跟生产方式一样，也是在历史进程中

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低级的转为高一级的，这种变化意味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关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转化，因而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样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跟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所以有根本区别，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生活方式”这个概念有一点是不同于生产方式的，就是它可以用来表述个别的阶级、社会集团和个人的生存活动。譬如在阶级对抗发展阶段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就有根本区别，因而在诸如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也就谈不上什么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生活方式的两个极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依旧有一定的社会差别。这个概念还可以用来表述职业集团的生活方式（如矿工或律师的“生活方式”）和非正式集团、家庭、乃至个人的生活方式（如“他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意思既是指社会集团和个人的“生活格调”、“生活风格”，也是指生活方式、生活结构和个别人的行为风格。

诚然，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工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是由自己所处的境遇决定的。^①这里所指的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可是，在这种工人阶级共有的生活方式里面也可以区分出它的每支队伍、每个阶层、每项职业、以至个别工人的生活方式特点。当然，个别工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及其所属的社会来决定的。其他阶级人员的情况也莫不如此。

我们知道，科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各种过程的实质，也就是说，在于发现各种现象的根本特点并揭示出它们的相互联系。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给生活方式下这样一个定义：生活方式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01—402页。

一系列足以表明有关民族、阶级、社会集团和个人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下所从事的活动的根本特点之总和。^①由此又可推导出：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即是一系列足以表明人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从事的活动的根本特点的总和。这里所说的总和是指根本特点的有序列，因此这个定义也可以说是针对它们的系统而下的。

这两个总的定义若要进一步加以具体化，那就得根据唯物辩证法对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一番研究了。首先要探讨的，是关于人们的活动因而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跟生活条件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认为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是主要的，并承认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客观要求和需要是在人们一定的物质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会在人们的意识中不同程度地得到正确的反映，其反映方式即是产生进行某项活动的思想动机。为动机所驱使，人们会采取行动，以满足（充分地或部分地）这些需要，同时又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条件，而本身也得到了改变。

那么人们早先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又有多少介入到人们的活动范围之内呢？上面已经说过，把外界条件都包括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我们以为是不正确的。有些学术著作也确实把生活条件跟生活方式的联系看得太宽了，不妨举个例子：“对于‘生活方式’这个概念，我们是把它确定为：物质条件、社会经济关系以及足以反映整个社会业已达到的人类生活水平的文化形式这几者的广泛综合。”^②

① P. 霍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下过近似的定义：“所谓生活方式……就是人们生存活动一切基本形式的总和，它涉及到劳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涉及到家庭，也涉及到个人的消费范围。”（《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6年，第6期，第73页。）

② 《人—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分析科学技术革命的经验）》，莫斯科，1973年，第219页。

对于这种把生活条件同生活方式混为一谈的观点，我们是一再反对的。^①可是有人却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列为这样一些作者：他们“不但把人们生存活动的形式，而且也把这种活动的条件全部地包括在生活方式之内。”^②

不过，如果把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都排除在生活方式也即人们的生存活动以外，同时又完全否认生活方式有可能包含生活条件的若干因素，那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也是不足为训的。有人就提出这样的理由：“在客观条件和人们的举止、行为、生活方式之间，是存在着一个对客观实际的主观反映过程的”^③，说是不同的人由于对同一种条件会有不同的反映，因此他们的行为是各种各样的。”

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组织、政党、阶级、人民无疑是有某种选择自由的。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用来说明个人行为的个体特点，虽然也得考虑到，总的生活条件在个人的生活条件中会有特殊表现的。但生活方式首先就是人民和阶级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出发点就不能是个人命运中的偶然因素，而应该是外界条件和活动之间的普遍关系以及通过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人们目的和行动的一般机制。

这种一般机制是这样的：要劳动，首先得使用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则把前人付出的劳动予以物质化了。所谓社会条件，就是周围的人在以往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现有的整个社会关系网。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外界条件和人们活动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复

① 参见M. H. 鲁特凯维奇著：《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及其在苏联的发展》，莫斯科，1977年，第9页。

② A. II. 布坚科著：《生活方式：问题的内容和尚未解决的课题》载《哲学问题》，1978年，第11期，第42页。

③ A. II. 布坚科、A. C. 采普科、B. II. 基谢廖夫著：《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莫斯科，1975年，第4页。

杂 早先，当狩猎者还在亲手制作弓箭，捕鱼者还在亲自编织鱼网、刳凿独木舟时，劳动工具同其生产者是有机的地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那时的劳动工具可以看作是生产者身体器官的自然延伸。在这个时候，人们的劳动活动跟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妨说是“结为一体”的）劳动工具是密不可分的。其他一些活动领域的情况，如艺术创作，也是如此。在原始部落生活方式的记述中，人种学家对一个部落的生活方式、具体环境与其活动的物质条件是不加区分的。

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外界条件和人们活动的联系也大为复杂。一台已被掌握控制的车床和一部调试得当的轧钢机足以反映一个车工和整个轧钢车间集体的劳动活动的特点。然而，尚未安装或尚未控制的设备则表现不出有关企业工人的劳动特征。同样，工人新村中业已落成的俱乐部也只有从该新村居民对于俱乐部所提供的业余消闲机会的利用多寡中才能反映出他们生活方式中的文化生活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由家庭中拥有的日常用品决定的。如果一个家庭主妇身居设备完善的住宅，吸尘器、电冰箱、煤气灶或电炉等等一应俱全，那么她的活动特色和日常生活方式同那些仍需从井里汲水、用木柴生火、在地窖里储藏食品的主妇相比，就大有区别了。可见，生活方式又是人们的日常活动，而这种活动跟人们利用物质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是统一在一起的。

生活方式跟社会环境的联系更要直接些。社会环境也就是社会关系，人们的活动都是在这种关系中展开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提出的目标在于改变物质环境，但物质环境的改变与否却总是通过社会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目标则不同，它们都是直接指向改变社会关系的。不管是有关日常生活或改变夫妇双方关系这样一些小目标，还是象劳动者争取从剥削下解放出来

这样一些历史性目标，无不··如此。倘若我们以下面这一点作为出发点，就是人是在活动中表现自己的，是有活力的生命体，在人的身上集中着一个时代的种种社会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普遍的个性类型都带有这几方面的特征。比如集体主义就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一个主导方面，又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一条最重要的界限，也是一个新型的人所具备的典型特征。在这一点上，正如前一种情况一样，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包含着他在交往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一部分社会关系。至于阶级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那就跟有关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是密不可分的。

外界条件不但制约着人们的生存活动，而且还介入到这种活动中去，至于介入的程度，那就要看它们在人们的活动中究竟被“同化”了多少。但这仅仅是这种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第二个方面：凡是活动，都旨在改变周围环境和外界条件。生产劳动是创造消费资料和新的劳动工具。对周围的人的作用则改变着社会环境。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在人们能动的和有意识的活动跟环境、生活状况、教育对于人们所起的定型作用这二者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第一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说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以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而言，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首先决定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与其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特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而这种本质又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总之，生活方式是人们活动形式的总和，而人们的活动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既跟活动条件相统一，又在改变着这些条件。论述这个问题的专著和文章为数不少，它们提出的生活方式定义实际上跟这里说的是相合或相近的。И.Н.费多谢耶夫指出：“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正确地指出：生活方式是人们生存活动形式的总和，而这些形式跟社会的实际条件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积极地开展起来了。”^①

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其精神世界究竟有什么联系。上面已经提到过，人们的活动一般是离不开精神因素的，也离不开他们意识中所提出的理想性目标和按照总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系统所产生的心理动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活所持的态度跟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它使我们正确地认识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相互作用，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生活方式中的相互关系。

庸俗唯物主义对于人类行为所持的观点，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已经在那些受行为主义影响的学派中广为流传，它们把生活方式看作是个人的行为，而行为又被归结为对外界作用的反应。有一种看法不那么极端，在它看来，生活方式似乎包括着人们的全部思维活动，其中也包括人们的理性观念；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譬如，我们就不能把围绕对生活方式的认识所发生的思想斗争同生活方式本身混为一谈，这就象我们通常得把理论和实践加以区分一样。

实践作为人们的一种物质活动，它所包含的精神活动仅仅是对物质活动直接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社会的生存活动和生活方式包含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因为它们已成为人们的习惯，跟人们的日常行为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说，社会主义社

① И.Н.费多谢耶夫著：《关于社会的科学和社会进步》，载《新世界》，1977年，第11期，第164页。

会的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都直接表现出民族团结的感情。民族团结已成为苏联生活方式和民族关系的一个客观特征，也是苏维埃人的一大个性特征。

人们的思想方式是他们生活方式的表现，但是，被表现的东西跟受反映的事物并不是一码事。理论产生于实践并为实践指明方向，但理论并不等于实践。不少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在报告中对生活方式也作出了限定，认为它是人类活动的实践方面与其在思维中的反映，是人们的思想方式，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个人价值取向系统。卡达尔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已在社会上扎了根。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①。

不过，如果把生活方式完全归结为活动的精神动机和表示感情、思想的方式，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知道，这恰恰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那种总的立场。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社会生活时的根本区别在于以往的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最风行的那几个学派连“至多”也不够格。它们不但把人们的活动归根于动机，而且对动机的看法通常也是非常狭隘的。内中有一种看法正好针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我们知道，人们的意识里边是含有他们将要采取或正在采取的那个行动的理想性目标的，同时，这里面也含有人们对行动过程中和行动结局中取得的结果所作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有一部分则表现为人们在情感或理智上对行动、结果和活动条件所产生的满意感（或不满意感）。评价并不是孤立的意识活动，它与政治、道德、审美观、宗教等方面的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个人、阶级和社会的价值取向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真理报》，1975年3月18日。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页。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很重视研究价值取向系统，它的许多学派把人们的行为特征、作风和生活方式最终都归之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其中最风行的一种做法，是确定人们在这个或那个领域所从事的活动的满意感指数。确实，这些指数是一种手段，可以用来搞清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中各种主客观因素的联系。比如，人们对工作的满意与否，对于衡量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很重要。但是，个人或集团对工作究竟产生了多大满意感，并不仅仅决定于他们眼前的工作性质，而且还要看他们对更高级的工作究竟怀有多大的需求。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现实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本身不可能成为衡量生活方式的客观指标，因为它通过意识所显示出来的只是需要和满足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再者，第一，客观上的需要有可能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或者认识得不正确，这就象我们对自己行动中已经取得的结果有时也认识不清一样；第二，生活方式跟任何一种事物一样，也必须把它看作是发展的，也即有变化的。

我们花在这个问题上的笔墨之所以特别多，是事出有因的。西方在提出“生活质量”观念的同时（有关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讨论），又掀起了一个具体社会学研究的热潮，专事探讨如何测定对“生活质量”的“感觉”和“感知”，也即测定人们对自己的活动及其条件的各个方面所达到的满意程度。例如，1976年美国出版了一部名叫《美国的生活质量。感知、评价和满意感》的书，作者是密兹根大学的A.坎贝尔、P.康维尔斯、B.罗杰斯教授。作者的注意中心是“安宁”、“对生活的满意感”和“幸福”等范畴。他们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提出的角度却一样，即：您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何？他们的调查内容是受询人在收入、受教育程度、家庭状况、居住地点、年龄、性别、种族（白人 or 黑人）、职业等方面的区别。得出的结果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

不过，这样一来，事前就不必再去怀疑黑人、青年、离婚者、特别是失业者对于生活的满意感是低于平均水准的。^①对于我们来说，最要紧的一点还是指出，这种研究工作在方法论上的主要弱点是在于用满意感，也即用对客观条件的主观评价来偷换事物的客观特征。

象这样一种或者与此相类似的“生活质量”观，无疑都带有辩解性。它们（明显或不明显地）都带着一种说教：要善于控制需求的变化，以使大众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该书的出版介绍中就有这样一段话：“随着合众国二百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全国广大民众已开始感到，单是丰衣足食还不足以使人欢欣鼓舞，同时要激励和犒赏人们对生活本身的感受。”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于社会学家教授们的著作是大加利用的，在这方面他们很善于运用大众信息手段来发挥其作用的。

最后，我们还要根据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来谈谈“生活方式”的概念。列宁曾经说过：“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②人们生活方式中的共性，是从两个方面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首先是通过人类发展进程中相互更迭并带有特定生活方式的社会经济形态表现而成的。上面已经说过，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其表现形式而言，就是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在生活方式上的区别和对立。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不同的社会人口集团，如城乡居民、青年和老人、妇女和男人，在生活方式上各有各的特点，甚至连小群体、家庭和个人的生活方式也都带有自身的特征。

我们把生活方式的定义确定为人们活动中的主要特征的总

① A.坎贝尔、P.康维尔斯、B.罗杰斯著：《美国的生活质量。感知、评价和满意感》，纽约，1976年，第52—54页等。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09页。

和，是想以此来着重指出，这些特征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有规律地产生的，是必不可少的。再者，我们把人们的组合看得越是广泛，就越要指出他们的内在本质，而这种本质即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特征。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不同民族处于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兼备共性和个性的。按照这个观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差别，首先就表现在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上。目前，苏联已经达到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不少兄弟国家的人民也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而象蒙古这样一些国家则刚刚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阐明共性和个性，就得把能够比较的发展阶段作出比较。其次要考虑到因历史发展道路不同，甚至因自然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民族特点。苏联的苏维埃生活方式是统一的，然而它也带有各个地区、共和国、民族和种族的某些特征。民族差别是一种特殊的东西，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的最本质、最普遍的东西正是通过它来得到表现的。

上述看法对于认识目前正在社会学著作中讨论的那些专门问题是很重要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分类问题。我们觉得，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进行分类，应当把广义的社会结构，如社会阶级结构、居民结构、人口结构、民族结构等作为依据。关于消除生活方式中的社会差别问题我们下面再谈，如果在分类中对于局部的东西不是以共性作为出发点，也就是说，不是从苏联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的普遍的和根本的特征出发，而相反地只是根据个别的或偶然的因素，那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A.Γ. 兹德拉沃梅斯洛夫对苏联生活方式的类别所提出的分类办法遭到大家的反对就是这个道理。在他看来，人们在以下几种需要中总有一种是占主导地位的：立志为社会多做有益的工作，力求把家庭安排好，谋求个人的发展，作者把第四类归之为个性类

型，主要是“尚未明确个人要求”，“在个人的行为习惯中有不合乎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准则的不高尚的精神需要”^①。这样一种分类法，在我们看来，完全抹煞了社会差别，更何况在公有经济中为造福社会而诚实工作、建立正常的家庭并加以关心、求得个性发展等等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极大多数公民的特征，根本谈不上是哪一类人员的特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作为人们生活方式特征的日常生活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人们的生活方式必须包括道德规范，而这些规范已经融合在人们的习惯、生活和日常行为中，也就是说，已经变成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内在信念。可是我们能否就此认为把生活方式的定义确定为“日常行为”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呢？^②

人们生存活动的一些根本特征和主要方面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不可能没有反映，因为日常行为能够表现出活动的实质。比方说，苏联的工人平时一直在努力劳动，这固然是社会主义劳动态度的本质反映。然而，这种日复一日的劳动也在推动着历史前进。强调人们活动中的“日常”，就象在判别人们的精神生活时强调通常的意识一样，也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

把人们的生活方式说成是“日常”和“通常”的行为，在客观上只能使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两种生活方式的质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通常的意识所能得出的，只是莫斯科和巴黎的人们一样的吃饭、睡觉、走路和乘车。只有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实质中去，我们方能发现，处于相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在生活方式上究竟有什么差别。列宁早就预言

^① 参见А.Г. 兹德拉沃梅斯洛夫著：《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类型问题》，载《社会学研究》，1974年，第2期，第88—89页。

^② 参见Л.А. 戈尔德、В.В. 克洛波夫著：《人们的业余生活。日常生活和业余时间的社会问题》，莫斯科，1972年，第15页。

过，社会主义将“创造出人类共同生活的新的更高级的形式来”^①。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给生活方式下定义时特别要强调指出，这是人们生存活动的主要特征的总和和体系。给生活方式下定义，目的应当是为了阐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实质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存在的质的区别。

第 二 节

生活方式与个性形成

上面说过，个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体系这三者的主要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地一致起来的。

在成熟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一代新人的形成，跟他们生活环境的变迁，也即跟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这三大任务的执行情况，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②因而共产党给社会科学提出的任务也在于对这些几个彼此相关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综合研究。

在此，我们将按照原来的办法，继续探讨各种概念的辩证法，其中包括探讨能以表示个人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在个性形成中的相互关系的那些概念的辩证法。理论社会学在作经验研究时所采用的那些概念势必要加以具体说明，以便借助指标系统来揭示人们生活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关系以及人们的存在条件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评价、意向和计划之间的联系。面对生活的青年正处于个性形成最活跃的时期，因此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想多予以注意。

在培养年青一代的过程中，大量自发因素（如校内外同伴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1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73页。

影响，本地区 and 居住地点社会心理气氛的感染等）和教育集体、共青团组织、大众信息手段以及各种校外机构（少年宫、体育团体、游览场所等）所发挥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作用交织在一起并在相互起作用。

当然，现有的教育系统有意识、有目的地发挥的作用会影响到生活条件对于个性形成所产生的自发作用，因为生活条件本身就是由共产党、国家和社会团体根据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福利和文化水平的总规划建立起来并不断加以完善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个性发展的一般过程，其中也包括正在走向生活的社会成员的个性发展过程，看作是新人的形成过程和对劳动者，特别是对年青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也即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过程。

这样难免会涉及到某些概念的关系问题，如“形成”和“教育”同“个性的社会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后一个概念在苏联的社会学著作中用得相当广泛，对它的阐释也颇多分歧。例如《哲学百科全书》就对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指带有一定生物天性的人类有生命体获得他在社会上为生存活动所必需的各种品质的过程。”^①毫无疑问，个人是需要接受文化、吸收这种或那种社会品质的，并且这是个性形成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可是，不加批判地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中把“个性的社会化”这个术语直接借用过来的做法难道是正确的吗？纵令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这个概念总的说来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个性并不是生物学上的个体，而是已经“社会化了的”个体，是人的社会方面。个性宛如一颗水珠，它以特殊的折射方式，集中地反映出社会关系的整个汪洋大海。

在苏联的社会学著作中，由于“社会化”的含义被看得十分

① 《哲学百科全书》，莫斯科，1970年，第5卷，第66页。

广泛，成为个人和社会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个性的社会化”这个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就把个性的培养和形成这样一些概念给挤掉了。比如И. С. 科恩就明确地说：“社会化的过程即是个人掌握社会经验的过程，具体的个性就是在这个进程中建立起来的……”^①。然而，“社会经验的掌握”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具体的个性”，并不仅仅是自发地“掌握”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等的过程，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社会化”的自身。这也是社会环境、社会建制和社会组织对所施加的定向作用，是教育的过程和结果。

Б. Л. 帕雷金提出，“人的社会化”概念起初是“遭到反对”的，但现在“已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了”。他是怎样来看待这个概念的含义的呢？他说：“每一个个人在其成长和发展的全部历史中，跟他们的先辈一样，也在重复着这样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即置身于社会环境，对它进行适应，学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并担负一定的职能。”^②接着他援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虽然我们不知道马克思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定义的。这句话是：“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③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个人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而且是把二者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但Б. Л. 帕雷金所论及的，却只是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个方面又只被看到“一半”，因为他只着眼于个人对环境的适应。这一点要不要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应当把“社会化”理解为个人对社会规范的掌握，应当确定它和其他含义更广的概念的关系并对它们的联系作出分析。Б. Л. 帕雷金并没有这样作，因此他只是用“社

① И. С. 科恩著：《个性的社会化》，莫斯科，1967年，第22页。

② Б. Л. 帕雷金著：《社会心理学理论基础》，莫斯科，1977年，第1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15页。

会化”一语取代了个性的培养和形成这样一些传统概念。

资产阶级社会心理学对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社会化是指新生者在交际过程中不断把集团所接受的范型有选择地纳入自己行为系统的过程。”^①

苏联的某些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西方作者所下的这一类定义，作了一些修正：他们不再囿于跟集团的直接交往，也不再使用“新生者”或“个性”这一些字眼，而是用“个体”、“人”等等来取而代之。然而，这种修修补补的做法并不能改变事物的实质。“社会化”这个术语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概念系统而独立存在，它跟整个系统一样含有十分明确的意义。

我们不是“反对”使用这个概念，而是坚决反对把它的含义扩大化，使它把个人和社会的联系过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包括在里边。

上面已经说过（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科学术语的含义不是任意判别的，只有在枝节问题上才能通过“协商”的办法来加以确定。每一个科学概念在需要时都能被“录入”某一学术领域的概念系统，而且只有完整的概念系统方能对研究对象作出全面的反映。

“个性的社会化”和“个性的社会适应力”这两个概念是某些社会学家试图用来表示人掌握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过程，也即表示个性和社会环境二者辩证关系的一个方面的。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概念也显得很不确定，因为个人乃是已经“社会化了”的人。至于个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化这个概念中也是通过下面一种说法被“强行”塞进去的：“我们并不否认个人在掌握社会规范过程中的能动性。”在И. 科恩看来，“社会化的过程，根本不是个人对‘现成的’社会形式的消

^① Т. 舍布坦尼著：《社会心理学》，莫斯科，1969年，第404页。

极“适应”。^①这位作者承认个人的能动性实在是件大好事！然而，他却看不到，不管他对“社会化”概念被赋予的意义作多少补充说明，这个概念的主旨并不在于反映个人的能动性和个人在改变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活动特征。

我们认为，个性的培养和形成是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伦理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谓培养，就是国家、党、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家庭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总趋势规定的方向，对个性的形成和发展施加影响的过程。对此可以分三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1.各管理机关有计划地提出各种旨在改变个人存在条件的目标。比如说，要对青年进行劳动教育，就得解决许多问题，如确保校办工厂、职业训练教学中心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农村学校学生的劳动小组提供小块土地和技术设备，兴办并装备职业技术学校，出版刊物，扩充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院校实验室的物质技术基础等等。同时还得解决师资的培训问题。为了有效地开展体育教育，就要在学校和各区建立运动基地，培养体育教练。另外，家庭也能为培养青年的个性提供一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

2.单是创造条件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条件既有可能被利用，也有可能不被利用。大家知道，有些家庭在物质上为子女创造的“温室”条件，不但不利于对他们的劳动教育，反而养成了他们“坐享其成”的坏习惯。体育场所和少年宫有可能无人问津，校办工厂、实验园地和教学中心的工作也可能搞得懒懒散散。可见，教育结构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活动的组织工作，其中也包括青年人的活动的组织工作。这种组织工作一方面要求教师集体、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地方行政机关、共青团和其他机构有的放矢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求“教育对象”即青年本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73年，第3版，第14册，第580页。

身所成立的机构，首先是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积极开展活动。

把每个成长中的个人都吸引到学校和企业行政当局在党和国家机关领导下开展工作的集体中来，是适当利用物质条件的必要前提。A. C. 马卡连科20年代教育流浪儿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建立青少年课余组织的楷模。家庭的劳动教育要取得成功，就得让子女和少年儿童参加家庭的劳动活动，料理家务（若有家庭副业，也应让他们参加），让年青一代担负起他们力所能及的劳动职务。在体育教育上，学校和体育场则应建立起各种运动小组和运动队，等等。

3. 组织工作必须用思想工作来加强。所谓思想工作，就是狭义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照我去做”。大众信息手段，特别是电视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思想工作的影响和“榜样的力量”。可是，口头教育、说服帮助、以身作则如果不以相应的组织形式来加以保证，同时又缺乏一定的物质基础，不能使已经形成的信念付诸行动，那么，它们也可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从上述几点不难看出，教育就是对正在形成的个性有计划地施加影响，它必须使个人的活动得到发展，使个人的能动性得到发挥。个人既是社会环境作用的客体，又是赖以改变社会环境，从而改变自身的活动的主体。个人的自我教育必须列于教育范围之内。

人们活动中的主客观因素的关系，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最先揭示出来的。旧唯物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看作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那种片面观点，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被马克思批判得体无完肤了。

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所探讨的“个性社会化”和个性的“社会适应力”等理论，都（明确或不明确地）以这样一个哲学前提为基础：人是消极地适应社会环境，消极地接

受外界影响的。在这一点上，有些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如：社会环境是怎样改变的？是哪一种力量在改变着现有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此曾经作过回答：“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①换句话说，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活动，同时又是这种活动的产物。

在我们看来，个性形成这个概念最能概括地表现出个人跟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因为既是形成，首先就要有社会环境自发产生的和有目的地施加的影响，其次要有社会环境跟人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的改变周围环境的主动活动。苏联的科学历来注重研究各个劳动者集团在劳动和社会方面的主动精神的发展过程，也很重视年青一代在这方面的成长过程，并把它看作是形成新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要形成全面而又协调地发展的个性，那就必须全力发展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劳动主动性和社会政治积极性。

这几个理论问题跟应用社会学是直接相关的。在对完全中学和非完全中学毕业生调查征询时，常常要搞清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从父母、教师和朋友那里，究竟得到过哪些有关选择人生道路的教益。这一点对于作出生活道路的抉择，虽然是一个有促进作用的因素，然而，它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研究青年的职业定向，不但要注意教育者的引导和社会环境中足以影响不同性别的青年对于某些工种采取不同态度的客观情况，而且还要十分重视他们本人的劳动主动性和社会积极性的发展程度。因此，在调查中还必须询问清楚，学生们是否乐于参加校办工厂、校际联合工厂、职业训练中心、农村校办农场、技术革新活动小组、下乡下厂劳动这一些劳动课程，是否乐于参加运动队、旅行、课余文娱小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页。

及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的工作等等，这就是说，必须搞清楚学生们对待各种能够形成个性的积极活动的态度。

近二十年来，关于个人，首先是关于青年的社会定向和职业定向问题，由于关系重大，在社会上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响。实际上这是一个有关年青一代走向生活的问题。就社会学而论，最重要的还是研究社会过程中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年青一代的意向、计划跟客观因素的关系。

我们以为，这不只是一个职业定向问题，而是社会职业的定向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职业结构跟社会阶级结构总是紧密相关的。选择了工人的一种职业，意味着将跨入工人阶级的行列；考上了高等院校的某一个系，毕业后势必被补充到知识分子的某一支队伍中去。社会学总是结合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研究一切问题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学家必须（与心理学家、教育家和实际工作者一起）把职业定向当作一个社会过程来加以研究。

“社会”和“定向”所组成的术语，含义很广，凡“社会”带有的意义，它都能包含（见第四章）。如果从这个概念的广义出发，也即把它视为社团的同义词，那么，社会定向就是确定自己对该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及其通行的价值体系的态度。要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狭义的概念（上面我们正是把它当作狭义的概念来加以论述的），那么走向生活的青年公民所作的社会定向，就在于确定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地位，被充实到哪一个阶级、社会集团、社会阶层和社会队伍中去，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农村，从事脑力劳动还是从事体力劳动。当前，苏联的社会阶级差别首先是经济上的差别，因而这种差别在日常生活、文化、心理，也即在整个生活方式中还是继续存在的。有鉴于此，因此人

们的社会定向也就是根据全国人民共同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因而也就是对个人相应的发展道路作出抉择。

研究社会职业的定向问题，必须研究青年的生活计划问题。这两个对象在我们看来基本上是一致的。“生活计划”是安排生活的计划，是“对生活”的计划。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劳动活动，这样一来，“当什么人？选择什么工作？”势必成为人们生活计划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觉得有些社会学家所使用的“青年的个人计划”^①这个术语，含义太窄，是很不精确的。个人的计划跟个人计划并不是一码事。所谓个人计划，主要是有关“私人生活”的计划。当然，人们在计划个人的前途时，是把私人生活的安排考虑在内的，如男婚女嫁，生儿育女，为小家庭物色处所等等，但是，这一类计划首先就带有社会性，因为在这以前总得先选定自己未来的劳动活动范围。由此可见，把社会职业的定向问题归之于研究“个人计划”这种论断，是失之偏颇的。

青年人一踏上社会就要在现有的社会职业结构中去填补因年长者调职、退休、死亡等原因而空缺出来的某个“眼”，或者被安排到社会上新建立起来的工作单位。人们一代代交替，使社会结构不断地再生产，从而又使社会结构不断地向前发展。不过，这种再生产并不是简单的再生产，因为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也随时在改变着社会的结构。

年青一代的社会职业定向起步很早，在他们十五岁即八年级结业以前，就在进行第一次选择了，因此青年的社会职业定向不但受制于社会上已经形成的社会结构，而且至少还得顾及到它在近期内的变化情况。年青人大多羡慕较为高级的工种，他们在安

① 参见B.H.舒勃金著：《社会学实验（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莫斯科，1970年，第204页。

排生活计划时，对于社会需要一般都有点“朝三暮四”。这种情况尽管很自然，然而它对我们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得使他们的计划“脚踏实地”，使他们在安排计划时考虑到社会上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现状，以便使青年们对就业的实际需要，跟消除不受社会欢迎的某些工种并增加比较有吸引力的工作单位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步调。

对若干年以后劳动性质、劳动内容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情况进行预测，应当被看作是赖以确定青年人意识中正在形成的生活计划跟社会实际需要和他们劳动就业的实际可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

另外还必须看到，青年人的计划、目标、“理想”等等，都是社会客观需要在他们头脑中多少有点理想化了的主观反映。由于教育系统对于控制青年未来的劳动生活是有作用的，因此它在这一过程中能有计划地对他们施加影响。实际上这里有三个因素在交互作用，一是客观因素，也就是社会上对某些工种的需要；二是主观因素，也就是青年的生活计划；三是这两种因素通过教育系统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教育系统对于青年来说，是一个客观因素，因为它通过职业技术学校、中等技术学校、高等院校和各种短期训练班为他们提供一定数量需要某种专门社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工作。教育系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并不断予以完善的，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又是根据党政机关的决策来行事的社会发展的主观因素。

青年的中等教育行将全面普及，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普及以八年制（中等技术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十年制（技术专科学校、中等技术学校速成班和高等学校）为主的专业教育问题就亟待解决了。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有1,830万人接受了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根据苏共二十五大

示，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专业教育的三大系统将输送2,060万人，其中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将培养1,100万人，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将输送960万人。^①1976至1980年期间就业的青年人都是在60年代上半期出生的。60年代上半期是一个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时期（从1961年的520万人下降至1965年的430万人），再加上人口自然死亡率这一因素，到时候就业人口的总数大约是2,240万人。^②这就是说，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约有92%的青年人将进入各类正规学校接受职业训练。

要实现这个规划，就得进一步加速发展各种职业学校，首先是发展培养熟练工人、集体农庄机务人员、司机、畜牧人员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根据苏共二十三大、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的决议，职业技术教育系统自60年代中期起就加快了发展速度。1965年，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的毕业人数是110万人，到1977年则已增加到221.7万人。在这十二年期间内，职业技术教育系统所输送的熟练工人翻了一番多。^③

但是，从社会结构的发展前景来看，教育系统中象现在这样一种比例关系，还是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要求的，首先就满足不了培养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接班人的需要。

1975年，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全日制学校的招生数是19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是89.6万人，高等学校是59.4万人。这三类进行脱产职业教育的学校共招收了341万人，它们各占的比重是56.3%，26.3%和17.4%。1958年至1960年，每年出生的人数平均约530万人。除去5%的自然死亡率，1975年以前的年平均出生人数应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82页。

② 参见《1965年苏联国民经济》，第43、45页（数字由笔者计算得出的）。

③ 参见《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397页。

为520万人^①。这就是说，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末期，每三个青年人当中，有两人在劳动就业以前接受过职业教育，而另一人在就业前要么只受过短期的训练，要么所受的职业训练还很不充分，因而不得不在“工作过程中”，其中包括用个别授艺或集体授艺的办法，再学习一些职业知识。不言而喻，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今天，用这样一种办法来培养青年参加劳动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由于60年代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目前正面临着劳动力来源明显减少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根据全国各区域和各部门的发展情况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紧迫了。为了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信誉，把这类学校改造成职业教育和完全中等教育并举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是大有好处的。1977年，这一类学校的毕业生合计有33.7万人。^②

根据苏共二十五大的指示，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工人应增加1.6倍以上。1977年秋，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的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倘能实现，对于扩大培养青年工人这一支队伍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在决议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被看作是职业技术教育系统中最主要的一种办学形式。决议特别重视普通中等教育跟职业教育的结合。它提出：“必须大力发展技术专科学校网，并把这种教学形式看作是对普通中学毕业生进行职业训练的一条最有效的途径。”1980年，技术专科学校全年的招生数将是80万人。^③

① 参见《1975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76年，第556、683页；《1965年苏联国民经济》，第43页。

② 参见《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397页。

③ 参见《真理报》，1977年9月11日。

加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系统，为工业、建筑、运输、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扩充某些要由训练有素的工人方能担负的需要专门劳动技能的工种，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苏联共产党提出的这个社会政策方面的重要目标，目前完成起来确实还有一定的困难。

第一，国内各大工业中心和科学中心的职业技术学校所招收的新生，有一部分是来自别的地区，主要是来自邻近的农业地区的。1978年，基辅的职业技术学校通过这种途径招收的学生就占71.8%^①。目前，很多地方对于把城市中学八年级和十年级毕业的学生吸引到这一类学校中来的工作，开展得还很不得力。苏共二十五大指出，必须更加注重学生的劳动教育和青年的职业定向。^②苏共中央肯定了奥尔斯克市委在开展青年的劳动教育，职业定向，帮助他们深刻理解劳动者的作用，让他们争取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经验。^③1976年，奥尔斯克（奥林布尔克州）有55%左右的中学毕业生当了工人，38%的八年级学生升入了职业技术学校。苏共中央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在校学生的培养工作，让他们今后能担负起需要专门技能的体力劳动，跨入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行列。

苏联宪法在宣告公民享有劳动权的同时，又补充了一条：“有权按照本人的意愿、能力、职业训练和教育状况，并根据社会需要，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工种。”^④因此，职业定向系统既得全面考虑社会的需要，也得注意培养每个青年人的能力和志趣。把职业技术学校改造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就能使这项任务完成得更快一些。此项改造工作有许多城市和共和国已近于完成。比如，

① 参见H.纳拉基莫夫：《我进工厂》，载《真理报》，1979年1月26日。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82页。

③ 参见《共产党人》，1977年，第13期，第6页。

④ 参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第40条。

1976年到1977年教学年度，阿尔美尼亚已有70%的职业技术学校变成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到1980年则将全部改为此类学校。^①列宁格勒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

第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的发展状况是不平衡的。据统计，1976年该系统输送的熟练工人在全国10,000人中间有83人。这个指数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当于93，而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人口出生率尽管很高，但指数却低得多：乌兹别克斯坦是61，塔吉克斯坦是41.3。^②目前，全国各地区正在按照本地区的人口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远景，对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在逐步进行调整。

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使社会关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就必须使每个青年在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现有社会集团的一员时，不但具有普通教育的程度，而且还得通过以下各类学校接受职业教育：（1）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院校；（2）以十年制普通教育为基础的技术专科学校；（3）作为专业学校主要形式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4）以八年制普通教育为基础的职业技术学校 和 夜校（鉴于有些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急于参加工作，保留一部分此类职业技术学校，以便培养从事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工种的人，还是可取的）。普通中学，首先是农村普通中学对于培养专业的机务人员和畜牧工作人员是有成效的，它们在青年的职业训练工作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般地说，学校对于解决年青一代的成长问题是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

① 参见C.米卡耶良，《要有合格的接班人》，载《真理报》，1976年8月24日。

② 参见《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481页；《1975年苏联国民经济》，第10—11页（数字是由笔者计算的）。

普通中学的教学和教育工作，搞好在校学生的劳动准备》的决议要求学校加强劳动教育，让学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职业。决议中说：“苏联的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坚决地把学校的办学方向转为搞好青年在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的准备，并让他们对口选择自己的职业。”^①

这就是实践向我们提出的关于青年踏上生活道路，接受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首先是接受靠劳动谋生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解决这一些问题的过程中，所有的社会学家，不管是搞理论工作的，还是搞具体社会学研究、向管理机关提供咨询的，都能起很大的作用。^②我们尤其要研究一系列理论问题，如年青一代成长和培养过程的实质，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统一性，个人能动性在其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个人能动性的培养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同全体苏联人民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关系等等。

第 三 节

生活方式的质量与数量特征。

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

上面我们谈论了关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总概念，现在再来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不过，在此之前先得搞清生活方式的质量特征和数量特征的关系，以及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等概念的内涵。在这方面我们也非借助于辩证法不可，因为“质量”和“数量”本来就是辩证法的范畴。

判断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特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住社会

① 《历届党代表大会、党中央全会和代表会议决议和决定汇编》，莫斯科，1978年，第12卷，第586页。

② 参见《高等学校是改变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因素》，莫斯科，1978年。

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即区别于人类进步前一个发展阶段的质的规定性。目前，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大体相当的，然而，即便在这种状况下，二者的区别也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加以规定的。不过，我们在具体描述这种规定性时，还是需要指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具有的一系列相互有关的特点，因为它们能显示出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特征。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物体（过程）由于与别的物体（过程）发生着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因而具有的质是很多的。^①要搞清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跟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质的区别，只要比较一下两个社会关系体系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也就是个性的基本特征）就行了。

首先，这是社会关系性质的根本区别。剥削、贪得无厌、压迫、竞争已让位于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一致利益、集体主义、同志式的团结、相互帮助和社会主义竞赛。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这个特点，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政治权力转移到以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为首的劳动者手中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因为工人阶级兄弟般的团结和相互支持的精神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也是新型个性的主要特点。

其次，这是民族、种族和部族相互关系方面的根本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到处充满着民族和种族利己主义、怀疑、仇恨和相互疏远。其极端表现就是希特勒分子、当代南非统治集团、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国种族主义分子所实行的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而代之的，是劳动者的国际主义兄弟情谊、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以及通过相互帮助而使各民族的经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576页。

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渐趋一致。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这个特点，已经同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血肉相连，它是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产物，因为工人阶级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下进行解放斗争的。国际主义同样是社会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的个性特征。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这两个基本特点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据统治地位这个客观基础上产生的。M. A. 苏斯洛夫指出：“这个基础为把全体劳动者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全体劳动者自觉地、创造性地进行合作，使各民族和各种族的友好相处和相互接近，创造了客观条件。”^①

第三，社会性的乐观主义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Л. И. 勃列日涅夫说过：“每一个人都向往着明天，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对于这种社会需要，我们已经有条件来予以满足了。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的胜利。”^②这个特点是整个社会固有的，它贯穿在每个社会人员的世界观与其活动中，因而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性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所具有的乐观主义世界观，跟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对前途疑虑重重，对社会缺乏信念这种处世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特有的乐观主义世界观是有其产生的客观基础的，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按照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这个宗旨有计划地进行以及社会对其成员的关心。近年来，西方不断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通货膨胀又有增无减，从而使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区别就显得更有意义了。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这些重要性质特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就是新的社会制度以及该制度所培养的个性的特点。列宁

① <M. A. 苏斯洛夫言论与论文选集>，莫斯科，1972年，第612页。

② Л. И. 勃列日涅夫著：<遵循列宁的方针>，第5卷，第70—71页。

曾经指出：“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做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①

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这些区别，也就是社会关系体系的区别，人们的生存活动即生活方式的区别，以及人们的个性特征也即他们社会属性的总的特征的区别。它们涉及到每一个活动领域：劳动、日常生活、文化、社会政治活动和“实际道德”，即道德准则在人们现实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所谓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发展它的全部性质特征。

生活方式的性质常常要在“生活质量”这个概念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由于西方提出了“提高生活质量”的种种方案，从而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中广泛地流行起来的。有时它也见诸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现在先来看一看导致产生这个概念的原因。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社会学界一直把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问题全都置于“生活水平”、“生活标准”、国民总产值或人均收入这些范畴内来加以考察的，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从数量这个角度来观察这些问题的。我们知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原来就比苏联和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所遭受的损失又不一样，结果，二者在经济上的差距拉得更大了。这种状况使得按照生活水平的平均指数来比较生活方式的办法先声夺人，宣传起来“十分有利”。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群众福利事业的发展速度都超过对方，从而不断地缩小了彼此间的差距。早在50年代末，资产阶级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必须注意全部生活条件。而“生活质量”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84页。

这个术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流行起来，随之又风靡于世的。未来伦理学派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杂志曾经载文说“单凭国民总产值是难以检验真正的福利的，这样就导致人们去寻找衡量‘生活质量’的新办法”^①。

必须指出，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家中，至今仍有许多人抱住这种旧的比较法不放。比如，法国社会党的著名活动家J.R.莫克在他的《原子时代之社会主义。新的比较法》一书中，就表现出这种态度。他的论据都是按照美、苏两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额来得出的，他没有看到两种社会体系在物质福利的分配原则上是有质的区别的。^②

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政论家的著作中，对于“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并未下过精确的定义。很多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英国社会学家M.阿勃拉姆斯指出：“近些年来，关于“生活质量”问题，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书，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言论。然而，作者当中很少有人想给这个用语确定一个精确的含义，因为大家都担心弄不好会使它变成一句“陈词滥调”^③。这句“陈词滥调”固然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他在使用过程中还是有所演化的。

在60年代，资产阶级的思想界曾经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是可以避免发生经济危机的。这种观点在“富裕社会”、“大众消费社会”等理论中表现了出来。在这些理论的作者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极限的，因而有关提高“生活质量”的各种问题都无须经过具体的社会改革而一一予以解决。“生活质量”这个术语是美国著名经济

① 《未来主义者》，1974年，4月号，第94页。

② J.R.莫克著：《原子时代的社会主义》，巴黎，1974年。

③ M.阿勃拉姆斯著：《生活质量》，载《繁荣世界》，1974年，11月号，第4页。

学家J.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写道,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处于“经济成熟”阶段,因此它能够为“全民福利”提供保证,并大大提高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

自60年代末开始,西方出现了通货危机,加上青年风潮此起彼伏,犯罪、吸毒现象有增无减,自然环境的污染情况日见严重,原料资源又面临枯竭威胁,凡此种种都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能否解决社会问题这一点,丧失了信心,于是,人们在“生活质量”的看法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态度。而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加剧,特别是因为70年代中期出现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就变得越益强烈了。1975年,工业生产有所回升,然而,这根本改变不了局面。到1979年下半年,又出现了新的生产衰退的征状。^①统治阶级力求从降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阶级的生活水平上来寻求出路。Л.И.勃列日涅夫指出:“现在大家看到,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编造的神话之一——似乎当前的资本主义能避免危机的神话——已经破产。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变得日益明显。”^②

“生活质量”观念与政治显然是有联系的。西伯林社会学家Г·德列伊采尔在1974年于多伦多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社会学会议上正确地指出:“改善生活质量与其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口号。”然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它的含义也是模糊不清的,因而不同的政治势力在使用这个口号时都赋予一定的内容。这个口号对于生活质量所否定和贬斥的东西比之它正面提出的规划要明确得多。这一点从1973年美国出版的一部由D.希尔主编的多名作者的论文集的书名上即可看出:《美国的生活质量。周围环境的污染,贫困,暴力和恐怖》。该书作

^① 参见《真理报》,1979年9月10日。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8页。

者把提高生活质量跟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克服贫困、消除民众暴力行为，使百姓从恐怖中解脱出来这一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M·纽埃尔的《生活质量》一书更加详细地列举出与这个概念有关的各种问题。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的主要问题是人类正在丧失他的自然环境。其他的问题是：汽车成灾，人情淡薄，“成批生产”岌岌可危，“百无聊赖”，神经病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湮没无闻等等。^①该当消除的消极因素于此表示得够明确的了。可是如何加以解决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同的政治立场就一一暴露出来了。

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P·德鲁克曾经指出，垄断集团对于“生活质量”概念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所采纳的“改善”生活质量的种种规划，是持赞许态度的。他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生活质量的提高应当为各个企业开辟无尽的潜在市场。”^②换句话说，“提高生活质量”的规划能使各个公司赚大钱，同时又毫不动摇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统治权。这就无怪乎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政治家们竟如此广泛地使用“生活质量”这个概念了。比如，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党人就人云亦云地把这个问题归结成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保障；所谓“生活质量”，即是“照顾好孩子”，“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仁”，“生活中具有小小的但不无紧要的乐趣”等等。

英国保守党有一个宣言，叫“更美好的明天”，内中说道：“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上的繁荣同生活质量的提高应该是并驾齐驱的。”^③

① M·纽埃尔著：《生活质量》，悉尼，1972年。

② 《今日当如何培养未来之企业家》，纽约，1969年，第128页。

③ 《生活质量》，载《保守党调查局》，伦敦，1973年7月，第190页。

·社会民主党人也很赏识“改善生活质量”这个口号，在不少国家中，他们已把这个口号变成他们制定政纲的一项原则，比如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制定1985年以前的政纲时就是这样做的。该党主席B·勃兰特在演说时把“改善生活质量”称作是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对内政策的主要任务，他在一部名叫《展望未来。预想中的结果》的著作中又在努力探索这个原则的含义。B·勃兰特把改善社会关系（包括“摆脱恐惧和贫困”，“使劳动人道主义化”）和保护周围环境这两大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理论家Э·埃普勒虽然对“使人们的生活具有应有的质量”这个口号，按照“伦理社会主义”的精神，作过全面阐释，提出过它的理论依据，然而，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术语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他说：“如今我们虽然都在谈论生活质量问题，但我们并不了解它的含义，更不知道如何实现它。”^②别的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样在大力宣传关于改善生活质量的必要性的论题。

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的“生活质量”观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在吁求两大社会体系的趋同，因为它们所探求的，乃是总的“工业文明”的问题。

他们所运用的“生活质量”概念尽管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观中多少也提出了有关人们生活方式中的质与量的相互关系问题。

坚持这种观念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把生活的质与表现为生活水平的量对立了起来。譬如，前面提及的《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的作者就断言说，要提高全球范围的生活水平——这自然

① B·勃兰特著：《展望未来。预想中的结果》，汉堡，1974年。

② Г·埃普勒著：《生活质量》，载《生活质量。第四次国际工人工业工会冶金工人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72年，第86—87页。

是指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生活水平——势必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原因首先在于人口增长迅速，自然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正在枯竭。^①这几个作者所提出的经济“零点增长”方案实际上就意味着要求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在他们看来，在物价不断高涨，资产阶级国家正在推行“硬性经济”政策，即压缩社会拨款的情况下，要取得较高的“生活质量”，就必须使劳动者放弃提高工资的要求。

要解决好生活方式中质与量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后者确实表现为生活的水平，而且有时又能用数量指标来加以测定）首先就得承认，“生活质量”跟社会制度是紧密相关的。由于资本主义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的进步势力得出了一个结论：要获得质量更高的生活方式，并能不断地加以改善，那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在运用“生活质量”这个概念，并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本质在社会领域内的反映。它们利用人们对“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提出了从根本上来变革社会的纲领，以此来对抗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政党所提出的纲领。比如O·纽曼在德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性机关刊物上著文说：“数量确实会转化为质量……设法消除当前的灾难，决不是对现有制度进行修葺装饰。为了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提高生活的质量，必须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民主的和反垄断的坚决措施。”^②

我们以为，突出生活方式的质量特征，总的说来，还是正确的。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条件地接受“生活质量”这个术语。另外，苏联的一些作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也分别对它注

① 瓦·密多乌兹、瓦·3密多乌兹、T·兰德尔、贝连斯著：《增长的极限》，纽约，1972年版，第44页。

② 《共产党人报》（法兰克福），1973年，第5期，第67页。

入了不同的内容。有些人认为,“生活质量”是一个用来测定自然环境及其对人们影响的那些数量指标的系统,也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①我们觉得,把生活方式的质归之于生态环境的状态是很不恰当的,因为生活方式中最本质的东西乃是由社会制度来决定的。另一些人认为,凡是无法从数量上来加以测量的需求,人们都是从这个范畴来衡量其满足程度的。^②这种观点把生活质量化作了评价,也就是说,把它给主观化了,同时又排斥了这个概念中最为根本的,“可以”从数量上来加以测定的经济需要。另外还可以列举出一些不很恰当的定义。不过,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在采用“生活质量”这个概念时是用它来确定生活方式的质的方面的。^③

我们觉得,运用这个术语,必须注意一个情况,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已经把它弄得“眉目不清”,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对它的阐释也颇多分歧。我们以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概念——生活方式作为根据,同时又考虑到它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及其质和量的变化。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倘若要正面用到“生活质量”这个术语,事先总得搞清它的含义,指出它与生活方式概念的特定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谈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这两个概念的关系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是在相应地表示人们生活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对此我们未敢苟同,因为那样一来,生活方式似乎就只同社会制度,也即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发生关系了。还有一种观点更加片面,在它看来,生活方式概念在于表示人们福利的性质特征,而生活水平则主要是表示

① 参见《经济问题》,1974年,第12期,第8页。

② 参见《社会学研究》,1974年,第2期,第61、62页。

③ 如H·什拉伊弗培因著:《“生活质量”观应为谁服务》,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第7期,第52页。

人们福利的经济特点。^①在这里生活方式被说成是旨在显示福利的质，而生活水平则在于表现福利的量。然而，生活水平（更不用说是生活方式了）并不等同于福利状况，它不仅是物质福利的水平，而且还是文化和教育的水准。在我们看来，生活方式这个概念对于社会生活的特征反映的角度是很广的，因此它跟社会本身一样，也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而并非仅是人类生存活动性质方面的特征，只有这样来看待问题，我们才能对这个概念作出正确的解释。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特定的生活方式，而在这特定的生活方式范围内又存在着一定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决不能把生活水平看作是对生活方式的“补充”。进一步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事业，并提高其水平。苏共二十大所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社会规划就题名为：《关于社会发展和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规划》。《1976—1980年期间国民经济的基本发展方向》这一文件指出：“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生产效益的基础上保证更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始终不渝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完善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②

就是从发展远景上来说，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质与量两个方面的联系大体上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首先得进一步完善社会制度，并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1990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内苏联在这方面将跨出很大的一步。在未来的十五年中，我国的物力和财力跟上一个五年计划相比，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这就为解决我国

① 参见C. П. 斯特鲁米林、Э. Е. 皮萨连科著：《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兼论方法论问题》，载《哲学问题》，1974年，第2期，第27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75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社会经济的主要课题创造了新的条件。

如果从人均收入来进行比较，目前最富裕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是超过苏联的，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所享受的福利和文化待遇，却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下性质全异的生活方式又有着广阔的前途，各种表示福利待遇和文化水准的数量指标将会不断提高。即使以今天而言，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也有着全然不同的特点，首先就是物质和文化财富是按劳分配的。资本主义的症结，如饥饿、贫困、失业、有组织的犯罪现象等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已被消灭。第二是社会主义能为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提供可靠的保证。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计算大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是法国和联邦德国的一半，而到1977年，则已是美国的56%，并超过了法国和联邦德国1973年的收入水平。^①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均收入指数上超过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已为期不远了。

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下的生活水平进行科学的比较，首先得分析一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所取得的进步。1978年苏联每个职工的物资供应量水平同1913年相比，在工人方面增加了9.2倍，在农民方面增加了14.3倍。^②在1971年至1975年期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 actual 收入增加了24%，预计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再增加20—22%。随着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资供应量的增加，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整个服务领域活动的改进和保健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也将不断发生变化。苏联共产党1976—1980年期间的社会规划提出了一项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任务，并有条款来加以具体规定，如“增加居民的收入”、“扩大服务行业的种类并增加其数量”、“提高劳动者的教育程

^① 参见《197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54页。

^② 同上书，第192页。

度和文化技术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工作”、“加强对周围环境的保护”等等。^①

西方把“生活质量”跟生活水平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有目的的，那就是通过含糊地许诺改善“生活质量”来分散劳动者的注意力，避免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切身利益、反对通货膨胀、失业这一些实际上在降低他们生活水平的现象而进行斗争。由此可见，关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中，都具有付诸实践的直接“出路”，并且对思想斗争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总之，生活方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在于表示人们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条件下所从事的活动的特点，并带有质和量的属性，原因在于生活方式是由整个生产方式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消费水平。换句话说，要搞清人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数量上来了解他们的生产和消费情况：他们是半饥不饱、衣着困难、住房简陋、文盲比比皆是，还是营养丰富、拥有设备完善的住所、穿着丰裕、起码接受十年以上的教育、并有交通工具代步等等。忽视群众的生活水平，宣扬贫穷和平均主义曾是空想共产主义不讲文明的典型表现，而如今这些东西却被一股敌视马列主义但又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来加以掩饰的思想接过来使用了。

掌握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这一种关系对于制订规划是至关重要的。不注意人们需要的变化，不关心他们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和预计会发生的变化，就难以提供可靠的远景规划。进行规划，首先是进行长期规划，必须对生活方法的发展情况进行预测并把它当作依据。而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及其发展道路形成一个完整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76页。

而又全面的看法，不仅对预测消费结构和生活水平其他方面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预测旨在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

从理论上来研究生活方式的观念，目的是为了建立起“操作”的概念。如果我们把生活方式定为主要特点的系统，那么这些特点不仅要反映出事物的性质特征，而且还得以必需的数量指标来予以表示，进而对生活方式进行模式化。可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哪些方面应当算作是主要的，也就是说，这个系统究竟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另外，究竟哪一些数量指标可以用来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诸方面？

这几个问题并不简单。比如说，包括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无疑就是劳动。而劳动的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予以决定的：劳动是自由的，是为本人进行的。然而，劳动的性质（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又是由整个生活方式决定的，因此它不仅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生产率和机械化程度有可能很高，也有可能仍然在搞生产率很低的手工劳动，这种劳动目前在苏联也还没有完全消除掉（见第四章）。对此是可以借助一系列数量指标，如劳动生产率、技术装备和动力装备等等来加以表示的。如前所述，劳动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预测今后的劳动发展情况，就必须从上面这些指标中选择出一个或者把它们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来作为检测的标准。

我们在研究生活方式的别的侧面时，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例如，采用哪个指标方能分析出居民的健康状况？是不是他们目前的平均寿命数？新生儿第一年的死亡率？还是每一千人中拥有的医生数？可以用来表示居民的健康状况因而也就是表示其生活方式

一个方面的指标是很多的，然而，按照一定的方法，从中选择一个或者把几个组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却是件很困难的事。

目前已经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模式是很多的，它们都由数量不等的成分所组成，其中每一个成分实际上就是一个“侧面”。最简单的一个区分办法就是分出工作时间所搞的劳动和非工作时间所进行的主要活动。这种区分办法对于研究劳动者的时间安排还是有用的，而且也合乎逻辑。然而，当我们需要进行比较周密的研究时，这个模式用处就不大了，因为人们在非工作时间进行的活动是极其纷繁复杂的。比如说，人们进行的私人副业劳动活动，按此就得归入非工作时间类的，因为在社会学文献中，所谓工作时间，通常只是指化于公有经济活动的时间。这个问题要专门讨论，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我们看来，既能反映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活方式一定的质，又能用数量指标来加以测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侧面”：

1. **劳动**。在这方面数量指标所应表示的，是人们的劳动在社会经济和生产条件上是否得到了改善，劳动的创造性有否加强，自动化和机械化程度有否提高，手工劳动、专业性不强的劳动和重体力劳动的比重是否下降了。

2. **福利，消费和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数量指标应表示的，是居民的收入有否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有否提高和改革，住宅建设的规模有否扩大，居住条件有没有改革，各种能以减轻家务劳动、改革生活条件并把技术设备引进日常生活的服务项目和服务范围有没有增加和扩大。

3. **教育和文化**。对此，数量指标应予反映的，是劳动者教育程度（指平均学习年限）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后者的表现形式是对文化财富需要量的增长，改善对居民的书刊、报纸、电视机和其他文化必需品的供给状况，扩大劳动者参加文艺创作活动的领域。

4. 居民的健康状况。在这一点上数量指标应予表现的，是医疗服务工作有否改善，环境保护工作有否加强，妇幼保健和幼儿教育条件有否改变，人们的寿命和有效活动的年限有否延长，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是不是增加了。

5. 社会政治活动。在此数量指标应予表示的，是劳动者在社会管理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否加强，他们在各级苏维埃，党、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各种会议中表现得是否积极。人们的社会政治积极性还表现在一个方面，就是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积极参加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运动。

这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几个主要部分，而每一个部分又是需要用一整套数量指标来加以表示的。由此可见，数量指标不仅能应用于全国范围，而且也能应用于城乡居民、各共和国和各地区、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甚至能应用于不同年龄组的人。

当然，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模式时，是可以从不同于上面所列举的那几个“侧面”出发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生活方式概念区分成不同的要素。不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生活方式的每个能以表示质的规定性的方面都必须用数量指标来加以表示，否则就难以建立起生活方式的模式，也难以对生活方式进行预测，因为这是需要数量计算的^①。

此项工作在我国实际上才开始进行。因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切不可不顾生活方式的质和规定性“泛泛地”搞生活方式的模式化。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西方学者论述“生活质量”指标的著作一方面固然要予以应有的重视，但另一方面却不可把他们提出

① 芬兰的一些学者为了研制社会指示器，仅就保健一项就提出了169项统计指标（见《生活方式、社会目标和社会测量》一书，1973年赫尔辛基出版），即此一端便可看出，这项任务是何等复杂。

的模式照搬到社会主义社会里来，否则的话，我们觉得，将是错误的。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有几位学者在H. 杰尔列茨基主持下提出了几个有关“生活质量”的要素：健康与安全，教育，居住环境，“生活质量的最高指标”。最末一项的数据是五花八门的，如自然保护区的数目、演员的数量等等。^①

这几个方面分别都配有一整套数量指标，借以判断那些用来达到既定目标的手段究竟有多大效用。例如，第一个“侧面”就采用三项指标来加以表示：平均寿命、丧失劳动力者的命运、暴力犯罪行为的相对数（以10万人作为一个统计单位）。作者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的暴力问题已变得十分尖锐。据统计，美国10万人死于罪犯之手的就比某些西欧国家高出若干倍。如70年代初，克里夫莱市每1万名青年人中就有334人毕命于暴力行为。^②不难发现，H. 杰尔列茨基的模式完全排除了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这两个部分，而在“健康”一项中公民的个人安全又被看得过分重要了（这是符合美国的国情的）。

用数量指标来直接比较不同质的生活方式只会把事情搞糊涂。若要比较苏美两国（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国家的情况也如此）的数量指标，始终得考虑到两种社会体系和苏美两种生活方式的根本区别。用于表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特征的指标必须自成体系，并照顾到事物的动态和今后将产生的结构变化，以便用来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情况作出预测。

第 四 节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辩证法

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必须把进一步完善社会

① 《管理科学协会管理科学报》，1973年，第10期，第1176页。

② 参见《消息报》，1978年2月3日。

主义的生活方式看作是共产主义因素在其中不断出现、成熟和发展，而残余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各种反社会主义现象同时被铲除的过程。列宁曾经指出，在任何一种现象中随时都可看见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①因而完善生活方式也就是消除城乡居民和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差别并加强其统一性的过程。

这一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无疑是有联系的。消除全国人民统一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所存在的社会差别并加强其统一性，即是消除各劳动者社会集团和城乡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在成熟程度上的差别。这一点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是有其统一的共产主义发展方向的。成熟程度的差别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而且还见诸于城市或农村的每一个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内部，其表现形式就是各个家庭和个人在生活结构、生活情趣和生活风格方面的区别。如果把苏联确立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解释为全体公民目前都已过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那是很片面的。必须把生活结构的规范和它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出区分。处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发展阶段，人们所过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并非都能称得上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场为肃清人们各个活动领域所残存的非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而作的斗争。不能不看到，旧社会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余毒至今仍大有市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进一步改进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强调指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诸如“……贪财受贿，好逸恶劳，奢侈浪费，酗酒现象，流氓行为，官僚主义，待人接物麻木不仁，破坏劳动纪律和社会秩序”^②等反社会主义丑恶行径仍时有所闻，我们党正在为铲除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59页。

^② 《关于进一步改进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第5页。

这些余毒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

消除这些严重危害社会，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相对极”的东西，乃是件头等大事。目前有许多公民的行为只是基本上符合社会主义的规范，肃清他们生活方式中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那些因素，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肃清资本主义的余毒不仅在物质领域和经济领域要进行，在思想领域也要进行。有时能听到这样一种意见：问题既然是消除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余毒，那只要安排好共产主义教育这项工作就行了。毫无疑问，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社会上各类先进人物所进行的教育工作是要提高其水平的，而且这是完善生活方式，从中清除旧社会的种种“遗毒”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然而，这个目的光靠采取教育措施是无法达到的。进一步改善劳动、生活、休息和整个社会关系的物质条件，对于改变人们的意识、行事的精神动力、道德、实际行为因而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必须看到，苏联的社会生活在物质上也还没有完全符合成熟社会主义的要求。有很大一部分手工劳动，有时是很繁重的劳动，仍未配备机器和机械设备；有一部分家庭尚欠富裕；有些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使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有机可乘，结果不能不妨碍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完善。

物资供应量的增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个性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这种增长又是人们本身提高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而得的结果。要是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发展得比福利增长的速度慢，那就很有可能养成人们对生活的“消费”态度。共产党一再提醒人们防止产生“物质至上”、“消费第一”的心理现象：“在改变物质条件的同时，必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否则我们将使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现象再度复发。”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包括建立新制度在内的一般发展过程看作是新旧事物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共产党人》杂志的一篇编辑部文章指出：“我们知道，生活中在对社会主义的逻辑描述和基本理论描述同社会主义的具体历史发展情况之间，在理想和实际本身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形而上学的一致性……”^①。文章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敌人抓住社会主义的原理与其尚有消极因素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这一点大做文章的作法，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驳。

以共产党为首的各支进步的社会力量正在跟人们生活方式中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那些现象进行着斗争。旧事物总是要让位于新事物，而新事物则在不断产生、成长、积聚着力量。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方式即便在今天也已带有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某些因素、特点和苗子。共产主义特征在生活方式中的逐步产生和发展，是与那些背离社会主义的现象不断被消除，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成熟程度的提高同时发生和发展的。

共产主义因素首先是在劳动这一人类活动的基本领域中壮大起来的。千百万工人、农民、职员和专家所参加的社会主义竞赛以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发展，是当前苏联人民生活方式中共产主义因素增长的主要趋向。

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政治活动领域中也在不断发展。我国广大公民在业余时间常常为社会组织进行义务劳动并积极参加各级苏维埃和工会、党、团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工作。1975年，在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中，当选代表有220余万人，其中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共占66.7%。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各级党委和支部委员会的人员共360万人，占苏联共产党员总数的25%以上，而在二十五大召开前夕，则已增加

^① 《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其现实》，载《共产党人》，1979年，第11期，第18页。

到436万人,占党员总数的27.6%。每个党员又都担负着党所委派的这种或那种工作。无偿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和管理社会事务,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个特征即包含着共产主义自治的某些因素。1977年对新宪法草案的讨论具有真正的全民性。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4亿,占全国成年人总数的五分之四以上。社会政治积极性如此高涨在我国还是没有先例的。

社会为全国每个公民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入发展,这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幼芽在日益壮大的具体表现。1977年的宪法通过立法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公民在社会经济方面所享受的基本权利,劳动权、休息权、健康保护权,因年老、疾病,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力,失去扶养者而享受的物质保障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和使用文化成果权等等。该宪法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为扩大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使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纲领的实施而不断得到改善提供了保障。”^①

就完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而言,有权获得有保证的、能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领取劳动报酬的工作,是一项最重要的权利。^②必须指出,苏联的劳动报酬是在不低于国家额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范围内来加以规定的。而这种有保证的最低工资又在逐步提高。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部门工人和职员每月最低工资是70卢布。60年代中期,集体农庄也开始实行有保证的月薪制,从而使集体农庄庄员在这一点上跟工人大大地接近了起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采取措施同时提高最低工资和国民经济非生产部门任职的各类中等收入工作人员的工薪。一个提高最低工资和职工工薪的新阶段已经到来。”^③

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第39条。

② 同上书,第40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76页。

非生产部门中等收入工作人员的调薪工作全国各地已于1979年全部结果。结果有1,800万人增加了工资,这样在五年时间内,全国就有3,100万人增加了工资。^①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在成熟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公民不论工作成绩大小均能免费或以优惠的条件享受一定数量的物质和文化福利(超过这个限度的福利和服务项目应自费解决,这样就能刺激人们努力去工作),而这些福利费用也是由社会消费基金支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消费基金是国民总产值中的一笔专款,专门用于保障个人的成长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它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消费基金。

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从整体上来说,是超过国民收入、工资和其他劳动收入的增加速度的。1940年,社会消费基金所提供的津贴和优惠,按人口计算,每人是24卢布,到1965年则已增加到182卢布。在1974年至1979年期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提高了19%,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收入增加了26%,而社会消费基金的支出,按每人每年平均计算,则从312卢布递增到484卢布,也就是说,增加了29.5%。^②

社会消费基金提供的津贴和优惠在劳动者实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否提高,其中有一点是决定于那些主要靠社会基金来得到满足的需要(在教育、保健、疗养、住房等方面的)在增长速度上是否超过了对全部物质文化福利的需要。

目前,居民们从社会消费基金中所领取的对家庭非在业人员(儿童、学生、领养老金者、产妇)的津贴和优惠,还只能部分地贴补其实际开支。进一步提高这种基金在满足上列需要方面所

① <真理报>, 1978年11月30日。

② 参见<消息报>, 1979年2月3日。

起的作用，就可以逐步消除各个家庭因构成不同而产生的生活条件上的不平等现象。而目前这种基金尚不能充分地起到平衡各类居民的生活条件的作用。由于各类劳动者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所有制之分，居住地点有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小城镇之别，加上子女数量不等，工作部门和主管单位又有区别，因此免费或以优惠条件提供的福利在他们中间分配得是不均衡的。除此之外，福利支付还取决于需要的发展高度，如对受教育的需要等。社会调查证明，凡家庭的人均收入越高，对教育和文化福利的要求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消费基金中对这类家庭所支付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津贴和福利也就越多了。因此如何更快地增长社会消费基金并处理好它们的使用问题，便成为共产党的旨在扩大社会平等的社会政策的重要方针之一。

社会主义社会为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就其本质而言，是完全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施行的社会保障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劳动者群起反抗，为自身的权益展开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在战后增加了一些以社会为目的的开支。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却利用这一点提出了一个纲领，说是要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具有最低收入保障的“全民福利国家”。比如法国的总统顾问L. 斯托莱留就有这种想法。不过他的态度是够谨慎的了，说是他的“社会最低收入”的设想，要到本世纪末方能实现。^①法国的共产党员专家们却令人信服地指出，当前法国有1,12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要想解决这一“贫困消除”问题，就得对社会制度来一个根本变革，斯托莱留所提出的办法只会使贫困更加扩大。^②

苏联的公民既享受权利，又必须执行自己的义务，二者不可

① P. 斯托莱留著：《有保证的最低收入政策》，载《预测分析》（巴黎），1973年，第12期，第47页。

② B. 马克思著：《斯托莱留、格鲁松、罗马俱乐部——的危机》，载《经济与政治》（巴黎），1975年，第246期，第7页。

分割。宪法指出：“每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苏联公民在其选择的社会主义有效活动领域中认真劳动，遵守劳动纪律，是他们的义务和光荣的事。逃避社会主义有效劳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是不相容的。”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分配，是社会赖以控制人们执行其首要义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共产主义因素在分配中是在有规律地增长的，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削弱，相反应加强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完善按劳分配的原则并提高每个公民为共同事业在劳动中多作贡献的责任心。达到这几个目标的途径是：第一，使收费分配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与其价值进一步接近起来（这方面的缺陷常导致产生投机倒把和其他不良现象）；第二，完善工资制度，以不断提高它的刺激作用，促使各行各业的职工努力劳动并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只有通过这条途径方能克服劳动的社会经济非单一性，从而扩大实际生活中的平等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分配是有其深刻的辩证法内容的。由于对劳动的刺激紧密关系到社会保障外的福利和服务支出及工资制度的完善，因而对劳动的刺激利用得越充分，就越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国民收入和社会消费基金增长得更快，而消费基金的增加，则又使社会保障的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这样，财富的免费分配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同在别的方面一样，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完善也是跟消除背离社会主义的各种现象以及共产主义因素在内中的增长，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辩证发展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方式的统一性是通过消除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城乡居民阶层现有生活方式上的差别而不断得到巩固的。消除社会主义生

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第60条。

活方式上的这一些差别是跟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转变为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这一点同时发生的。

根据生活方式是人们生存活动的主要特征的总和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一点：生活方式中的各种社会差别是通过人们彼此相关的主要活动领域来加以消除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是把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问题跟改变社会结构，使之向社会单一性方向发展的问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要使1976—1980年期间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继续向前发展，首先得使“苏联社会上的各个社会集团和城乡居民的福利和文化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进一步接近起来”^①。

关于消除阶级、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差别问题可以从全国范围来加以研究，也可以从城市或农村单独地加以探讨。目前，大多数社会学研究是采用第二种办法的，因为按照这种办法似乎能把一种社会差别跟另一种区分开来，使研究工作变得容易些。其实，60年代的研究成果就已表明，农村生活方式中的主要社会差别，跟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种差别并不是集体农庄跟国营农场（及其他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之间的区别，而是劳动性质有别的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从Ю. Б. 阿鲁秋尼扬的统计材料来看，在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如果把从事手工体力劳动的职工从社会经济中所得的收入定为100，并按各类农业企业的平均收入计算），从事手工劳动的有专业技能的人员的收入是127，机械师的收入是156，职员是135，专家（包括中层干部）则是233。^②

不过，专家的私人副业收入是大大低于平均水平的，这样就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76页。

② 参见Ю. Б. 阿鲁秋尼扬著：《苏联农村居民的社会结构》，莫斯科1971年，第119页。

缩小了他们跟其他人员的差距。如果把这个因素估计在内，那就不妨把农村各个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最大差距看作是2:1。

文化上的差距是不能这样直接地来加以测定的。比较简单的做法是着眼于教育程度（学习年限）和文化需求水平（按下列指数来进行统计，如报纸订阅数，书刊及日常文化用品的购买和拥有量，看戏，看电影，上俱乐部的次数等）的区别。要是我们对各类成年人的教育程度作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国营农场的青年工人和集体农庄的青年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Ю.В.阿鲁秋尼杨在调查研究文化要求时所注意的对象跟调查收入时略有不同，是杂工、机械师和专家这三类人员。从他的统计材料来看，鞑靼共和国各大村镇中“经常读报的人”，在第一类人员中占64%，在第二类中占82%，在第三类中占97%；“经常收听广播的人员”分别占71%，4%和91%；“常常看电影的人”分别占19%，53%和44%；“经常阅读文艺作品的人”分别占20%，27%和53%。^①

总之，从大多数“文化需求”的指标来看，鞑靼共和国在这方面的差别，早在60年代中期，就不大明显了。1979年，В.И.斯塔罗维洛夫在勃良斯克区也进行了调查，从一系列文化指标的调查结果来看，该区的各类农业人员差距也不大。比如，经常读报的人，在国营农场的专家中占92.6%，在集体农庄的专家中占89.9%，在双方的机械师中分别占98.7%和98.5%，在从事专业性劳动的人员中分别占90%和87.6%。“经常收听广播”，“时常收看电视”这几个指标的数字出入也很小。不过，积极借阅图书的人在专家中所占的比重比之其他社会集团要高得多（国营农场中占78.9%，集体农庄中占91.5%），指数最低的是从事

^① Ю.В.阿鲁秋尼杨著：《苏联农民居民的社会结构》，第157页。

畜力、人力劳动的人(国营农场中占6.1%,集体农庄中占19%)。

在社会学研究中,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探讨得不及农村生活方式那么多。不过,从迄今所积累的一些资料中已经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集团的差别在各大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消除得最为迅速。O·И·什卡拉坦所主持的研究工作证明,在列宁格勒这个科学技术进步中心,人们的工资水平差距是很小的。据统计,1970年的月平均工资,熟练工人是142卢布,从事专业脑力劳动的人员是133卢布,担负管理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是191卢布。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也不大。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的家庭人均收入是:熟练工人和从事执行者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是75卢布,只有各生产集体的领导干部略高于平均水平,计82.6卢布。^①

有关社会政治积极性的统计资料证明,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其他活动领域中也在相互接近起来。据统计,1970年在列宁格勒的熟练机器制造工中,共产党员的人数占15%以上,在工程技术人员集团中占17%。二者参加社会工作的情况也如此。从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指标来看,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差距。比如,体力劳动者的家庭藏书量平均是102本,而工程师和技术员则是150本左右。在受询问中间,不管他们是哪一个社会类别的人,总有75—78%的人员每周读书不少于两本。每周读书不少于一本者,在工人中占30%,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占20%左右。1976—1977年的复查资料表明,根本不读书的人员在各个工人阶层中所占的比重已在下降,在非熟练工人中占18.2%,在熟练工人中占4—5%,在高度熟练工人中实际上已不存在。就读书的数量而论,整个工人队伍跟生产部门的知识分子差别已不大,不过在家庭藏书量上二者的差别却没有消除;工人的平均

① 参见Л.С.布利亚赫曼、O.N.什卡拉坦著:《工程技术人员、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莫斯科,1973年,第168—169页。

拥有量是120本，工程师是200—300本。^①

Л.Н.卡甘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彼尔姆两个州的城市居民生活也进行了社会调查，也取得了相似的结果。情况是：工人、职员和专家这三类人员的家庭所拥有的文化用品在数量上已没有多大差别。如备有电视机的家庭，在工人中占82.8%，在职员中占91.5%，在专家中占82.9%；备有收音机的家庭分别占93.4%，90.6%和82.9%。^②

城乡生活方式，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相互间都在逐渐地接近起来。对于这一些接近过程都要进一步作具体社会学研究，而在研究中则应考虑到苏联各共和国和地区在这方面的特点。以哪一种方法论来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上面说的那些总的方法论原理要进一步加以充实，并且对生活方式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性质也要有一个估计。

一般说来，只指出“联系”、“系统”等等而不揭示联系的性质，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由于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对生产力、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三者的相互作用作出解释，因此它是我们赖以正确理解生活方式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基础。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然而，上层建筑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恩格斯接着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③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这些原理，对于考察不同社会集团在生

① 参见Л.С.布利亚赫曼、О.Н.什卡拉坦著：《工程技术人员、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莫斯科，1973年，第170页；《社会学研究》，1977年，第4期，第43页。

② 参见《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第1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200页。

活方式上的接近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苏联当今的社会条件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大类人员的收入水平，比之他们的文化和教育程度，差距要小一些。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工人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和各支队伍（集体农民和专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的教育程度差距却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不同劳动报酬便是其主要区别了，因为劳动报酬涉及到人们的劳动条件、繁重程度、责任大小、所属的经济部门以及因气候条件恶劣（指北方）而给的津贴等等。由此可见，每一种具体情况都要作具体分析，这样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别消灭起来步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对于这种非同步性，我们也不应夸大其词。目前有一种说法，似乎社会上的经济状况几年或者至多十年就会有一个变化，而“文化类型”的变更则是用完全不同的时间单位来加以度量的，对此我们是断难苟同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是一个统一体，它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在不同的时限内，更不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向前发展的。

苏联各社会集团和城乡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是按同一个方向，以相同的时间向前发展的。

总之，消灭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的社会差别，意思是指扩大和增强人们生活方式中的共同特点，同时，这个过程又无一例外地贯穿在整个生活领域之中。成熟社会主义向着更为单一的社会的发展过程（参见第五章）同时就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发展并演变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过程，这就是二者的辩证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前景进行规划和管理，已越来越广泛地涉及到生活方式的一切方面。我们要更加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以便及时发现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从而不断用新的内容来充实社会发展的客观辩证法。